

序

书名 : 炼狱 (1229大罢食)
作者 : 编委会
出版和发行 : 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
PERSATUAN PERSAHABATAN
PHOENIX MALAYSIA
8.03, Tingkat 8,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承印 : POLAR VISTA SDN BHD
出版日期 : 2006年7月
定 价 : 西马 RM20.00
东马 RM21.00
ISBN : 983-43161-0

我国各族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与封建压迫，争取国家独立、自由、民主、进步与繁荣的斗争，是发生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空。它可以是既往的历史，被记载下来或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可以体现为当下的各项政、经、文、教和社会的具体斗争，以及对未来社会制度和理想的持续奋斗和追求。

前者涉及记忆与遗忘的矛盾，也涉及历史诠释权的争夺。简单的说，被遗忘了的“历史”当然从此泯灭，无法承传下去。而被垄断了诠释权的“历史”，也只能是“胜利者”的独白，无法反映人民斗争的真相。

因此，整理历史文献和资料，编撰各族人民在各领域的斗争事迹，是完全必要的。其实，追忆个人曾经参与过，却逐渐淡忘的斗争历程，实际上就是抢救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不让它因为被遗忘而泯灭，或在当权者的垄断下，被蓄意地加以篡改。

稍可告慰的是，近年来一些机构和/或出版社，如文运、朝花、诗巫友谊协会、21世纪和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等，都越来越自觉地在进行著这项保存记忆和“抢救”历史真相的工作，而且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

本书以1973年12月29日政治扣留者被迫进行47天大罢食事件（简称12·29事件）作为主轴，收录了关于20世纪60-70年代政扣者在华都牙也营、麻坡营、太平监牢、太平甘文丁营和砂拉越营等几场反迫害罢食斗争的事迹。它可说是迄今为止，反映政扣者在营内开展反迫害斗争，较具代表性的一本著作。

以《炼狱》作为书名，是因为在被镇压期间，政扣者所遭受到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煎熬，无异于生活在“人间地狱”！然而，政扣者的斗志和牺牲精神，却充分体现出“宁可站著死，也不跪著生”的高尚情操，誓死捍卫政扣者的人权和尊严，焕发出永恒的光辉！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经过将近33年，仍然能够相当完整地把一批当事人亲自整理和总结出来的珍贵历史文献、当年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的各有关声明、媒体的报导和国内外支持者的文宣等，如实地呈献给读者。

这些第一手资料，其真实性是毋庸质疑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好多位劫后余生者，还追忆了他们自身的遭遇和罢食期间的所见所闻，写下了悲愤的控诉和动人心弦的感想！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是凝聚了当年许多政扣者、家委会和国内外进步党团的斗争、智慧和牺牲，和现在许多同志的努力和付出的结果。

试想一想，若当年营内的政扣者，在暴力镇压下不敢开展和坚持罢食斗争，和在罢食结束后进行总结；若当年营外同志和国内外进步党团，没有发动支援行动和撰写各种文宣；若

没有“有心人”把各种资料加以收集，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地善加保管；若工委会没有毅然地负起编辑和出版的工作；很难想像，这本书能够以目前这样的面貌和大家见面。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政扣者在付出了宝贵的健康、甚至性命换来的。本书和近年来人权组织所收集的许多资料，已经充分证明，内安法令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对政治扣留者精神的摧残和人身安全的威胁，已经到达非常严重的地步。

因此，当局必须立即废除这臭名昭彰的恶法，并成立独立的调查庭，公开及透明地调查自内安法令实施以来，有关当局所犯下的一切罪行，并把犯罪者控上法庭；而所有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则必须给予适当的赔偿。

此外，本书也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当权者为了达到镇压政治异己分子的目的，是绝对不会手软，也没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因此，在扣留营内，除非是在非常特殊和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应该轻易采取绝食斗争，特别是无限期绝食斗争这种形式。一旦采取，就必须宁死不屈、坚持到底！

在此，本工委会除了要向当年参与各场斗争的战友、家属和国内外各进步党团致以崇高的敬意之外，也要对已经牺牲或病故的战友，表示深切的哀悼。这些同志包括在营内牺牲的冯朝民（甲）、苏辉祥（槟）、阿末雅典（柔）和黄水生（柔）等；出营后不久就逝世的布汉鲁丁医生（毗）、黄春树（雪）、郑亚苟（毗）、温瑞展（槟）、李林（彭）和林金泉（甲）等。

以及由于健康受损，出狱后因病早逝或发生意外事故逝世的，则有槟州的傅连美（车祸）、李国权、徐公民、陈福麟、陈福兴（在冲凉房跌倒）、傅捷益和刘完信；吉打的黄少明；吡叻的黄乙新、刘朝天、刘倩、毛谭今和卢迪；雪兰莪州的郭祖锋、谢林金、胡汉光、黄吉彝（从屋顶跌下）和许玉文；柔佛州的叶秀明（车祸）、梁广西、周纪泉（周野山）、温锦源（粉刷屋子跌倒）、周雅明、张发起、陈金枝、蔡鹏程（车祸）、蔡小华和黄斗垣等同志。由于匆忙收集，难免有错误或遗漏，尚请原谅。

最后，还要感谢这次参与收集资料、编辑和翻译工作的翁秀君、颜永才、赖顺吉、朱齐英、李万千、陈松生；惠赐佳作的彭展发、叶新田、韩佑平、吴维湘、李耀华、林裕、翁秀君、陈炳权、曾天生、黄天祥、陈松生、林子亮、陈雪文和李万千；及负责审稿的陈凯希、陈炳权和祝俊雄等同志。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

2006年6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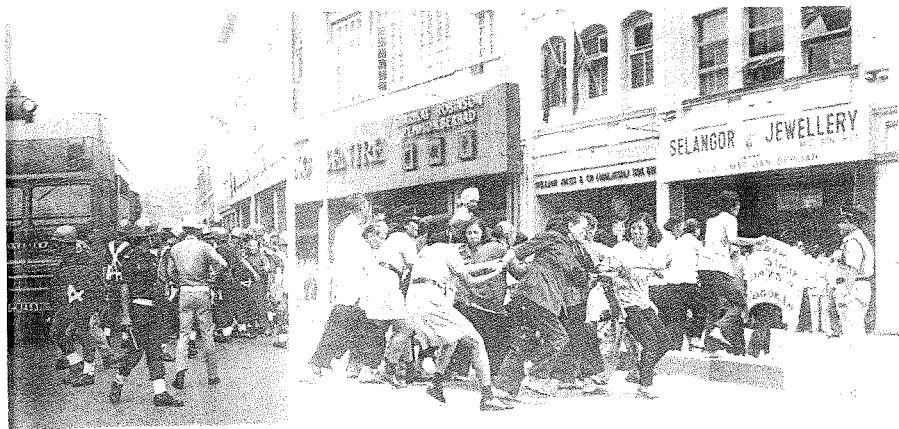
目 录

序

第一章：12·29事件大事记	3
第二章：历史的见证	33
(一) 黄水生同志的遗书	33
(二) 悼文	37
(三) 王其辉部长的《招降书》	39
(四) 报导	
(1)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41
(2) 太平营男战友的战斗	49
(五) 劳中派对12·29斗争的总结	63
(六) 暴力压不倒正义斗争	81
第三章：家属与各界的支援行动	97
(一) 家属支援活动简记	97
(二) 在国会路和平示威	102
(三) 家属委员会告社会人士书	106
(四) 向首相请愿	109
(五) 联盟政权必须对黄水生的死亡负责！	114
(六) 严厉谴责联盟政府迫害政治拘留者	117
(七) 营内传来结束罢食斗争的消息	119
(八) 雪州家属抗议当局违背协议	121
(九) 救救病重垂危的政治拘留者	123
(十) 其他团体的支援	127
附录(一)：致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书	128
附录(二)：要求停止对政治扣留者	
进一步迫害备忘录	131

第四章：政治犯狱中的控诉	141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	
前言	141
(一) 华都牙也扣留营之行	143
(二) 历时共四十七天之绝食抗议行动的根由及事情经过	144
(三) 太平拘留人的同情绝食	148
(四) 手铐及住院治疗	151
(五) 结束四十七天绝食行动的协议	153
(六) 行动党的建议	155
第五章：国际声援	161
(1) 英国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	
a. 致马来亚政治扣留家属委员会函	161
b. 向拉扎克法西斯政权提出强烈抗议	164
c. 致电报坚决支持爱国志士及其家属	165
d. 坚决支持250政治扣留者的绝食斗争	166
e. 太平扣留营及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政治扣留者的近况	169
(2) 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学生会	
a. 致马来亚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函	176
b. 致纽西兰总理函	178
c. 报界声明	181
(3) AMPO 杂志特别报导	
——马来亚政治扣留者的血债！	183
第六章：悲愤的回忆	189
(一) 47天大罢食始末（12·29事件追忆）	189
——彭展发	
(二) 47天绝食斗争片断回忆	204
——韩佑平	

(三) 意志力与体力的重大挑战	212
——叶新田	
(四) 挥之不去，忘也忘不了！	215
——吴维湘	
(五) 一名前政扣者在报界	218
——曾天生	
(六) 冰霜雪压心犹壮，战胜寒冬骨更坚	223
——陈炳权	
(七) 我们为什么坚持47天的罢食斗争	226
——林裕	
(八) 回忆扣留营生活	233
——李耀华	
(九) 我的回忆	237
——黄天祥	
(十) 血染的丰采	240
——林子亮	
(十一) 扣留营绝食斗争的体会	249
——陈松生	
(十二) 内安法令下的暴行	256
——李万千	
第七章：营内其他罢食斗争	263
(一) 华营5·26绝食斗争	263
(二) 太平监牢8·28绝食斗争	284
(三) 华营3·25绝食斗争	286
(四) 麻营8·13绝食斗争	305
(五) 砂营10·9绝食绝水斗争	312
(六) 记一九七六年“3·2”事件	315
附录：	
(一) 永远窒息不了的呼声	319
(二) 响应自由和正义的呼声	324



本章简要地叙述了发生于1973年12月29日，即12·29 我国政治扣留者大罢食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当局进行迁营并藉以镇压扣留者的预谋，及47天大绝食的起因、过程和惨遭暴力对付的真相。同时，也简介了扣留者在家属、国内外进步党团和人权组织的广泛支援下，发挥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斗志和牺牲精神。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付出宝贵的健康与生命）之后，争取到最后的胜利，维护了政治扣留者最起码的福利、尊严和人权。本章可视为全书的概要。



第一章：12·29事件大事记

(一) 时代背景：1969年5·13流血事件及1971年2月恢复国会

1969年5·13流血事件过后，国家宣布紧急状态，进入以敦拉萨为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MAGERAN)的统治之下，我国民主制度宣告死亡。直到1972年2月才恢复国会，敦拉萨正式取代东姑，实施更为严峻的各项土著主义政策。

(二) 1971年8月12日：阴谋镇压政治拘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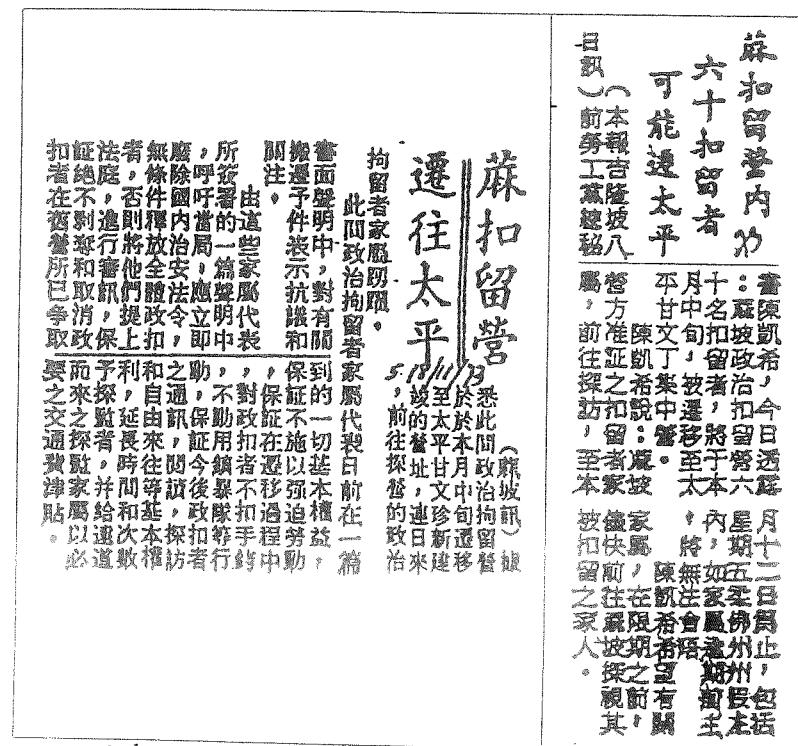
在上议院通过国内安全法令时，副内政部长摩哈末耶谷在总结辩论时称：在不久之后，西马政治扣留者的死硬分子，将被遣送到太平的自新中心，以学习谋生技能。一项进一步镇压政扣者的阴谋，显然正在酝酿中。

(三) 1973年8月13日：具有政治野心的加沙里沙菲被委任为内政部长

(四) 1973年11月：开始调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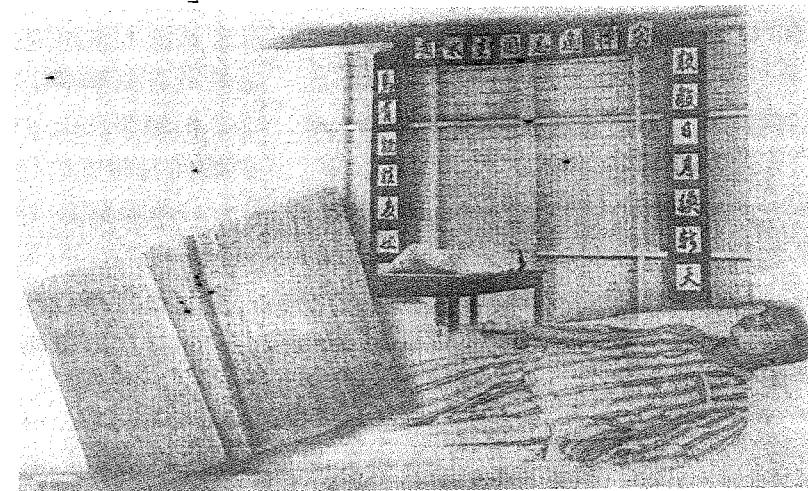
当太平甘文丁扣留营(简称太营)建竣之后，当局就决定关闭麻坡扣留营(简称麻营)。原来关在该营的60名扣留者和

部分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简称华营）的扣留者，被送往太营。当局企图实施所谓让扣留者“学习谋生技能”（如木工、裁缝之类）的“自新计划”，事实上是把政治扣留者当成刑事犯，剥夺他们学习和活动的时间，为营方提供廉价劳工。在扣留者的坚决反对下，太营的作坊形同虚设。调营后华营共有政治扣留者 96 人（A 座：60 余人，B 座：20 余人，C 座：12 人），太营则有 160 人（男区：139 人，女区：21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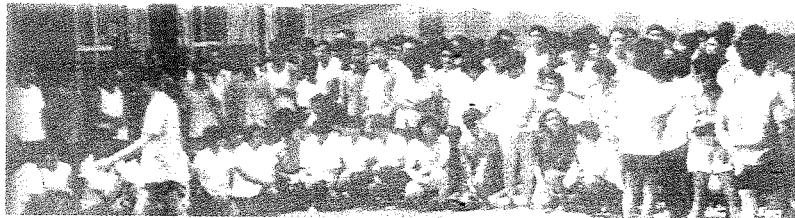


(五) 1973 年 12 月 29 日：黄水生同志不堪敌人的迫害，于太营以死抗议，自缢身亡。这是拉扎克集团迫死扣留者的另一罪行。

太营七区扣留者，在当天清晨做早操时，发现少了黄水生。经过一番寻找，终于发现黄水生同志已经自缢身亡。他留下一封遗书，控诉是由于营方没有提供应有的医药照顾，在忍受不了病痛折磨的情况下自杀的。（《遗书》全文见第 33 页）



太营全体扣留者悲愤地向营方提出抗议和交涉。营方基本上接受代表的要求，包括：代表会见黄水生家属，亲交其遗书；准许全营扣留者举行追悼仪式；营方须付予黄水生家属丧事费及其他费用（后来查实营方并未履行此项承诺）。全体扣留者，在追悼仪式结束后，送别黄水生同志的遗体，并拍了全体照作为纪念。



(六) 触发华营罢食斗争

华营扣留者在会见家属时，得悉太营黄水生同志自缢的消息，但不知详情。由于事态的严重，扣留者就派6名代表（A、B及C座各2名），要求会见营长，请他对有关事件作出交代。营方一开始就采取强硬的态度，除了拒绝华营代表与太营代表通电话，以了解事情真相，还拒绝同时和6名代表一齐会谈（只同意分开和各座代表会谈），寻求解决方案。此外，还从外地调集联邦后备队，准备进行预谋的镇压。当群情激愤，不满营方态度的扣留者，推开营内通往营方办事处的一扇篱笆门以示抗议时，副营长罗金福立即带领严阵以待的联邦后备队，冲入扣留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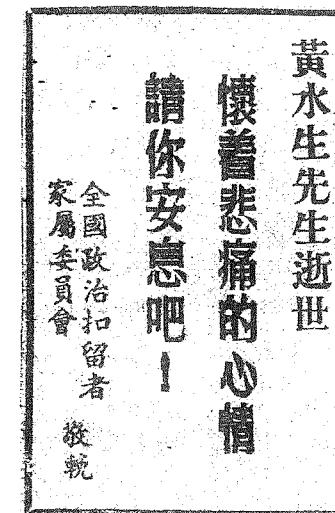
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以催泪弹和警棍等进行血腥的镇压，导致十多名扣留者受重伤。经过一番对峙之后，扣留者代表提出以送重伤同志入院治疗为条件，停止冲突。营方答应，在送重伤者去医院治疗的同时，其余扣留者则被联邦后备队一一押进牢房，惨遭殴打和单独监禁。扣留者于是被迫宣布开展无限期的绝食斗争。

从12月29日开始，军警就接管了扣留营，整个华营处在围城状态，通往扣留营的公路遭到封锁，车辆及行人不得靠

近，军警在华营周围巡逻，残暴队在营内长期驻扎。全营笼罩在白色恐怖下。

(七) 家属刊登挽词

全国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在获悉黄水生同志的死讯后，立即在报章刊登挽词：怀著悲痛的心情，请你安息吧！以表哀痛。



(八) 绝食斗争：第一个10天，1973年12月29日至

1974年1月8日

华营全体扣留者在12·29遭到血腥镇压之后，就决定开展无限期绝食斗争。营方指扣留者违反营规，宣布实施关小房单独监禁、剥夺扣留者会见家属、阅报和与外界通信的权利。营方采取镇压和分化的两面手法。一方面，利用联邦后

备队和狱卒，在扣留者放风时（上下午各10分钟，让扣留者洗马桶、衣服和冲凉等）侮辱和殴打他们，企图以白色恐怖的手段，迫使他们放弃绝食；另一方面，则动用政治部人员，游说意志不够坚定的扣留者，破坏罢食斗争。

由于营方封锁消息，音讯隔绝，太营扣留者这时还不知道华营同志已经开展绝食斗争，因此未有任何支援行动。家属方面，雪州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也迟至1月5日才掌握到华营扣留者绝食的情况，向报界发表声明。

（九）罢食斗争第二个10天：1974年1月9日至1974年1月18日

华营同志罢食的消息终于传到太营，全营震动。各区代表向营方提出抗议，并宣布全体168名男女战友从1月13日起展开支援华营的罢食斗争。虽然扣留者的抗议行动是和平的，营方仍然招来大批联邦后备队，制造白色恐怖。

次日，营方宣布全体男扣留者将调往其他扣留营。扣留者在营方及警方保证不使用暴力后同意迁营。当天下午，全体男扣留者送往华营。途中未有事故发生。但一抵达华营，却遭到惨绝人寰的暴力对付，几乎每位扣留者都由于受到攻击而负伤累累（详情请参阅：本书第49页《太平营男战友的战斗》）。太营女扣留者则继续罢食斗争。

华营方面，经过10多天的罢食，部分扣留者已经出现血压过低、心脏衰弱等问题，不时有人晕倒。营方怕闹出人命，安排医生来检查，结果发现有10多位扣留者，必须立即送院治疗。由于看守的联邦后备队员，要对留院治疗的6名扣留



和南水



郑亚育



Gunaratnam



骆瑞忠

者，即彭亨州的和南水，吡叻州的郑亚育，柔佛州的苏志明，槟城的骆瑞忠，柔佛的黄斗垣及雪州的Gunaratnam强行扣上手铐，遭到他们的拒绝。他们宁可不接受治疗，于1月15日‘割牌’出院。一回到扣留营，他们即因‘顽固’而遭到报复，被棍打脚踢，病上加伤。

这期间，焦虑的家属，为营救罢食多时的亲人而日夜奔走。1月10日槟城、彭亨、吡叻、雪兰莪和柔佛州的家属，集合到华营，准备探访他们的亲人。营方不准探营，还威胁家属若不在3分钟内解散，就会遭受到联邦后备队的暴力对付。在家属的坚持下，副营长罗金福不得不接见家属的代表。他把联邦后备队镇压的责任推给扣留者，但承认李万千、叶镁辉、林春华、吴玉柏、郑亚育、韩佑平、傅捷益及李林等人



叶镁辉



林春华



吴玉柏



韩佑平



傅捷益

李林

严重受伤，他们迟至当晚12时才送院治疗。他坚持扣留者在3个月的处罚期间，不准会见家属，但家属可以向内政部提出要求。

1974年1月11日，家属律师谢金朝到华营交涉，虽见到营长奥马，却不准会见扣留者代表。华营已告封锁，许多家属只好在附近的草地逗留，希望能够获得他们亲人的消息。

1974年1月12日，30名家属在甘玛尼律师的带领下，到内政部提呈备忘录。内政部最初答应会见甘玛尼律师和4名家属代表，最后食言，只接见甘玛尼律师一人。内政部人员只接收家属的备忘录，宣称会呈交给内政部长。对于家属代表要求会见部长，则表示必须预约见面时间。经过律师的接洽，家属代表被通知，内政部长将于1月14日上午11时会见5位家属代表。

1974年1月14日，家属代表突然接获电话，通知说内政部长要即刻会见家属代表。当各代表匆匆赶到内政部时，有一位代表还未抵步。内政部人员即以部长要会见5位代表，而不是4位代表为由，诸多推搪。在家属代表的坚持下，内政部人员又转口，说只能会见2名代表。2名代表进入办公室，始知接见的不是部长，而是一名态度极其傲慢、叫做翁姑伊士迈（Ungku Ismail）的职员。他表明并无实权，只能将家属的要求转达给部长，并答应将部长的答复，通知家属的律师。家属代表对内政部人员的愚弄深表不满。当天中午，在谢金朝律师的带领下，家属代表又再赶往国会去会见内政部长，无功而返。

1974年1月15日，甘玛尼律师再到华营，依然被挡驾，不准会见还在罢食中的政扣者。

1974年1月16日，家属到甘玛尼律师楼寻求协助。甘玛尼告诉家属，内政部致函警告他，若家属有所行动，要他负起全责。同时，要他转告家属，必须劝告扣留者放弃罢食，方准探访。甘玛尼对内政部的恐吓和无理要求，已经委托黄荣贵律师加以处理。

6-12-74
雪政治扣留者家屬委會

**禁扣留者三個月
會見其家屬處罰**

（本報吉隆坡訊）
新考慮禁止扣留者三個月內會見其家屬的處罰。
（一）立即停止對他們的基本的權利，恢復他們進一步的政治迫害，賠償死者家屬的損失。
（二）進一步的民主要求，保證類似事件不再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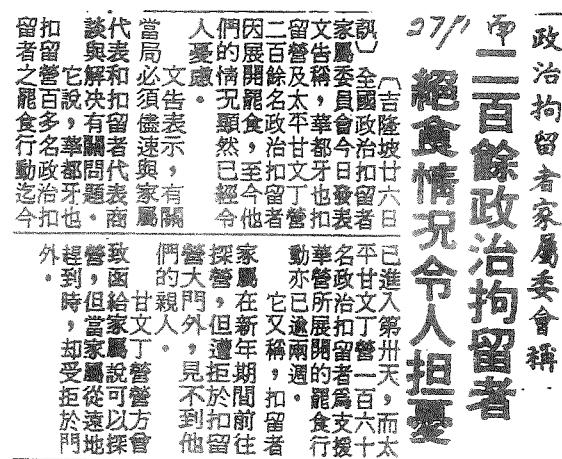
據悉，生甘治與華拘事因太平甘文丁，而逝世九日，招都聯也兩地的政事，該委員會說：「黃水月上廣處罰抗議，長期被拘，不堪病魔因自身代會會上件，聯也兩地的政事，該委員會發表書。」
動用具。動設備改善扣留營內的運留營里的惡劣生活待。四、上者療照善政，迅速改善政治拘，停止對扣留營里的精神上與肉體的折磨與虐待。（五）迅速改善政治拘，停止對扣留營里的精神上與肉體的折磨與虐待。

1974年1月17日，上午10时，黄荣贵律师接到内政部的电话，表示不同意家属在备忘录中所提出的的要求，也不会放弃处罚营内罢食的政扣者。当天中午，不能坐视亲人被暴力折磨和面对死亡的威胁，约50名家属在人民社会主义党总部举

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结束后，家属们到国会请愿，被警方镇压和逮捕。被捕家属年龄介于17岁和70岁之间。被捕家属由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担保出外，并提供旅店让家属歇息。次日林氏联同该党律师，到法庭为家属抗辩。被控以非法集会罪名的家属否认有罪，法庭定于4月开审。

(十) 罢食斗争第三个10天：1974年1月19日至1974年1月28日

这是农历新年期间，当局企图利用新春佳节之名，诱骗政扣者放弃罢食斗争。因此，营方在策略上作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减少以暴力对付罢食者；另一方面，则请砂劳越人民联合党主席王其辉部长出面作说客，通过新闻部广播车，在华营和太营宣读他的信件。由于他完全没有涉及到黄水生自缢事件、营方的暴行和如何解决各有关的问题，只是一味重复政治部和营方的说辞，当然无法说动政扣者，放弃他们的罢食斗争（请参阅本书第39页《王其辉部长‘招降书’》）。



在新春佳节期间，家属都忙于过年。除了寄望当局在佳节期间，能够以人道立场解决政扣者的罢食问题外，还在1月28日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吁请各界支援政扣者。

(十一) 罢食斗争第四个10天：1974年1月29日至1974年2月7日

华营与太营继续罢食。营方在‘招降’阴谋不能得逞之后，恼羞成怒，想以殴打等暴行击垮体力已经不支的长期罢食者。例如在2月5日下午3时半左右，林玉华同志在冲凉时，被两名狱官和两名狱卒殴打。2月6日，才从医院回营不久的吴少平同志，被两名狱官和两名狱卒打到昏迷过去。这是他第4次惨遭毒打。林吉祥在他的报告中说：“一名在医院看到吴少平的拘留人告诉我，吴少平伤到不能讲话，医院当局看到他伤势严重，认为如果吴氏再被殴打，可能受不了而逝世。因此，院方拒绝让他回到扣留营去。”这段期间，罢食者的健康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留院治疗的人数直线上升，院方不断增加病床应急。



吴少平

其实，早在1月30日，即罢食进入第33天时，由营内传出外头的讯息已经显示情况已经“十分恶劣、严重了”！具体情况如下：

1. 单独监禁：全志罢食已进入33天，身体虚弱，有些跌倒无人知晓，后来自己醒来，医生已指出我们全志生命已达到危险阶段，而反动营方尚施行单独监禁。

2. 我们病重的全志由于不喝牛奶水，被遣回营后，就被红头兵殴打，伤势极其严重，这是在营方官员怂恿下干的。
3. 韩佑平全志被红头兵及狱卒殴打重伤臀部，致使他伤势严重。目前留院，但仍然坚持斗争。
4. 反动营方说如果你们（指全志们）死，要死在医院，不要死在营内。
5. 留院的全志（病重的）由于不喝牛奶水，被院方赶回，不给任何药品。
6. 被调来的太平营全志（14号来）在营方官员袖手旁观下，怂恿红头兵及狱卒殴打，伤痕累累，满地血迹斑斑，过后营方赶紧洗掉。后来过几天，在晚上才带全志们往医院，给几粒止痛丸了事。
7. 太平营全志调来时什么东西都不准拿，营方只给一张床、桌椅及一个茶杯与一张被，关在小房内。
8. 目前医生很少巡牢房，偶然只选一两间而已，只给一些止痛丸。
9. 我们冲凉的时间只有一、二分钟，洗衣不必讲了，慢了就被脚踢、打。全时，驱赶追逐身体虚弱的全志跑，并进行侮辱。
10. 红头兵强迫我们的全志拿饭，不拿者被从床上拖下来。
11. 营方强迫身体衰弱的全志从三楼下来取水及拿马桶。
12. 供应不足及不干净的水，以及葡萄糖不足。
13. 现在大部分全志都坚持罢食斗争，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放弃。
14. 我们希望你们大力进行工作，支持我们的斗争。我们目前的情况非常恶劣、严重了！

1974年1月30日

这期间，家属委员会焦虑地四处奔走，先后向营方和内政部交涉，皆未有结果。显然当局已经不顾政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危，决心要拉垮他们的罢食斗争。

黨部本 憶逝為抗九者指森 度動政也有人
代長月 會世一議日是出阿。採治及關社
表要十他探之名銀展在：未該 取拘太當黨、
去求一說取黃在暴開去華今黨
華接日：突水太隊絕年營日全
都見致該襲生平在食十政發國
牙並函濶行舉扣扣行二治表主
也准內曾動行留留動月扣文席
探該攻子。追營者，甘留告卡 態行營牙議

措問改集 決報的絕 態拘豈可也者 仍營
施題黨各 絶給時食 度留不是會家 未，
並及關他食部候行卡。者顯也作屬他給但
將圓心說事長了動森 之示沒出及說予迄
採體絕：件要，晉說 欲當有同法：答今
取討食該。求他入： 理局下樣律政覆內
有論事黨 馬已一今 不對文的顧治。政部長
效上件將 上打個天 理改，呼問扣
的述之召 解電月是 的治這吁，留

**政治拘留者絕食
已經晉入一個月
要求馬上解決
人社黨電部長**

（十二） 在死亡边缘：1974年2月8日至1974年2月13日

处在死亡边缘的政扣者，除了绝食外，也开始绝饮。这导致情况迅速恶化，罢食罢饮者一个个先后晕倒。许多同志救醒后，反复晕倒。营内不断传来同志晕倒在地上发出的巨响声，和附近牢房同志们紧急发出的呼救声，深恐狱卒行动太慢导致人命的牺牲。这时医院已经多开两座病楼，让政扣者留医。

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院长带来了一位专家，向政扣者代表表明，有重要讯息要向全体罢食者宣布。专家强调指出：如果政扣者继续绝食的话，他们的心脏、肝脏和肾脏等主要器官将永久性失去功能，最后导致死亡。专家要求政扣者代表劝告大家立即恢复进食。

政扣者代表表示他不能这么做，但同意由专家亲自向罢食者宣布这项与他们性命攸关的重要讯息，然后由他们本身决定是否愿意放弃斗争，恢复进食。结果，竟然没有任何一位罢食者，在死神的威胁下放弃斗争！这种精神，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本来对政扣者存有偏见的院长，也深为感动。于是致函给卫生部，表示院方无法确保罢食者的性命安全，要求卫生部接管这些随时有性命危险的罢食者。她这项果敢的行动，可能对促使当局面对和解决问题，起一定的作用。因为若再不解决，当局就必须负起政扣者一旦死亡的严重后果！

(十三) 家属行动升级

在亲人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家属全面动员，化悲愤为力量，把支援行动相应升级。2月8日，家属再次发动请愿，这一回是转向首相。当天早上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午，家属游行到首相署请愿。一名高级警官出面会见家属，接收备忘录，答应呈交给首相。他要求家属解散，等到第二天才到首相署来了解首相的答复。

次日，这批以妇女为主的家属在吉隆坡集合，准备步行到首相署了解首相的答复。唯队伍走到蒙巴登路新闻部时，却遭

到联邦后备队的阻拦、殴打、拉扯及逮捕。总共有56人被送往警察总部，然后被控上法庭。（详情请参阅第三章：家属的支援行动）

(十四) 广泛的国际支援

由于罢食斗争的正义性、残酷性与持久性，这场斗争获得了远比以往更为广泛的国内外各阶层人士、团体与舆论的支持，特别是星马的许多进步组织和民主团体都分别进行各种形式的支援。在国际上，也获得了来自英国、荷兰、日本、澳洲、纽西兰与香港等地的各种团体的支持和声援，包括荷兰红十字会、伦敦国际宽赦委员会和纽西兰总理诺曼克等团体和国家领袖也打电报向反动派提出抗议和谴责，或促请它解决问题。正是在政扣者坚持斗争，家属和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和团体的施压下，当局才愿意坐下来解决问题。

華都內扣留營

百餘政治扣留者已結束絕食行動
昨日已通知家屬前往探望

動日已正一式吉隆坡電報十三通通知他訊」
到士讐友打留止會政想迄上
首支大聯營者過字不治辦據歷上
相援會合再家後，久扣法全時述
署他，會也屬，遣前留證國共政
請們呼禮全委全，警者解政四治
願，請堂國員國方政的他治十扣
。他各召交會政違治家們扣七留者
們界開通在治捕扣屬在留天。自去年十二月廿九日便開始展開絕食行動，
們屬，扣停止並者獄留家。去年十二月廿九日便開始展開絕食行動，
。前今停止另於家為期之會發言人說，要在他們因爲當局禁，
不往日營絕另於法庭會三個月。均不得領，他們已經結束絕食行動，
不過，為支持華扣通的食之方面，委員會會正大廈門前請願，因為當局禁，
入的營進留都牙也。目前，因未持
第絕行政行第三政治行展也。當局禁，
三食治絕食也。當局禁，
三十行扣食開扣五動留之絕留營，
目前，已他扣動治普們留而扣

14-3-74

(十五) 坚持到最后胜利

在政扣者宁死不屈，及家属和国内外各界人士施压下，当局终于在闹出人命之前派出两名国会议员，即巫统的拉惹龙吉和回教党的东姑赛益，与政扣者代表举行谈判并达致协议，政扣者于是在1974年2月13日结束为时47天的罢食斗争。为了支援华营而罢食的太营政扣者，也随即结束为时32天的行动。华、太两营还破例允许政扣者代表利用营方办公室的电话，向家属报告大罢食结束的消息。

出席谈判的双方代表及所达致的协议要点：

(甲) 出席谈判的双方代表

政扣者代表：

(A) 华营政扣者代表：



陈福兴



李万千



李明城



吴桂生



陈华平



叶新田

(B) 太营政扣者代表：



张发起



林两盛

政府当局代表：拉惹龙吉（巫统国会议员）、东姑赛益（回教党国会议员）、副监狱总监、内政部代表、华太两营高级官员以及警方人员等。

(乙) 所达致的协议要点：

1. 当局必须立即废除国内治安法令与驱逐法令，并即刻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扣留者和因政治理由而被驱逐者。〔当局答应传达到内政部。〕
2. 营方必须立即取消对政治扣留者的一切无理处罚，重新开放小牢门，恢复营内的正常生活状态。〔当局答应之。〕
3. 当局必须设立一个包括扣留者家属与律师在内的公开调查庭，以调查扣留营的一般情况，特别是这次12·29暴力镇压拘留者的事件。对在这次事件中非法动用暴力殴打扣留者的官员和狱卒采取纪律行动，并保证今后将不动用暴力对付扣留者。〔(A)关于设立公开调查庭一事，当局代表答应向内政部传达；(B)当局答应调查打人的官员和狱卒，并

采取纪律对付犯罪者；（C）当局保证今后不再使用暴力对付扣留者。但他们表示假如扣留者触犯营规，营方将根据法令条文加以处理。】

4. 当局必须承认各座扣留者的代表权，并允许三座代表在必要时，一齐会见营方，解决拘留者的共同问题。〔当局答应。〕
 5. 当局必须告诉我们关于黄水生同志死亡的真相，并允许我们以全体华营扣留者名义发慰问信及帛金给黄同志的家属。〔当局答应。〕
 6. 改善营内一般生活待遇，平等对待各营拘留者。〔当局在基本上答应改善生活待遇。具体问题将留在短期内讨论解决。当局接受平等对待各营拘留者的原则。〕
 7. 当局答应恢复太平营扣留者的一切权利，并履行过去双方所达致的协议。
 8. 当局答应向内政部转达扣留者下列的要求：
 - * 撤消扣留者家属的一切控状(按：指抗议示威所引起的)；
 - * 立即无条件释放因此次迫害事件致使生命垂危及病况严重的扣留者；及
 - * 在一星期到两星期之间，将全部从太平营调来的拘留者送回太平营去。

(十六) 验尸庭闹剧

当局于3月17日设庭验尸，以寻找黄水生逝世的原因。于3月17日及22日由各证人上庭供证。

无论如何，此所谓验尸，也只是官样文章，最后当然是得出一个每个人都已经预料到的结果：黄水生死于自杀。

謹音) 伏供錄第六光
第七章位營之間。
做細做領智的。二場
房規矩不經，互相鍛
往還但指出二營之間
日發生意突，延人
升發數名風雨，千人
在第七隻位，數子死
者所知。李師亦似出人
死。本人出示。討死
者。生前是當局之區
件。比較兩信文字有闕
處，據氣氛由軍隊進行
行。當局之要事到，現場
行各處。總理斯卡哥尼
處。處聞之，這次移居逃
處。某處今年四月八

(十七) 当局违反协议

大罢食结束后，华、太两营的政治扣留者，除了在一段短时间里获得较好的待遇外，当局代表在谈判中所承诺或答应考虑的事项，过后皆一一反悔，包括释放病重的拘留者，撤消指控因请愿而被捕的家属，把来自太营的同志送返太营及改善拘留者的待遇等等。

(十八) 罢食后病重的扣留者

家属委员会在大罢食结束半年之后曾经做过一项大略调查，发现当时病重的扣留者包括：

- * 吕进益和温瑞展，一度神经失常；
- * 郑苟双肾被打至完全丧失机能，有生命的危险；
- * 韩佑平患了严重的甲状腺毒症、心脏和高血压并发症；
- * 江海、郑敬文、郭祖锋、梁广西、吴维湘等患上心脏病；
- * 黄少明、陈伟英、黄斗垣等患上了肺结核；
- * 郑举、陈文松等患上了糖尿病；
- * 张发起、Gunaratnam 等患上了严重的贫血症；
- * 萧谷添、和南水等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症。



吕进益



温瑞展



郑苟



韩佑平



江海



郑敬文



郭祖锋



梁广西



吴维湘



黄少明



陈伟英



黄斗垣



郑举



陈文松



张发起



Gunaratnam



萧谷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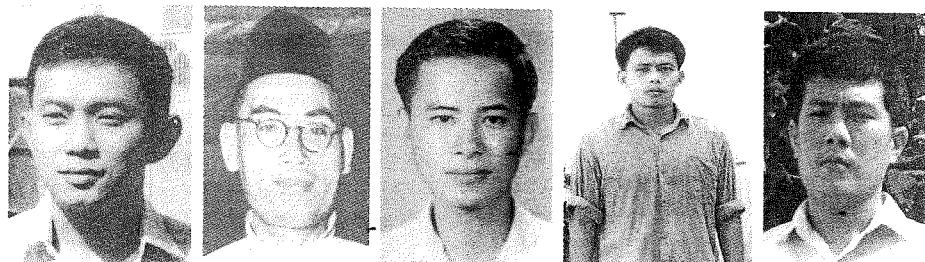


和南水

除郑苟在生命垂危时由家人抬出扣留营，送入医院外，其他都未获释。郑苟最后不治，含恨离开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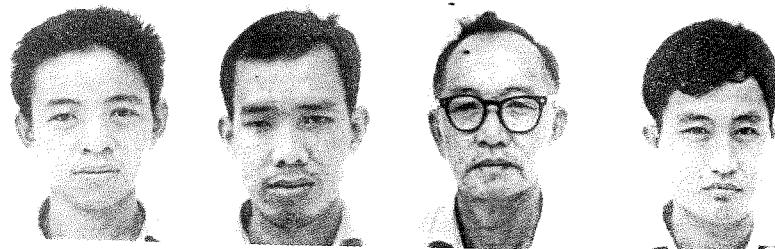
至于殴打拘留者的有关警察、狱卒和狱官，则没有任何一人受到对付。

对已经逝世的同志，我们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这些同志包括在营内牺牲的冯朝民（甲）、苏辉祥（槟）、阿末雅典（柔）和黄水生（柔）等；出营后不久就逝世的布汉鲁丁医生（毗）、黄春树（雪）、郑亚苟（毗）、温瑞展（槟）、李林（彭）和林金泉（甲）等。



冯朝民 布汉鲁丁医生 黄春树 李林 林金泉

以及由于健康受损，出狱后因病早逝或发生意外事故逝世的，则有槟州的傅连美（车祸）、李国权、徐公民、陈福麟、陈福兴（在冲凉房跌倒）、傅捷益；吉打的黄少明；毗叻的黄乙新、刘朝天、刘倩、毛谭今和卢迪；雪兰莪州的郭祖锋、谢林金、胡汉光、黄吉彝（从屋顶跌下）和许玉文；柔佛州的叶秀明（车祸）、梁广西、周纪泉（周野山）、温锦源（粉刷屋子跌倒）、周雅明、张发起、陈金枝、蔡鹏程（车祸）、蔡小华和黄斗垣等同志。由于匆忙收集，难免有错误或遗漏，敬请原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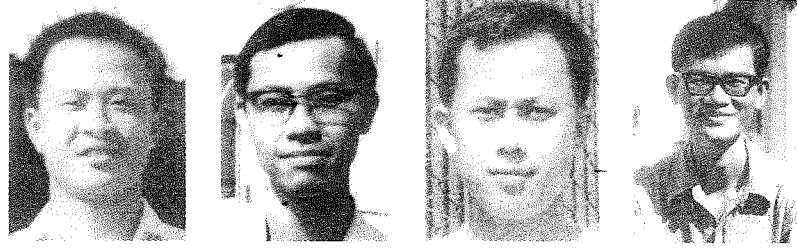


傅连美 李国权 徐公民 陈福麟



陈福兴 傅捷益 黄乙新 刘朝天
刘倩 毛谭今 郭祖锋 谢林金
胡汉光 黄吉彝 许玉文 叶秀明
梁广西 温锦源 周雅明 张发起

1229大罢食



陈金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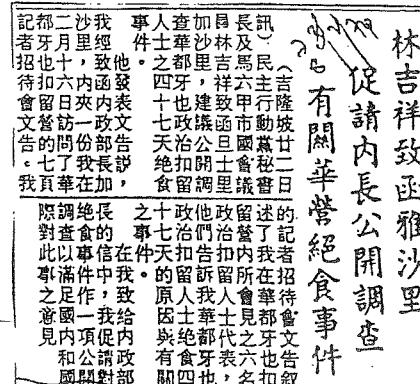
蔡鹏程

蔡小华

黄斗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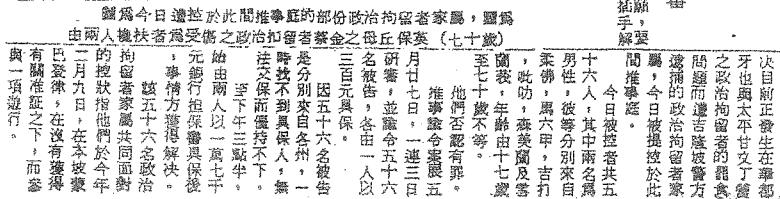
(十九) 人权组织要求调查真相

无论如何，当局过后允许林吉祥进入华营对罢食事件进行调查。可是，当林吉祥发表其报告后，内政部长即取消其原定的访问太营准证。国际人权组织如特赦机构也表明要调查真相，最后都得不到当局的配合。



(二十) 家属被控上法庭

因2月9日游行请愿而被捕的家属共56名被控上法庭。56人之中，只有两名男性，其余皆为女性，年龄介于17岁至70岁之间。法庭择于5月底审讯，每名家属以300元担保。



显然，当局并不未履行协议中所承诺的，考虑撤消因游行请愿而被捕家属的控状。

经过一再的展期审讯，第一批被捕的50名家属(43女及7男)终于在1974年8月27日被判罪名成立，每人罚款25元。可是有一半以上的家属，即26人，选择拒交罚款，宁可坐牢，以示抗议。

至于第二批被捕的家属，在1975年2月26日开审时，辩护律师以主控官已三度申请展延，造成高龄家属不便为由，要求判家属无罪释放获准。因此，56名家属皆无罪释放。



(二十一) 内政部长否认大罢食事件

到了 1974 年 4 月 16 日内政部长丹斯里加沙里在下议院答复林吉祥的口头询问时，竟然否认发生过这一场震惊国内外的政治扣留者大罢食事件：

“内政部长丹斯里加沙里今天对下议院说，他曾经进行调查有关华都牙也扣留营扣留犯遭受警方残暴对待的指责，并发现这些指责是不确实的。

他说，因此，政府无意设立一个调查庭来调查此事。

他是回答民主行动党马六甲市区议员林吉祥口头询问有关扣留犯曾展开四十七天绝食的问题。

他说，扣留营内并没有绝食事件，事件的真相是，在太平扣留营内有一名拘留犯黄水宋（译音）逝世后，这些扣留犯就罢食当局所准备的食物。

丹斯里加沙里说，黄氏是自杀身亡的，他是患上了自然的疾病，医生曾劝告他不要太过顾虑他的病症。”

这也就是说，对于当局而言，那47日的大罢食和血腥镇压是没有发生过的。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为荒谬的吗？

針對拘留犯受虐待指責
內長在國會澄清調查發覺無其事

血
史
物
见
祖

本章收录了7篇珍贵的历史文献，除了《招降书》之外，《黄水生同志绝笔》、《悼文》、《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太平营男战友的战斗》、《关于12·29斗争的总结》和《暴力压不倒正义斗争》，都是当年政治扣留者亲笔写下来的、关于12·29事件真相的第一手资料，可谓是对有关当局累累罪行的血泪控诉！而《招降书》则暴露了当局“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和欺骗性。



第二章：历史的见证

(一) 黄水生同志的遗书

按：遗书正本由拘留者代表亲交黄水生弟弟。下面所影印者乃誊录版本。

黄水生同志遗书全文

致莫明：

我天天顶着牙痛到医院不看病，坐了五年，更技术上提高困难。前些年由于在工地上脚下的地面上小时脚底泡入盐，有脚只是合上张合而已，晚上也疼如此，有时半夜睡醒牙痛不能入睡了，还是合眼到天明，咬紧一個人有多大的精神长期折磨下去？

反动派搞政治迫害他们怕记者的质问他就是这么恶毒，就問一個被折磨得连自己的人也上夜班了？我腿骨痛了三年，治疗也受了一年半，手脚、小腿的治疗慢，咬紧牙齿都睡不好过。腿也常常那块过了，很大的筋膜就是我的苦处，牙痛，耳鸣，耳鸣了几天都是耳鸣，肾脏哪哪都痛，咬紧牙齿都痛不下床，咬紧牙齿，药石都移我的疼痛，或者推移耳朵以减轻我的苦处，自己化牙膏自己涂一下敷在耳痛的地方的全药人治病，但是医生在剖腹时的神经被切断了，故咬紧的嘴被破城。

在此，我可望所有扣留者（包括我和她）能把你身上的反动派的摧残和索取合理的医药钱财，多向锻炼自己的身体，因为我的腿和脚被他们逼迫的孩子造，不被批准去中医看病，迫使你感到非常痛苦，而反动派逼你西医看，在脚掌上割，只要不用医生证明没有得压疮而金给患者一个可以治疗的脚掌，然后妇女中停了一年多才治好，如果是癫痫病的脚，早就治好了，但脚长苦，而且老是送进监狱西治。

易一真将金保战友向我家人交代，不管是挂药局（指家人）一定要彻底治疗好，另一真元服的脚被割下一些工钱，一张不能向他们讨，孩子或天下别人的钱，要叫下各款，丁桂柳算总金额三十块，丁桂柳（即柳家柳子）虽然三十块，将在我人代我过境。

温州吉界乡场烧伤科一堂馆，大众布局烧伤科大的二十块，香港开年的罚款不讲，香港上海书局分已在西营总堂了十块，麻胡茅草期时改天忧愁，如果上海布局没有收到我的钱，想将我户口存的馆，倒计十九年来被继续监禁上海布局。

在此，我祈求一些肩膀重药的战友们用什么重药的脚等一等给我家人我种，且留下药名，对于真真厉害的以及一些轻多些翻腾的明天，为他们受到精神上的折磨，至于我所治疗的病痛，脚底瓦字与营房的战火需要的一张床下关，不必交回我家人，零零碎碎西英昌两平均，故天降给家人送一些轻便的病人药品。

在此后，将我家人将留在太平化，将我骨灰丢下此幼河执行。不带骨灰归葬的那些，我是不懂鬼神的，孩子孩子的一身药方，将我回赠给家人，如骨肉需要的话可另打一份，巨轮营内的同志研者。

我参加革命，並不后悔，後悔的是當時在政治部太天真，致使我把上一些新兵。

永别了！战友們——

馬來亞人民万岁！

凌志士烈士遗体（太平）绝症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五日

（新威反他們劫我家人到悲惨，我該功德何然！想！恨！恨！恨！恨！）

战友们：

我天天被耳鸣干扰到我睡不安宁、坐不安宁，更谈不上读书或阅报。我时常中午在床上躺了两个多小时都无法入睡，有的只是合上眼睛而已。晚上也常常如此，有时半夜睡醒来就不能再睡了，只是合眼到天明。试问一个人有多大的精神长期折磨下去？

反动傀儡政权对我们扣留者的医药照顾是这么恶劣。试问一个被百病缠身的人怎么受得了？我髋骨痛了三年，湿疹也受了一年多，手、脚、小腹的湿疹常常反反覆覆，几乎没有好过。但这些我都挨过了。最大的苦恼就是我的耳鸣、耳鸣、耳鸣！天天都是耳鸣，有时响到我头昏脑胀，致使我书报都看不下去，唯有翻翻药书转移我的苦恼，或者找找草药以转移我的苦恼，因为我本想自修学一点针灸与草药来为农村里的贫穷人治病。只是耳鸣干扰到我的精神无法集中，致使我的指标破灭。

在此，我万望所有拘留者（包括星岛）应该尽量的向反动傀儡当局争取合理的医药照顾，多多锻练自己的身体。因为我的被扣留致使我弟弟的孩子迟迟不被批准去中国医治，这事也使我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击。反动傀儡当局常常在报上说，只要本国医生证明没有得医，当局会给病者三个星期或三个月内批准出国。我的侄女申请了一年多才批准。如果是急病的话，早都死去了。但愿我‘去’后，我的侄女还能出国治疗。

另一点请全体战友向我家人交代，不管是谁有病（指我家），一定要彻底治疗好。另一点我驳的小园尚欠下一些工

钱，一概不准向他们讨。至于我欠下别人的钱，有以下各款：丁能脚车店永发宝号三十元，丁能店子（即邱亮彬店子）亚烈的三十元，请我的家人代我还清。

星洲世界书局我尚存有一些钱，大众书局我也存有大约二十元，香港七十年代的存欠不详，香港上海书局我已在华营寄去了十元，据来信说没有收到，所寄来的书我也没有收到，麻烦麦翔战友改天代写信问问，如果香港上海书局没有收到我的钱，请将我户口存的钱，割出十元补寄给香港上海书局。

在此，我请求一些负责草药的战友有什么草药的种寄一些给我家人栽种，并写下药名。对于负责医药的战友应该多多照顾有病的战友，勿使他们受到精神上的折磨。至于我所存下的药单、书本及字典，营内战友需要的一概留下来，不必交回我家人。有些药书我是买两本的，改次叫我家人送一本给我的友人封君。

我死后，请我家人将我在太平火化，将我骨灰丢下毗叻河就行，不必举行古老的那套，我是不信鬼神的。至于我手抄的一本药方，请交回给我家人，如营内需要的话可多抄一份，留给营内的同志研究。

我参加革命，并不后悔，后悔的是当时在政治部太天真，致使我犯上一些错误。

永别了！战友们。

马来亚人民万岁！

凌晨二时黄明侨（水生）绝笔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九日

（请战友们劝我家人别悲伤，应该劝他们恨！恨！恨！恨！
恨反动派！）

（二）悼文

黄水生（又名明侨）同志，柔佛永平人，参加革命不幸在1970年被捕入狱。入狱后，耳鸣症和腰部风湿痛发作，反动当局没有给予应有的和有效的医药照顾，病情恶化。搬来此地（指甘文丁政治拘留营）后更加严重。每天24小时不能读书、不能入眠，受了三年多的折磨，终于在12月29日清晨被虐待而死，终年38岁。

黄水生同志出生贫穷，受过小学教育，家里还有父母和弟妹。在太平旧营时期，他勤于学习中医中药和培植草药，积极的为有病的同志治病。他学医的目的是为了广大的贫苦村民和拘留者服务。他积极参加营内的对敌斗争，对敌人表现极端的仇恨。在遗书中向敌人作了愤怒的控诉和谴责。他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对敌人仇恨的立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反动派的迫害随时会降临在我们头上，我们不应作消极的抵抗，而应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天反动当局正在加紧进行暴力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以对付我们，我们要警惕，发扬坐穿牢底的革命精神，不受骗，不怕压。

黄水生同志是牺牲了，但我们可以坚信，他所坚持的理想，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定会有更多人去进行，去走他未走完的道路。黄水生同志在遗书中希望营内同志对反动派的迫害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可以保证，我们一定能够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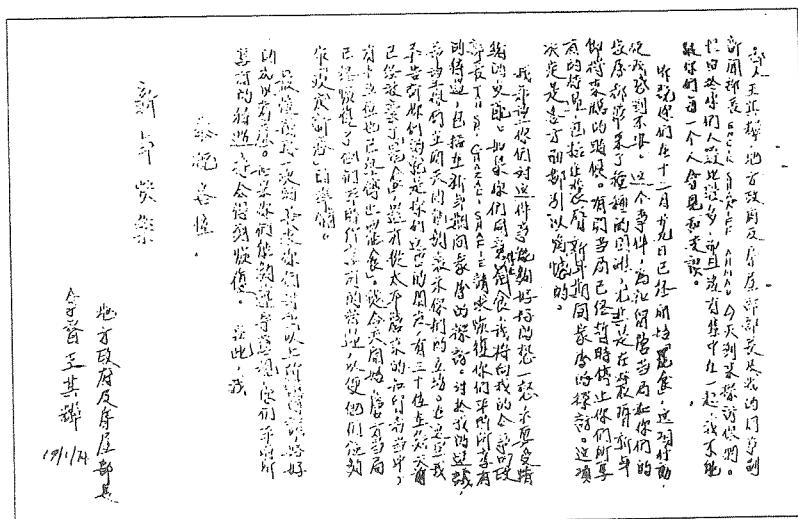
让我们高举革命先烈的红旗，把马来亚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坐穿牢底有先例，未闻暴政不灭亡！

太平甘文丁政治拘留者发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 王其辉部长的《招降书》

王其辉于1974年1月19日在华营通过广播劝罢食的扣留者结束罢食的谈话，其内容于当晚半夜塞入扣留者的房间内。



鄙人王其辉，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及我的同事副新闻部长ENCIK SHARIFF AHMAD今天到来探访你们。但由于你们人数比较多，而且没有集中在一起，我不能跟你们每一个人会见和交谈。

听说你们在十二月廿九日已经开始‘罢食’，这项行动，使我感到不安。这个事件，为扣留营当局和你们的家属都带来了种种的困难，尤其是在农历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有关当

局已经暂时停止你们所享有的待遇，包括在农历新年期间家属的探访。这项决定是各方面都引以为憾的。

我希望你们对这件事能够好好的想一想，不要受情绪的支配。如果你们同意停止罢食，我将向我的同事内政部长TAN SRI GHAZALI SHAFIE请求恢复你们平时所享有的待遇，包括在新年期间家属的探访。对于我的建议，希望你们在两天内能够表示你们的立场。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这里的朋友，有三十位在几天前已经放弃了‘罢食’；还有从太平营来的扣留者当中，有十五位也已经停止‘罢食’。从今天开始，营方当局已经恢复了他们平时所享有的待遇，以便他们能够作‘欢庆新春’的准备。

最后，我再一次要求你们对我以上所讲的话，好好的加以考虑。如果你们能够遵守营规，你们平时所享有的待遇，将会得到恢复。在此，我

恭祝各位
新年快乐

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
拿督王其辉
19/1/74

(四) 报导

(1)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 12·29 反迫害长期绝食斗争的报导)

12·29 反迫害长期绝食斗争在 1974 年 2 月 13 日胜利结束，历时 47 天，政治扣留者在斗争中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顽强战斗，顶住了敌人的法西斯暴力镇压与政治欺骗反革命两手的进攻，制止了敌人进一步的疯狂迫害。

1973 年 12 月 29 日，黄水生同志被拉扎克傀儡集团活活迫死于太平甘文丁扣留营。这是拉扎克集团干下的又一宗杀害革命人民的滔天罪行，欠下另一笔血债。消息传来后，华都牙也扣留营全体政治扣留者感到无比愤慨与万分悲痛，一致决定开展斗争，声讨敌人的法西斯罪行。并从当天晚餐开始罢食一天和举行各种哀悼仪式。

下午三时开始，营内全体扣留者共派出六名代表去找伪营方谴责敌人的杀人罪行和解决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各座扣留者分别集合到通往伪营办公室的大铁门前面，唱战斗歌，高喊口号，声讨反动派的罪行。但是反动当局拒绝接见代表，反而招来一批伪政治部大小走狗部署它计划已久的再一次血腥镇压。同志们斗志昂扬，愤怒情绪高涨，A 座一位同志推开篱笆门，涌入办公室门前与等候会见伪营长的代表汇合，加强压力。C 座一位同志爬上厨房屋顶观察敌人的动向。同志们的阵阵口号声响彻云霄。到了晚上八时，拉扎克集团派遣

了大批所谓镇压暴动队（伪联邦后备队）血腥镇压全体政治扣留者。

所谓镇压暴动队实际上就是人性泯灭的残暴队。进营后，残暴队立即发挥其暴徒本领，喷射催泪瓦斯，挥动警棍猛劈猛击，把A座扣留者代表打进大牢房（即大楼房），突破扣留者堵塞大牢房铁门的防线，把扣留者连推带打，关进小牢房单独监禁。接著，残暴队转入B座，用暴力把扣留者关进各自的小牢房。但是，当残暴队企图闯入C座时，遭到C座同志的英勇抗拒。当残暴队在A、B座施暴时，C座同志立即高喊口号，严厉谴责敌人的暴行，接著把进入C座的大铁门堵塞，抗拒残暴队于外，以捍卫政治扣留者的生存权利。残暴队在各种破门企图和恐吓可耻失败后，改用云梯，从营外爬越高墙进入C座。同志退守大牢房铁门，残暴队从铁栏把催泪瓦斯喷入，守门同志双眼中毒不能张开。残暴队撬门而进，逢人便打，当头劈击。一些同志双手被连绑在两名残暴队的左右手，身体各重要部位遭到殴打。一位同志被四名残暴队在前，三名狱卒在后，同时前后夹攻，甚至被推倒在小沟旁踩踏，一起身，双手便遭殴打，身体继续仆倒在地，久久无从起身。C座全体扣留者，一个个遭到数名暴徒狱卒夹持殴打到B座单独监禁，在长约四份之一里的路途中，暴行没有暂缓过，沿途站岗的残暴队和狱卒也进行卑鄙的突袭行动。

十二月三十日早上，反动派宣布剥夺全体政治扣留者的一切基本权益，包括三个月不可探监、通讯、阅报，并且无限期地强行每日廿四小时单独监禁。在暴力镇压与残酷迫害面前，决不能退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野兽面前决不能表

现得丝毫的懦弱。”我们必须：第一不怕，第二反对。因此政治扣留者坚决反抗，开展长期绝食斗争。

一月十三日，太平营全体政治扣留者发扬了互相支援、共同战斗的优良传统，开展绝食斗争，全力支持华营战友的反迫害斗争，给同一战线上的阶级兄弟带来了新的鼓舞、新的战斗力。两营扣留者并肩战斗，给敌人迎头痛击，于是敌人马上反扑。

一月十四日早上，太平营伪营长宣布剥夺全体扣留者一切权益三个月，接著派遣大批残暴队进营，把正在进行守卫抗暴的全体男扣留者押上红车（残暴队专用车）军用卡车，并在坦克压阵下，调到华营。至于女同志，残暴队也对她们暴力镇压，捣毁她们的私人财物，把她们分成三区，进行隔离监禁，并施于各种迫害。

太平营男同志抵达华营后，遭到反动派事先部署的有重点的集体殴打，全体扣留者不论老少，个个被打，无一幸免。绝大部分同志身受重伤。有些同志颈项被扼，几至窒息；许多同志被打得头晕目眩；有位同志心脏部位被踢，当场吐血。同志们经过严酷殴打后被关进小牢房，但是暴力吓不倒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者。同志们集体合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战斗歌曲；坚决反击敌人，矢要同敌人搏斗到底，给已坚持了十七天绝食斗争的华营同志带来了鼓舞，两营同志更加紧密地战斗在一起。

当天下午及第二天早上，反动派故意设计了集体殴打的迫害行动，强制全体太平营来的同志去“冲凉”，同志们一踏出小牢房，立即遭到围攻。从牢房到冲凉房残暴队列成行，野

蛮殴打来回冲凉的每一个扣留者。冲凉房里，残暴队无耻窥视，强令同志们在一分钟或更短时间内冲好凉，否则又是一阵毒打。一些同志因病或不甘受侮辱，拒绝“冲凉”同样遭毒手。

经过上述三轮集体殴打后，扣留者内外伤严重，但是扣留者坚持斗争，毫不妥协。

从十二月廿九日血腥镇压后，残暴队长期驻扎营内，施行白色恐怖。残暴队执行往日狱卒执行的工作，为非作歹。残暴队强令同志们在二、三分钟内冲洗完毕，遇到同志不许交谈，否则暴力对付。在大牢房里，残暴队口出污言，高声辱骂，尖声狂叫，用警棍敲击铁栏杆、桌、椅，猛踢牢房，制造喧哗，干扰安宁，不让同志们有片刻宁静，从精神上折磨绝食中的扣留者。但是，坚持战斗，不畏强暴的同志们，英勇反击敌人，不顾残暴队的暴力威胁，在小牢房里互相对喊，共同勉励，通过适当方式传递书本和字条，坚决拒绝把每日两餐的诱降饭拿入房间，碰面时互相鼓舞，相报听到祖国人民的战斗捷报，尽量突破白色恐怖。

为了不让病重同志到医院看病，反动派强行手铐措施，要所有前往医院的同志上手铐，否则不能去。同志们坚决拒绝。宁可牺牲在小牢房，不愿上手铐受辱。昏倒后被抬去医院的同志，醒来时手早已被铐在病床上，翻身不得。残暴队把他们和普通病人隔绝，蓄意辱骂挑衅，夜间大吵大闹，不让病重扣留者入眠。

罢食的第十八天，六位病重体弱的同志被医生指定留院，他们坚决拒绝上手铐，于当晚被残暴队从医院押回营，一踏入

营里，立即遭到殴打，严重受伤。其中一位同志被打倒在地上，一位同志内脏被警棍插伤大量出血三天，每天三、四次。

二月四日，罢食的第卅八天，同志们不是处在危险状态，便是处在严重状态。一位前往抹身同志在冲凉房里抗拒反动派的侮辱，遭到狱官、狱卒五、六人围殴，小牢房里的同志们齐声谴责和警告逞凶暴徒，吓住了暴徒。第二天，一位同志在小牢房里被殴打到昏倒不省人事。暴行时，同志们仍然坚持谴责和警告，压下暴徒淫威。由于敌人的不断殴打、迫害，不少同志患上危险病症，例如心脏病、糖尿病、肾机能丧失、大小便失禁，生命处在垂危，有时严重恶化，濒临牺牲，但是同志们宁死不屈，坚持斗争，决不进食。敌人的暴行只能把同志打死、打伤，但绝不能击垮同志们的战斗意志。

敌人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在暴力手段使用的同时，它又兼施欺骗手段；两手并用，互相配合，妄图个别击破，捣垮全局。

伪政治部人员及其在伪营方的爪牙大肆活动，进行招摇撞骗的勾当。这些家伙频频闯入一些扣留者的小牢房，或者个别调到办公室“洗脑”、灌毒，威迫利诱，要有关同志放弃斗争。

一月十九日，拉扎克集团还放出大走狗头目，伪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王其辉到华营来公然向全体坚持罢食的扣留者发出诱骗招降的广播。但是，这种笨拙的招降伎俩都不能动摇同志们“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战斗意志。同志们不上

当、不受骗，不在招降书上签名，坚持把斗争进行到底。

在这场斗争中，同志们发扬了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特别是罢食进入四十天时，同志们都已处在极其严重状态，血压已经降到危险线，只要再往下降便会死亡。

罢食的第四十二天，有八十多名扣留者被列入危险名单，送去医院治疗。在牢房里，同志们频频昏倒地上。终日头昏目眩，躺在床上，上下床都不能。医生再三提出警告，若继续绝食下去，他已束手无策了。一个被特地派来的自称全霹州最高级医学专家向留院扣留者提出罢食45天生命就会结束的洋框框要同志们进食。但是，在这随时可能牺牲的紧要时刻，同志们坚持了斗争，而且还从四十天开始把斗争形式提高了，不再接受医生供给的药用葡萄糖了。同志们在面临牺牲的时刻没有任何犹疑，决心为革命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由于政治扣留者宁死不屈的顽强斗志，并且得到国内革命人民、革命家属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以及国际正义力量的声援，敌人暂时改变了迫害手段，举行谈判，答应恢复扣留者的基本权益，撤走残暴队，解除单独监禁，绝食斗争因而胜利结束。

这场斗争能够取得胜利是与长期宣传教育，革命人民猛烈战斗分不开的。回顾四十七天的战斗过程，首先由于华营扣留者开展了反迫害斗争，太平营同志即时支援，共同战斗，星岛狱中同志先后展开两次绝食斗争，支援华、太两营战友的反迫害斗争，加强我国政治扣留者的战斗团结，给斗争的坚持和胜利带来有利条件。

在营外，革命家属和革命群众动员起来，和扣留者并肩战斗，青年学生和各阶层社会人士纷纷进行各种支援行动，开展斗争，这些都在国内形成一股强大的战斗洪流；在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下，沉重地打击了拉扎克傀儡集团，这是这场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也是这场斗争在政治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这场绝食斗争，在我国半岛来说，时间最长（星岛达一百多天），暴力使用极为残酷，对每一个扣留者不论新旧老少，都是一场严酷的考验，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考验，提高了认识，加强了战斗力和团结，敌人以为把太平营同志调来华营予以单独监禁，个别击破，施加暴力，可以压服我们。他们没有想到，两营扣留者被关在一起，反而加强了团结，促进了互相鼓舞和支援，力量显得更大，斗争的坚持性更强。敌人总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切反革命的阴谋总是以可耻的失败告终。

但是，必须注意的，这场斗争的成果是不完整的、不完全可靠的。因为敌人已经并正在改变其已作出的诺言，比如剥夺太平女营战友的权益，拖延不改善营内的待遇，斗争成果又是不完整的，因为两营的福利改善，特别是太平营战友是否搬回太平营，权力恢复尚未谈判。因此，确切的说，斗争只告一段落，整场斗争还没有结束，可以说还在持续中。而且敌人也正在准备和部署进一步迫害行动，颁布所谓“营规”，在二月廿八日派遣残暴队入营，把后来关在C座的扣留者押往太平营，敌人正在加速进攻步伐，但是营内广大同志随时作好斗争的思想准备，随时准备给来犯的敌人迎头痛击。

我们坚信，营内同志一定会坚持战斗的，营外的革命群众、革命家属、正义与进步力量一定会坚决支援营内斗争，敌人的一切进攻与迫害一定会被打退的，敌人的阴谋一定不会得逞的。（完）

（2）太平营男战友的战斗

（一）在太平营的战斗

一月十三日，全体男战友集中于第一区，长期罢食支援 KB（华营，下同）战友的斗争开始，下午四点多，营长要我们回到各区，否则 KT（太平营，下同）将交给军警，实行军事管制。全体战友以作各项战斗准备来回答敌人的恐吓。十三日傍晚，红头兵全副武装共约几百名开进营内，在第一区附近的POS及周围站岗，包围了我们。我们估计他们将打催泪弹，把我们赶回各区去，或者加上调走主要干部，或者关 ROTI 房。我们准备了湿被盖、毛巾等等。入夜，探照灯不打照时，同志们在四周和区内各主要位置站岗守夜。

十四日早上，敌人藉口我们全体进入第一区而宣布“处罚”我们三个月，并宣布关闭 KT，全体战友（敌人说包括女战友）调去 KB，要我们在十分钟内，打开一区的门，让他们一批一批的调走其他战友，否则红头兵就要开进来，……全体战友被分批上了红车，一共十八辆，在严密的押送下被调去 KB。

（二）反革命两手压不倒我们——在 KB 的斗争

十四日下午二时许到了 KB，我们被令一个一个的从办公室（JUMPA 的冷气房）进入通 C 座的走廊，然后转入 A 座的旁门，一进此门，红头兵立刻出现在眼前。他们在此门通到 A

座楼门的山道上排成队，手拿长警棍，全副武装，战友們在经过他们面前，受到棍插胸、腹，脚踢阴部和肚子、关节及其他要害，棍打脚踢腰部，打在肩膀、手臂、腿部的棍和拳打脚踢不计其数。战友們就是这样一路被打到A座楼门口。殴打并没有到此停止，座内走廊和楼梯也站满了红头兵，当战友們进入牢房时又被殴击。下午冲凉，早上洗脸，一出牢房就被打，一直到冲凉房，来回都被打。这种疯狂的法西斯暴力，一连两天都如此，第三天才停止。由于不断的被殴打，许多战友受了重伤，吐血、瘀血、心脏病、糖尿病、水肿、肾病、神经病、胸痛、股痛等不计其数。

KT全体男战友被个别监禁于A Block的牢房内，除上下午洗脸和冲凉外，24小时单独监禁，狱官蛮横无理，严禁讲话、唱歌。派饭时，铁碗、铁盘乱丢，铿锵声满楼响，对受饥负病的战友是一种极大的精神负担。到KB的头四天，没有分派葡萄糖，第五天才有。

十七日下午，喇叭突然响起来，原来，伪地方部长王其辉广播，实行软的一手，说什么只要放弃罢食，一切权利立刻恢复，包括华人新年会见家属。十九日，其广播稿在夜间偷偷地塞进我们房间。第二天，营方逐一调战友到办公室要我们表明立场，支持还是放弃罢食。与此同时，小锣鼓还个别问一些被认为是软弱的战友实行威迫利诱，但是，除了获少数动摇分子外，多数战友坚持团结、坚持斗争，把敌人的反革命两手置之不顾。

(三) KB 战友的斗争

十二月廿九日，他们得悉黄水生牺牲的消息后，每座派出两名代表，要求了解情况，以便采取对策。营长只答应见三名代表，于是战友們集中在各座近办公室处唱歌、喊口号抗议；下午七点左右，A座战友推开了两道铁门，进入办公室门口，敌人恐慌万状，立刻召集红头兵，开入营内，首先镇压A座，殴打和追赶A座战友，以致好几人受伤。A座全体战友被强迫关进小房。接著，红头兵开进C座，那里的战友关起门进行反击，红头兵破门而入，实行最残暴的殴打，战友个别被五个红头兵前后围住，被令搬去B座，一面走，一面被前后左右夹击，被打得遍体鳞伤，其中佑平同志受伤最重，腰部、脸部被踩、踢，警棍插打，造成瘀血、糖尿病、心脏病，一直住院医治直到三月十四日才暂时出院回营。

A座部分战友（多是各单位的负责人）被调去B座，当KT战友到达时，只剩二十七位，住在Rumah Sakit，过了几天，全部被调进A座，同KT战友一齐监禁。

红头兵在镇压A、C座之后，长期罢食宣告开始，由于估计不到敌人的行动，因此准备不充分，连要求也未向敌人提出。

(四) 坚持斗争，直到胜利

敌人的暴力和单独监禁，使我们不但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而且A、B座之间也无法联络，连在A座内的联系也是困难的。斗争是艰苦的，敌人把我们的代表丢在一边，根本不睬

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动摇分子放弃罢食，调去 C 座（KB 罢食一开始，xxxx 等十五人首先放弃罢食，调去 KT。）同时，每天又有成批的战友被送去医院。在这时期内，敌人似乎是顽固强大的，斗争似乎是遥遥无期的。不但右倾单位（以下以 RU 代替），连反右单位（以下以 AU 代替）的领导似乎处于被动的地位，失去了领导作用，一切行动多是依靠同志的自发性。斗争进入 40 天（KB）之后，战友们身体普遍虚弱，晕倒进院的人特别多，一半以上的人留在医院，医院开了三个病房专门容纳我们，但仍感不足。这时期革命斗争是“黑暗”的时期。然而也是我们斗争胜利的前夜。“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战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的时候，正是敌人将要失败，我们将要胜利的时刻。”二月四日，我们开始一致的拒绝敌人每天发给的葡萄糖，两营战友的健康进入危急阶段，加上外面的广泛支援，终于逼使敌人低头，“纸老虎”原形露了出来，不得不同我们谈判解决问题。

（五）外面的支援

革命家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广泛的动员起来，坚持的斗争，不把敌人的暴力放在眼里，给我们极大的鼓舞。

据初步了解，外界的支援有：

1. 星政治扣留者多次罢食支援我们；
2. 星政治扣留者家委派出慰问团，并捐 500 元；
3.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联合大陆家属，召开记者招待会声讨敌人；

4. 国民大学、MARA 学院和马大教授、专业人士和学生发动签名运动，支援我们反迫害斗争；
5. 雪、槟、柔、甲、吉等州家委印发传单和发表报界声明，要求解决我们的要求；
6. 人社党和“林吉祥之流”也出来捞油水，起了一定的暴露作用；
7. 香港学生代表团来隆慰问家属，表示大力支持我们的正义斗争。

国外有：

1. 纽西兰威灵顿大学学生会；
2. 伦敦为争取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
3. 纽西兰星马学生联合会；
4. 美国纽约左派人士 Hashim Hussein Yakob 等人；
5. 星马学生留纽西兰 Masseh 大学学生会；
6. 国际红十字会荷兰分会；
7. 日本左派团体；
8. 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到吉隆坡来听取有关我们罢食的真象和表示支援；
9. 海外许多报纸、通讯社发表了我们斗争的报导；
10. 上述团体纷纷打电报给拉扎克集团，谴责他迫死黄水生同志，要求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结束罢食。

（六）罢食告一段落和当前的任务

二月十二日，所谓国会代表团会见 KB 代表（KT 代表不在内），这个代表团由 NAZAR LONGCIK、TENGKU SAID

两名伪议员和内政部、监狱总部官员组成，名为“国会代表团”，实际上始终由拥有实权的伪内政部和伪监狱总部官员为主角，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非得到他们的答应不可。会见的结果，敌人同意取消“处罚”，恢复我们的原有权力（包括会见家属、书信、报纸等），撤走红头兵，答应KB、KT待遇相同，KT战友搬回KT和享有原来权力。另KB代表提出释放病重战友、取消被捕家属的控告、设立调查庭等，敌人答应交由伪内政部，答应二月廿一日谈判解决两营的待遇问题。有一问题未解决，即敌人答应开小门。大门则由七时一—明早七时开，是否恢复八点—七时的时间，要看我们是否“遵守营规”而定。战友们一致反对开大门的时间。第二天（十三日）当会见时，敌人说接到伪内政部的指示，开大门时间按照以前的样子。之后，敌人叫KT两代表会见，态度强蛮，只要我们代表表态要不要停止罢食，别的问题都不谈。基于“KT斗争只是支援KB斗争”的理由，KT代表同意和KB战友一起结束罢食。于是斗争告一段落，由十三日下午开始进食。

这是一次会见，实际上并非谈判，因为敌人同意的几个大问题，多是敌人自己提出来，“谈”和“争”的成分很少，这是不是胜利呢？是，是胜利，因为敌人的反革命两手以破产而告终。但是，胜利并非是完整的和可靠的，因为后来敌人改变主意，拖延二月廿一日的谈判，至今无确定日期。这就是说，福利问题尚未谈判，KT搬回太平问题也尚待谈判。事实上，KB待遇恶劣，见几次OMAR都不能解决。而太平女同志的权力遭到粗暴的侵犯（我们知道的是，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关大门，放弃扫沟抗议营方规定扫沟时间，十六人分成三区监禁，不得自己煮饭和拿饭，生东西不能进等。）

这表明敌人的“保证”是不值钱的。我们估计是，一面敌人开放大小门、取消“处罚”，给我们特别伙食，使我们生活安逸，削弱我们的斗志；一面尽量拖延解决实际福利问题。在背后策划“新营规”，特别是对太平同志，一旦他们认为适当时机已到，把我们调回太平，强迫我们接受既成事实，实行新的法西斯管制。所以，这次斗争在政治上，我们是胜利了，在福利问题上，胜利还有待争取，不是现实的东西，严重的斗争还在前头。我们千万不要为胜利冲昏头脑，不要为敌人给的“特别伙食”（物质待遇）腐蚀我们的斗志。

对敌人的政策应有正确的估计，这里的RU顽固分子正散布恐敌思想，说什么“敌人要挑起事，我们不能轻举妄动”。敌人仍然对我们强蛮无理，甚至悍然侵犯我们的基本权力，我们绝不要轻易发动不必要的斗争。但是，敌人也有顾虑，罢食刚结束不久，如果此时再来一次斗争，对他们是有利的。其次，多数战友的斗志仍然存在，在必要时是可以继续战斗的。基于这个估计，我们正在队伍内和其他单位战友间作思想准备，也吩咐家属通过家属告诉其他进步团体，即刻发表声明支援我们未来的斗争，在必要时发动示威请愿。另外，对敌人的拖延谈判提呈抗议信，若无答复将再次提，并限定日期，否则，我们将采取行动（如静坐示威，唱歌喊口号）。另外，这里的反右同志要求太平女同志采取一定的斗争，抗议敌人侵犯权力。我们在抗议信中和即将来临的谈判中提出你们的问题，希望你们能同另一单位的战友交换意见，一致行动，也可以同已回营的战友交换意见，并希望你们将上述斗争准备的意见通知家属，广为宣传。

(七) 处理中途放弃罢食战友的问题

KB罢食一开始，共有十五人掉队，立即被送往KT(即xxxx那一批)。后来，KT战友到来了，KB掉队现象大为减少。但是KT战友，主要是第一、二、四区的革命群众，到此后的第二天，大约有十多人掉队，后来陆续还有，有少数几个到罢食进入三十多天四十天时掉队的。两营的掉队人数约42人，除12人“中计”从C座过去A座，一位水肿留院（华都牙也医院）医治外，全部已调回KT。

对这些战友，我们的政策是争取，只要承认错误，下决心今后同大伙一起行动，那么既往不咎，继续团结他们，但必须强调思想工作。

在这些战友中，有些是正在蜕化变质的分子。据了解，同其他人一齐回去KT的xx(原第二区)过去C座后，要求政治部“解决”他的问题，自己放弃罢食之后，家里送给他很多钱和补品，他公开鼓吹“别人罢食，我们进补”，可能已向敌人妥协；另一个留在A座的是xx，他曾帮助敌人说服一些战友放弃罢食，对于此类人，首先要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其次要提高警惕，他们可能（可能而已）成为敌人在我们里面的内奸。

上面两类人应严加区别，前一类战友由于看不清罢食的意义和这种斗争形式，对革命的支援作用，自己的思想有缺点，因此受了敌人的欺骗而放弃斗争，但是他们还是要革命的，应当争取。

(八) 单位关系

KT的各区生委和各区生委代表协商的组织，原封不动的搬来KB活动，本来要求KB及各座三单位派出人参加生委，他们不要。

各单位间的协商仍然存在，不过张xx受了B座陈xx等顽固分子的影响，也大大的顽固起来，正在开倒车。因此工作起来特别吃力。目前争论几个问题是：在伙食上要不要勤俭节约，节省一些钱用到福利和政治方面去；联欢会要不要突出共产党的问题；读报组如何处理新闻的问题；抗议信对“部长”、“马来西亚”要不要加引号的问题；要不要接见林吉祥的问题等。他们提出“非共论”，认为共产党和革台可用“伪政权”、“伪部长”等。他们不是共产党所以反对用，他们完全不懂或不愿意了解“伪”即傀儡之意，承认它是伪政权，这是一切反帝反殖的人士的起码立场，是反帝反殖的立场，是民族主义的立场，不是共产主义立场。反对用“伪”字只能暴露他们的“非共论”仍然存在。他们拒绝革命的路线和领导的思想仍然顽固。一句话，右倾路线仍然存在，在路线分歧没有解决，思想斗争绝不可放弃。

单位间思想斗争最近趋向是：RU企图利用我们的让步，想爬到我们头上了。对此，我们有清醒的认识，毛主席说：“一个时期内，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决不会在同RU搞团结时，犯上牺牲原则，作无必要让步的右的倾向，请大家放心。现在，我们的策略是：争取SU（团结单位，下同）的同情和支持，在RU战友中做思想工作，扩大他们内部的思想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和打击少数，具体情况回KT后再谈。

(九) KB 反右内部的问题

KB反右内部的分歧，即是今日B座反右的内部分歧(A座只剩两位反右同志和四位申请加入而未加入的原柔州同志，即xx等四位。)大致说来，一种意见太过强调团结，忽略斗争；一种意见又太过强调斗争，忽略团结；因而造成两种极端，互相之间关系不太好。在11·14调营后，A座反右负责同志闹到辞职。

在这期间，单位和单位关系有所改善。这是随著反右在政策上的调整而来的。这就是说，反右内部的分歧虽然仍存在，但已起了新的变化，这个是基本好的，同我们的影响是相联系的。在这期间，我们同KB共同处理了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接见林吉祥问题，KB AU主张接见，我们支持，他们保留看法，尊重我们的看法，在行动不接见。(林接见了陈福兴、李方千等六个)；二是A、B座的共同备忘录问题；三是联欢会问题(还未结束)；四是伙食问题等。这些都牵涉到内部如何处理AU和RU的关系问题，即团结政策问题。

我们已把我们的基本政策(在太平实践过的)告诉了KB反右同志，两种意见的同志都同意我们的政策，但在实践时却有分歧。我们正尽一切可能，利用这个时机，协助KB反右解决内部分歧，加强团结，详情日后再谈。

(十) 健康、特别伙食、生活等

同这里医院院长谈判结果，从二月廿六日起获得一个月的特别伙食。一个月后看情况而定。特别伙食包括：鱼肉加倍

(即加多四安士)即日给四安士猪肝和半安士牛油，每天豆腐一块，每天鸡蛋一个，面包加倍等。

餐食安排：进食后的20天吃粥，早点二粒蛋、面包；十一点中餐；二点半午茶；五点半晚餐；九点宵夜(面包、奶水)。

三月十三日开始早操及打球，只限于篮球打半场和打乒乓、羽球尚未发给。

进食一个月后，许多战友“发胖”了。但是，这不过是外表现象，气和力远远没有恢复，精神的耗损也没有恢复。许多战友有水肿、心脏病、肾病、胃病、精神病等，都是长期罢食造成的，病情严重的有韩佑平、李亚明、郑敬文、黄苟仔(中途放弃罢食者)。最近进院的有江海、GUNA(均为心脏病)，有更多战友需要进院，但由于病床不够而没有送去。另外，吕进益患了神经病，已进入红毛丹神经病院。至于被殴打而致内伤者则不计其数，由医药组照顾，吃中药治疗。

我们同A座(共约27人)生活在一起，A座共有一百二十多人，B座四十多人，C座自从放弃罢食者调走后已无人。

(十一) 结语

这次罢食意义是重大的，它动员和教育了广大的家属，发挥了营内外团结战斗的精神，促进了群众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次罢食之长是目前扣留者未曾经历过的，艰苦性也是少有的。这对每个扣留者都是一个考验，它加强了扣留

者的团结战斗的精神，锻炼了每个人。

但是，这次斗争也有缺点，反右组织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主要是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失去了应有的领导作用。六区有两个同志（XX和XX）未能坚持到底，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彻底检讨。

我们决心团结战斗，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

（十二）对太平女营（16人）战友的几句话

敬爱的同志们：

你们坚持斗争到胜利的顽强战斗精神，鼓舞了我们，值得我们向你们学习。我们两方的斗争各有特点，你们虽未被严重的殴打，但是你们同外界隔离，同政治扣留者整体隔离，你们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没有坚强的意志是不行的。我们全体反右同志向你们致崇高的战斗敬礼！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你们目前的处境比我们恶劣，在我们大伙尚未回营前，希望你们自力更生，团结战斗，争取必要的行动对付敌人。我们将在此地支援你们，我们除了在谈判中提出你们的恶劣处境，要求敌人改善外，还将要求敌人将你们的代表送来KB，参加谈判。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是整体扣留者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反右队伍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援，把当前未完的斗争进行到底！

你们转告我们，说不了解我们的情况，在此我们表示歉意，因为在罢食结束后，没有及时充分的将情况转告你们，这是我们的不对，我们将纠正此缺点。

你们的健康如何？你们不少人身体不好，应加倍休养和锻炼。在目前一个时期，应把必要的时间放在健康方面，当作必要的战斗任务来完成，身体对革命是重要的。

我们在战斗中分别，我们将在战斗和胜利中见面，有部分同志或许不能重回KT，敌人不愿见到他们回去，但是在一个多月的罢食中，我们分隔两地而共同战斗，取得胜利，敌人隔离不了我们，今后敌人也永远分隔不了我们，只要我们是不断革命的，我们必定有见面的日子。当然，我们将尽力争取全部战友回KT。

我们已通知敌人，我们留在厨房的一切伙食，由你们全权处理，只有你们才有权处理。我们已要求敌人将我们在KT的钱割来KB，以应急需，因为我们的归期遥遥无期。

在二月十二、三日谈判中，敌人口头保证KT战友的权力不受剥夺，你们可据此力争捍卫自己的权力，要求敌人履行诺言。

罢食前，家属拿来的食物，若是易腐者，而你们又用不完，可交敌人（或家属）送来KB给我们。

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仇恨人心要发芽”，让我们把这次迫害的血海深仇化为力量，“心中有光荣革命，千难万难无阻拦”！

此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KT、KB 全体反右同志
74年3月16日于 KB A 座

（五）劳中派对12·29斗争的总结

历时47天的12·29反迫害绝食斗争胜利地结束了。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发扬的优点，也存在著某些需要引为鉴戒的缺点。而这场斗争的实践所提供的正面与反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更正确地分析和掌握扣留营的矛盾，更好地开展斗争是很有帮助的。

爆发12·29斗争的背景

12·29斗争的爆发是反动派在一个相当时期以来积极策划，进一步对付和迫害政治扣留者的必然结果，是作为它进一步对付和迫害政治扣留者的具体表现的调营事件分不开的。由于同志们发扬“坐穿牢底”的精神，藐视了敌人长期扣留的政策，思想素质有了提高，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反动派想通过长期扣留来“解决”我们、软化我们的企图是失败了。它们现行的那一套对付扣留者的各项政策是越来越不灵了。太平新营的设计与建造以及它所计划实施的各种新条例、新措施，一方面说明了反动派过去实行的那一套扣留营政策的失败；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它不甘心失败而决心以新的一套来加强对付和迫害扣留者。

自1972年年中起，有关搬营的风声时有所闻，从反动派官员口中，我们也逐渐了解到新营的一些设施和制度。当时我们估计敌人将会在新营中实行隔离和分等级制度，并通过“思想改造”或“经济刺激”等，强化它们的软硬兼施进一步

对付扣留者的政策。鉴于星岛明月湾扣留营曾实行强迫劳动政策，我们也不否定敌人在新营实行强制劳动的可能性，虽然我们估计现时这种可能性还不大。在广泛的讨论中，同志们基本上都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敌人在新营实施的基本方针必将是更加强化其“政治与思想的攻势”，而“分等级隔离”、“思想改造”、“职业训练”、“按件计酬”等具体政策都可能被采用，以服务于上述的方针。对于敌人的这种方针与可能实施的多项具体政策，当时三座我方同志都决定应根据到那边以后的具体情况，设法打破其隔离政策和工作制度，以生活集体化和经济集中处理来面对敌人可能采用的“思想攻势”、“经济刺激”政策。且决定一般上不做超过三小时的工作，以防止敌人可能用各种劳作来剥夺我们的政治活动与学习的时间和精力，打破它企图使扣留营“自给自足”的政策。我们也推测反动派在吸取了其营规在华营、麻营被逐步打破以致不能有效实施的经验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作调整，恢复其营规的“威严”，以便有效地配合其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根据上述的分析和推测，大家都认为新营的各种设施和政策，都必然会使我们与敌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而到了新营之后，必将会爆发一场反迫害的斗争。

由于我们估计到了新营之后必然要出现的斗争局面，我们不同意“反右”方面所提出的要为调营而开展斗争的做法（当时C座“反右”方面曾向我方同志提出他们准备为调营而开展斗争），而认为应当避免在被镇压的情况下到新营，因为我们虽不否定敌人可能会以暴力方式或突击方式调营，但估计和平调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当时还未有人调去新营，我们还不能十分肯定敌人将实行什么具体政策，与其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斗争，倒不如等我们到了新营估计那

边具体情况，作好具体的准备之后才来开展斗争，这样会来得更加有理有利。

为了更好面对反动派在新营可能实施的各种迫害政策和由此而引起的斗争，我们除了作好同志们的准备外，还以各种方式向国内外作了一系列的反迫害与反对长期监禁的舆论工作。同时外头各地家属也组织起来，重新成立地区性的与全国性的家委会。在国内外制造舆论，谴责敌人的长期监禁与各种迫害政治扣留者的政策，争取各界对政治扣留者的关注与同情，为我们的反迫害斗争所迫切需要的营外支援作了组织上与舆论上的准备。当时被释放的同志在报上的谈话，各地家属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和在给反动派当局的抗议信中，以及家委会成立之后所发表的文告中都突出了长期扣留与新营的问题，呼吁各界人士的关注。另一方面，我们还利用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的时机向国内外发表了一篇题为《响应正义的号召》的声明，并附上过去我们为暴露‘11·27’事件而写的《我们的控诉》。同时也要求外头家属打电报与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主席，并将这函件在国内外加以发表。

十一月中旬，传闻了许久，展延了数次的调营行动终于付诸实施了，但除了麻营全部同志及部分华营与太平隔离营同志被调去新营外，尚有九十多位同志留在华营。同志们去了新营不久，关于新营条件恶劣的情况便传到华营，接著又听到太平营同志的各种斗争消息，知道他们利用反动派行政上的混乱和狱卒人员的短缺，挫败了“职业训练”的新工作制度及逐渐地打破了区与区之间的隔离，使敌人的“新秩序”无法建立起来，我们当时听了这些消息之后便产生了大镇压不

久即将在太平营发生的感觉。多次营内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反动派是不会甘心见到它所精心策划了那么久的隔离政策，与工作制度和其他设施遭到那么严重的破坏，它更不会容许新营的“无政府状态”长期延续下去。反动派的暂时“忍耐”与“不理”虽然可能与负责官员处理手法有多少关系，但无论如何它是不会脱离反动派最高当局处理扣留营的总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倒是它一方面估计那时采取行动对它不利，因此暂时“按兵不动”，选择对它较为有利的时机才来镇压；另一方面则是收集对付我们的资料与“证据”为它的全面调整和镇压作舆论准备。根据上述的估计和看法，我们意识到或迟或早反动派的镇压与同志们的反迫害斗争将不可避免地会在太平营发生，而我们在思想上也作了随时开展斗争支援太平营同志的准备。

由于新营所出现的局面，以及华营当局在那段时间内基本上采取缓和的态度和手法，使我们在思想上过分地注意太平营敌我矛盾的尖锐性和镇压与斗争的可能性，却忽视了华营本身的矛盾也是同样尖锐的，因而低估了反动派进行镇压的可能性。反动派进一步迫害扣留者的方针是已经定下来了的。它对付各营扣留者会有某些差异，但它的基本政策却是一致的。其实在调营前的两天，华营各座也出现了不受控制的情况，B座“反右”在此之前的“烧门事件”，A座打破铁丝网及几次打破通往三楼之门等事件。反动派在当时虽没有采取对付行动，但这些斗争都说明了敌我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事实。由于我们在思想上低估了华营矛盾的尖锐性与镇压的可能性，导致在12·29处理水生事件时，产生了估计不准确的结果。

对水生同志牺牲的态度和处理经过

1973年12月29日正午，B座一位同志会见家属回来传达了水生同志的死讯，并大略反映了太平营同志对此事的处理态度。B座负责同志立即讨论，并把有关情况向A、C座反映，同时提出下列意见：

- (1) 各座代表分别出去会见营长，要求允许代表去太平营了解水生同志的死亡真相，或与太平营政治扣留者代表通电话，了解情况；
- (2) 分别打电报给家委与水生家属；
- (3) 写信向内政部提出抗议，并要求改善太平营的卫生条件与医药照顾；
- (4) 于水生出殡当天罢食一天，表示哀悼和抗议。

C座负责同志基本上同意B座的意见，但提出三座代表可坚持一起出去向营方作交涉。（注：“3·25”斗争后，三座代表是被允许召开会议，并一起向营方交涉有关营内共同问题的；“5·13”事件后，反动派剥夺了三座代表的这项权利。）A座负责同志也表示同意，认为施加一定的压力是可以争取到的。B座接到A、C座的意见后也表示同意争取三座同时出去交涉，但考虑到营方可能会拒绝，因此写信询问C座准备对此问题坚持到什么程度？C座当时答复说，只作一定程度的坚持，这时A、B座代表都已先后出到外面去了，而开门的狱卒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了C座的门，让代表出去。

由于三座代表都已经出去了，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三座代表共同处理问题的既成事实，再加上考虑死人的问题是个严重的

问题，我们认为营方在现实情况下是会一同会见三座代表的，因此大家都同意先不个别同营方交涉，而坚持三座代表共同处理。当天大家向营方提出水生事件时，营方一开始便同意三个代表一起见，但同时拒绝同时会见六位代表（各座有两名代表，我们与“反右”各一）。我们曾听说太平各区代表共同处理问题，起初也遭拒绝，但坚持了一阵之后，营方最后才答应的。我们当时认为既然太平营的情况是那样，而营方又已同意见三名代表，那么，同时见六名代表对营方来说已不是个大问题了。估计这是营方负责官员的有意刁难，坚持一下，他们最后还是会答应的。因此，我们拒绝三名代表见营方，坚持六名代表一起见。于是先退下来自己讨论处理水生事件的具体问题，决定由我们与“反右”打电报给家委与水生家属，向营方提出允许代表去太平了解真相或打电话与太平同志联络的问题。同时也决定当天及第二天进行罢食以示抗议和哀悼。由于准备在营方不答应时施加一定的压力，我们决定各座同志集中在各座大门前喊口号与唱歌。并同“反右”代表选定了口号与歌曲，分别传给各座。

当代表们对有关问题协商决定之后，我们又再去同营长交涉，他仍不答应，其态度非常强硬，且警告代表，命令代表回去，否则准备以武力对付。当时，他有重提一次见三名代表的安排，并说如有必要他会再见另三名代表。我们同他据理力争，但他根本不讲理，因此我们还是不接受。为了施加一定的压力，三座同志于营方第二次拒绝后便开始喊口号及唱歌。

这时，代表们又退下来讨论，根据几年来我们对疯狗（营长）的性格与处理手法的认识，我们知道他是不会在这种情

况下答应我们的要求的，于是，我们提出了给他一个下台阶的办法，那就是派一名代表先去办公室同他谈，这名代表不是去交涉和处理水生事件所引起的问题，而是在比较缓和的气氛中向他提出我们为何要六名代表一起见的理由。在这问题上“反右”基本上同意，但却提出派两名代表，即我们与他们各一位，进去找疯狗谈这问题。当两位代表要去见疯狗时，他傲慢地通过其下属加以拒绝，并再一次要代表回到座内。疯狗的这种强蛮的态度，不仅使代表问题不能解决，就连水生同志牺牲的问题也不能处理了。由于考虑到死人的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是必须解决的，而同志们当时的情绪是相当高涨的，绝不能容忍营方的这种无理态度。于是，各座代表都同意加强压力，这时“反右”代表提出以敲敲打打的方式来加强压力。对于“反右”这项提议，我方代表之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了解同志们对于“11·27”期间，“反右”滥用这种斗争方式是很反感的。他们的滥用不仅在政治上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也大大地削弱了这种方式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形式。我们认为若要加强压力，与其敲敲打打不如把锌门推开，让同志们出到办公室前集合更有效果。我们知道推门的形式是相当高的，我们一路来就不轻易采取这类斗争手段。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提出这种斗争方式呢？主要原因正如前面所说的，对于华营本身所存在的敌我矛盾的尖锐性估计不足，以为在死人的问题上，反动派处于无理与不利。因此，当时虽也曾估计到敌人派镇暴队进来镇压的可能性，但认为可能性不会很大。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已就敌人的长期扣留与调营事件，向国内外作了不少舆论准备，而家委会也已经成立了，若反动派真的来镇压，我们不会处于完全无准备状态而措手

不及，同时在政治上也将会使反动派付出很大的代价，尤其是它正在准备其“大选”，对政治扣留者的镇压，必将会被各反对党所利用。

负责同志当时是这样想的：推门这一斗争方式，我们虽向来不主张随意采取，但这并不等于完全否定这种斗争方式，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使用。另一方面，也由于深知同志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因此曾写信打进A、B座征求营内同志的意见，但在忙乱中，由于传达上的误解，以致造成B座同志的意见没有被询问到，却误以为B座负责同志也同意采取这种斗争方式。

我们提出这个斗争方式，“反右”同意先采用，若没有效果再来考虑是否要采取敲敲打打这一方式。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便立即通知三座准备于再次要求会见营长被拒绝时，推开A座的锌门让A座同志出来集中，为了准备应付最坏的可能性，我们还提出若敌人派镇暴队进来，可退进A座内铁门顶住，作适当的坚持，同时也决定在遭镇压之后即展开长期绝食斗争。

将近傍晚七时，我们的要求再一次被拒绝。于是A座同志便推开锌门出来集中唱歌和喊口号，B、C座同志也各自在座内大门前作相应的配合，大约只坚持了一个钟头，镇暴队便进营进行血腥镇压，见人就打。我们退到A座大门前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在镇暴队保证不再打人及立即将受伤的万千同志送进医院的条件下，让它们开入楼座内，镇暴队进A座之后，便把同志们锁进小房内。在这过程中部分同志在关进小房时，遭到殴打。当晚C座同志把座门锁住，镇暴队从后墙

爬云梯进入把全部十一位同志押往B座单独监禁（注：C座的建筑物是不能单独监禁的。）在押送过程中，几乎每个同志都被殴打，为了反抗敌人的这种镇压，于是我们的绝食斗争便告开始。

这场镇压若把它孤立起来看，确实是由于我们坚持六名代表一起处理水生事件而引起的，但实质上，这问题同敌人在调营事件后因为其政策与制度在新营遭到破坏，打算在有利时机对政治扣留者进行镇压，以便它作全面的调整和强行其政策的基本趋向是密切关联的；从表面上看来，镇暴队的进营镇压是由于我们采取推门行动而导致的，实际上，当营长第一次拒绝我们的要求以极其傲慢无理的态度来对待见三位代表还是六位代表这样一个小问题时，反动派已经决心准备镇压了。从推门行动之后约一小时，镇暴队能这么迅速从怡保赶到，这一现象便可以看出来。因此，从实质上看，从总的来说，不管有没有水生事件，也不论我们有没有采取推门行动或坚持三座代表一同会见的问题，敌人的镇压与对扣留者作全面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所不同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和导致镇压的方式而已。在时间上，敌人可能会选择较后的，也更有利于它的时机，或等待它完成其准备工作与其他部署之后，镇压的发生或者是它主动挑起事件或者是利用我们的错误作藉口，或者是强行其政策引起我们开展斗争。总之，为了达到实施其新的一套扣留营政策与制度的目的，反动派对我们的镇压是必定要发生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指出，在调营后，若我们对华营本身的矛盾尖锐性有充分的估计，在水生问题上不低估敌人当天进行镇压的可能性，不过于坚持代表权问题，也不要采取推

门或者其他较高的斗争方式，那么当天的镇压是有可能避免的。在代表问题上，当时作适当的坚持是有必要和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开始时是过分地坚持了，以致造成后来无法灵活地加以解决而采取较高的斗争形式，而我们当时会那样处理，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同六位代表已经出去这个“既成事实”的局面以及当时的气氛有关系，也和与“反右”共同处理问题时灵活性受到一定限制有关系。但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主观上对敌人当天的可能反应估计不准确所致，推门这种方式的采用也是由于上述各项因素所造成。推门的方式在加强压力上是有效果的，但也同时给敌人拿来作为镇压的理由。对于这种斗争方式的采用，不应完全加以否定，应根据具体的需要，从利弊两个方面来衡量。但若不准备开展较高形式的斗争，那么当时采取这样的斗争方式是与整个斗争不调和的。

这场斗争的意义和成就

“12·29”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动派的新营政策失败后，企图用镇压来作全面调整，以便实施其各项新制度与政策所造成的。从反动派对同志，尤其是太平营同志全面进行残酷殴打与虐待的情况看来，很明显地反动派这次的暴力镇压，主要地还是在对同志尤其是太平营同志进行报复。其残酷性可以同一九六九年的“11·27”事件相比，而在规模上则是更为扩大的。反动派把太平营同志调来华营，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方便镇压与报复；另一方面，也宣告其新营政策的破产。这场斗争的胜利结束以及打破了它欲通过镇压而实现其全面调整，进一步对付和迫害政治扣留者的计划。从太平营同志的继续留在华营而没有被调回太平的事实看来，反动

派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会放弃对坚持斗争的扣留者实行其新营政策的企图。从抗拒作为反动派进一步迫害政治扣留者的全面调整政策而言，这场斗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场历时达47天的绝食斗争，不仅是近年来半岛上扣留者所进行的最长久的一次绝食，在绝食期间所遭受到的肉体与精神迫害也超越了以前各次的斗争。而敌人在这次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其特务官员和在扣留者内部的代理人所进行的个别说服与诱降活动也作得比往次落力和恶毒，甚至在春节前还出动其“部长”到营内来进行无耻的劝说与诱降。这充分地说明了这场斗争的长期与艰苦的特点，同时也显示了反动派如何阴险地交替运用镇压与欺骗这两手策略。

这场反迫害斗争的政治性最为突出。在斗争要求中，政治上的考虑高于一切具体的福利改善，这是“12·29”斗争的重要特点。如果不从政治上去考虑而只著眼于一些具体的福利要求，那就不能充分评价这场斗争的意义和所取得的成就，或甚至会得出斗争没有取得多大成就的错误结论。

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不论是营内各单位之间，还是营与营之间，同志们都能为了反迫害这一共同目的而团结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开展斗争直至最后胜利，这对于扩大这场斗争的影响与改善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12·29”斗争的另一个特点是家属广泛地动员起来，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支援斗争，扩大这场斗争的政治影响，使这场斗争发挥了更大的积极作用。这次家属的支援工作，不仅做得比以前远为广泛，同时在形式上也大大地提高了。几次请愿示威的被残暴镇压，不但引起了国内各阶层人士的同情与

支援，使反动派更加处于无理和更不利的地位，在政治上受到严重的打击。同时也使家属得到教育和锻炼，使他们更加仇视反动派，更了解我们坚持斗争的意义。这对于促进家属更积极地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是有帮助的。

由于反动派这场镇压的无理与残酷，我们事前的国内外舆论准备和斗争过程中的许多舆论工作，也由于这场斗争的正义性与持久，以及外头家属的各种动人的斗争场面，使我们获得了远比以前更为广泛的国内外各阶层人士与舆论的支持，特别是国内各大专的学生与讲师还以各种实际的行动支援我们。而在国外许多进步组织、民主团体也分别进行各种形式的支援，甚至像荷兰红十字会、伦敦国际宽赦委员会和纽西兰总理诺曼克那样的团体和人物也打电报向反动派提出抗议和谴责或促它解决问题。据目前已知道的而言，我们至少获得了来自英国、荷兰、日本、澳洲、纽西兰与香港等地的各种团体的支持和声援，这也在舆论上对我们非常有利，大大地扩大了这场斗争的政治影响。

斗争过程中的优点和缺点

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发扬的优点，也出现了一些应当注意的缺点。

由于这场绝食斗争远较以前几次更为长期和艰苦，而敌人在尝到“11·27”那种通过暴力镇压与威胁手段成功击垮了那次斗争的甜头之后，妄想以更大的规模来重演“11·27”，把我们的斗争击垮或拖垮。但是历史并不重演。同志们在吸取了“反右”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更加坚定地发挥了

不怕苦、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在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情况下，在体内器官可能永久不能恢复其机能的威胁下，都还坚持著斗争，甚至有几位同志已经达到死亡的门槛，但他们还是凛然不屈，视死如归。这种在斗争中的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和毅力，是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优点不论是在那一种形式的斗争中都必须加以发扬的。

在“12·29”尽管反动派的镇压来得如此突然，以至这场绝食斗争无法像过去几场斗争那样，能够事先作好具体的联络与各种准备，也来不及把斗争的目标与意义较具体与详细地向全体同志解释与分析。但由于平时的思想准备工作和同志们的高度自觉性以及对集体对领导具有信心和充分信任，大家对这个“事变”都能镇定乐观地投入战斗，把这场艰苦与持久的甚至随时须付出生命代价的斗争坚持到胜利。这充分体现了同志们的斗争坚定性与组织纪律性。同志们这种高度自觉性，这种坚定性与组织纪律性以及这种对领导对集体的信心，也是这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它使敌人的一切劝说与诱降活动，各个击破、欺骗中伤的企图都可耻地失败了。

反动派这次采取迅速镇压和严厉封锁的手法，企图使我们被镇压和开展斗争的消息不能传到外面，并完全隔绝我们与外头的联系，尽管敌人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我们还是成功地把斗争的情况和敌人的各种暴行，及时地传达到外面去，同时还把国内外支援我们这场斗争的各种令人鼓舞的消息传了进来，这种出色的联络工作不仅及时地向外头提供了制造舆论打击反动派的资料，同时也大大地增强了同志们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在各方面的机智与出色的工作是值得赞扬的。

每一次的绝食斗争都必然地要使我们更多地同医生与医院人员接触，怎样处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这次的斗争中，尽管个别医生与医务人员由于受到敌人宣传与政治偏见的影响，对我们的斗争产生反感并对我们采取不友善态度，我们还是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至于对其他的医生和多数医务人员，我们则采取解释与团结的态度对待他们，使他们也对敌人的野蛮无理产生不满，这有利于我们在政治上孤立和打击反动派。

由于有这么多同志进院，而在医院期间同志们的那种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各种优良的表现，赢得了医院工作人员的尊敬和赞赏，有助于解除某些医生与医务人员对政治扣留者的某些偏见和促进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与认识。

当罢食斗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B座“反右”向我们提议采取杯葛葡萄糖的行动以施加压力，我们原本是不同意的，我们不能同意的主要看法是：

- (1) 我们已经罢食了近四十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甚至随时都有同志牺牲的可能。这种情况本身已经足够向反动派施加压力，不论我们有没有杯葛葡萄糖，我们的健康情况已不容许反动派再拖多久了；
- (2) 在同志们这么虚弱的情况下杯葛葡萄糖，会促使同志们的健康更加恶化，使那些身体较弱或本来有病的同志的内部器官受到严重的损害，以至有可能长期不能复原；
- (3) 因听说A座某些同志思想上有些动摇，担心升级步骤会使他们跟不上而放弃罢食，对斗争以及对那些同志今后的发展，都会有不利的影响。

但是，当我们的负责同志之间还在交换意见，还未答复B“反右”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时，便传来了A座的决定，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和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肯定杯葛葡萄糖对迫使反动派较快地来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作用，但在那种情况下，其作用是很有限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来，既然这场斗争是持久的，从策略意义上来说，为了使斗争快一些结束，而付出增加逃兵和使同志们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那样的代价也是很不值得的。更何况以当时的情况看来，斗争的拖延对反动派极其不利，它必须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想以杯葛葡萄糖来使斗争快些结束是一种急躁，对持久战缺乏耐心与信心的表现。据了解，当时A座决定杯葛葡萄糖是在没有经过负责同志研究与同意的情况下，由个别同志发起并带动同志们进行杯葛的，而A座负责同志对于当时正在酝酿中的这种不正确的“升级”步骤，没有及时地以正确的分析与看法去领导同志们，制止这种没有组织纪律性的自发行动。当时A座的处境是较为恶劣的，但负责同志却没有挺身而出，突破白色恐怖以加强同志们对作持久战的信心。这种缺乏领导的与组织纪律性的现象是必须严肃地加以检讨的。（即使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决定方式也是很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当时A、B座之间通话虽然有困难，但仍旧是可以联络的，在采取这行动之前，没有事先与罢食更久、健康情况更差的B座同志商量，而只在采取行动之后把决定通知过来的处理法也是不正确的。

在“12·29”当天在外头的代表与座内（主要是B座）的其他负责同志的联络是很不够的，外面情况的发展没有及时地向里面反映，使里面的负责同志不能很好掌握当时的情况和

提意见。另一方面，在推门的决定上也由于联络得不好，在忙乱中误将A座负责同志的意见理解为A、B座都会同意这决定，以致在实际上没有征询到B座的意见便作出决定。在斗争中，有时由于情况的急迫，负责同志是可以当机立断的。当天的情况虽然也相当紧急，但还是有时间可以征询到里面同志的意见的。负责同志在这方面的忽略使许多同志不明白做出这个决定的情况与原因。虽然同志们都会因为这是负责同志的决定而加以尊重，但对此决定是有意见的。在今后的斗争中，这种情况应加以避免的。

此外，个别同志在斗争期间不必要的大声谈话，以及冲凉时表现得生龙活虎等都是不恰当的，这只能使敌人以为我们的虚弱是装出来的，在效果上对于罢食这种斗争形式来说是不利的。

结语

表面上“12·29”的镇压主要是在一件小事情上发生的，而且来得很突然，但从本质上来分析，它是反动派企图通过镇压进行调整和施行其新政策、新制度的总趋势所必然要导致的。这次经验说明反动派为了政治上的理由，为了执行其政策的需要，随时都可以在小问题上，甚至故意制造事件和藉口而对我们进行突然镇压和迫害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更具体地去看待我们一路来所经常说的“反动派随时都会剥夺我们的权利”、“我们必须随时面对敌人的进攻和迫害”这些话，随时准备在更加艰苦和更无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果敢、坚决地面对敌人的进攻和迫害。

在这场艰苦斗争中，大多数同志能坚持到最后胜利，而一小部分则在中途当了逃兵。

总结这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可以这么说，是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相信集体，走集体的道路，因此对斗争有充分的信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坚持到胜利；另一种则是，脱离集体，找个人的出路，于是牢骚满腹，埋怨多多，对集体对领导没有信心或缺乏信心，看不到斗争的意义和前途，结果自然要选择保全自己，背弃同志，当个逃兵的道路。这种现象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公”字当头就会有勇气和力量，就能乐观地面对一切，成为堂堂正正的战士；“私”字挂帅，就会顾虑多，包袱重，困难面前不是悲观失望就是经不起考验，当个畏缩的逃兵。成为战士或是逃兵，往往只是在于一念之差，而这一念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同平时的思想情况分不开的。因此，我们要坚持胜利地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与艰苦的斗争，就必须更加重视平日的思想工作。

从几年来营内斗争的发展看来，我们的绝食斗争一次比一次更长期更艰苦，敌人的镇压行动也一次比一次更残酷，随著外头局势的迅速发展，国内阶级矛盾的加剧，反动派必将采取更加严厉更加恶毒的政策来对付营内外的革命者，因此今后所进行的形式较高的斗争将是更加艰苦的，而敌人的迫害手法也将会更加残暴。对今后所开展的斗争，我们应更加慎重和最多地从政治需要去考虑。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因此而害怕斗争或否定将来的一切形式的斗争。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敌人的迫害和镇压是不讲理由和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它的形式和时间取决于反动派的政治需要及其政策上的

考慮。因此，那种认为只要我们不事先有所行动，敌人就不会对付我们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但是，那种以为外头形势大好，可以依靠主观能动性，在每一项具体的问题都要发动斗争的想法也是极其不实际和有害的。这种想法是忘记了自己与敌人今天所处的地位与关系，忘记了自己目前仍处于被扣留、被镇压和被迫害的地位，忘记了敌人不管怎样还是我们的镇压者和迫害者。从总的观点来说，我们应当在精神上压倒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压倒。根据这种精神，我们藐视敌人的长期扣留与一切迫害，敢于在必要时开展斗争，坚持我们的政治立场与原则，捍卫和争取我们的权利。但在具体的一个个的问题上来说，认为敌人事事都会在我们的压力下低头，那是幼稚的，对敌人的“民主”伪装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冒险的想法，这种想法便是盲动与乱斗的根源。

敌人的镇压与迫害主要的是根据它的政治需要，而我们今后所开展的斗争也必须主要地从政治上来考虑。

扣留营的主要矛盾与斗争，其实就是我们与反动派之间的政治矛盾与斗争，其他一切的具体问题的矛盾都是从属于这个主要矛盾的，为这主要矛盾所规定的。反动派在扣留营内所进行的一切威逼利诱和一切软的或硬的措施都是依据它用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总政策所规定的。因此，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并根据我们政治上的利益与需要来指导我们在一切具体问题上的斗争和一切营内活动。（完）

（六）暴力压不倒正义斗争

前言

暴力镇压是拉扎克傀儡集团对马来亚政治和留者所采取的一贯政策，军警开入扣留营对手无寸铁的扣留者进行血腥迫害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1967年「5·26事件」，1968年「3·25事件」，1968年「7·29事件」，1969年「3·24事件」，1969年「11·27事件」以及这一次事件就是最近几年来拉扎克集团血腥镇压扣留者的突出例子。在这一系列血腥事件中，反动派从来没有停止过暴力的使用，相反地使用得更残酷、更野蛮。

1973年12月29日，反动派再度派遣大批军警野蛮镇压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政治扣留者，导致扣留者坚决的进行了历时47天的长期绝食。这场反迫害斗争终于在1974年2月13日胜利结束。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反动派在这期间所干下的种种法西斯暴行。

血腥镇压与反迫害斗争

长期以来，无数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祖国优秀儿女和爱国人士为了民族的利益，在黑牢里被杀害或活生生的迫死迫疯。由于长期监禁和残酷迫害的结果，许多扣留者在扣留期间患上重病，有的在扣留所或在扣留营或在释放后牺牲了。反动

派为了推卸责任，把一些病人膏肓的、在垂危之际的扣留者推出牢门加以「释放」，以免让他们死在牢里。这些扣留者往往在踏出牢门不久就因病而逝世。其中有前泛马回教党主席布汉鲁丁医生，前泛马回教党吉兰丹州行政议员阿末也丁，最近三年来在扣留营内牺牲的同志就有苏辉明同志（矿场主人）、冯朝民同志（前劳工党马六甲市议员）、黄水生同志（工人）。过去几年来，扣留者被迫疯的例子就有六宗。

1973年12月29日，黄水生同志在太平甘文丁扣留营被拉扎克集团活生生迫死。这是反动派迫害扣留者的最新罪行。我们华营同志于当天下午听到这不幸消息后，感到无比的愤慨和沉痛，立即派出A、B、C三座代表各二名联合向反动派当局提出我们的谴责和抗议，并要求解决有关问题。令人愤慨的是，反动派当局不但断然拒绝接见代表，顽固地不解决有关问题，反而于当晚8时左右派遣大批联邦后备队（即所谓的镇暴队，实际上是残暴队）悍然开进营内对集合在营方办公室门前等候会见营长的代表和A座同志进行疯狂的镇压；反动派对准同志喷射催泪瓦斯，猛挥警棍，把全体A座同志关进各自的小牢房，施行单独监禁。镇压过后，C座一位代表下腹受重伤溢血不止而被扛去医院救治，另有几位伤势严重的同志也被送到医院治疗。

接著，残暴队进入B座用暴力把全体同志单独监禁起来。

过后，残暴队进入C座，冲到大牢房前把催泪瓦斯喷向同志们脸部，使他们双眼中毒不能张开。大牢门被冲开后，C座全体同志被押往B座单独监禁。有些同志双手被分开绑在两

名押送的残暴队左右手上，其他残暴队员则伙同狱卒，乘机挥动警棍猛击猛撞扣留者身体的各个要害部位。在C座同志被押往B座的约1/4哩的路途中，暴徒们没有停止殴打。此外，沿途站岗或埋伏著的暴徒们也参与突击性的殴击，一位同志被打跌倒在地上，遭到警棍和皮鞋猛插猛踢胸、腹、腰、肾等部位。另一位同志后脑被警棍打破，鲜血湿透衣裳，给送进医院留医。其他同志有的被打得周身瘀青红肿，有的鼻腔出血，有的吐血。

第二天早上反动营方宣布剥夺华营全体扣留者的一切基本权利三个月，包括不得会见家属、通讯和阅报，并且无限期地对全体扣留者施行廿四小时单独监禁。

在法西斯暴力面前，同志们奋起反抗，坚决开展了这场持续47天的反迫害斗争。

军警接管扣留营，施行恐怖统治

从12月29日开始，军警就接管了扣留营。整个营处在围城状态，通往扣留营的公路遭到封锁，车辆及行人不得靠近，军警在营的周围巡逻，残暴队在营内长期驻扎。

刁难绝食中的扣留者，命令扣留者在一分钟或二分钟内冲凉、洗衣服、不准扣留者谈话，否则动用暴力对付。这些暴徒在楼座内（囚禁扣留者的地方）制造各种各样的吵杂声浪，例如高声狂叫、棍击栏杆和桌椅、脚踢牢门和铁罐等等，以加强白色恐怖气氛，威胁同志进食，妄想瓦解罢食斗争。

在医院内，军警严密封锁和隔绝扣留者病楼，残暴队肆无忌惮地在病楼内外巡逻，不理医生反对，强把病床上患病的扣留者加上手铐；此外，时而辱骂和威胁留院同志，或在夜间故意喧闹，干扰安宁。凡此种种，治疗病人的医院已经变成另一个折磨扣留者的牢房。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的暴力镇压必然伴随着抢夺、偷窃和破坏，这次事件也无例外。营长奥玛（Omar Bin Mohd. Amin）亲自率领狱官狱卒残暴队，藉口查房，进行抢劫扣留者的较贵重的私人财物如手表、闹钟、钢笔等被盗窃自不在话下。甚至连原子笔、铅笔等物也难免遭殃，其他私人物件也被捣毁或破坏。

太平营同志血染华营

太平甘文丁扣留营的一百六十八名全体男女政治扣留者于1974年1月13日开始展开绝食行动，全力支持华营战友的反迫害斗争。他们的正义斗争，立即遭到拉扎克集团的血腥镇压。当天中午军警接管太平营。次日早上，反动营长宣布剥夺全体扣留者的基本权利三个月。接著，更命令残暴队开入扣留营，把全体男性扣留者（139名）押上红车，在装甲车的压阵下，强行把他们调来华营A座，施以24小时单独监禁。过后对留在太平营的29名女性扣留者进行残酷镇压，造成许多同志被打伤，不少名贵物品被捣毁。她们最后被分成三批，分别监禁。

太平营同志，在未被调来华营之前，曾同反动营方交涉。营方保证不动用暴力对付扣留者，可是，当太平营同志于中午

时分抵达华营之后，却遭到一场经过精心策划、有系统、有重点部署的全面性残酷镇压。

反动当局事先部署妥当，故意不让同志们由A座正门进入，而另设一条通往A座的小道，约有三百尺，在小道的两旁站满两排事先收起编号的残暴队。便衣暴徒（狱卒）、狱官则在旁指挥和督促。同志们被令单人一行从小道走进A座。沿途中残暴队员、暴徒口出污言，高声辱骂，逐一殴打从中间走过的同志，不论老少，无一幸免。暴徒们用警棍劈击或猛插扣留者的全身要害部位，用鞋尖猛踢同志们的阴部、肾部、胸部，有些同志颈项被紧扼，不能呼吸；许多同志被打得扑倒地上，又给拖起来继续殴打；有几位同志心窝被踢中，当场吐血；一位被囚禁了十年之久的同志给三名狱卒反扳双手，腹部遭到太平副营长再那（Zainal）的殴打；一位同志由于腹部遭到警棍猛插和脚踢，淌了六次血。139名同志，被打得身受重伤，从办公室通过小道一直打到他们给关进小牢房为止，被关在二、三楼的同志被打得颠簸欲倒，随时可能跌下摔死。在楼座里，一些暴徒埋伏在角落头或空房间，待到同志经过就突然冲出猛不防地来个突袭性攻击，旋而参与围殴。

下午二时许至六时，同志们被强令去冲凉。有些同志由于身受重伤，无法行走，拒绝去冲，就当场在牢房里被殴打或者给强拉出去殴打。总之，出去或不出去都要挨打。反动派正是假借给同志二、三人一批去冲凉的机会，大肆施暴。一些同志被令脱光衣服，只围一条毛巾就去冲凉，每当同志们踏出小牢门，立即就遭到暴徒殴击。从大牢房（楼座）到冲凉房，残暴队员并列成行，前往冲凉的同志经过暴徒面前，一

个个遭到毒打。无耻的暴徒，还进冲凉房窃视和监视同志们冲凉。有的同志被令在一分钟内冲好，有的同志被令在暴徒从一数到五就得冲好，否则必遭毒手。有些同志当一淋湿身体或刚抹了肥皂后就被令离开，头不许转，否则遭到殴打，被殴打时也不许回头看（暴徒怕给认出面孔）。总之，转头也打，不转也打。同志们从冲凉间回小牢房时，仍然一个个遭到殴打。回到小牢房后，还继续被殴打。有些则被压在床上毒打。有位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高喊「打人」之际，被暴徒用布塞住口后继续殴打。

第二天早上9点多，同志们照例被强令去「冲凉」，同样遭到如第一天下午的残酷殴打。

太平营同志在24小时内，连续遭到三次全面性的毒打，小道、牢房、冲凉间变成一个人间地狱和刑场！同志们被殴被踢得抗议高喊，呼声传遍B、C座，越过高墙传到医院及附近住家。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几点：第一，在这次事件中，凡是行凶的残暴队员及狱卒，都事先除去编号（在营内处执行任务时，残暴队员则不论何时，都是解下编号的）；第二，行凶的暴徒专门攻击扣留者身体的重要部分，如胸腹、肋、肾、腰、阴部等，打法则是用警棍猛击猛插，皮鞋猛踢猛踏及拳打掌劈，如此打法配合所打部位就必然地造成扣留者蒙受严重内伤，终身不愈，反动派对扣留者的慢性谋杀的罪行也就进一步地表现于此；第三，许多被殴倒晕倒的同志，在苏醒后又遭毒打，要求见医生或进医院都被拒绝；第四，两营的许多高级狱官亲自动手殴打或是率领，下令狱卒殴打扣留者。

招降阴谋不能得逞

暴力镇压和政治欺骗是反动派惯用的反革命两手。在这次事件中，拉扎克集团在使用暴力的同时，也要出诱骗招降的手段，企图通过软硬两手的互相配合，交替使用，达到瓦解扣留者绝食斗争的可耻阴谋。一方面，它派出隶属「政治部」的狱官及其代理人大肆活动，不是把个别同志调到办公室谈话「洗脑」，威迫利诱，便是到小牢房内进行哄骗欺压，诱逼同志放弃斗争，以期达到个别击破，搞垮全局的目的。另一方面，反动派也于1974年1月19日派出「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及「副新闻部长」到华营，把新闻广播车开进A座篮球场，向A、B座扣留者大放厥词，妄想招降，可是这种阴谋诡计并不能得逞。

残酷暴行继续发生

在47天的罢食过程中，反动派对政治扣留者所干下的法西斯暴行，真是罄竹难书。在此，我们仅仅举出较突出的例子以示一斑：

1974年1月15日绝食进入第18天，医生要B座6位病重扣留者进院留医，在营长答应不上手铐的保证下，这6名同志便由残暴队员押往医院。

当晚，由于他们拒绝被铐在病床上，被残暴队员押回扣留营。当这6名罢食了18天体弱病重难于行走的同志，一踏进B座范围内时，就立即遭到副营长罗金福授意下行凶的残暴队的毒打，每人身受重伤。其中有位同志被打得不支倒在地

上，惨遭暴徒猛踩猛踢，蒙受严重的内外伤。另一位同志腹部被警棍猛殴猛插，过后，便大量瘀血三天，每天瘀三、四次。

二月五日，罢食进入第38天，同志们的生命正进入危险状态，一名B座同志在下午前往抹身时，遭到两名高级狱官安奴哇及梅沾年和三名狱卒围殴，眼镜打破，伤势严重。

二月六日早上，已经罢食了25天的一位调自太平营的A座同志，在小牢房内遭到梅沾年率领的几名狱卒围殴，颈被猛扼，几乎窒息，阴部和尾尖骨被踢重伤；眼眶破裂，身体的要害，皆受重伤。暴徒们逞凶后，就把昏倒在地上的这位同志置之不理。过后不久，当他苏醒后又再遭到安奴哇和梅沾年率领的狱卒围殴，直到失去知觉为止。苏醒后，他要求见医生或进医院都被拒绝，当晚11时再次倒跌在地上，不能恢复知觉，营方才不得不把他扛进医院施救。应该指出，这是这位同志自从1月14日从太平营调来华营后的第4次被殴打，在全部的32天的绝食期间，由于被打重伤，4度进院留医。留院的日子长达25日，前后昏倒过6次。

在拉扎克集团对扣留营施行恐怖统治的47天期间里，绝食扣留者的肉体和精神遭到极其严重摧残和折磨，致使许多同志在绝食期间，由于伤重而并发演成多种危险病症。在此，我们只举出几宗较为严重的病例：

韩佑平同志由于肾脏和心脏受到严重殴伤，演变成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脏病，数度送往怡保中央医院紧急救治，迄今尚在医院治疗，病况未见好转。

郑敬文同志由于心脏被殴重伤，演变成严重心脏病，最近病况恶化，被医生下令静躺病床上至少4个星期不能走动，否则会发生生命危险。他迄今尚留院治疗。

此外，被关了10年之久的江海同志及一位印族同志古那(GUNARATNAM)也因为受伤而演变为心脏病，他们目前尚在医院接受治疗。

吕进益同志由于受到严重的肉体和精神迫害，在绝食斗争结束之际，神经失常，被送进怡保红毛丹精神病医院治疗，目前尚在精神病院中。

此外，另有不少扣留者在恐怖统治时期里濒临于神经分裂状态的边缘。

暴力压不倒正义的斗争

尽管反动派在12·29绝食斗争中以法西斯暴力与威逼利诱的兼施并用地妄图迫使扣留者放弃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抱定宁死不屈、顽强战斗的决心，坚定地把斗争坚持到胜利。

绝食斗争进入40多天时，同志们已经生命垂危，八九十名被送进医院急救的同志曾经受到专家的警告，说他们若再不进食，身体的主要器官将丧失机能，造成终身残废乃至死亡。当时一位同志由于胃溃疡发作，生命垂危。许多同志的血压，已降至维持生命的最低点，心脏随时都可停止跳动。在这生死攸关的严重关头，同志们仍然坚持斗争，充分体现了

不怕死的斗争精神。与此同时，还留在营内的绝食扣留者经已大部份昏迷卧榻不起，但是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有增无减，肆意施暴，妄图在这决定性阶段，透过暴力击垮我们的斗争。然而，正义斗争是暴力所压不倒的！正义斗争也绝不会孤立！在同志们的坚持底下，在家属和广大群众的奋勇支持下，在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和抗议下，拉扎克集团不得不接见扣留者代表，谈判解决问题，答应恢复我们原有的权益和改善营内的恶劣生活条件。我们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严正立场和衷心感谢

马来亚是一个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仍然是我们的真正统治者；拉扎克集团与李光耀集团只是他们在我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傀儡。我们是一群为打倒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在我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我国各民族人民翻身解放，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马来亚而奋斗的爱国者。反动派的长期监禁和残酷迫害政策，不但不能迫使我们放弃我们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相反的，它却更加坚定了我们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决心。

近年来拉扎克傀儡集团，对扣留营不断进行法西斯暴力镇压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了监狱是反动派镇压革命人民的暴力机器的组成部份。从反动派多次向扣留者使用暴力的事件中，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反动派的许诺，不过是美丽动听的谎言，我们绝不会对它存有任何幻想。经验证明：只有全体扣留者团结一致，随时准备开展对敌斗争，才能捍卫和争取我们的生存权力和基本权益。

事实上，在协议的墨迹未乾的此刻，反动派已经有计划地逐步违背其所许下的诺言。例如，我们原有的权益不但未完全恢复，甚至竟有不少被进一步剥夺，特别是太平营女同志的遭遇更是如此。犯罪的营方官员和狱卒不但未被调查和处罚，反而继续被允许进入营内耀武扬威。反动派原本答应在2月21日，同我们举行进一步谈判以改善营内恶劣的生活待遇。可是，有关谈判已被拖延，至今未得肯定答复。它也答应在绝食结束后一至两个星期内，把调来华营的太平营同志迁返原地。可是这个许诺未见履行。最近营方还重新公布禁令如毛的所谓营规。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拉扎克集团必须立即履行双方在谈判中所达致的协议，并完全恢复两营扣留者在绝食斗争前所享有的一切权益；立即解决太平营同志迁返原地及由此而引起的有关问题；立即举行进一步谈判解决太平营及华营同志分别于1974年1月10日及2月21日所提呈的备忘录中的各有关问题。否则，拉扎克集团必须负起由此而引起的全部后果。

自从绝食斗争结束以来，反动派肆意撕毁协议的种种迹象显示了反动派依然虎视眈眈，正在筹划对扣留者的进一步迫害和镇压。对此，我们会随时作好思想准备，迎接敌人的进攻。在此，我们呼吁扣留者家属、国内外进步力量和正义人士，密切关注反动派在此血迹未乾、伤口未愈之际，准备再进一步迫害政治扣留者的阴谋。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国内外各阶层人民，各正义团体和人士，在斗争期间给予我们的精神鼓舞和物质支援。

华营及太平营政治扣留者发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三日

附注

过去数年来，政治扣留者为了争取基本人权和应有权益，为了改善营内的恶劣生活条件和抗议反动当局的迫害政策，曾经先后进行了多次反迫害斗争，每次斗争都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

- (一) 1967年5月26日，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政治扣留者由于上述原因而开展绝食斗争，遭到反动当局派遣军警进营镇压，多人受重伤。绝食斗争坚持了16天而在取得胜利之后宣布结束。
- (二) 1968年3月25日华营扣留者为了同样原因而展开绝食斗争，再次遭到军警镇压，造成数十人受伤，绝食斗争坚持了24天，最终在取得胜利后，宣布结束。与此同时，麻坡扣留营扣留者为了支持华营战友的斗争而展开了21天绝食。
- (三) 1968年7月20日麻坡政治扣留者开展反「驱逐」斗争，遭到军警镇压。结果多人受伤，5名同志被军警押往芙蓉监狱监禁，以待「驱逐」。
- (四) 1969年3月24日麻坡扣留者反对反动当局对扣留者强加手铐的措施而展开斗争，反动当局在4年内5度派遣军警进营镇压，造成许多扣留者蒙受重伤。「反手铐」斗争，最终在反动派保证不对扣留者实施

手铐措施后结束。

- (五) 1969年11月27日，反动当局派遣军警进入华营镇压扣留者自从7月30开始的争取恢复基本权利的反迫害斗争，并对扣留者实施长达半年的24小时单独监禁。在此漫长的黑暗日子里，反动当局对扣留营实施恐怖统治，有计划地殴打被剥夺一切基本权益的扣留者。这就是臭名昭彰的「11·27事件」。



每当政治扣留者在营内受到镇压，被迫开展斗争时，扣留者的家属出于对亲人的关怀和支持，总是成为最积极的支援力量。在12·29事件的过程中，家属的支援和斗争更为突出。在此，必须特别感谢前全国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理事翁秀君老师。经过33年，她还保存了当年的一些活动记录，并整理成《活动简记》，再现了当年家属的主要活动。《在国会路和平示威》及《向首相请愿》，报导了家属那两场和平请愿行动，如何遭受到联邦后备队毫无人性的镇压。此外，各州及全国家委会的有关声明，也都是珍贵的原始资料。



第三章：家属与各界的支援行动

（一）家属支援活动简记

翁秀君

作者简介：



翁秀君同志是前全国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理事，退休华小教师。她爱恨分明，在12·29大罢食期间，与家委会各成员一道四处奔波，为支援政扣者的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1/74 霹州家属到来通知：华营同志罢食。隔天，雪州家属都接到华都牙也扣留营营长来信，通知三个月不准探营及通信。

5/1/74 家委召开记者招待会披露华营及太平营政扣者因黄水生在营内逝世而引发罢食。不久，又接到消息说镇暴队开进华营镇压，致伤5、6人。

9/1/74 雪州、麻坡、槟城家属陆续抵华营要求探营，遭守候在营外的镇暴队阻拦。几经交涉，始由副营长罗金福接见吴培生家属，并告知：29日下午，营内6

名政扣者代表要见营长 Omar 了解黄水生逝世事，Omar 只允接见三人，代表不同意，营内扣留者纷纷抗议。营长电告当局谓营内暴乱。镇暴队不久闯入扣留营，施放毒瓦斯及殴打，导致 5、6 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李万千。营方迟至晚上 12 时才将伤者送进医院。罗金福也同时告诉槟州家属：人死了，营方会负责。又说一切命令来自内政部，与营方无关。

11/1/74 太平政扣者告诉家属，将在隔日罢食支持华营。

14/1/74 家属上太平营探望。途中，路人告知，曾见政扣者被载走。太平营营长不肯接见家属，只言政扣者已全部载往华营。

16/1/74 内政部已致函甘玛尼律师说：家属如要解决罢食事，须劝其亲人先进食，又恐吓律师：家属有任何行动，要律师负责。至此，甘玛尼律师便请黄律师协助家属与内长约定会面时间，但内政部的答复是：决不取消三个月的处罚期。

17/1/74 家委会假人党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者有政党、社团及国内外报馆记者。家委会主席黄彩虹把罢食始末公布后，重申七点要求。澳洲电台访问家属代表，有关录音于当晚播出。下午 2 时，来自全国的 50 位家属齐集国会大厦前，要求内政部长解决罢食事件，同时也要求国会议员主持正义。一个钟头后，警车开到，将全部家属强拉上车，载往谐街警署扣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得知，赶往保

释。当晚又安排家属入住隆市旅店。次日，50 家属被控上法庭，罪名是：“非法集会”，民行党彼得达生律师代为辩护。案展至 4 月 9 日开庭。被捕家属有来自星洲、吉打、霹雳、柔佛、马六甲、雪州及首都者，年龄从 17 岁至 70 岁。开审后，每人罚款 25 元或坐牢一天。结果多数选择坐牢，以示抗议。

23/1/74 家委上华营探望，在医院病房，看到 3 位受伤政扣者。其中 1 位吊著盐水，1 位内伤严重，另 1 位则躺著不能言语。医院六号楼已腾出来容纳受伤者。家委又赶赴牢房，遭看守警员驱逐。

24/1/74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者除法新社记者外，还有马新社、海峡时报记者，大学生、家委代表（6 人）及华文报记者等 30 余人。当场发表文告，谴责当局迫害政扣者。

25/1/74 槟州家属邀请莫希汀律师及 Rajamuti 律师协助。

27/1/74 家委会发电给联合国秘书长、人权委员会主席、伦敦宽赦委员会、纽西兰宽赦委员会以及国际红十字会，请他们拯救已罢食 31 天的政扣者。

30/1/74 家委会曾数度致函内政部，要求会见亲人，但不见答复。国内报章都有报导罢食事件。甘玛尼律师告知：人社党昨日曾讨论此事，马大经济系将开会，希望家属参加。是日，家委会亦发表《告社会人士书》。

8/2/74 家属假交通工联开抗议大会，过后即到首相署呈函。警长阿都拉曼答应把函件转交首相，并交代家属于隔日上午来听取答复。

9/2/74 上午9时，家属准备列队步行至首相署，行至蒙巴登路新闻部，即遭警车拦住。镇暴队随后赶到，挥动警棍打人，家属手牵手极力抵抗，被强力拉扯，当场受伤者逾20人，老年人亦打至伤痕累累。过后，全体家属被捕，送往谐街警局。是日，华营罢食已进入43天，太平营罢食29日。

11/2/74 家属全被控上法庭，并订于5月27日开审。法庭谕令每位被告必须一位担保人缴付3百元保证金担保，在律师抗议后，始准以银行保证书担保。当天的担保人是赵律师，商人许先生及家委代表。

13/2/74 律师接到华营扣留者代表陈福兴通知，说罢食已结束。家属百感交集，纷纷赶往探视营中的亲人。

16/2/74 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探访华营，过后出版《政治犯狱中控诉》一书，记录详尽。

47天的罢食行动终于结束了。想起家属们当时被焦虑、痛心、无助、愤怒的心情煎熬著，真是笔墨难以形容。白发苍苍的老妈妈，老泪横飞的说“我的命已豁出去，请愿、抗议、示威，我一定要去！”

想起了牢中手无寸铁的儿女、丈夫、妻子、爱人、兄弟姐妹在忍饥挨饿，遭受殴打、迫害，生死未卜的过著炼狱生活，家属们怎不肝肠寸断！于是有人掏尽储蓄，有人被迫离职。

有一人一个月踩破3双鞋子，更多人丢下工作投入了拯救、支援的工作。年老的家属带著病体，离乡背井赶来参与斗争。热心的律师说：我读了这么多书，不为你们做一点事，我读书有何用！

罢食结束后，家委们接下来的工作是感谢所有国内外协助的个人及团体，了解营内同志的情况，及呈函有关部门，督促它们正视病伤者的健康、福利、争取早日释放。家委会亦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出庭聆听黄水生死因的调查庭，及接受国际大赦委员会的访问等。社会上的仁人义士、新闻工作者、出狱的政扣者，纷纷挺身而出，或公开或私底下支持、关怀，无私的付出他们的力量，显出了人性的光辉。这恩情，家委们铭感五内。在这里，我们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对已辞世的家委、家属、政扣者，我们也要致以深深的悼念！

岁月悠悠，倏忽32年已过，当年参与斗争的姑娘和小伙子、出狱的同志们；有的已为人父母、有的已做了公公婆婆。相信这段历史，还让大家感慨万千吧！希望大家把这段有血有泪，苦涩又温馨的回忆，点点滴滴的串起、写下，别让这段历史留白！

(二) 在国会路和平示威

(吉隆坡十七日讯)大约五十名政治扣留犯家属，今日在国会路天桥，举行和平示威，要求政府准许他们探望扣禁在华都牙也扣留营的子女及亲属，他们当中四十二位系属女性，七位是男性。

早在今日下午二时二十五分，国会开会前，他们曾派代表谒见内政部长且施利雅沙里，可是不得要领，他们于是在国会路天桥左旁和平示威，手持标语及布条，那些标语，有些用华文书写，有些则用大马文书写，有些标语写著「政治扣留者绝食，经已进入第廿天」，「立刻释放政治扣留者」。

一位参加和平示威的扣留者的家属说：我们要国会关注这项问题，这些参加示威的政治扣留者家属，大部份经已年逾半百，不是白发蓬松，就是戴著极厚的老花眼镜，不是满脸皱纹，就是大半牙齿脱落，他们在烈日下站不到五分钟，就坐在热烫的人行道上，用厚纸书写的标语遮住太阳。在聚集后不久，数辆警察巡逻车立刻奉召赶到现场，跟著保安人员主任因仄打朱汀副警监，吉隆坡警区主任因仄阿都拉曼助理警监，吉隆坡政治部副主任陈亚灿，亦相继到场视察。

三时十分，六名女警察奉召抵步，刚好这时民主行动党议员范俊登，前往国会出席会议，途经国会路停下来，看个究竟。但是他显然是束手无策，片刻一辆大型卡车抵达现场，因仄阿都拉曼助理总监向范俊登说：我是奉命行事，请你让

开。范俊登回答说：我是前往国会开会，途经此地，我有权在此站立。于是在因仄阿都拉曼助理总监的号令下，十多名警员将示威者包围，并问道：你们示威有准证吗？没有，上车，可是有些老泪纵横的老太婆说：我们的子女生死不明，我们又不是偷抢，为甚么要捉我们，我们要会见内政部长！

因仄阿都拉曼助理总监说：警方不是捉你们，我们是带你们回去警局解决你们的问题。可是哭哭啼啼的妇女，拉成一团，不肯上车。女警员人数少，男警员不敢动手拉老太婆上车，何况那些哭哭啼啼的老太婆的确嚷得可怜：「难道你们不痛爱你们的儿女吗？我们关心我们的儿女，有甚么错？」



全體五十名政治犯的家属今日在國會前因沒有准證示威，被帶到警局。圖為他們被帶到警局之情形。



首都警衛立誓門部員救助理總監昨日在國會大廈前
（持標語）：「請勿捉者自動上警車」。這些受害者是國會議員范俊登

僵持大约七分钟，她们终于有些非常愤怒，有些则哭著登上警车，有些老汉亦不禁老泪盈眶。被捕者当中，包括全国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主席祝俊雄的太太。

查祝俊雄为前柔佛人民党州议员，于一九六七年被捕，经已被褫夺公民权，现正关在芙蓉监狱，等待递解出境。

在今日中午十二时，全国扣留者家属委员会，在本坡人民党总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指出：在去年十二月廿九日黄水生自杀，其他扣留者召开追悼会，并实行绝食，结果镇暴队开入营中，并处罚他们，三个月内不准家属探望，连家属的医生及律师，亦不得进入营中探望。他们要求政府，立刻取消处罚，使扣留者不致关在小房内，镇暴队应撤出华都牙也扣留营，准许医生律师及家属探望扣留者，设立调查庭，调查这事件，改善营内生活。

今日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包括来自华都牙也政治扣留者李耀华的母亲。

据她说：扣禁在太平监狱的一百六十名扣留者经调往华都牙也扣留营。而华都牙也营内，则仍有八十九名扣留者。

社会正义党政治局主任戴卫今日发表文告称：太平扣留营绝食事件，曾导致镇暴队开入，造成若干政治扣留者受伤。

戴卫说：政治扣留者并没有犯上什么罪刑，他们只是涉嫌从事反政府活动而已，政府应以文明手段，处理他们的案件，政府一直没有解决政治扣留者，数年来的申诉。

社会正义党要求设立由高庭法官所主持的调查庭，并促请内政部长急切地处理这项问题。

吉隆坡警区主任阿都拉曼助理总监，今午在谐街警局发表称：被警方扣留的人士共五十名。计四十三名女性，七名男

性，他们是在今午二时半至三时十五分，在国会大厦人口处，未拥有准证而集会，触犯法律。因此，遭警方扣留。他说：这些男女是成年人，有些为年达六十岁的老太婆。

警方在他率领十名男警员，五名女警员抵步后，即将这批人押入警车，送至谐街警局备案，以便在明日提控于法庭。



被控械打殴傷一百零四人，據報有五十七人是女性，這五十一人都是在本月七日中午十二時半左右在吉隆坡中央警察局前對面的馬路旁舉行抗議行動時被打傷。抗議行動是由五十七名男女所主導，並由他們所代表的全國五十個州和直轄市的三十個組織發起的。抗議行動的目的在於強調政府在沒有經過調查和審判的情況下，將五十名政治犯關押在首都國會路集會廳前的馬路上，已經違反了人權法。抗議行動是由五十七名男女所主導，並由他們所代表的全國五十個州和直轄市的三十個組織發起的。抗議行動的目的在於強調政府在沒有經過調查和審判的情況下，將五十名政治犯關押在首都國會路集會廳前的馬路上，已經違反了人權法。

五十人遭受控告

(三) 全国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 告社会人士书

华都牙也和太平政治扣留者正面临空前的厄运，彼等至今已分别展开卅一天和十七天的绝食行动，以抗议当局所实施的暴力镇压，迄今营内政治扣留者之命运不为人知，生死未卜。我们在此呼吁全国各派系、各种族团体、政党及全体人民关注事件的发展，并在必要时给予这些政治扣留者一切精神上及道义上的支持，因为这是发生在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法西斯暴行，也是一项“民主”制度的重大讽刺。

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太平政治扣留营扣留者黄水生因缺乏医药照顾，不堪病魔的百般折磨，而告逝世。

当天下午，华都牙也扣留营的政治扣留者痛闻噩耗，派出六人代表，会见营方当局要求解释和澄清黄水生事件，但遭当局拒绝，且招来联邦警察后备队，进行蛮横的镇压。事后有七名政治扣留者身受重伤及数十位扣留者受伤，华营的六十余名政治扣留者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绝食抗议。上述七名受重伤者为：叶镁辉，李万千，吴玉柏，郑亚育，韩佑平，傅捷益及李林。

华营事件发生后，扣留者一律不准见家属，家属的代表律师也不得其门而入，安危无从得知。

今年一月十二日，太平政治扣留营的扣留者为支持华营的正义斗争，也相应展开绝食行动。翌日，营方当局故技重施，他们召来七车联邦警察后备队，再度展开血腥镇压，造成无数扣留者受伤。稍后，军车将扣留者运到华都牙也扣留营，进营时，又再次遭到残酷殴打。家属前往探营时皆遭横蛮阻挡。

家属曾经通过律师，欲见内政部长，却一直受到拖延和无理的恐吓。

基于事态严重，家属们不能坐视亲人们遭受冷血的迫害，乃于一月十六日齐集国会大厦路上，欲会见部长，促其处理此事。“民主”的联盟政府竟召来警员，强拖家属上警车，载往警局，并控上法庭。

从黄水生逝世至今，前后已有卅二天，许多扣留者昏倒在小房里。韩佑平、傅捷益等人被打得生命垂危在医院里。我们要问：扣留者的合理要求被置之不理，扣留者受尽灭绝人性的折磨，是不是法西斯统治在马来亚的重演？最后我们强调：作为这些扣留者的亲人，我们绝不能坐视政府的胡作非为，并呼吁社会上所有正义人士声讨此法西斯暴行，支持我们达致下列要求：

- (一) 立即取消禁止家属探营三个月的处罚，并开放小房恢复他们的基本权利。
- (二) 停止在精神和肉体上残酷迫害我们的亲人。
- (三) 撤出华营的暴动队，永远禁止他们进入扣留营。

- (四) 处罚造成我们亲人受伤的官员，并保证此事不再重演。
- (五) 准许我们的律师、医生和家属代表会见政治扣留者以调查和解决问题。
- (六) 无条件接受政治扣留者的要求。
- (七) 设立调查庭，调查黄水生死因，并给其家属予合理的赔偿，并保证改善营内的生活条件及医药服务。

一九七四年一月廿八日

(四) 向首相请愿

(吉隆坡九日讯)全马各州政治拘留者家属约七十名左右，今晨九时许再度由隆火治街与苏丹街交接处开始和平游行至惹兰拿督翁首相署请愿，要求首相敦拉萨插手解决目前正发生在华都牙也与太平甘文丁营之政治拘留者的罢食问题。

今早在游行请愿行动展开前，来自各地之拘留者家属，其中大部份为老妇女，一早便三三两两集合在火治街施里再也停车站附近。时间一到，一声令下，全体约七十名上述家属便集成一支队伍，手执布条标语，浩浩荡荡沿著刚好正在繁忙的火治街转人大巴刹之罗爷街，然后进入蒙巴登律。准备长驱直上位于惹兰拿督翁之首相署，惟正当队伍行至蒙巴登律新闻处门口时，突有大批隆市警方人员驰至。旋警方立即下令阻止秩序井然的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并把七十多名参加请愿游行之上述家属赶上新闻处门口之人行道，准备把彼等拉上警车载返警署拘留。惟由于双方人数悬殊，再者，上述家属又大声叫喊，这样，经过一番你拉我扯后，警方无可奈何，暂时惟有团团将彼等围住等待已应召之镇暴队人员前来协助。惟上述家属却趁机大批涌向对面，即罗敏申门口之单边路。似乎有意折返市中心，在场的隆市警方人员睹状，马上动手拖住跑在后头之一部份家属时如此互相对峙，互相挣扎约半小时之久。未几，三架载著一大批镇暴队人员之红车便赶抵现场。至此，警方人员便正式蜂涌而上将正想走向市中心或躲入罗敏申附近咖啡店、商店等之上述家属，一一拉上警车，载返谐街警署备案拘留，相信日后彼等将会被控以

非法集会罪。

吉隆坡市总警长拉曼助理总监于事后发表谈话，说上述被捕之政治拘留者家属系因没有准证举行非法游行而被拘捕，人数约六十名左右。

他又说，他们是上月十七日在国会前非法集会请愿之同一批人。他们前次的案件将于四月十九日，廿日，廿二日在地庭审讯。拉曼助理总监也说，上述拘留者家属已于昨日向首相呈交了一份请愿书，他们的事情已完结了。因此，他们今天的集会游行是非法的。不过，假如他们事前有提出申请，则他或许会考虑批准她们再到首相署请愿。

查上月十七日被捕之家属共五十名，其中四十三名妇女，七名男人。

另悉，昨日下午三时许同一批家属曾从隆火治街游行至首相署呈交请愿书，并要求会见首相敦拉萨，惟不得要领，结果他们延至昨日傍晚时分才带著闷闷不乐的心情撤离首相署。

另一方面，昨日较早时，上述拘留者家属特假八打灵再也交通工友联合会大厦举行抗议大会。出席者除了上述的家属外，尚有各反对党代表和学生团体代表等，济济一堂，为况极为热烈。全国政治拘留者家属委员会特在大会上发表一份文告，要求政府答应拘留犯的合理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一）撤走驻在营内的镇暴队；（二）取消日夜单独监禁，不准会见家属，阅报和通讯等决定；（三）处罚那些引起此次事件有关的官员，及那些殴打和污辱政治拘留者的狱卒；（四）改善扣留营内的恶劣生活待遇和卫生设备；（五）调查

黄水生的死因，并给予死者的家属合理的赔偿，同时保证类似的事件不会发生；（六）停止对政治扣留者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及虐待。

文告强调指出，自从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华都牙也营拘留者展开罢食以来，今已进入四十二日，而太平拘留营的绝食行动也已进入第廿八日，由于长期的绝食，拘留者的身体已异常虚弱，许多人的血压已低至危险水平，但营方还是施以单独监禁。文告也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很多拘留者，在小房内晕倒而无人知晓。在此事件中，被镇暴队殴打受伤的拘留者太平有六十多人，华都牙也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三十多人伤势严重，重伤者包括：韩佑平，傅捷益，李万千，李林，吴玉柏，叶镁辉，郑亚育等在内。

文告也呼吁一切维护正义的政党、工会、社团、专业人士及各族人士等，关注这事，以使恢复拘留者的合法权利，及解决他们长期绝食的斗争。

据最后消息说，今日早上约十时全体被捕之上述家属已于今日午后四时左右由赵燊儒律师、李健生律师，以及商人许博义先生担保出外候审。被捕人数实为五十六人，其中有三十多名被捕者因与警方人员挣扎时受伤，伤势比较重者包括政治拘留者蔡金的母亲、韩佑平的母亲等人，目前他们正在此间陈志勤医生私人医院留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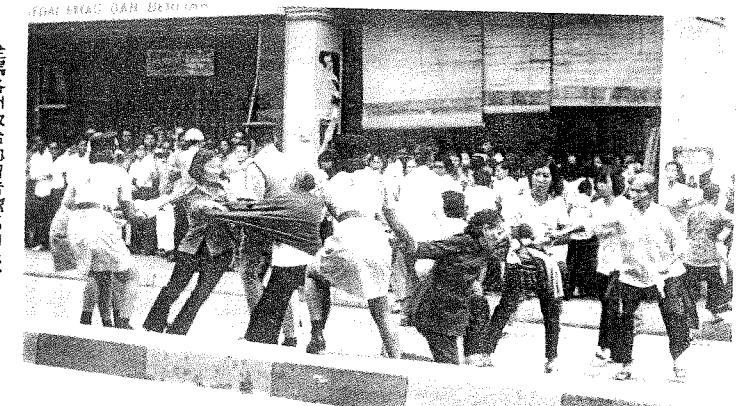
1229 大罢食

全馬各州政治拘留者家屬昨日上午在交通工友聯合會大會上討論，許在交會場所舉行大會討論，與太平營二百多名被拘者已晉入第四十二天之罷食問題。國為出席大會的二部份拘留者家屬和各反對黨以及學生代表委員會在大會上發言之全國上層右角為代表家屬在大會上發言之前柔州議員現監禁于美泰牢獄之魏後雄夫婦。

10.2.7 中
政治拘留者家屬在本坡蒙巴登律華
律銀行前舉行不威被警方人員驅散，
捉拿官府備案。

全馬各州政治拘留者家屬約七十名昨晨九時許再從龍水治街開始和平遊行至首相署請願，以要求首先救拉薩活子解決監禁于美泰牢也與太平甘文丁營拘留者之罷食問題。國為遊行隊伍行至蒙巴登律華律新辦公室時，為隆市警察人員所阻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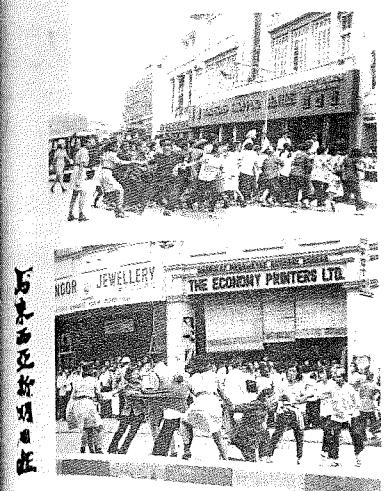
圖為今日遭控於此間推擊庭的部分政治拘留者家屬，圖為兩人被扶者為受傷之政治拘留者蔡金之母丘保英（七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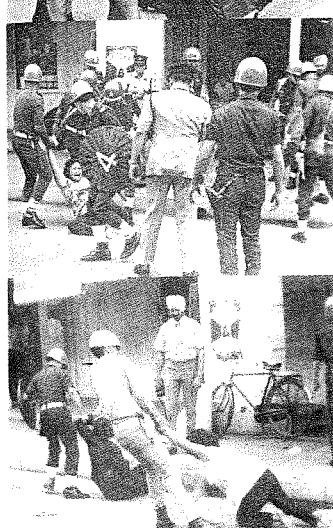
9.2.7 地報

Tongben, 10-2-1974

圖為一名政府拘留者家屬在花旗銀行名駕運送隊人員拘押時大聲呼喊之情形。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星期日）



圖為今日遭控於此間推擊庭的部分政治拘留者家屬，圖為兩人被扶者為受傷之政治拘留者蔡金之母丘保英（七十歲）。

(五) 联盟政权必须对政扣者 黄水生的死亡负责！

(柔、甲州政扣者家属委员会声明)

对于政治扣留者黄水生突然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九日凌晨二时许在太平甘文丁集中营里逝世，我们柔甲州政扣者家属委员会对这事件表示严重关注，并要联盟政权对他的突然死亡负责，因为他是死在戒备森严、密不通风的四面围着高墙的政府集中营呀！

黄水生是一九七零年七月间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逮捕和监禁至今的。打从被捕后，由于长期来生活在警察局、政治部以及集中营里，那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那里的饮食起居、医药照顾、卫生情况、食物营养都是极其恶劣和不足的，更何况他们必须经年累月地面对肉体和精神的长期迫害和折磨，所以被囚禁的扣留者当中，占八十五巴仙以上都染上各种不同的严重病症。在短短的几年内，集中营里就已发生过数宗死人的事件。这雄辩地证明了联盟反动政权迫害政扣者的残酷的真实面目。马六甲前劳工党市议员冯朝民死于胃病，槟城苏辉祥死于肺病，新山的巫籍同胞阿末雅典的死于心脏和肺病等等。而今却是黄水生的在经过三年多的腰骨病严重折磨加上耳鸣、手、脚、小腹等的长年反覆湿痛，在这百病缠身的情况下死了，扣留者曾经三番五次地要求当局重视，并且送去医院治疗，然而每每所得到的答覆都是否定

的。因此，扣留者的病症，难道是应该让它随时日的久长而恶化下去吗？更令人费解和不满的，是当局复又通过它的御用医生，对政扣者进行冷嘲热讽的“洗脑”工作，这难道是对待病人应有的态度吗？

而今黄水生被迫死的事实，联盟政权如何处心积虑也是难辞其咎的。人在你手上，死了当然你要全面负责，这是推诿不了的。在这事件面前，我们政扣者家属能不为我们数以百计的亲人的命运而焦虑和关注吗？我们严厉谴责反动派这种残酷迫害和摧残政治扣留者的手段和政策。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我们全马政扣者针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廿五周年纪念日向联合国提呈的控诉联盟政权残酷迫害扣留者，要求即刻无条件释放他们的备忘录，其墨迹尚未乾，然而间接谋害政扣者的另一事件却发生了，马来亚的人权何在？马来亚的民主何在？

在此，我们柔、甲政扣者家属委员会再一次地要郑重指出，联盟政权的任何更其残酷的迫害行动，都不能挽回其摇摇欲堕、江山日暮途穷的必然命运。

最后我们严正要求：

- (一) 设立一个包括医生、律师、各政党代表、政扣者家属代表在内的独立公开调查庭，调查和研究造成黄水生突然逝世的根本原因；并且当局应给黄水生家属因他死亡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予赔偿。
- (二) 设立一个独立公开的调查庭，调查和研究目前被囚禁在全马各地之监犯或集中营里数百名政扣者之严

重恶劣处境，他们在肉体和精神方面所遭受到之残酷迫害之深广度，从而加以解决，立刻改善扣留者的生活待遇和条件。

- (三) 联盟政权必须即刻改变反动的压迫政策，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即刻恢复我国人民的基本权利，无条件释放全体政扣者。
- (四) 联盟政权必须即刻废除国内治安法令，停止迫害政扣者，保证全体政扣者的人身安全。
- (五) 我们严厉谴责和抗议联盟政权在黄水生家属前往太平集中营领尸期间，对其家属进行恐吓、威迫，逼迫他们接受不合理的领尸条件。
- (六) 我们严厉谴责和抗议联盟政权动用军警镇暴队，在黄水生家属前往领尸过程中，直接冲进扣留营里不分青红皂白地以警棍、枪托、皮鞋殴打营内扣留者，造成许多人当场受伤倒地。
- (七) 我们坚决支持和声援狱中扣留者为捍卫和争取一切基本权利、生活条件和待遇而展开的任何斗争行动，并呼吁全马各阶层各民族同胞能严密关注扣留者被迫害的严重事件，同时给予支援。

柔、甲州政扣者家属委员会代表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

(六) 严厉谴责联盟政府迫害政治拘留者 坚决支持我们亲人的绝食正义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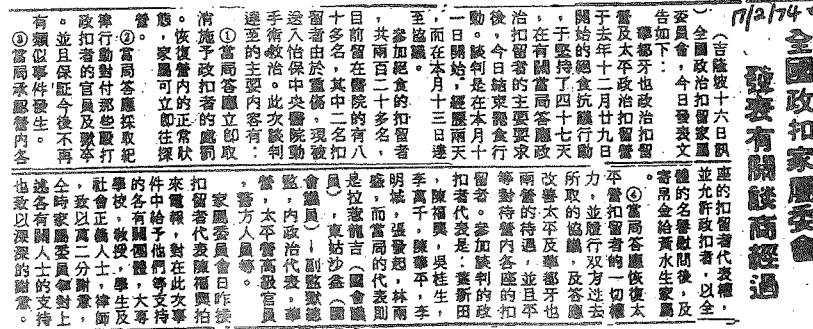
今天华营和太平营的绝食斗争已进入第四十五天，我们全国家属委员会强烈要求联盟政府立即停止对拘留者的进一步迫害行动，恢复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答应政治拘留者的一切合理要求，这些主要包括：(一) 撤走驻扎营内的“镇暴队”；(二) 迅速取消日夜单独监禁，不准会见家属、阅报和通讯等决定；(三) 处罚引起此次事件之有关官员及那些殴打和污辱政治拘留者的军警和狱卒；(四) 迅速改善拘留营内的恶劣生活待遇和卫生设备；(五) 立即设立调查庭调查黄水生的死因，并给予黄水生家属合理的赔偿，同时保证类似事件不再重演；(六) 停止对政治拘留者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与虐待。

自从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华营拘留者展开罢食以来，今已进入四十五天，太平营拘留者为声援华营的正义斗争也已罢食三十一天了。(星加坡政治拘留者也开展支援罢食斗争)。我们的亲人经过长期的罢食，身体已经异常虚弱，许多扣留者血压已低至危险水平，可是营方仍然实行单独监禁，以至有许多扣留者在小房内晕倒而无人知，有者则晕倒数小时后，自己醒来时已头破血流。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镇暴队”的日夜殴打和折磨，生命危在旦夕矣！在此事件中，被暴动队殴打受伤的太平营六十多人，华营三十多人，其中有四十多人伤势严重，在已知的重伤者中，有韩佑平，傅捷益，

李万千，李林，吴玉柏，叶美辉，郑亚育。在这里，我们要问我们的亲人为反帝反封建，为人民服务而被捕坐牢，他们被关在牢房里，手无寸铁，为何当局招来那些灭绝人性的“镇暴队”将他们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难道这就是所谓民主自由吗？

最后，我们呼吁一切维护正义的政党、工会、社团、专业人士和各大专的教授同学，以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反对当局对政治拘留者的迫害，恢复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答应他们的合理要求，迫使当局解决长期罢食斗争，同时我们呼吁社会人士密切关注两营罢食事件的发展，并给予他们行动上、精神上和道义上的全力支持！

全国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启
11-2-1974



(七) 营内传来结束罢食斗争的消息

(全国政扣家属委员会发表有关谈商经过)

(吉隆坡十六日讯)全国政治扣留家属委员会，今日发表文告如下：

华都牙也政治扣留营及太平政治扣留营于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开始的绝食抗议行动，于坚持了四十七天，在有关当局答应政治扣留者的主要要求后，今日结束罢食行动。谈判是在本月十一日开始，经历两天，而在本月十三日达致协议。

参加绝食的扣留者，共两百二十多名，目前留在医院的有八十多名，其中二名扣留者由于重伤，现被送入怡保中央医院动手术救治。此次谈判达成的主要内容有：

- (1) 当局答应立即取消施予政扣者的处罚。恢复营内的正常状态，家属可立即前往探营。
- (2) 当局答应采取纪律行动对付那些殴打政扣者的官员及狱卒，并且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 (3) 当局承认营内各座的扣留者代表权，并允许政扣者，以全体的名誉慰问，及寄帛金给黄水生家属。
- (4) 当局答应恢复太平营扣留者的一切权利，并履行双方过去所取得的协议，及答应改善太平及华都牙也两营的待遇，并且平等对待营内各座的扣留者。

参加谈判的政扣者代表是：叶新田、陈福兴、吴桂生、李万千、陈华平、李明城、张发起、林两盛。而当局的代表则是拉惹龙吉（国会议员）、东姑沙益（国会议员）、副监狱总监、内政部代表、华营、太平营高级官员、警方人员等。

家属委员会昨日接获扣留者代表陈福兴拍来电报，对在此次事件中给予他们支持的各有关团体、大专学校、教授、学生及社会正义人士、律师，致以万二分谢意，全时家属委员会对上述各有关人士的支持也致以深深的谢意。

（八）雪州家属抗议当局违背协议

雪州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发表文告，促请政府当局履行二月十三日与华营、太平营的扣留者代表们所达致的八项协议。

文告指出，自从华营、太平营罢食结束后，雪州家委会曾经组织家属们多次前往两营探监，发现营内的医疗卫生情况和生活待遇仍然很恶劣。经过长期罢食斗争后，政治扣留者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身体异常衰弱，精神失常疾病丛生。许多扣留者被殴打到半身残废，有些则犯上失眠、便秘、贫血、胃痛、心脏病等。例如韩佑平、郑敬文患上严重的心脏病，尿症大便出血，四肢无力走路，生命垂危；李亚明也患糖尿病，至今尚在医院留医。还有些神经失常，被送往红毛丹精神病院治疗等等。这些政治犯身体健康恶化，是当局在他们罢食期间使用暴力，殴打摧残和精神迫害所造成的。

家委会在访问了太平营后，发现那里的一切基本权利都没有恢复，生活待遇、医疗卫生照顾都没有改善。不但如此，当局还变本加厉地在那里施行「新营规」的措施，严禁政治犯来往，取消他们的代表权，剥夺他们自己煮食的权利，任意扣留他们的书信和报刊，晚上七时至明晨七时被关禁在牢房里，家属探营时带去的食物和药品等多数不准入营，同时还严禁扣留者谈论和反映他们在里面的恶劣生活情况和待遇。显然地，当局在太平营的所作所为，完全违反了去年双方所达致的协定，片面地毁约。这是对政治扣留者的一种粗暴的挑衅行为。我们重申：既然当局已答应平等对待各营扣留者的原则，就必须言行一致，切实履行协议，别再去寻找什么藉口来拖延或随意取消双方达成的协定。否则，由此而产

生的一切后果，应由当局负责。

文告指出，两营政治扣留者再度向当局提出如下的要求：（一）切实履行二月十三日双方所达致的结束罢食斗争的八项协定；（二）将全部被太平营调来的扣留者，在两星期内调回太平营，调营时当局不得再使用暴力，保证人身安全不受侵犯；（三）当局必须迅速恢复太平营在一月十四日所争取到的一切基本权利；（四）迅速改善两营的生活待遇、卫生设备、医药照顾和福利措施，履行平等对待各营扣留者的诺言；（五）承认两营政治扣留者的代表权；（六）保证太平营扣留者的个人财物不受损坏或遗失，若损坏或遗失应照价赔偿；（七）当局应迅速惩罚那些在罢食期间殴打和虐待扣留者的官员和狱卒，并保证今后不得使用暴力对付政治犯；（八）设立一个包括政治扣留者家属和律师在内的公开调查庭，以调查12月29日罢食事件和黄水生在狱中死亡的真相。我们家委会促请当局迅速履行以上八项要求。切勿再采取拖延政策了。

文告最后说：虽然两营的绝食斗争业已结束一个月了。但是，当局采取拖延和欺骗的政策，至今尚不履行双方所达致的协定，甚至出现严重的毁约或违约现象，从各种迹象表明，当局正在酝酿著另一场迫害政治扣留者的计划，只要两营的问题悬而未决，那么，新的一场反迫害斗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所以，我们呼吁国内外的一切主持正义的团体和社会人士，密切关注政治扣留营的新动态，做好一切准备，通过各种方法，要求当局迅速履行之前所达成的协议，并继续给政治扣留者精神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全力支持！

雪州政治扣留者家委会启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

（九）救救病重垂危的政治拘留者

（马来亚全国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声明）

近年来，联盟政府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不断迫害我国政治拘留者，以摧毁他们的健康和危害他们的生命，我们严厉谴责政府这种法西斯罪行！

在短短的几年内，已经有近十名拘留者被迫害到精神失常，而苏明辉（矿场主人），冯朝民（前劳工党马六甲市议员），及黄水生（工人）等则在营内被活活迫害而死。另外，一些拘留者则病到奄奄一息时才被释放。例如，前泛马回教党主席布哈鲁丁医生及吉兰丹州行政议员阿末也丁，人民党新山市议员依布拉欣等人，就是在临死时才被抬出黑牢。这是何等残酷，又是何等无耻的推却杀人责任的手法呀！此外，许多患上严重的心脏病、肺病、肾脏病，甚至神经失常者，同样被长期监禁，无情迫害。近来，联盟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地执行迫害拘留者的违背人权，惨无人道的反动政策。

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太平甘文丁营一位名叫黄水生的政治扣留者，由于不堪长期受到风湿痛和耳鸣的折磨，毅然付出他可贵的生命以强烈抗议和彻底暴露联盟政府对政治扣留者的严重迫害。他的牺牲，激起了全体扣留者的愤慨。

当天，华都牙也扣留营当局竟然不接见拘留者代表解释黄水生的死因，反而召来大批所谓“镇暴队”进营殴打扣留者，造成数十人头破血流，严重受伤。事后，扣留者还被24小时

单独监禁，并被剥夺会见家人和律师、通讯和取得书报的权利。华营扣留者于是被迫开展反迫害绝食斗争以要求“镇暴队”撤出扣留营及恢复一切平时所享有的权利。

太平甘文丁营扣留者在得知华营的情况后，便于今年一月十二日参与绝食斗争，以支援华营扣留者的要求。两天后，他们便遭受到暴力镇压，且被强制搬迁到华营单独监禁和处罚。一到华营，他们再度遭受到全面的残酷殴打。

为了挫败扣留者的正义斗争，“镇暴队”于是接管了华营，对扣留者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暴力镇压。许多扣留者由于身体要害如头、胸、肾及下体不断受到殴打，精神上饱受凌辱及长期绝食，都患上严重的疾病，有的已经奄奄一息，危在旦夕。尽管如此，在扣留者家属及国内外所有热爱自由、民主、正义和维护基本人权的人民的支援下，扣留者充分发挥了不怕苦、不怕死的斗争精神，坚持四十七天的绝食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绝食斗争结束时，扣留者的健康已经受到重大损伤，他们身上的主要器官如心脏、肾脏、肠胃等机能已经受损，或完全丧失机能，有的扣留者则已经神经失常。

绝食斗争结束至今已近半年，可是当局并没有兑现他们对扣留者所许下的诺言，例如承认扣留者代表的代表权，处罚在12·29事件中使用暴力对付扣留者的罪犯；以及改善营内非人的生活条件和医药设备等。

联盟政府不但不讲信用，而且对扣留者采取报复政策。绝食斗争结束后，吕进益和温瑞展曾一度神经失常，可是当局却

拒绝释放他们。

郑苟双肾被打到完全丧失机能，有生命的危险，他的家属不断要求释放他，但当局一直拖延，直到上个月，他的病情恶化，看看就要身亡了，当局为了推却杀人的责任，才让其家人将他抬出黑牢。目前，吉隆坡中央医院正在抢救他的生命，如果发生不测，当局必须负起全部后果！

此外，韩佑平患了严重的甲状腺毒症、心脏病和高血压并发症；已经被关了十年的江海、郑敬文、郭祖锋、梁广西、吴维湘等患上心脏病；黄少明、陈伟英、黄斗垣、RATNAM等患上了肺结核；郑举、陈文松等患上了糖尿病；张发起、GUNA等患上严重的贫血症；萧谷天、何南水等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症等等。尽管他们的家人忧心如焚，不断要求政府释放他们的亲人，政府却断然拒绝。这不是充分地说明了政府决心对我们的亲人进行有系统的慢性杀害么？！

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对联盟政府不再存有丝毫幻想，我们觉悟到向反动联盟政府乞求是没有用的，唯有和国内外一切热爱自由、民主、正义和维护基本人权的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无条件释放我国所有政治扣留者，废除臭名昭彰的内部治安法令和防止公众安全法令及恢复人民各种民主权利而斗争，才有希望，才有出路！

在此我们严正警告联盟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我国所有政治扣留者，尤其是那些病重垂危者，否则你们必须面对一切因此而引起的不良后果！

最后，我们呼吁国内外一切热爱自由、民主、正义和维护基本人权的人民密切关注扣留者问题的发展，并随时准备给予我们的亲人以实际的支援！

马来亚全国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发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十）其他团体的支援

根据《太平营男战友的战斗》的资料，除了家属的斗争之外，外界的支援还有：

1. 星政治扣留者多次罢食支援我们；
2. 星政治扣留者家委派出慰问团，并捐 500 元；
3.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联合家属：召开记者招待会声讨当局；
4. 国民大学、MARA 学院和马大教授、专业人士和学生发动签名运动，支援我们反迫害斗争；
5. 人社党和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也给予支持；
6. 香港学生代表团来隆慰问家属，表示大力支持我们的正义斗争。

这一切说明了 12·29 罢食斗争在突破当局的新闻封锁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同时，也显示当时的进步团体，还有一定的动员力量。这无疑是这场斗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附录（一）

致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书

联合国秘书长沃尔罕先生：

我们代表全马政治扣留者家属谨此吁请阁下促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立即调查我国的政治扣留者遭受虐待的事实，也希望阁下支持我们“立即无条件释放政治扣留者”的要求！

目前，在我国有超过三百名政治扣留者被监禁于华都牙也、麻坡、太平、芙蓉及吉隆坡附近的秘密扣留所。我们的亲人已被监禁了由两年至八年之久。他们从未被提控于法庭，也从没有在法庭上辩白的机会。他们都是卓越的政治、工运和知识界的领袖。他们纯粹是基于政治信仰而被监禁的。当局至多只能指责他们“反对政府”，但却提不出任何暴力活动的证据。事实上，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他们反对贪污腐败和专制的政权，正是这政权一味为外国资本家效劳而剥夺了我国人民的基本权利。

大家知道专横的监禁政治对手是殖民地主义政策的延续。在臭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下，每年都有无数的爱国志士不经审讯地被逮捕和监禁。他们之中，有的被送进秘密扣留所单独监禁、虐待和拷打，有的经过了多年的监禁才被释放，但他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殆尽，他们被限制居留，夜间不得外出，不得参加政治和职工活动，他们的生活途径受到百般为难。

有不少政治扣留者被驱逐出境，他们有的公民权被褫夺而遥遥无期地遭受监禁。政府强行吊销华族扣留者公民权，并把他们看待为中国国民，但中国方面从不接受此种野蛮的逻辑。事实上这些扣留者出生在本国，从来视本国为自己唯一的故乡。

政治扣留者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人口过度拥挤的高墙之内，里头缺乏运动和消遣的场所。他们的伙食质地十分差，以致营养不足，医药照顾更加恶劣，身心的惨受折磨造成扣留者在监禁期间精神错乱甚至死亡。

另一严重的事是扣留者的阅读权利也被剥夺，甚至连教育、语文和卫生书籍也受禁止。他们虽然可以和外界通讯，但他们寄出的文件经常失落。家属寄给他们的信也经常收不到。

当局对政治扣留者的待遇已达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在六九至七零年之间，即自执政党制造种族冲突以后，对政治扣留者的生活条件特别苛刻，他们的遭遇比刑事犯更恶劣。“镇暴队”一再地冲进监狱残忍地殴打政治扣留者，侮辱女政治扣留者，他们被限居在六尺乘十二尺的小牢房里，受一天廿四小时的单独监禁。他们会客和通讯的权利被剥夺，即使写信给律师也不准许，律师来访问也遭受拒绝。

政治扣留者沉痛地申诉说：“在那延续了几乎一年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统治时期内，单独监禁于牢房中的扣留者被殴打到晕倒，有的受重伤，有的牙齿被打脱，扣留者较值钱的物品被偷窃，当被殴打者求见医生或提出申诉时，他们便遭到更残忍的殴打，连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扣留者也要扣上手

铐。”

这些爱国人士遭受长期监禁和恶劣的待遇已引起家属和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政治扣留者及其家属曾进行多次绝食和游行示威以抗议迫害政治扣留者及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全部政治扣留者。我们家属已决心进行斗争以争取全体扣留者从长期和无限期的监禁中获得释放！

我们谨此要求阁下关注我们的呼吁，同时请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有关机构为此事采取行动！

马来亚政治扣留者家属代表

朱基菲之妻	曼依文签
陈福兴之母	蔡素叶签
S.N.RAJAH之父	M.孙德南签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日

附录（二）

要求停止对政治扣留者进一步迫害备忘录

马来亚内政部钧鉴：

迳启者：

要求停止对政治扣留者进一步迫害备忘录

由于我们的亲人，在华都牙也及甘文丁政治扣留营，遭受愈来愈严重的迫害，我们不得不出于对亲人的关心，而集体向阁下提出此份备忘录，希望阁下在了解了问题的真相后，能够采取有效的步骤，使政治扣留者的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

（一）政治扣留者被进一步迫害的背景

随著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我国政治扣留者的数目也日益增加，单单监禁于华都牙也和甘文丁两地扣留营的政治扣留者已经超过五百名，这些扣留者包括工人、农人、渔民、小贩、商人、学生、教授、新闻工作者、医生、职工会运动者、反对党议员以及执政党的前部长等。尽管这些扣留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著不同的职业，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信仰，然而他们都是在「危害治安」的同一罪名之下，受到内部治安法令的对付，上述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所谓「危害治安」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用以迫害政治异己的借口罢了！

我们的亲人，都是热爱祖国和人民，敢于维护正义和真理的爱国者和实践者。由于热爱祖国和人民，他们献身于改革社会的事业，由于维护正义和真理，他们不向阁下的政府的政治压力、暴力、黑牢、甚至死亡的威胁低头。

他们之中，有的在黑牢中被迫死或病死（如黄水生、郭玉华、冯朝民、苏辉明等）；有的被摧残到奄奄一息，才被抛出黑牢，往往一出黑牢就病重身亡（如BURHANUDDIN、AHMAD YATIM、IBRAHIM、黄春树、郑荀、林金泉等人）；有的被迫到神经失常。这类例子，每个时期都有，多得不胜枚举。活著的经过长期监禁，由于营内物质待遇及医药照顾都十分恶劣，加上在精神上及肉体上不断受到干扰和袭击，有时被迫采取长期的罢食行动，因此大多数扣留者都身受内伤或患上各种疾病。

我们的亲人，就是如此不断地付出自由、健康以及性命代价，坚持著他们高尚的爱国为人民的立场。我们的亲人能够经受得住如此严重的考验而屹立不倒，就等于宣判了阁下政府惨酷的黑牢政策的破产和失败！阁下政府是不甘心于失败的，它不但不准备（其实也不能）放弃惨酷的黑牢政策，反而愈来愈依靠它来维持遥遥欲墮的政权。一方面它没有一天不抓人；另一方面它加紧对营内扣留者们的迫害，妄想使他们屈服。我们深信，正义和真理的力量最终总会战胜暴政的，甘地夫人的倒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二）甘文丁「改造营」的建立

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政治扣留者的住宿问题，及加紧对他们迫害，太平甘文丁的所谓「改造营」，在一九七三年底正式启用。根据营方透露，华都牙也营是用来监禁扣留者之中的「死硬份子」，而甘文丁营是用来「改造」扣留者，一旦「改造」成功，就释放他们。

然而，甘文丁营的所谓「改造」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用真理来说服扣留者么？不是的，因为真理本来就不在阁下及阁下政府的，所谓「改造」其实就是威迫利诱，是软硬兼施的或交替作用的一种策略。

首先，扣留者由单独一人、数人、十数人、或者数十人一组、或一组一组地被分隔开来，而且不时调动重组极尽分化的能事。

其次就是加强「营规」，动不动就是处罚、关小房、甚至动手打人，实行白色恐怖。

营内亲人不准见面——不论是母女、兄弟或爱人，一概不准见面。此外还加紧对阅读物的限制，许多在外头书摊上可以买到的书刊，都不准进营。连许多过去进过的书刊，现在也一概不准。有的书刊说是拿去检查，结果音讯全无，如石沉大海。

中药现在也不准进营，食物和日常用品受到更严厉的限制。

营内的医药照顾很差，有些扣留者病得很严重了，还看不到医生，有时还被指责是「装病」！

营内的运动场所不足，许多区都没有运动场所，到其他区去运动，有时却遭到不合理的人为限制。例如营方曾经规定要踢足球和跑步，整区的人都得一齐去、一齐下场，它简直是强迫运动了！

营内的日常用品供应也不足，扣留者的鞋子、肥皂、牙膏等若用完了，不到期限，营方就不供给，而有关期限往往定得很不合理。

在去年年底，会见室竟然竖起了玻璃障碍，把探访的家属和扣留者隔绝开来。这不但是对家属与扣留者尊严的侮辱，也妨碍了彼此对话的进行，因为玻璃上只开了几个小洞，让声响透过，听觉不灵的根本无法听到对方的谈话，因此只得大声叫喊！亲属探访的时间，一次只允许半小时，而且当探访者人数较多的时候，营方以时间不够为借口，把探访者时间缩短至五分钟，或完全不准探访。有的家属赶了数百哩的路程，却只被允许会见五分钟或不得会见亲人，这怎不叫人失望和气愤呢？

尤有进者，扣留者到医院治病，或回家探病、奔丧等，都要强加手铐，使到扣留者不得不放弃治疗或回家奔丧。手铐问题在华都牙也营也同时发生，这是一种违背协议的行动。一九六九年四月间麻坡扣留者因手铐问题与营方展开了斗争，导致当时的总警长与扣留者代表律师进行谈判，结果双方取得协议：扣留者去医院或看病或留院治疗，一概免上手铐，有事回家，则视情况的需要而定，由于扣留者回家或出外都是由警员护送，上手铐是没有需要的。上述协议达致之后，手铐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

可是在最近几个月来，扣留者就必须上手铐，连去医院也不例外。更不人道的是连要动手术的扣留者，留院也得上手铐，上著手铐，叫病人怎样休息？怎样养病？这种做法，真是野蛮到极点！

有几位患上严重疾病的扣留者（如林裕、曾荣盛、郑敬文、韩佑平、李亚明、GUNARATNAM、凌金辉等人）医生早就决定要和他们动手术了，由于要上手铐，他们宁可病死在牢中也不愿去医院遭受迫害，他们的病情正在迅速恶化之中。当局以手铐问题来为难我们的亲人，摧残他们的健康，一旦他们误了治疗而有了三长两短，当局难道不必负起责任吗？

我们希望当局遵守一九六九年大马总警长与扣留者代表律师所达成有关手铐问题的协议，使手铐问题得以解决，使我们亲人的疾病得到及时的治疗，否则当局必须负起一切后果！

（三）华都牙也营实行新营规，加紧迫害扣留者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凌晨四时，警方人员突然闯入华都牙也扣留营，用暴力将所有扣留者强行关入小房，然后宣布根据所谓一九六零年内部治安法令（扣留者）修正条例，施行新营规。

根据新营规，我们的亲人除了冲凉及洗衣服之外，每天遭受到二十四小时的单独监禁。

与家人通信由每星期四封减至三星期一封。

家属探访由每星期一次减至三星期一次。

中西药不准进营，日常用品及食物均受到限制。
阅读物的限制和检查更加严厉。……
总之，我们亲人所受到的待遇比罪犯还不如！

我们的亲人经过长期的监禁和摧残后，死的已经死了，活著的为什么要受到进一步的迫害和虐待呢？他们到底犯上了什么滔天大罪？可以肯定，二十四小时的单独监禁及新营规对扣留者在精神及物质上的各种迫害，将使我们亲人的健康更快地崩溃，这种有步骤、有预谋的行动，岂止是不人道，它简直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在我们亲人未犯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对他们采取惩罚性的二十四小时单独监禁是一种疯狂的做法，我们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四) 我们的要求

为了维护基本人权及我们亲人的利益，我们坚决要求：

- (1) 废除恶名昭彰的内部治安法令，立即无条件释放全体政治扣留者。
- (2) 立即停止迫害和虐待政治扣留者，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健康不受损害！
- (3) 废除华都牙也的新营规，即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实施的所谓一九六零年内部治安（扣留者）修正条例。
- (4) 履行一九六九年四月大马总警长与扣留者律师所达成的关于手铐问题的协议，解决手铐问题。

- (5) 拆除甘文丁营探访室内的玻璃障碍！
- (6) 改善营内的医药照顾，准许中药进营。
- (7) 放宽阅读物的限制。市面上买得到的书刊应准予进营。

(五) 紧急呼吁

目前，由于受到二十四小时的单独监禁，华都牙也扣留者在营内的日常生活受到破坏，甚至连运动、散步、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的健康因此在迅速恶化中。我们在此紧急地呼吁阁下立即采取行动，结束这种不人道的集体迫害行动，无条件废除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实施的新营规，使营内的生活回复到三月十日以前的状态。

上述各项要求和我们的紧急呼吁是对阁下及阁下的政府是否相信民主、听取民意的考验，我们等待著阁下的答覆。

华都牙也政治扣留者家属

一九七七年五月卅日

副本致给

- | | |
|------------|----------------|
| 1. 国际人权委员会 | 2. 国际红十字会 |
| 3. 国际宽赦委员会 | 4. 华都牙也及甘文丁扣留营 |
| 5. 政治扣留者律师 | 6. 各政党 |
| 7. 团体 | |

政治犯獄中的控訴

—民主行動黨秘書長林吉祥

絕食四十七天！

政治犯獄中控訴

(总二司)

行動黨秘書長林吉祥探獄獲取

正如《政治犯獄中的控訴》前言中所指出的，为了更清楚地调查与了解整个事件之发生原因与经过情况，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暨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林吉祥先生，乃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前往华都牙也扣留营，会见拘留人士的代表。翌日，林吉祥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他的调查报告。鉴于新闻封锁，该党乃决定出版有关的小册子。吉祥的及时访问及突破新闻封锁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章：政治犯狱中的控诉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

前 言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九日，我国华都牙也扣留营的政治拘留人，因太平扣留营的一名政治拘留人士——来自柔佛州永平的黄水生的自杀，触发了一项全国关注的绝食抗议行动。

到了一九七四年正月十三日，太平扣留营内的拘留人士，在听悉警方人员强蛮对待华都牙也扣留营内的拘留人士的消息后，也议决展开绝食行动，以支持华都牙也扣留营的拘留人士。

这项后来引起了拘留人士家属召开记者招待会及示威游行以抗议当局的绝食行动，一直拖延了四十七天，到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二日，营中的拘留人士与扣留营当局达致一项协定后，才宣告结束。

为了要更清楚地调查与了解整个事件之发生原因与经过情况，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及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林吉祥同志，乃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前往华都牙也扣留营，会见拘留人士的代表。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二时，林吉祥同志在吉隆坡举行了一项记者招待会，公布他访问华都牙也营时所获得的拘留人士方面的叙述。

鉴于所有报章皆没有刊载这项叙述，为了使大家了解上述之情况，乃本小册出版的目的。

（一）华都牙也扣留营之行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我前往华都牙也扣留营，会见了被扣留在那儿之政治拘留人的领袖，以便调查出他们在扣留营中，进行了四十七天绝食抗议行动之真正原因。

我会见了来自槟城之陈福兴，麻坡的李万千，知知港的陈松生，麻坡的李庆和及陈志光以及吉隆坡的翁隆盛。

我曾要求会见在扣留营内的其他两位政治拘留人——雪州之纳达拉惹和柔佛州之韩佑平。可惜纳达拉惹病重不能见我，而韩佑平到目前为止，仍留医在华都牙也中央医院内。

(二) 历时共四十七天之绝食抗议行动的 根由及事情经过

以下是与我相晤的政治拘留人，在两名高级监狱官员之监视下，告诉我之四十七天绝食抗议行动之原因及经过情况：

黄水生的自杀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九日，华都牙也扣留营（以下简称华营）内的政治拘留人听悉有关太平扣留营（以下简称太营）中，一位被拘留者——来自柔佛州永平之黄水生的死讯。

自从黄水生被拘留以后，他全身都患上风湿痛。医治之结果，由于进食药丸起了副作用而不幸患上耳鸣症。因为营内生活条件差劣，又没有获得好的医药照顾，其病情乃日益恶劣。

对华营之政治拘留人来讲，黄水生是抗议太平甘文丁（KAMUNTING）扣留营之非人生活，及医药情况而自杀的。他们深信黄氏是要以尸谏争取改善扣留营中之生活条件。死前，他留下一封遗书。

华营共分为三座楼，A楼监禁了大约有六十名的拘留人，B楼有二十人，C楼则有十二人。

要求谒见总监

华营的政治拘留人都深切地关注黄水生的逝世。于是，每座楼都选派出两名代表要求谒见扣留营之总监，以便查出黄氏的真正死因。同时，要求当局安排打电报及寄钱给死者家属，以示哀悼。

可是这三座楼的六位代表却不被获准经过办事处大门口去谒见总监。而后者也拒绝他们的要求举行联席会议。

当局要这六位代表分开来。但是，他们却坚持一致行动，理由是这关系到他们所有拘留人之福利问题。

拘留人让步

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维持了大约四五个钟头，最后，还是拘留人让步，分批两人一队去谒见总监。但是当局还是不接纳他们的折衷办法，而且还下令他们回返各自的座楼去，否则，就得面对暴力赶回去。

这个时候，A楼为数大约五十八名的拘留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同时受到黄水生逝世的刺激，加上对他们的代表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听说他们的代表将受到暴力的对付。于是，他们用力推开A楼的栅门，跑到对面大楼之大草场，大声高喊口号，要求谒见总监，同时要求知道黄水生之真正死因。

大约晚上八时廿分，扣留营当局要求联邦后备队到场，向六十多名集合在一起的拘留人抛放催泪弹，穷凶极恶地殴打和驱散他们。

联邦后备队见人就打

来自麻坡的李万千，被殴打而跌在地上，周身创伤，后来缝了九针。另外，六到七人因为头部及身体各部被殴伤而留院治疗，他们之中包括槟城的叶镁辉及吉打的林春华。其中叶氏身上被缝了大约九针。

联邦后备队向拘留人施暴时，见人就打，而且乱打拘留人的身体各部，包括头部、胸部和腹部。在面对暴力下，拘留人只好退回到他们的座楼去。

拘留人之领袖以他们已经返回座楼，于是要求扣留营的官员停止再向他们动粗。同时要求负责官员把受伤的李万千舁入医院去接受紧急救治。

可是，联邦后备队的人员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残暴殴打行动，而且再把催泪弹射入A座楼内，并且闯入座楼内继续见人就打。后来拘留人被个别关入牢房内，继续在牢内受到殴打。

开始绝食抗议行动

在联邦后备队人员的殴打中，被迫退入A楼内的B楼和C楼拘留人代表，也被拖回B楼去。途中，他们又再被联邦后备队的人员毒殴。为了抗议当局残暴对待他们，拘留人于是开始绝食行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卅日，扣留营当局宣布，由于拘留人违反扣留营的条例，他们都得受罚，今后三个月内，拘留人的家属不被获准会见拘留人，不能跟外界有任何通讯来往。

自从白色恐怖开始之后，联邦后备队奉命驻守在扣留营内，拘留人继续不停地被联邦后备队的人员殴打，精神及肉体受尽折磨。每天冲凉，一次带出两三人，有时稍迟或稍慢的话，就被联邦后备队人员拳打脚踢。有时，这些联邦后备队人员甚至把警棍插打拘留人的胸部、肚子、肋骨、肾部及其他敏感的部位。

肉体施暴外的精神折磨

联邦后备队及营中狱卒不但对拘留人的肉体施暴，而且还在精神上折磨他们，以期摧毁拘留人所展开之绝食行动的精神。

他们明知拘留人在绝食，可是这些狱卒和联邦后备队人员却强迫拘留人拿食物。当收回食盘之时间到时，虽然他们明知道拘留人并没有吃这些食物，他们还硬要拘留人打开他们的食盘盖，否则就向拘留人施加体罚。

除此之外，这些联邦后备队人员及狱卒日夜廿四小时喧闹，以干扰拘留人的精神，使他们整天没有安宁。

遇到拘留人生病或是受重伤时，牢外就置放“注意”之告示牌。狱卒在晚间每隔几小时就开灯，据说是要看拘留人有没有死，使他们夜间没有好睡，造成他们的病况及伤势更呈恶化。

根据拘留人告诉我说，尽管他们受尽精神及肉体折磨，但他们的斗志坚强，因为这不但涉及他们的政治原则及信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人权及自尊之基本问题。

(三) 太平拘留人的同情绝食

一九七四年正月十三日，太营的人获悉警方人员因黄水生之死而强蛮对待华营的拘留人，于是也议决展开同情绝食行动，支援华营之拘留人。

表明是和平的行动

他们向太营负责当局提呈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他们展开绝食行动的理由。同时声明他们的行动是和平的。

我被告知说，在那个时候，太营被分为八个区域。但是，只有第一、二、四、六及七区域住有人。拘留人明知这场绝食行动将会延长下去，于是请当局允许所有拘留人齐集在一起，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自己互相照应年纪比较老或是体质比较虚弱的人，虽然当局不赞同他们的这项建议，但是，第二、四及六和七区的拘留人，在正月十三日下午起就汇集在一起。

太营当局经注意到他们的备忘录说明那是和平的绝食行动，可是，到大约下午四时左右，太营的负责当局召回看守绝食拘留人的狱卒，并且不允许拘留人拿取开水。晚间七时，更召集联邦后备队到来包围著整个太营，虎视眈眈地监守著拘留人。

受殴打后被调往华营

隔天清晨，当局就把联邦后备队人员带入营内殴打进行绝食的拘留人。到了大约上午十时左右，当局也宣布因拘留人破坏营内条例，他们所有的权利都将被取消，作为一种处罚。此外，他们都将被调往华营去。当时，太营共有一三九人。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拘留人都同意被调往华营去。但是他们要求当局保证不向他们动粗。联邦后备队的官员保证，只要拘留人不用暴力，他们亦将不动粗。

当这批太营的拘留人被载往华营的时候，旅途中并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到抵达华营的时候，他们必须一个个地相距一段距离，进入营中的三层楼A楼去。太平来的拘留人告诉我，他们得经过一边由联邦后备队员所组成，另一边则由狱卒所组成之行列。他们遭受到警棍和铅杯的殴打，因而头部，背部和其他身体部份都受伤。

那是当天下午一点钟的事。到下午两点钟时，太平来的拘留人分批两三人被押往冲凉，他们也被毒打一身，联邦后备队人员还进入他们的牢房内，下令拘留人脱开他们的衣服，然后动手动脚殴打他们一顿。

听到受尽凌辱的痛喊声

那天整个下午，被禁锢在附近之B楼内者，听到来自太平的拘留人受尽凌辱的痛喊声，有的被殴者受了伤而被送往医院去治疗。

我也被告知有关拘留人被粗暴地殴打之特别例证。象林裕，当他去冲凉的时候，被两名狱卒以警棍殴打肚子，事后五六十天，他因而痴血。我已经获悉殴打他的狱卒之服务号码。其他日常被殴打受重伤者有吉打的赵善宝和槟城的吴少平。

但在大多数的时候，当联邦后备队人员和狱卒向拘留人施暴时，他们事先必把服务号码除掉，以免被人辨认出。

（四）手铐及住院治疗

在较早之一批住过医院后，虽然有许多拘留人受到重伤，但是，他们不愿住院治疗或到医院治病，这是一位狱卒带他们到医院求治时要他们上手铐。此外，如果在医院留医，也要把他们的手扣在病床上。这是违反拘留人与已故敦沙礼警察总长所达成之协约的。那就是到医院求诊的时候，拘留人不必上手铐。为了抗议当局违背上述协约，如果一定要他们上手铐的话，拘留人都不愿意到医院求医。不过，有些患上重病的拘留人，在医院助手的建议下，都马上被送到医院住院医治。

一九七四年正月十五日，有关当局同意不上手铐押一些拘留人到医院求医，他们是B楼的六名拘留人，即彭亨州的和南水，吡叻州的郑亚育，柔佛州的苏志明，槟城的骆瑞忠，柔佛州的黄斗垣及雪州的古兰利南。但是，当他们留院治疗的时候，却被迫扣在病床上。为了表示抗议，他们六个人都一致拒绝进食药品或接受医疗。周日晚上，医院的医生把他们送回集中营去。但是，当他们返回B楼时，联邦后备队人员就利用警棍殴打他们的肋部，这已是他们进入第十八天绝食。那时候，有关的拘留人，除了身受重伤之外，身体已很虚弱了。

再打下去可能死亡

二月五日，也就是拘留人绝食行动晋入第卅八天的时候，B楼的林玉华最后一个出来冲凉时，也受到两名狱官和两名狱卒的殴打，那时大约是下午三时卅七分。拘留人已经把这两名殴打他的狱官姓名告诉了我。

二月六日，早些时候曾被送进过医院的吴少平，又被两狱官和两狱卒殴打到昏迷过去。这是他第四次遭毒打。事前，他已被送往医院医治过四次，而且也曾经昏迷过更多次。

一名在医院看到吴少平的拘留人告诉我，吴少平伤到不能讲话，医院当局看到他伤势严重，认为如果吴氏再被殴打，可能受不了而逝世。因此，院方拒绝让他回到扣留营去。

因为联邦后备队人员殴打拘留人的时候，把他们的敏感部位像肾部、肋部和肚子作为攻打的地方，有许多因此内伤或者内脏出血。到目前为止，我知道有许多拘留人身受重伤，好像翁隆盛就是其中一位。我知道目前有四名拘留人内伤很重，有的甚至大小便也有困难。

其中一名拘留人笨珍的李亚明受重伤进入怡保中央医院救治中，其他如陈文松（吉打）及郑举（昔加末）的伤势也很危险。扣留营中有许多人受伤致昏迷不醒，往往要等一段时间，才获得医药的照料。

我获悉，有许多拘留人的衣服沾满血迹，他们的面巾及其他用具也血迹斑斑。这都是警方人员在有关时期内，残暴对待拘留人所流下的血证。

(五) 结束四十七天绝食行动的协议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拘留人和扣留营当局达致一项协定，结束了这场历时四十七天的绝食行动。

拘留人提出一些要求，政府通过两名国会议员——巫统的拉惹龙吉及泛回的东姑赛益应答。其协议扼要点如下：

停止绝食协议要点：

- (一) 拘留人要求当局立即废除内部安全法令及驱逐出境法令，同时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政治拘留人及被令出境者。两名政府的国会议员及扣留营当局都同意把拘留人的要求转达给内长知道。
- (二) 拘留人要求立即取消所有对政治拘留人的专横处罚，释放单人禁闭牢房和恢复营内之正常。扣留营当局同意了这点。
- (三) 拘留人要求设立一个包括法律顾问及政治拘留人家属代表在内的公开调查委员会，深入调查集中营内的一般真实情况及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九日事件期间，[政治拘留人被野蛮地施暴]的事件，并对殴打拘留人的有关犯罪官员和狱卒采取纪律行动。同时保证当局以后不再向政治拘留人施暴。
在协议中，有关当局同意把拘留人这项设立一个公开调查委员会的要求提呈内长知道。有关当局也同意调查政

治拘留人被殴之事件，并且处罚有罪之官员，当局也答应以后不再以暴力对待政治拘留人。

(四) 拘留人也要求他们的代表可以连袂谒见总监。
当局也同意考虑此事。

(五) 拘留人要求有关当局把黄水生的真正死因告诉华营的政治拘留人，同时给予安排，俾使他们可以向黄水生的家人致慰及汇寄帛金给其家人。
在这项要求上，当局也原则上同意。

(六) 拘留人要求改善扣留营内的一般生活条件，并给予各扣留营平等待遇。
当局也原则上赞同此要求。

(七) 拘留人要求恢复过去的一切权利。
有关当局经已赞同。

(八) 政治拘留人要求当局取消指控他们的家属因响应彼等之绝食行动而展开之示威游行罪嫌，至于那些因联邦后备队和狱卒殴打而病危的政治拘留人应获得释放。

有关当局表明将把他们的此项要求转呈内长知道。

上述协定是由政治拘留人八名代表，包括陈福兴与李万千在内所签署者。

(六) 行动党的建议

上述记载是我昨天访问华营会见拘留人代表时，他们向我叙述的。在场的还有两位高级政府人员。很显然地，不管政府对上述事件有什么解释，不容辩驳的是，政府应设立一个以高庭法官为首的调查委员会，鉴定上述绝食行动的根源及事件的经过始末，去消除公众人士的疑虑。

看来，好像地方性当局，对去年十二月廿九日事态的发展，有过过份的反应。

希望勿掩盖真相

我呼吁内长丹斯里加沙里立即训令设立这样一个公开调查委员会，以便警方人员是否有向政治拘留人施暴和肉体及精神虐待的真相，可以公布出来。

我们希望内长不致像卫生部长丹斯里李孝友处理马六甲中央医院大批死亡事件那样，把调查真相掩盖下来。

鉴于华营大多数的拘留人都蒙受到重伤，内政部应该允许一批独立医生团进入华营去，会见拘留人，同时检查他们每人从十二月廿九日之事件后，受到何种程度的不良影响。

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到今年三月十三日在华营所发生的事件，对马来西亚是一项奇耻大辱，我呼吁所有马来西亚国内外爱护基本人权的人民都站立起来，呼吁政府设立这样的调查

庭。

最后，我得感激内政部允许我会见政治拘留人。我将在三月二日（星期六）前往访问太平扣留营，会见其中二名拘留人，查出该营的真情实况。

附件

以下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及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林吉祥致给内政部长丹斯里加沙里，建议公开调查华都牙也扣留营内，政治拘留人士绝食四十七天之事件的函文。

内政部长钧鉴：

首先我要谢谢内政部 让我访问华都牙也扣留营和会见那里的政治拘留人士代表。

我会见的拘留人士对警方与营方之粗暴行为，作了非常严重和证据充份的指责，如果不充份地加以调查的话，将在政府对待政治拘留人士的记录上，留下污点。

不管警方和扣留营当局对这些指控经作出怎样的反驳，我坚信它是严重到只有对这绝食四十七天之事件的成因及有关事件作一项全面之公开调查后，才有正义可言。

此项调查亦能有益地调查出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九日，如果扣留营当局更圆滑及技巧地处理事情的话，是否不能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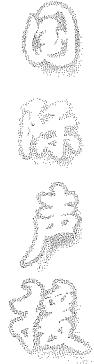
触发拘留人士和当局之间的对抗，而导致四十七天的绝食，以及警方和营方粗暴对待拘留人士，使他们大多数受到严重伤害的真正情况。

因此，我诚恳地促请你，进行一项公开调查，以一名高庭法官为首，调查华都牙也和太平扣留营的这件严重事件，以满足不但是国内，同时亦包括国际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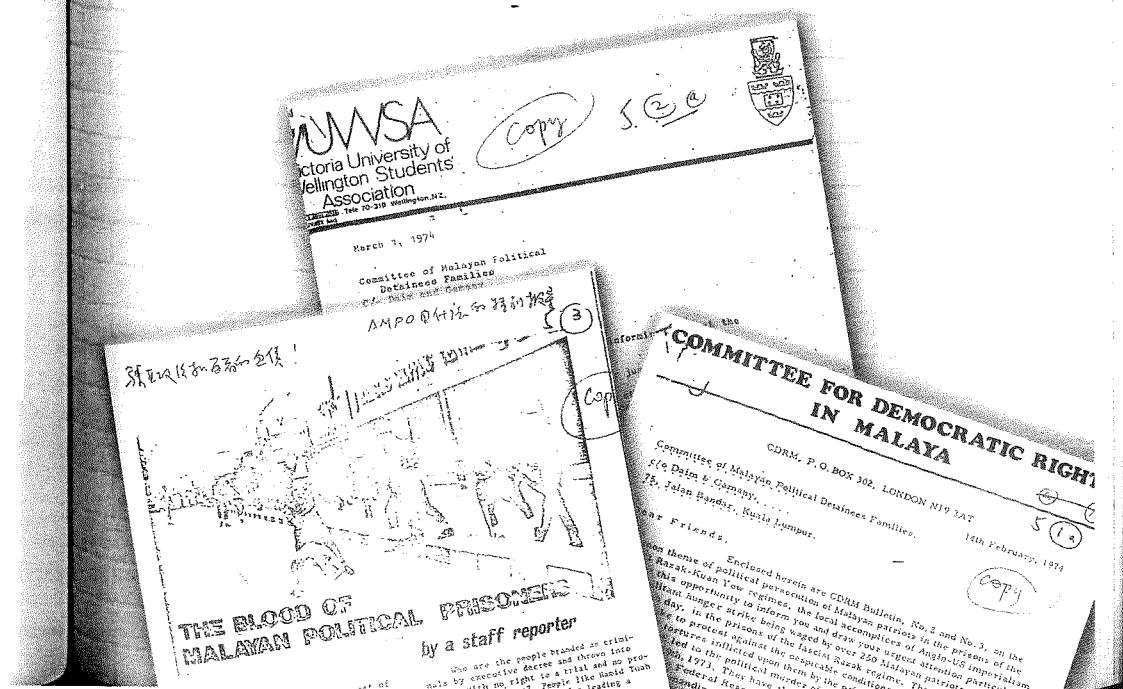
如果有关警方和营方粗暴的指控是真实的话，则那些犯有暴行之罪的官员应受纪律处分，如果指控是不确实的话，则记录应获得清白。

最后，我附入一份有关我在二月十六日，在华都牙也扣留营会见政治拘留人士代表的记者招待会文告，从中你将同意他们的指控是非常严重，理应获得充份的公开调查。

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林吉祥谨上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



根据《太平营男战友的战斗》文中的资料，12·29大罢食斗争获得的国外声援有：纽西兰威灵顿大学学生会、伦敦为争取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纽西兰星马学生联合会、美国纽约左派人士、国际红十字会荷兰分会、日本左派团体及香港大学学生会等。此外，海外许多报刊和通讯社，也发表了绝食斗争的报导。上述各有关团体纷纷打电报给拉扎克集团，谴责它迫死黄水生同志，要求它答应政治扣留者的合理要求，以便结束罢食。本章刊出的只是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由陈松生同志译成华文。



第五章：国际声援

(1) a. 英国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
致马来亚政治扣留家属委员会函

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 (CDRM)
(Committee For Democratic Rights In Malaya)
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
邮箱：302
地址：N19 3AT, LONDON.
1974年2月14日

致：

马来亚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
达因与加曼尼律师楼
吉隆坡谐街75号（转交）

亲爱的朋友们：

谨此附上英国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第2及第3期报导英美帝国主义帮凶拉扎克——李光耀法西斯政权对马来亚爱国者

进行政治迫害的新闻简报。

我们藉此机会通知你们，并请你们密切关注囚禁在拉扎克法西斯政权牢狱里的250名爱国者所展开的大绝食斗争。这场斗争已进入第48天。他们展开罢食斗争以抗议牢狱中的卑鄙的条件以及狱方和政治部对他们所施行的罪恶性精神与肉体的虐待，这些虐待导致1973年12月29日黄水生同志的政治谋杀。

他们也谴责联邦后备队(Federal Reserve Unit : FRU，俗称“镇暴队”或“暴动队”)在他们绝食期间对他们进行不断的毒打。他们也要求当局立即把联邦后备队撤离监狱。

帝国主义者的大众传媒如报章、电台、电视台等等，特别是在英国和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传媒，无耻地串谋起来，对我们马来亚爱国者所遭受的残暴虐待保持缄默，不予报导。它们希望藉此掩盖他们的同谋者拉扎克政权的法西斯主义。但是，英勇的马来亚政治扣留者家属和支持者开展持久的斗争，他们现在已经突破了邪恶的新闻封锁。

英国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及留英马来亚新加坡学生运动(MASS MOVEMENT)响应英勇家属的呼吁，正在英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推展一场广泛和持久的运动以揭露拉扎克——李光耀政权最近的法西斯暴行。

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吁请英国及世界其他区具有正义思想和热爱自由的人们，支持马来亚各族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对拉扎克——李光耀法西斯政权，特别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呼吁你们支持我们的下列行动：

- (i) 揭露和谴责有关当局对遭受不公正扣留的马来亚爱国者政治迫害(有些情况包括政治谋杀)；
- (ii) 坚决支持罢食的爱国者所展开的正义斗争；
- (iii) 要求无条件释放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政治扣留者；及
- (iv) 要求废除一切法西斯法令，特别是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简称“ISA”“内安法令”)，保护公共安全法令(Protection of Public Security Act)，(译者按：这是新加坡政府实施的治安法令，类似马来西亚的“ISA”，扣留者在这两项法令下扣留。)

我们吁请你们把所有抗议政治谋杀和残暴虐待绝食中政治扣留者的信件、声明、电报等等，寄到马来西亚吉隆坡首相署。

所有政治扣留者及其家属的信件、电报等都可通过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代传。

请把你们要采取的任何行动告诉我们。

谢谢。

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秘书
华合(Wahab)签发

(1)b. 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致电报向拉扎克法西斯政权提出强烈抗议(5.2.74)

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强烈抗议你的法西斯政权罪恶性地迫害政治扣留者及政治谋杀马来亚爱国者黄水生。我们对于联邦后备队对付抗议的扣留者及其家属的暴行极为愤怒。

全力支持250名激进爱国者在牢中坚持39天的绝食斗争。你的政权须对由于绝食斗争所引起的不良后果负起全责。

要求立即停止政治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扣留者、废除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

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展开广泛运动暴露拉扎克——李光耀政权镇压牢中的爱国者及骚扰他们的家属。任何法西斯镇压都无法恐吓战斗中的马来亚各族人民摆脱一切反动势力的决心。

(1)c. 致电报坚决支持爱国志士及其家属(5.2.74)

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正在展开一项持久及广泛的运动以暴露拉扎克——李光耀法西斯政权对牢中的马来亚爱国者的罪恶性政治迫害。

强烈谴责政治谋杀黄水生同志，以及联邦后备队动用暴力镇压抗议中的扣留者及其家属。

密切关注英勇的罢食斗争。拉扎克政权必须对绝食斗争所引发的一切不良后果负起全责。

强烈抗议电报发给拉扎克。

任何法西斯镇压都无法恐吓战斗中的马来亚各族人民。拉扎克——李光耀政权不会有好下场。

(1)d. 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坚决支持
250 政治扣留者的绝食斗争

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
通讯地址：
CDRM, P.O. BOX 302, London N19 3AT.

1974年2月10日新闻简报第3期

暴露及谴责拉扎克——李光耀法西斯政权
政治迫害狱中的马来亚爱国志士
坚决支持250名政治扣留者
进入第45天的罢食斗争

随著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份子展开日益尖锐的斗争，拉扎克——李光耀政权加强镇压。尽管遭受残暴镇压，狱中的爱国志士还在进行英勇的斗争反抗法西斯新殖民主义政权。

黄水生同志过去3年来，与其他狱中爱国志士一道英勇地反抗残酷的精神和肉体的虐待，坚决地捍卫他的政治信仰。1973年12月29日，他作出最大的牺牲：宁可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放弃政治原则。于是他成为拉扎克法西斯政权一系列政治谋杀的最新受难者，他成为马来亚各族人民反抗英美

帝国主义及其帮凶拉扎克——李光耀集团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拉扎克法西斯政权把黄水生同志的自我牺牲单方面说成是“自杀”以掩饰其罪行。政治谋杀黄同志的事件，不但没有如同法西斯政权指望那样地吓唬了其他扣留者。相反的，他的牺牲激起了太平扣留营及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爱国志士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抗。两地的扣留者分别于1973年12月29日及1974年1月12日展开绝食斗争抗议不人道的待遇、恶劣的医疗设备、可鄙的生活条件以及联邦后备队暴行持续不断的残酷攻击暴行。这场不畏惧死亡的绝食斗争已经进入第45天了。

帝国主义的大众传媒如报章、电台、电视台等等，特别是在英国和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传媒，无耻地串谋起来，对我们马来亚爱国志士所遭受的残忍虐待，对他们在牢中展开逾一个半月的英勇斗争保持缄默，不予报导。英美帝国主义及其当地帮凶希望通过新闻封锁让其法西斯主义不受干扰地进行，以免其犯罪行径招来广泛反对。尽管如此，我们的爱国志士自1973年12月29日起所展开的不畏惧死亡的抗暴事迹，还是在国内和国外传播开来。

在马来亚，爱国志士的英勇家属已经争取到马来亚各族各阶层人民支持他们亲人的正义斗争。这些支持者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及知识份子。许多支持政治扣留者反抗暴力镇压的团体正在加紧动员。英国马来亚民权委员会在上周收到不少来自被扣的爱国志士的家属及支持者的电报，呼吁人们支援绝食斗争。

为了响应此呼吁，英国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以下简称“民主权利委员会”联合留英马来亚及新加坡学生运动(MASS MOVEMENT)一起发动广泛和持久的运动以揭露和谴责拉扎克——李光耀法西斯政权对牢中爱国志士的政治迫害，同时也争取人们支援绝食斗争。民主权利委员会也收到一些有关绝食斗争的资料。在此重印的文件是最全面的。

2月5日，民主权利委员会拍发电报给拉扎克法西斯政权强烈抗议当局对我们的爱国志士的残暴迫害。民主权利委员会也同时拍发电报给爱国志士的家属表达我们全力支持他们亲人的正义斗争。

这些电报重印在本期新闻简报第6页。

民主权利委员会呼吁所有具有正义思想和热爱自由的英国人民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支持马来亚各民族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抗英美帝国主义帮凶拉扎克——李光耀法西斯政权的斗争。我们特别呼吁你们在这个时刻支持我们的运动：

- (1) 揭露和谴责当局对遭受不合理囚禁的马来亚爱国志士的政治迫害(包括一些政治谋杀个案)；
- (2) 坚决支持爱国志士的正义绝食斗争；
- (3) 要求无条件释放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所有政治扣留者；
- (4) 要求废除囚禁爱国志士的法西斯法令，特别是臭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及保护公共安全法令。

英国马来亚民主权利委员会
1972年2月10日

(1)e. 关于马来西亚粗暴侵犯 基本人权的事实

太平扣留营及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政治扣留者的近况

简介

今天在马来亚大陆的太平、华都牙也、芙蓉、槟城、吉隆坡以及新加坡的樟宜监牢有大约超过600名人士被援引法西斯“内部安全法令”和“保护公共安全法令”分别扣留。

直至1973年12月29日，太平营约有169名政治扣留者，华都牙也92名，其中逾20名被扣留超过10年；60名超过6年；100名超过4年。这些扣留者惨遭法西斯监狱当局及政治部所施加的各种精神与肉体虐待。在牢中，生活条件恶劣、医疗及卫生设备奇差无比，而培训、运动等等设施也非常有限，亲友和律师探望备受限制。拉扎克——李光耀法西斯集团的这些措施旨在击垮扣留者的战斗精神，迫使他们放弃政治信念，以取得所谓的“自由”！这些暴行，导致许多扣留者成为受害者。其中有几位已经逝世了，如1970年逝世的苏辉明同志(Soh Hooi Beng)，1971年的冯朝民同志(Pang Chow Min)以及最新的例子，即1973年12月29日的黄水生同志(Wong Sui Sun @ Wong Meng Kiew)。黄水生在遭受难以言喻的精神与肉体虐待之后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下是有关系绝食斗争的一些事实：

1972年12月29日

黄水生于1970年被扣留。由于遭受精神与肉体虐待，加上营内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贫乏的医疗卫生设备，黄水生自从被扣留之后就患上风湿病痛。由于监狱医生所提供的药物(salicylate drugs)所产生的副作用，他开始不断地受到耳鸣症的干扰。政治部为了要击垮黄水生以迫使他放弃思想“争取”所谓“自由”而持续地对他进行精神与肉体的虐待，导致他的病情恶化。如此这般的折磨，最终于12月29日达到顶峰：黄水生决定宁可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放弃政治信念以换取“自由”出狱！

黄水生逝世后，6名扣留者代表立即会见监狱总监，谴责当局，要当局为黄的逝世负责，并要求当局允许扣留者代表团扶灵返黄水生的出生地永平。这项要求被当局断然拒绝。

当天，扣留者也致函内政部长，强烈抗议黄水生被迫结束生命，并要营方对他的逝世负起全责。他们也要求当局赔偿黄水生的家属，否则当局须负起由此而引发的一切后果。

当天下午，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者在获悉黄水生逝世消息后，其中一部份扣留者冲出牢房聚集在监狱办公楼前面，要求当局解释，并抗议当局对扣留者的迫害和折磨而导致黄水生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时，当局调动联邦后备队进营殴打扣留者，导致约30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进院留医。

华营扣留者采取进一步抗议行动：绝食。结果，当局剥夺他们会见律师与家属、通信和阅报等权利。此外，扣留者被单

独囚禁。

许多进行绝食斗争的扣留者向当局提出进一步要求，如下：

- (1) 立即把联邦后备队撤离扣留营；
- (2) 立即撤销扣留者不许会见律师与家属之禁令；
- (3) 停止单独囚禁；
- (4) 恢复扣留者通信与阅读报的权利；
- (5) 改善医疗和生活条件以及增添新的培训和运动设备；
- (6) 惩罚导致黄水生逝世以及殴打罢食扣留者的官员。

1973年12月30日

雪兰莪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家委会”)正式成立。家委会将为争取政治扣留者的民主权利而斗争。

之前一天(即12月29日)，他们前往华都牙也扣留营探访亲人，但是遭到营方拒绝。他们营外露宿，以示抗议。结果惨遭联邦后备队殴打。

家委会在成立大会上强烈谴责拉扎克政府及监狱当局在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各地扣留中心迫害政治扣留者，强烈抗议黄水生的逝世，并提出以下要求：

- (1) 立即停止迫害政治扣留者，恢复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
- (2) 赔偿死者家属，确保类似的事件不再重演；
- (3) 立即采取行动改善扣留营的生活与卫生条件；
- (4) 立即采取行动改善扣留营的医疗设施，停止对扣留者的精神与肉体虐待；

(5) 改善扣留营的体育运动设施，提供足够的培训设备。

家委会也通过议决案强烈谴责拉扎克一一李光耀政权迫死黄水生，要求废除法西斯法令如内部治安法令，驱逐法令等以及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扣留者和受驱逐出境人士。

1974年1月12日

太平扣留营政治扣留者在获悉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发生的事情之后便投入绝食斗争行列。他们遭到惨酷的殴击，超过60人受伤，其中30人重伤。

同一天，30名政治扣留者家属在内政部外面纠察，谴责当局在扣留营所进行的政治迫害和镇压。

1974年1月14日

太平营扣留者展开支援华营扣留者绝食斗争两天之后，营方动用7辆暴动队卡车把所有男性扣留者调到华营。这批扣留者抵达华营时，遭到暴动队及营方官员殴打，致使许多人受重伤。为了掩盖暴行，营方当局清洗施暴场所，以免探狱者看出痕迹。

1974年1月18日

政治扣留者家属在国会外面举行另一场和平示威，50名被捕和扣留，其中20人是年逾62岁的老妈妈。不过，她们过后获得保释，等待4月上庭审讯。

当天，华营扣留者的绝食斗争已进入第26天，太平营扣留者则第6天。扣留者坚持绝食、斗争直至当局接受他们的条件为止。

按：反法西斯主义及捍卫政治扣留者的民权运动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支援。雪兰莪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全国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学生、知识份子、社会各阶层人士和政党纷纷站起来支持扣留者的正义斗争，谴责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对扣留者的暴行。抗议暴行电报和支持扣留者斗争的声明，函件纷纷寄发给内政部长。

以下是其中一部份内容：(参阅前面引述的5(1)(c)&(d)电报)

1974年1月20日

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声明谴责拉扎克政权有系统和有预谋地通过精神与肉体的虐待以及扣留营的恶劣生活环境以达到摧残政治扣留者的目的。社会主义俱乐部要求政府接受扣留者的全部条件并负起绝食斗争所引起的不良后果。此外，该俱乐部呼吁国内外(团体和人士)支持扣留者的斗争。

社会主义俱乐部高度赞扬“这些爱国者的牺牲精神是祖国优秀儿女的好榜样！”一位来自新加坡政治扣留者的代表也出席新闻发布会，他声明说，新加坡政治扣留者会在不同的时段开展绝食以支持华营和太平营扣留者。

1974年1月22日

一批讲师、律师、教师、专业人士、学生和其他民主人士提呈备忘录给内政部，谴责政府“不断地违反人权。”备忘录强调，“这两个扣留营所发生的事件不但是对马来亚人民，同时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极大耻辱，这个事件违反基本人权，也明显地违背了政府宣称要遵守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译者按：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于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48票赞成、零票反对、八票弃权，通过决议并公布。马来西亚是宣言的签字国之一。）

备忘录坚决要求政府“接受政治扣留者的要求”、“立即停止精神和肉体的虐待”以及尊重与执行基本人权。

这份备忘录正在首都和国内外各地流传，获得各族人民的支持。

1974年1月30—31日

谴责政府迫害政治扣留者，支持扣留者民主斗争的电报开始从国外拍发，其中包括来自新西兰的学生和人民。

1974年2月2日

今天，华营的绝食斗争进入第36天，许多扣留者的健康进入危急状况。在261名扣留者之中，绝大部分仍然坚持绝食斗争，其中15-20名极其衰弱。

拉扎克法西斯政府对敢于捍卫人权的扣留者的斗争精神和意义，进行全面的扑击。它除了对扣留者施行单独囚禁和不允许他们的家属和律师探望之外，同时也强加严刑峻法对付扣留者。他们只被允许一两分钟时间冲凉。如果他们超过时限，就会遭到狱官和联邦后备队不断地拳打脚踢。联邦后备队企图强迫绝食的扣留者进食，如果扣留者不听从命令，就会被踢和拉下床。狱方在不理三楼扣留者的危急健康状况，强迫他们到楼下提取饮用水和洗刷水。这些水通常都很肮脏，而且不足够；葡萄糖也不足够。

尽管体能虚弱，扣留者坚持绝食斗争。那些体能极其衰弱者则被送进医院。但是，由于他们坚持斗争，不在威吓和迫害下放弃绝食，因此进院后未能获得医院救治就马上被赶回扣留营。在营里，他们又遭到联邦后备队的另一轮的残暴殴打，过后再把他们遣回医院。据悉，有些狱官告诉扣留者，“如果他们（你们）要死，就死在医院，别死在监狱。”

但是，种种的法西斯措施都无法折杀扣留者的斗争精神。他们坚持绝食斗争，直至当局全盘接受他们的正义要求。

扣留者的英勇的斗争在国内外获得日益广泛的支持和关注。

让我们团结一致，谴责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

坚决支持政治扣留者的斗争！

要求废除内部治安法令和保护公共安全法令！

争取无条件释放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全部政治扣留者！

关心民主权利的马来亚人民

1974年2月2日

(2)a. 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学生会致
马来亚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函

纽西兰威灵顿
维多利亚大学学生会
邮箱号码：196
电话：70-319
1974年3月1日

致
马来亚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
达因与加曼尼律师楼
吉隆坡谐街75号
(转交)

亲爱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们发电报通知我们，绝食斗争已经结束了。

我们为自己能够支持你们的正义事业而感到高兴。随函附上我在不久前发表的声明。可是那些收到声明的报章却不予刊登。

我们会继续尽力让纽西兰公众认识马来亚的政治事件，同时也会继续向纽西兰政府施加压力。

专此问候

学生会主席
彼得威尔逊 (Peter Wilson) 签发

又及：随函附上两份有关马来亚政治迫害情况的文告。

彼得威尔逊

(2)b. 致纽西兰总理函

纽西兰威灵顿
维多利亚大学学生会
邮箱号码：196
电话：70-319

1974年2月7日

致

总理诺曼克尔克（Norman Kirk）
威灵顿国会大厅

亲爱的克尔克先生，

我希望阁下关注马来西亚政府政治扣留犯的处境。

我是维多利亚大学学生会主席。纽西兰政府支持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需要关怀马来西亚政治扣留者的处境。我相信你知道人权宣言第2及19条保护基本人权如言论自由和政治信仰自由；第2、第5及第9条保障人民免遭肆意逮捕、扣留、驱逐出境、残酷虐待与不人道对待。

从我们获得的资讯来看，在马来西亚太平、华都牙也、芙蓉及其他地方的政治监狱扣留了逾400名政治扣留者。他们应享有的上述基本人权已被剥夺，许多扣留者在未经法庭审讯

的情况下被扣留超逾10年。此外，马来西亚政府最近对太平与华都牙也为数约251名政治扣留者采取无情的政治迫害及虐待。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1973年12月29日所发生的事件。当天太平政治监狱扣留者黄水生，由于无法获得继续生存下去的基本医疗，而自杀身亡。

他的逝世导致太平与华都牙也的251名政治扣留者展开罢食行动以抗议迫使黄水生自杀的生活条件。他们因此遭受联邦后备队的殴打，造成约90名扣留者受伤，有些伤势严重。此外，扣留者平时所享有的家属探访、通信及阅读报刊资料的权利也同时被剥夺，其中一些遭到单独囚禁。

约50名政治扣留者家属在获悉黄水生逝世及营内发生事件之后前往太平与华都牙也扣留营探望亲人。当局拒绝。于是他们就在营外纠察，联邦后备队殴打他们。随后，他们在内政部办公楼外进行和平纠察。1月18日，他们在国会大厅前面举行和平示威，抗议导致黄水生自杀之营内条件以及政府残暴对付扣留者，约50名纠察者被警方逮捕，其中包括年迈的老妈妈，过后他们获得保释，4月才出庭受审。

时至今日，太平营及华都牙也营扣留者的罢食已经进入第39天。没有迹象显示政府准备尊重这些扣留者的基本人权。

基于上述各点以及您本身最近有同马来西亚首相敦阿都拉扎克接触，我呼请您尽您所能介入这群扣留者的事故。我相信情况的严重性需要您当面介入此事。

在此我随函提供一些证据让您参阅，这就是一封由政治扣留者家属致给联合国秘书长的函件。

你忠诚的

维多利亚大学学生会主席
彼得威尔逊

副本致：雷纳丹·韩特（Jonathan Hunt）国会议员
杰拉德·奥布连（Gerald O'Brian）国会议员

维多利亚大学威灵顿学生会
1974年2月7日

（译者按：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全文如下：“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个人所屬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或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5条公文：“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的待遇或刑罚。”

(2)c. 报界声明

维多利亚大学学生会主席彼得威尔逊今天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马来亚的执政联盟政府剥夺政治反对者的最基本民主权利。

威尔逊引述被敦阿都拉扎克政府横蛮囚禁的政治扣留者家属致给联合国秘书长库特·沃尔罕（Kurt Waldheim）的函件作出上述论断。

函件的一部份内容说，“我们的亲人已经在政治监狱渡过2年至10年，他们未被指控任何罪名，也从来没有机会在法庭上作出辩护。”

威尔逊也提及拉扎克政府吊销《真理》(Truth) 月刊版准证之事。

《真理》月刊是由两名马来亚知识份子所创办，基于其宗旨是反对英美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支配马来亚。当局基于《真理》月刊“威胁国家安全”及“公共治安”的理由而吊销其出版准证。

威尔逊指出，“在考虑马来亚政府对政治扣留者指责的可信度时，我们记得在不久前，马来亚驻纽西兰大使西哇先生（J.D. de Silva）竟然轻率到给留纽大马学生主办的文化音乐晚会套上帽子，指责它是“颠覆的”，“反马来亚宪法”的音乐晚会。

威尔逊说，马来亚扣留营情况的严重性应受到政府高度关注，也该受到总理克尔克先生的高度关注，因为他最近才访问该国。

威尔逊说，“截至目前为止，超过200名的太平营与华都牙也营的政治扣留者正在绝食中，迄今已逾40天。绝食乃因扣留者黄水生自杀身亡而引发。他在太平营患上重病而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这种情况迫他最终走上自杀道路。”

威尔逊先生总结道：“绝食扣留者以及扣留者家属委员会的要求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及第9条款所保障的人权是一致的。这些条款维护言论自由及政治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此外，宣言的第5及第6条也保护人民免遭肆意逮捕、扣留、驱逐出境及不人道对待的权利。目前，这些权利在马来亚遭到侵犯，如果纽西兰要兑现它支持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它就有责任去应用其影响力促使拉扎克政府停止侵犯人权。”

维多利亚大学学生会主席
彼得·威尔逊
(签名)

(3) AMPO杂志特别报导

——马来亚政治扣留者的血债！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不存在“扣留营”和“政治镇压”这回事。

不过，在同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党的赛·哈密交谈过后，我们才发觉，我们的上述印象正好反映了马来西亚政府新闻封锁的有效性：实际情况与我们的印象不同。

在新闻封锁的政策下，报章的出版准字需要每年检讨和更新。此举有效地迫使报章在处理重要课题报导方面不得不遵循政府的路线。

实际上，那些在内政部长眼中被认为是“治安危险”的人士被援引一系列的法令——无需经过法庭审讯的情况下有效地、无限期地加以囚禁。这些法令包括1960年内部安全法令以及随后制订的紧急状态与防止犯罪法令，煽动法令(1971)；反劳工法令如职工会法令(1967)，工业关系法令(1967)；还有大专法令(1971)，后者是为了阻止学生支持工人与农民的斗争而制订。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政府不但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镇压手段，而且更进一步箝制反对的声音。

那些被行政命令套上“罪犯”，而又没有权利上庭辩护以及没有指望获得释放的，到底是那些人呢？

他们就像哈密大(Hamid Tuah)在牢狱中渡过漫长岁月的人们。哈密大领导一场农民运动，率领贫农垦殖民。其他人士如新加坡反对党领袖林福寿医生和诗人新闻从业员赛扎哈里(Said Zahari)。他们两人于1963年反对英国人主催的合并而被无审讯地扣留迄今。此外还有其他人士如冯朝明。他是马六甲市议员，马来亚劳工党支部主席。他于第5年扣留期间在扣留营神秘逝世。当时他才31岁。

以上几个只不过是比较著名的马来西亚政治扣留者。

哈密向AMPO杂志介绍，由于上述法令没有规定扣留的期限，因此就无法确定扣留者人数。不过，根据保守的估计，马来西亚的政治扣留者人数大约有300名左右。扣留营内的情况则因传媒受到政府的严峻控制而使公众无从知晓。

哈密强调，马来西亚的多党制对遏制这种镇压过程，并不起多大的作用。就以他本身的政党来说，它的反对声音就受到多如牛毛的法令的箝制。相关法令禁止他的政党对所谓“敏感课题”发表政见：如经济制度、“马来特权”的真正受益者、苏丹的地位和语言课题等等。事实上，有不少政治扣留者来自人社党，其中包括一位已被扣留5年的州议员。他中选后马上被关进扣留营。

近年来，政治扣留者被集中关在砂劳越的两个扣留营，(毗邻的)太平甘文丁扣留营及华都牙特别扣留营。扣留营的政治迫害和生活条件，导致数宗死亡和神经错乱事件，也迫使

扣留者采取唯一的抗争手段：绝食斗争。扣留者发动一次绝食，就得面对更多的暴力对付，尤其是联邦后备队的殴打。

去年12月又有一名扣留者在营内逝世：他被迫自杀身亡。他的同志采取绝食行动向扣留当局抗议。这场绝食持续了47天——这是他们所展开的一次历时最长久的绝食斗争。他们几乎每天都面对狱卒和联邦后备队的殴打及其他暴行。

营内发生的事件传到扣留者家属及朋友耳中。但是，马来西亚缺乏民主权利，再加上新闻报导受箝制，因此扣留者绝食抗议的消息被有效地加以封锁。

AMPO杂志收到一份由扣留者在绝食斗争结束之后发表的声明——《暴力压不倒正义斗争》：马来西亚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及太平甘文丁扣留营政治扣留者针对“1973年12月29日绝食斗争”发表的文告。这份文件记录了扣留者在绝食期间所遭受的暴行。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同仇敌忾，把绝食斗争坚持到底的决心和意志。在此，我们摘录文件的部份内容，作为突破新闻封锁的一点努力，以让人们了解发生在这些男女扣留者身上的事情。(编者按：有关声明全文见第二章第6节，本文的摘录就略去，以免重复。)

AMPO杂志1974年3月13日发表



彭展发



韩佑平



叶新田



吴维湘



曾天生



陈炳权



林裕



李耀华



黄天祥



林子亮



陈松生



李万千

第六章：悲愤的回忆

(一) 47天大罢食始末

(12·29事件追忆)

彭展发

作者简介：



彭展发同志两度被捕，第一度由1968年扣留至1970年，第二度由1973年扣留至1979年，两度前后共关了8年。当时，他是劳工党柔佛州昔加末区秘书及武吉仕林支部秘书。长期的扣留和身心的迫害，使他的健康受损，但立场仍然坚定。他以一己之力，在2000年已经完成这篇追忆文章（2006年修改），成为编写12·29这段大罢食历史的动力，功不可没。彭同志现年66岁，已退休。

1973年12月29日下午，华都牙也政治扣留营的情况和往常一样，一切活动在进行著，战友们打球的打球，跑步的跑

步，做炊事的做炊事……。大约3点多时分，有家属探营过后，突然传来太平政治扣留营扣留者黄水生不幸逝世的消息，战友们听后无不为之震惊不已，急忙分头奔走相告，不一会全营三座的扣留者都知道了。

此事非同小可，它是所有扣留者头等关心的大事，三座扣留者代表共6人约定一齐向营方了解情况，并准备好向营方呈抗议信，抗议当局残酷迫害政治扣留者！

我们的代表出去第二道铁门口，要求一起进去会见营长奥玛，以了解事件的详情，好向全营扣留者交代。可是营方却诸多借口和刁难，说什么当天是星期六下午，狱卒不够，为了他们的安全，只能接见两个代表，不能接见全部。真是存心挑衅。要知道我们是被重重的锁在扣留营内，代表们又手无寸铁，怎能威胁他们的安全呢？

我们营里的战友在著急地等呀等，等到将近5点多6点，已经是开饭的时间了，却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的代表还没有回来。一些战友为了要了解情况，便敲门要出去探查一下，可是当时守门的狱卒不肯开门，说什么这是上头的命令。经过再三的敲门，还是不得要领，已经是傍晚的时分了，有战友在营内三楼窗口望见营外正门不远之处，不知何时来了两辆红车，‘残暴队’（即联邦后备队）正在那儿排队部署。

因此，我们急于要把上述消息通知代表们，以便更谨慎和提高警惕，可是狱卒还是顽固的不肯开门。这时，战友们逼不得已，便开始高喊口号，大唱歌曲，大夥合力把营内第二道锌板铁门推倒，出去同我们的代表汇合。战友们向营方表示：不要再无理拖延了。当时副营长罗金福（花名小锣鼓）见

状，答应再过一会要接见代表，说完他便溜出大门去了。

出去不久，他就招来数十名‘残暴队员’和狱卒，急速鱼贯而入。这时，我听到我们的一位代表说：“大家保持镇定，看他们怎样来，一般上会给我们时间退回或发出警告。”可是说时迟，那时快，那些‘残暴队员’凶神恶煞，毫无人性，疯狂地喊叫，根本就没有提出任何警告，狱卒即刻动手要打开第一道门锁。几位战友冲前用手阻止狱卒启开门锁，他们马上向战友的脸上喷射毒瓦斯，并用警棍敲打战友的手，实在没法阻挡，铁门很快被他们打开了。

这里先叙述一下，当我看到他们妄图横蛮地要打开第一道铁门的时候，顿时使我预感到情况的确不妙，就不敢久留在那儿，快快先走一步，要不然被那些毒蛇猛兽追上来，很可能被他们乱棍打死！

因为我的脚走路不方便，心脏和肺部又施过手术。在麻营反手铐斗争时，我是经历过这种遭遇，被他们打得遍体伤痕，险些送命！这血的教训给我警惕和预感，因此，这次避开了可能被乱棍打死的厄运！

我才走到A座篮球场，后面的战友已经被追打和殴打了。‘残暴队’逢人就打，更施放催泪瓦斯，他们的喊叫声，皮鞋的脚步声，杂乱一片。我刚踏进A座的门口，后面的战友们陆续跑回来了，走比较慢或中途被他们拦住的战友，都被打得伤痕累累，甚至血流涔涔！

大家等到战友们全部都进来了，便快手快脚把A座的大铁门关起来，用大桌子和数张长凳顶住，以阻止‘残暴队’和狱

卒冲进来殴打战友，一时气氛非常紧张。

他们数十人都冲上来了，在门外重重包围，大叫大喊，并用警棍敲打铁门，这时副营长罗金福用手提扩音器下命令，限我们在5分钟内开门，否则‘残暴队’要发射催泪弹进座内，然后破门而入。

就在危急的关头，战友们突然高声喊道：“有人死了，有人死了！”原来，大家都撤回座内后，正紧急为伤者包扎和止血时，李万千战友突然不支晕倒，腹部大量流血不止，在这种情况下，战友们才高声大喊起来。

他们听到“有人死了”之后，就马上退到A座角头去商议一阵，一会儿又倒回正门继续恐吓。我们的代表走向前去交涉，要他们答应紧急把重伤的战友送去医院抢救；保证不再继续殴打，我们就开门。他们不得已勉强答应了，而我们为了抢救战友，便移开障碍物，没有同他们继续对抗下去。

受伤的战友共十多位，以李万千战友的伤势最为严重，他们被抬出去后，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一个一个的被‘镇暴队’和狱卒赶进牢房锁起来，有些在牢房内还个别被他们虐待！

这就是12·29大罢食斗争的起因。

被关进小房后，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浮现被残酷镇压的混乱场面和战友们受伤的一幕幕情景。一整晚几乎失眠了。再长的夜也有尽头，第二天早上，狱卒照例有开几位做炊事的战友的房门，要他们准备早餐的食物和茶水等，可是时间到了8点多，营方还是不开门，并叫做炊事的战友把

食物扛进座内，一间间分发给房内的战友。他们拒绝照办，营方就把他们关回房内。

平日上午8时，狱官和狱卒便来开大门，并点算人数。而今天他们却不开门点算，一切似死般的寂静。我在想：不知营方在要什么诡计了。到了9点多的时候，数名狱卒扛来面包和茶水，把两片面包和一杯茶水放在一个盘子里，每间房去派送，然后快手快脚的把房门上锁，如此这般直到派完为止。开门和关门声，再加上残暴队和狱卒的叫喊声此起彼落，把整座牢房闹得轰隆价响，扰人安宁！

在毫无准备和完全不能互通消息的情况下，战友们自觉的都没有进食，以抗议他们的暴行。罢食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约上午10时，罗金福手提扩音器，来到大门口向我们宣布：指我们触犯所谓“营规”，“处罚”我们三个月不准家属探访，不准寄信回家，剥夺报纸和书刊的供应。总之，是取消了我们的一切权利。

大家都知道，这些权利是扣留者在经过几场罢食斗争，如5·26、3·25和8·13等（编按：各场斗争详情请参阅本书第七章），付出艰巨的代价争取得来的，万万不能一下子被无理取消，就是拼了老命，也要同他们斗争到底，捍卫我们的成果！

我们被分成五人一组，一天给我们放风两次，即上、下午各一次，每次约十分钟，实在太短了，那里够用呢？试想，这十分钟我们要倒马桶、冲凉和洗衣服呢！往往我们身上擦了肥皂，还没来得及冲洗干净，站在冲凉房内监视我们的数名

‘残暴队’员，才一下子就说时间到了，鬼叫似的大声呼喝，并挥舞警棍威胁，也禁止我们交谈。当我们晾好了衣服，马上被赶回牢房上锁好，再轮到下一组……。

接下来的日子，一天三餐都是狱卒和‘残暴队’员分茶送饭。他们把饭放在房门口，便开门要我们出去把它拿进房间，以引诱我们进食。等到下一餐他们送饭把盘收回去时，狱卒都有检查盘中的食物，看看有没有被进食过的痕迹，每餐他们都有做记录的。如果他们发现有进食了，很快便会把你调走，当作已经放弃罢食。我心中在想“既然我们开展罢食，干嘛还要出去拿饭进来房间？有一次，他们喊我去拿，我仍旧躺在躺椅上，丝毫不为所动。一个残暴队员气冲冲的进房来，一只手抓住我的衣领，另一只手挥举警棍，作状想要打我~ 我就大声喊道：你要打人是吗？很可能他定眼一看，发现我瘦骨如柴，才不敢打下来，而悻悻然地走出去了。

我住的房间是靠近大门口的第二间。三间靠近大门口的牢房，它的门洞比其他房间大，有铁支隔著，相信早期是关病重的扣留者，门洞方便狱卒观察。对我来说，它的好处是：从洞口吹进来的凉风，会徐徐地飘送新鲜的氧气进来，我觉得呼吸较为顺畅。而其坏处呢，就是在这个非常时期，却是首当其冲，残暴队一来送饭，你不去拿，他们就先骂和威胁要打，一连几次都是碰到这种情形。到了第三天晚上8时过后，狱卒外面大门上锁了，我从洞口望去发现外面没有狱卒站岗，在座内的狱卒的脚步声消失在后面深处，这时我就向大夥儿喊道“既然大家都罢食，不要拿饭，行动才一致”，后面的狱卒听到声音，马上到来阻止。因为全部牢房深锁，

我不知道到底有几个人听到我的喊声！

罢食刚开始的几天，会觉得肚子饥饿极了，其苦非常难耐，非笔墨所能形容。到了四、五天以上，口喉干燥，渐渐嘴唇破裂脱皮。我相信这是缺水和缺营养的生理自然反应所致。嘴唇皮脱了又脱，直到薄得能见到毛细血管，红红的几乎要出血了，大概脱到没有皮可以再脱为止。这实在是增添另一种的难受！

这些天来，罗金福可忙呢，他在办公室指挥狱卒，一个一个地带来开扣留者的牢房，像伪政治部一样调人去问话，游说你放弃罢吃。

他所传达的意思不外是：

(一) 向你解释当天下午营方人手不足，你们的代表全部要进来，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二) 太平营的问题已经“解决”，他们都没有事情了，你们这么“傻”，还要罢食；

(三) 你们之中有几位已经“放弃”罢食，被调去C座，他们的“权利”已得到恢复。

最后问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就说：开小房，恢复我们的权利，我们便停止罢食。

听后，他冷漠地点点头，并打眼色示意狱卒带我回房。

他妄图逐一击破，以瓦解这场斗争。在这期间，他们只能引诱三、四位立场较动摇的战友放弃罢食，绝大多数战友都不为所动，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罢食进入十天以上，营方发现一些体质较弱的扣留者，脸青唇白，走路踉踉跄跄的，几乎要晕倒了。不得已便安排医务人员进来扣留营检查，结果验出十多位扣留者血压过低，心脏衰弱等问题，一定要送去医院吊水和打针吃药。医护人员从医学的观点出发，只是苦劝我们恢复进食，便没有事了。我们的回答是：当局如此逼害我们，我们唯有坚决罢食反抗到底，直到恢复我们的一切权利为止。

我们在医院只住一个晚上吧了，第二天早上，躺在床上的我们，所吊的一支水还没滴完呢！镇暴队就到来迫害我们，要用手铐把我们一个个锁在床上，要给我们难受和走动不得，我们全部拒绝被扣上手铐，集体作出抗议。院方没有权力，也没办法，只好让我们“割牌”出院。营方没用车子载我们回营，大概是处罚我们吧？要我们十几个人集体走路回营。从医院到扣留营门口这段路，其实不会很远，可是我们这些身体瘦弱，头重脚轻，举步艰难，随时都会晕倒的战友，足足走了二十多分钟，实在是慢得像蜗牛一般。很多附近的群众，驻足观看，见证了这一幕虐待政治扣留者的场面。而押送我们的狱卒和残暴队员，则互相窃窃私语和冷嘲热讽，把我们讥为“饥饿队伍”。总之，我们一路上的确是出奇的慢步移动，个个脸上严肃不语，但怒火却在胸中燃烧！

罢食进入第十六天，即 1974 年 1 月 13 日，这对太平营扣留者来说，的确是所谓“不祥的 13 号”。上午十一时左右，外

面传来很吵杂的声音，我从门洞望出去，看见狱卒启开 A 座与 C 座围墙铁丝篱笆的小门，令我意识到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多久便出现大批的狱卒和残暴队，真是五步一（红头）兵，十步一（狱）卒，在严阵以待。接下来便是两个残暴队一前一后押著一个扣留者，“护送”入 A 座来，他们的距离约 15 英尺远，一个接一个进来。起初一、两车多数是年老体弱的扣留者，偶尔听到一些呼呼喝喝之声，较少打和踢的声音，可是接下去的一车比一车被打、踢得越来越厉害。最后两车被打、踢得最严重，他们一路上被追打，由于他们背著和手里拿著大包小包的物件，然而这些物件也不能幸免，被打得散落地上。他们停下脚步俯身去拾，警棍就劈打下来，或者飞脚踢你的胸部腹部。在上楼梯或墙边转弯转角的地方，你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走过，预先埋伏在那儿的残暴队员，冷不防的踢出飞毛脚，不幸被踢中要害，肯定暗伤上

我的牢房门口，就有眼镜的碎片和残架弃置在那儿，过后我才查出是王逊杰战友的眼镜被击落，他的鼻梁也受了伤。

这些都是我从门洞望到和亲耳听到的情形，其实当时的残酷情形何止这些，这仅是冰山一角吧了！

当天下午，轮到太营扣留者冲凉时，我还听到来自楼上或楼下牢房传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歌声，在激励士气！

他们冲凉也是被分为 4、5 人一组，有些又被残暴队和狱卒殴打。我在房内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在使用暗号，太营狱卒

若大喊 cepat 时，残暴队便追打得更厉害。还有更卑鄙的一招，那就是：镇暴队逼冲凉的扣留者在A座门口角头的地方脱光衣服，走去冲凉房。后来听说他们发现楼上的女狱卒从窗口可以望得见，所以在第二天才取消这一无耻做法！

A座的厨房很靠近我的房间，因此，可以听到很多声音从窗口传进来。第二天营方把厨房收拾一个角落，摆设几张桌椅，作为临时诊疗室。因为数十名受伤的太营扣留者，营方不敢集体带去医院检查，以免暴露其野蛮罪行。上午十时许，来了两位医生（包括院长）和一些护士，为扣留者们验伤和治疗。扣留者一个接一个被带去检查身体，这些医护人员忙了整个上午和下午，所听到的投诉和亲眼见到扣留者被打的伤痕累累，他们大多数会摇头感叹和寄予同情的眼神。我想：假如不是冷血的一类，内心都会谴责这毫无人性的暴行！

罢食迈入第22天，就是74年1月19日上午十时左右，A座篮球场上停放了一辆新闻部的广播车。不久之后，伪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王其辉向我们广播，宣读他早已准备好的一封“招降”信，妄图弱化和瓦解我们的斗争，并在当晚半夜，静悄悄把信件塞进我们的房里来。在这些日子里，伪政治部和营方交替使用反动的两手策略，都无法动摇我们的斗志。他们黔驴技穷，又要出这一劣招。它根本是枉费心机，毫无作用的。

大年除夕到了，整个上午没有什么动静，直到中午，他们派饭的时间都过了好久，但还是没有派饭。我心里在想：莫非他们发“慈悲”心了，要解决问题，好让我们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概接近两点时，我听到三巡向狱卒说道：上头这么迟都没有消息来，也没有新的指示，把饭发了吧。狱卒听后，便把饭派发。这时，我意识到：春节这个我们传统的欢乐节日，他们都不想解决问题，好让我们的家属和关心我们的群众免得担忧我们的安危；同时这也可以给营方当局挽回“面子”撤退，是一个很好的下台阶；还有，更何况我们的罢食已经过了这么多天，死人的事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这些因素都没有起任何作用，当局还是一意孤行，实在毫无人性，残忍之至！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是一场艰辛的持久战。

罢食进入40多天，几乎每天都有战友被送去医院急救，使到医院爆满，要多开两座病楼来容纳。医护人员也疲于应付，忙得不可开交。

这种情况持续著，当局还是冥顽不灵，无动于衷。最后，战友们决定把战斗升级，有些开始绝饮了，拿老命同他们拼搏！由于罢食已经进行了这么长久，每个人的身体已经弱透了，再加上绝饮，一个个更快速地晕倒。医生眼见情形不妙，也发出最后严重警告：若再拖延下去，死人的事随时都会发生。因此，这才迫使当局不得不屈服，而被我们所压倒！

罢食到了最后最艰苦的阶段，真是天亮前的黑暗，如果没有树立奋斗到底的决心，是很难坚持的。这时每个战友都热切的盼望著斗争胜利的一刻。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74年2月12日早上，一些狱卒跟著我们的代表来到A座大门口，代表们隔著牢门大声的向我们宣布：营方答应恢复我们的一切权利。我们的斗争胜利了！

这时，狱卒便开始打开所有的牢房，我们每个人都摇摇晃晃地走出房来，无不激动得不能自己，有些更热泪盈眶，相互紧紧地握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彷如隔世重逢！

当天早上，代表们也获准使用营方的电话，通知太平营战友，把喜讯传达给她们。因为我们的斗争是一致的，我们的胜利成果是共同赢得的！

开门后，整个上午是由年纪比较轻，体格比较壮的战友，大多数是来自太营的战友，他们罢食比较少天，因此精力受损程度较低，由他们带头当炊事员，料理厨房事务，准备饮料供大夥儿充饥。久未尝到奶茶、咖啡和美禄的香味，现在可以恢复饮食了，喝在口中感觉实在其香无比，真是世上的美极饮品，在平时根本体会不到。

享用了这杯美极饮品之后，我慢慢地走到食堂边的篮球场，找个地方坐下，晒晒这久违的太阳，使那肌黄骨瘦的躯体吸收一些日光精华来充充电，周身觉得十分舒畅。微风吹来，它比斗室的空气新鲜多了，再深深地吸它几口，精神为之大振！

大夥儿正在谈心之时，突然发现两位战友的行为举止不大对劲。大家很快便意识到：在长期的罢食中，个别被关在小房内，精神日夜受到干扰，现在突然改变了情况，一下子适应不来，而产生这种特殊反应。营方很快把他们载去检查和治

疗，一位还进了精神病院治疗数月之久，直到获得释放，病情还是反反覆覆，没有痊愈过来！

由于长期没有进食，肠胃已经冬眠收缩了，才恢复进食，千万不可吃饭或其他比较硬的食物。这些食物如吃了下去，肯定消化不了，排泄不出，在肚子里面胀死有份，非常危险。

因此，我们在开始进食的最初一、两个星期内，都是喝些稀麦片或稀粥，慢慢使消化系统恢复正常，十多天以上才开始吃饭，但是有些人还是碰到排泄困难，特别是患有痔疮者。做炊事的战友关注到这点，特地向院方要来一大瓶“润肠油”，置于食堂桌面上，供有需要的战友自由取用。

在政治扣留者的观点来说，本来大罢食是不会轻率和随意就展开的。然而，面对当局残酷和野蛮迫害时，在毫无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不得已只有以生命同他们搏斗，这也是唯一和最后的武器。

罢食，其实是相当消极的行为，因为一展开后，便即刻由主动变为被动。当局可以任意长期拖延，间接来折磨和摧残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命。罢食期间，他们不断进行捣乱和破坏，软硬兼施，妄图挫折瓦解这场斗争。庆幸战友们都很团结，都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就好像在一条船上，任凭风浪险，大夥只有生死与共。

家属们为了挽救自己的亲人，在外头展开请愿和抗议斗争，突破白色恐怖，不怕军警镇压，把罢食的消息传开去。

人民党、民主行动党和其他民间团体都有直接间接支持和声援我们的斗争。一些外国报章、电台也有报道这个事件。由

于突破新闻封锁，形成一股舆论压力，为我们赢得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相反的，如果这场斗争被他们镇压下去，我们的权利将进一步被剥夺干净，我们将长期被关小房，我们的头也将抬不起来！

总之，罢食斗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虽然，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可是，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是无法衡量的，是补偿不了的。

可不是吗，请看：

- * 罢食结束的第二天，每个战友都“过磅”称一称自己的体重，由炊事战友作记录。结果显示令人吃惊，每个人体重大幅度减轻，从十几磅到二十几磅不等。体质是需相当长的日子才能恢复，但体质和元气的损伤却永远难于恢复。
- * 许多战友都经历过伪政治部的长期折磨和摧残，已经是体弱多病了，进到营内长期监禁，得不到有效的医药照顾，再加上这艰苦的47天大罢食斗争，弱体进一步被破坏。因此，有好几位战友被释放后不久便病逝了，实在可惜！他们是：槟城的陈福兴、温瑞展；吡叻州的郑亚苟；彭亨州的李林；雪兰莪州的郭祖锋；马六甲的林金泉；柔佛州的梁广西、周纪泉（周野山），张发起等。
- * 柔佛州战友吴维湘，由于遭受长期的监禁，又参与数次罢食斗争，再加上这次大罢食，而患心脏病。不久前，他们曾经分别老病发作，所幸抢救及时，才捡回性命。

吕进益战友在罢食期间，精神受到干扰而患病，至今病情还是反反覆覆，复元无日。还有韩佑平战友，本是身强体壮，但经历被严重殴打和这长期罢食，20多年来每天要与药物为伍，才能继续维持生命。

- * 凡是参与这场大斗争的战友们，身体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后遗疾病，永远挥之不去！

结语

47天艰苦罢食，是一场反逼害、捍卫扣留者尊严和人权的伟大斗争，它在我国扣留营历史上应该是空前的，而且也可能是绝后的了！？

是什么力量，在激励著政治扣留者，面对反动的统治集团，在重重封锁的黑牢里，掀起这震撼人心的长期绝食斗争呢？不是别的，就是：“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它代表这一光辉历史时期的最强音！用这战无不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所畏惧的、是压不倒的！

完稿于2000年1月1日

(二) 47天绝食斗争片断回忆

韩佑平



作者简介：

韩佑平同志在1971年被捕，当时他是一位巴士售票员。他在1979年获有条件释放，但健康已受到严重摧残，从此与病痛和药物结了不解缘。韩同志现年58岁，虽然健康欠佳，在主持事务所工作之外，还积极参与柔州人民之友及拉美士人民公正党的活动。

自从一九七一年被无理扣留在华都牙也政治扣留营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罢食事件的日子里，我从未体会过绝食斗争的滋味和考验。在临死边缘作最后的冲刺，确实是对自己的意志力和斗争信念的一项重要考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绝食前夕是反动派把麻坡扣留营、华都牙也扣留营的政治扣留者调去已经建竣的太平甘文丁政治集中营。当时，华都牙也扣留营C座的女战友全部已被调去太平甘文丁集中营，A座和B座也调走部分战友，因此A座剩60人，B座只剩20人。与此同时，我们十二位战友，即李万千、罗明亮、李群熙、高淑平、黄贵峯、吴桂

生、叶美辉、雷钜添、罗木生、万家安、黄斗垣和我则分别从A、B座被调到C座。

我们在十二月廿九日下午五时左右，得知太平扣留营黄水生战友在恶劣环境下，遭到不人道的迫害而了结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接获悉耗后，全体战友极为愤慨，不满情绪非常高涨激动。三座战友立即各座委派二位代表，以便向扣留营营长OMAR交涉和了解事情的真相。

当三座六位代表在两道铁栅门外，也就是在扣留营办公室后面空地等待OMAR接见。但狡猾的营方一直在耍手段、拖延时间并部署进行野蛮的镇压。这个时候，营内战友眼见代表们不被营方当局接见，变相的被罚站。两三个小时溜过去了，反动营方一点动静也没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友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怒火在燃烧著。忽然间，我听到忿怒和激昂的口号从A座不断传来：「我们要见营长！」，「我们要了解真相！」，「强烈抗议不人道的迫害！」……。

由于情况越来越紧张，狱卒匆忙的走动著，墙外频频的听到车辆声。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在七点左右爬上屋顶边缘眺望围墙外的情况。我发现大批军警、便衣人员、残暴队车辆在营外空地上集中，这种不寻常的情况让我立刻联想到：「反动派正准备向我们发动大镇压！」我立即转告其他战友，告诉大家作好一切思想准备，随时面对一场即将来临的野蛮镇压！

天色逐渐昏暗下来，阵阵阴风迎面吹来。忽然间听到尖锐喊叫声，敲打铁门声劈劈啪啪响个不停，战友们的石敏土上奔跑发出混乱的脚步声。与此同时，又听到战友们的追打的忿

怒抗议声，反动军警发出狂叫声，此刻也听到有战友在高喊「化悲愤为力量，坚持斗争！」。反动派疯狂残暴地把A、B座战友和代表一个个押进个别小牢房（8' X 4' X 10'）单独监禁。

A、B座战友被关进小牢房后，大批残暴队队员、狱官、狱卒、便衣特务疯狂的喊叫地向我们C座进攻。事先我们早已把障碍物推到宿舍的入口不让反动派顺利进到宿舍。然而他们面对阻挡，不得而入却疯狂的叫嚣。最后，门被踢开了，他们老羞成怒如疯狂的野兽向手无寸铁的战友扑来。然而，面对如此疯狂、野蛮的血腥镇压，战友们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愤怒、更加坚强，互相支援，互相激励地把斗争坚持下去。

我被令只拿被单和铁罐搬离宿舍。当我离开宿舍门口两三码外，我看到小锣鼓在对面指挥并大声喊叫。忽然我觉得很多木棍齐落在我的背部，一阵阵刺痛，越来越剧痛。我一边走，就一边被打。除了用警棍，狱卒还使用拳头袭击我的胸部和腹部。刚好当时有些光线，我认出打我的其中两名狱卒，他们的花名叫「苏哈多」和「黄脚鸡」。这两位狱卒，一路来在营内作威作福，这次对我的攻击都是事前有策划、有预谋的，而且出手都对准我身体的要害部位。

当两位残暴队队员紧跟我背后，不停地挥打我的背部，一直到C座与外走廊相隔铁门时，忽然一位狱卒向我腹部来个「飞毛腿」，我被踢到四脚朝天，手上拿著的铁罐一脱手击中一位狱卒。这时，无数的脚和无数的警棍向我身上的每一个部位袭击、践踏和猛踢。当我要爬起来时，又一棍一棍打在

我手臂上，我的热血在沸腾，怒火在炽烈地燃烧，觉得整个身体热烫烫的。经过无数次的挣扎，我才成功从地上爬起来，在不断袭击与殴打下，我拿著被单，沿著高墙走向B座进口处。

当我到达B座篮球场时，就有人下口令停止殴打。当我被押到二楼小牢房后，我觉得整个身体热辣辣的，双臂也肿到无法自然举起，全身都激烈的疼痛。不知何时，战友传来一瓶云南白药，我立即往口中倒。没有水，没有杯，只好用双手盛自己的小便喝下去。过了不久，随著一股闷气从胸中向嘴里涌出，我吐血了！鲜血染红了我的上衣。把上衣除下，又发现背部也流了许多血！这件血衣，这就是反动派血腥镇压的血证！但反动派作贼心虚，在查房时无理地没收这件血衣，消灭证据，企图洗脱血腥镇压的罪名。

在残暴血腥镇压过后，令人痛心、可恨的消息陆续传来，我们营内代表李万千战友被殴打而跌倒重伤，需马上送院否则就有生命危险。后来又传来黄斗垣、GUNA、林春华、罗木生、叶美辉、万家安、吴桂生等战友重伤，战友们不仅在小牢房外被残暴队队员与狱卒毒打，他们也闯进小牢房继续殴打个别战友，此情此景，反动派及其爪牙是有计划、有预谋地向手无寸铁的政治扣留者干下暴行。为了维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和尊严，我们只有采取唯一武器——绝食行动，来向国内外发出正义斗争的呼声，暴露反动派血腥迫害和严重侵犯了我国民主人权的法西斯行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九日晚上我们决定展开绝食斗争行动。第二天反动派及其营方当局向我们发出处罚通知，从十二月

卅日起我们被禁止会见家属和法律顾问，不可与外界通讯，不准阅报，必须二十四小时单独监禁等等。

反动派及其扣留营当局一手挑起有关事件，并强蛮无理地向我们所有战友进行血腥镇压和毒打，他们不仅不向我们道歉，反而处罚我们。因此，更激起全体扣留者的强烈愤慨，斗争的怒火燃烧得更加炽烈，更加紧密的团结，并誓言把绝食斗争坚持到底。

绝食从第一天开始，营内就充满白色恐怖气氛。大批残暴队员，狱官，狱卒，便衣人员驻守在营的里里外外。他们五步一岗，野兽般地盯著我们，凶神恶煞，四处张望，企图在心理上威胁我们，打击我们的斗志。当战友们三三两两出来冲凉时，又遭到这群野兽的拳打脚踢和百般凌辱。

在绝食进入了一星期，我们已习惯了，不觉得饿。但他们开始把食物弄得香喷喷，企图引诱战友们的食欲。记得有一次，残暴队队员与狱卒「黄脚鸡」故意把没盖的饭碗放在门口叫我拿。我把马桶盖盖在那碗饭上推到角落，却突然挨了一棍和一拳。他们就是这样，故意制造事端并借机殴打扣留者。

记得绝食进入两星期多，太平营战友由于支援我们而开始绝食斗争。过后反动派就把一整批男战友调来华营，当他们抵达被押进A座时，我清楚听见他们被野蛮的毒打声，反动军警和狱卒的狂叫声，和战友们不满的怒吼和喊叫声。我们立刻发出抗议呼叫，当然换来的又是一顿毒打。

从此，太营与华营的战友就在同一围墙内，心连心，肩并肩地坚持绝食斗争。当太营战友被单独监禁起来后，三三两两被押去冲凉，在途中被凌辱和受到拳打脚踢，也有不少太营战友被打到重伤和送院接受治疗。

绝食一天天的过去，战友们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但斗志与精神非常坚强。但反动派不甘心，还在精神上折磨，时不时用力敲打走廊的栏杆、铁门、桌椅和启开牢门大力地关上。他们大声在狂叫，企图摧毁我们的绝食斗争行动。战友们每日靠三次、一次一汤匙的葡萄糖水活命。

不知绝食到多少天，我已不能再服用葡萄糖水了。一喝葡萄糖水，就马上要拉肚子，而且是黄色水带小片的血块排出来。就这样持续了几天，也不知何时晕倒被送进医院。当我醒来时，我已在医院的病床，模模糊糊见到一位印度医生和狱官等人和发现两手被针管扎著一条红一条白的胶管，但不能言语。

一个早上，一位印度医生（后来才知道他是院长）和两位护士到我床边检查血压，同时没有笑容地说「拿生命来开玩笑！」，「你再不吃东西就会死人的，你知道不知道！」后来我有力无力的告诉他，“绝食是我们最后的武器，坚持下去是我们的斗争原则！”

但他听了还是骂我“Stupid Fellow”，最少有二、三声。当他走到后面就对护士说：这些也是笨蛋！我随声音望过去是吴少平战友与其他战友。我问他们为什么我要输血和输水？我告诉医生，我是被打到重伤的，请他写在病卡上，没想到他反而骂我们该死，过后我心里非常不满，而且还担心他们

会下毒手呢！

营内战友在绝食进入整四十天后，毅然放弃服食葡萄糖以死的决心向反动派施压。这种斗争形式一展开后一两天，无数战友被送进医院同一间病房，变成让扣留者专用的病房，每一位战友一进入病房就立即要输生理药水，没有多久，传来病床不够，一会儿又说生理药水不够，工作人员不够以及缺少其他东西等等。

我听到医生与护士们开始向营方发牢骚了，非常不满营方的处理方法，见到狱官狱卒跑来跑去，OMAR也出现在医院，紧张急了，据一位院方工作人员透露，院长有向营方提呈报告，如果不赶快解决扣留者的问题就会死人的，由于床位不足，一些战友输了药水后，又送回营。一天一天地过去，在院的战友也陆续回去扣留营了。我要求回扣留营，但是院方不准让我回营。

我还在医院留医时。七四年二月十三日终于传来四十七天绝食斗争胜利结束的消息！这时我非常兴奋，好像病也好了一半，当我要坐上来时，股骨一阵剧痛，简直不能坐呀！我向护士借来一面镜子看一看自己四十七天后的相貌，看到自己皮包骨的样子，就好像看到非洲的难民一样！

这一场四十七天绝食斗争的胜利得来不易呀！战友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每位都用自己的生命跟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都是从死亡边缘走回来的人呢！

绝食斗争胜利结束了，我非常遗憾不能与战友们在营内见证与感受一下胜利的心情。我在医院继续留医，内心却有著不

同的感受。在斗争胜利后，院方工作人员、护士、医生包括院长的态度完全改变，一早主动说声「早安！」而不是乱骂笨蛋，而且有谈有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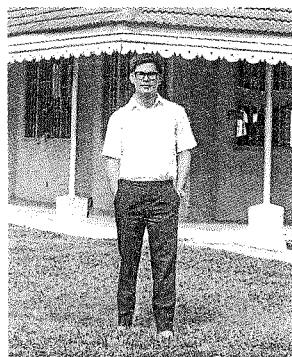
我还记得，有一天院长坐在床边跟我说：「对不起，起初在我的印象中你们是捣乱份子，现在才了解到你们完全是为了权利和福利而展开绝食，你们的意志非常坚强。在我的医学经验里，一个人如果三十五天左右不吃东西必定造成内脏损坏而死亡，可是你们还能够活著，精神还这么好，完全是你们有坚强求生的意志，这次事件给我增加了一些认识……。」

在我回营时，院长给我开了二个月的特别伙食要营方提供，好像每天二粒蛋、二粒橙、黄麦包一粒等等。

这里要补充的是，这次47天的绝食斗争造成不少战友患上顽症，有两位战友李林战友和钟亚苟战友在出营后不久相继离开人间。而我到目前，还继续在服著医生配给的药呢！

(三) 意志力与体力的重大挑战

叶新田



作者简介：

叶新田同志于1970年被捕，到1975年才获有条件释放。当时，他是甲洞五区木屋居民反迫迁联合委员会秘书。叶同志长期参与维护华文教育的工作，目前他是马来西亚董事联合会(简称董总)现任主席，今年67岁。

1966年甲洞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木屋居民反迫迁运动。我因参与其中，而于1970年被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扣留于华都牙也政治扣留营，直至1975年才获有条件释放。在扣留期间，与营内扣留者一道，参与各项集体活动，其中包括发生在1973年12月29日开始，为期47天的罢食斗争。这是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重大事件。

事缘在太平政治扣留营的一名扣留者黄水生，在政治部单独监禁期间，受到肉体及精神上的虐待。当他被送到扣留营后，因营内没有适当的医疗照顾，病情加剧，导致他不堪疾痛折磨，而自缢身亡。

当华营扣留者得知这项不幸消息后，深感悲痛。于是便派出代表，要求会见营长，以了解黄氏的真正死因。与此同时，扣留者要求营方准许他们发出电报及寄帛金给死者家属，以表哀悼。扣留者这项合情合理的要求却不获处理，双方相持不下，形势紧张。就在12月29日当晚，营方调动大批联邦后备队进营，并向扣留者施放催泪弹，驱散在营内聚集的扣留者。在这过程中，联邦后备队员见人就打，许多扣留者被打到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在镇压过后，全体扣留者被个别关进小牢房内。随后，联邦后备队员与狱卒还继续对个别扣留者施暴及进行人格污辱。营房内笼罩著恐怖气氛，不时传来有人被殴打的呼叫声与狱卒的呼喊声，那种阴森感觉与恐怖状况，犹如人间地狱。

全体扣留者为了抗议有关当局的暴力镇压及争取恢复扣留者在营内的基本人身安全与行动自由，被迫开展集体罢食行动。在罢食期间，营方不断地通过软硬兼施手法，试图迫使扣留者放弃罢食行动。但在扣留者团结一致，配合营外的支援，罢食斗争一直坚持下去，直到第47天才通过谈判结束罢食行动。这可说是扣留营最持久的一次集体罢食抗议行动。

这场为期47天的罢食斗争，对每位扣留者来说都是一场意志力、体力以及个人耐力的重大挑战，尤其当罢食行动持续到后期，大家身体都非常虚弱与乏力，甚至有些扣留者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真可说是令当时的扣留者与家属们，感到心惊胆跳的不平凡经历。

在集体团队精神的鼓舞下，我身心虽经受饥饿的磨难，还能坚持下去，直至问题获得解决。参与这次的罢食行动，对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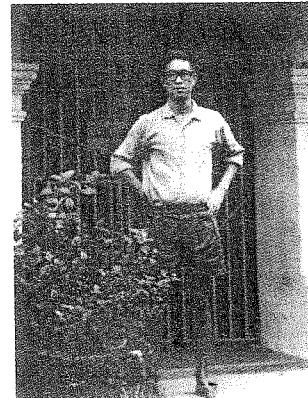
个人来说也算是人生历程中的一次严峻考验。它对我往后的
生活与社会工作有很大的启示。这次事件过后有所感触，写
下一首诗作为人生奋斗留下的雪泥鸿爪。

因哀战友起抗争，独禁小房怒气增。
绝食无期何所惧，斗志昂扬苦行僧。
外墙家属声援急，抗议街头民怨腾。
四十七天艰苦过，迎来胜利尽欢声！

（四）挥之不去，忘也忘不了！

吴维湘

作者简介：



吴维湘同志，于1967年被捕，当时他是劳工党柔州居銮市议员及分部宣教秘书。他入狱长达15年，至1982年才获释放。吴同志现年69岁，曾任銮中副董事长及企管顾问。现因健康欠佳，在家调养。

12·29一场47天反抗暴力迫害的政治扣留者绝食斗争，如今已是三十九年前的陈年往事，但我对这段往事，总是抹不去，挥不掉！

当天大批军警被调派进入监狱内，像一群凶恶野兽在张牙舞爪地狂叫，对著手无寸铁的政治扣留者，进行疯狂暴力镇压，许多扣留者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身体各重要部位被拳打脚踢，警棍猛插，扣留者在痛苦中尖叫，重伤躺在地上呻吟著，扣留者的鲜血溅洒在牢墙上，这是一场血腥镇压，这种悲惨情景，惨不忍睹，叫人如何能将它遗忘！

五、六十年代，联盟政权的倒行逆施，政权腐败，民主自由被剥夺，人权被践踏，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对当权统治施政日益不满；随之争取人权、民主、自由的声浪也日渐高涨，一股波澜壮阔，反苛政浪潮，日渐形成壮大，猛烈冲击著联盟政权。

为了维持稳定反动政权，随之而来的是暴政的反扑镇压，不断向人民袭来。左翼政党——劳工党、人民党（社阵）、大专学院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民主人士、地下革命组织，纷纷遭到无情的镇压；大扫荡逮捕行动，接二连三，一波又一波，排山倒海扑过来；当局援引所谓“国内安全法令”，未经公开审讯的情况下，将被捕者打入监狱，将他们长期的监禁和迫害，妄想一举扑灭反暴政的人民力量！到了六十年代，政治监狱大有人满之患，前后被扣的男女扣留者达千人之众。

当时我也是其中一位劳工党成员，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被逮捕，打入政治扣留营，前后辗转于麻坡监狱、华都牙也监狱、秘密监狱等地。从31-7-1967年被捕到15-9-82释放，前后长达十五年余。其间辗转于各地监狱，而每一所监狱都充满血泪。我也饱受肉体上、精神上种种虐待和迫害；包括在秘密监狱里，遭受二年的单独监禁，真是苦不堪言！终身难忘！

在辗转于各地政治监狱中，亲眼目睹同志们一个个面对暴力迫害，为了捍卫尊严，争取基本权益，愤起反抗，进行各式各样形式的反迫害斗争。我也和同志们一起参与了每一场斗争，包括几场较长时间的绝食斗争！如今回憶起来，眼前的

清晰情景，历历在目；野兽狂叫，同志们痛苦尖叫、呻吟，总是不停在耳边回响，一股压抑不住的胸中怒火，油然而生，我几乎不能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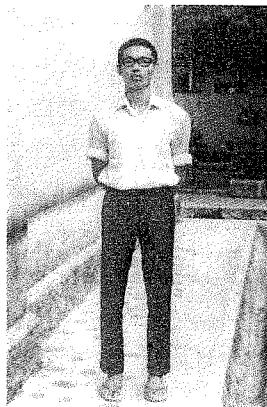
12·29这场长达47天的绝食斗争，是被围困于极度恶劣环境的牢房内，面对极度凶残的暴力镇压，没有其他斗争形式可以选择下，被迫开展的。虽然同志们面对死亡威胁，但仍然坚持顽强斗志，不畏强暴，不低头屈服的高尚品德，并得到营外同志、家属及广大国内外正义人士的支援下，终于迫使暴力政权屈服低头，答应扣留者的要求，一场长达47天的艰苦惨烈斗争，终于胜利结束！

三十多年过去了，曾经参与这场斗争的同志们，有些出狱后不久，因当年身受重创，早已离开人世，今天还活著的绝大部分已达六、七十高龄，苍苍白发；他们当中许多人正面对后遗症的病魔纠缠著，每当伤痛隐隐发作时，又怎能不令人勾起当年的惨状！随著三十多年日子的过去，但它是永远留在我胸中的痛，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幕幕场景，永远挥之不去，永难磨灭！……。

(五) 一名前政扣者在报界

曾天生

作者简介：



曾天生同志，加影育华中学毕业。

1967年被当局援引内安法令拘留于麻营与华营，至1972年才获释放。被捕时他是人民党加影支部秘书和雪州分部财政。12·29事件发生时，他是《通报》记者，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气氛下，坚持客观报导。他现年63岁，仍在报界服务。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国经济情况仍然没有大的起色，政治气氛依旧充满白色恐怖，警方政治部人员不时找人约谈。那时，我刚好从麻坡政治扣留营有条件释放约半年之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已故好友胡汉光及曾国干2位老同志推荐我会见《马来亚通报》的采访主任陈达昌。就这样我进入了华文报界做起了文字工作，一晃就34年。

我记得进入《通报》时，报社曾照会政治部，这是当时我从陈达昌那儿听来的，听说政治部并没有多大的意见。

像我这样背景进入《通报》的，当时只有陈达昌和我。陈达昌早在513事件前已加入通报服务。在其他报馆（如《星洲日报》）、早已有前政扣者任职新闻记者，做得不亦乐乎。

加入《通报》后，印象最深刻的，是《通报》发生了新闻从业员罢工事件，历时一个多月。因为我仍在试工期间，而且也并非职工会成员，所以每天照旧上班。事实上，那时也没有任何人要我加入职工会，或阻止我到报馆上班。还记得罢工的纠察亭就设立在《通报》座落在吉隆坡陈秀莲律第4路的印刷厂门前路旁。

另一项值得回忆的是70年代中期，政治扣留者在华都牙也扣留营展开一项抗议营方不合理管理措施的罢食斗争事件。消息一经传出，全马各地家属忧心忡忡。尤其是中马及南马地区的扣留者家属，为了支援营内扣留者争取合理的待遇，积极互相串联和四处奔走，以期营内罢食行动能够早日结束。

为使扣留者家属，有组织及有计划地展开支援行动，一个扣留者家属委员会便宣告成立，并以吉隆坡阿罗街大姐住家为联络中心。当然扣留者家属如有什么活动，必须集中到吉隆坡时，都会另租旅店留宿。当时较方便的地点是苏丹街的鸿图旅店，而惠州会馆的会议厅则是南马上来的家属的接待处，我曾在该处用摩哆西卡接载过家属到大姐的住家。

家属委员会成立后，几位走动比较自由的女家属，如扣留者翁隆胜的小妹翁秀莹，吴维湘的太太陈小英，祝俊雄太太黄彩虹，已故蔡小华的太太梁美懋，陈志坚妹妹陈惠娟等，都经常在吉隆坡会面，并常到法律顾问甘玛尼律师楼商谈前往

扣留营探望他们的亲属，以了解罢食的进一步情况和身体健康状态。

罢食行动期间，家属委员会曾举行过多次记者会。有一次是在孟沙路的人民党总部，当时是人民党的高层领袖赛哈密阿里协助，由翁秀莹发言。到场采访的有外国通讯社及本地中英文报章的记者，我是其中之一。

罢食行动进入紧急时期，家属委员会曾发动一次请愿行动，准备向当时的首相敦阿都拉萨要求插手。岂料，家属的请愿队伍由吉隆坡的惠州会馆大厦附近启程后进入蒙巴登路，抵达前新闻部办事处前的路段即遭到闻讯赶到的联邦后备队（镇暴队）的拦阻，不让家属请愿队伍前往湖滨公园山顶的首相署。

镇暴警察阻吓家属解散不果，便动手抢夺家属们手持的横幅布条和标语牌。男警察动手抢夺，女警员则强拉女家属，拉不动时，则由2人强抱和强行拖拉到附近的警察罗厘车，加以扣捕。如此野蛮的镇压，简直没有人权可言！

我当时是奉派偕同一名摄记陈来发前往采访，亲眼目睹这一幕。在混乱的场面中，一名来自南马的女家属，即扣留者刘运民的老妈妈，被粗暴的警方人员推倒，仆跌在路中分界堤，幸好只蒙受皮外伤，没有酿成重大的事故。

这次采访，摄记陈来发拍摄下现场图片数十张。回到报馆后，总编辑庄之明、采访主任陈达昌等对各种角度的图片进行审视，并严肃和认真地讨论如何采用。我从旁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厌恶警方的暴力镇压，但慑于当年的白色恐怖气

氛，不敢大篇幅刊登有关新闻，只选用2张图片，配1条短文见报。

我将用不到的图片收存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后，悉数移交给陈志坚的家属，以备将来可做其他用途。

家属委员会这段期间在吉隆坡的活动，我多数都到场。有时是被派前去，有时则是工余时自己主动去打气，因为那时尚在扣留营中的扣留者，好多都是我所认识的（尤其是从麻坡扣留营迁移过去的），所以对他们有特别的感情，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

过后，陆续有扣留者从华都牙也扣留营获有条件释放，多数都是派我去出席他们的记者招待会。其中一次是陈松生释放时，在陆佑律拉惹古玛医生的诊疗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若家属委员会及扣留者获释的新闻在通报见报的话，我都不忘将当日的整份报纸卷得整整齐齐的，拿去半山芭大街邮政局寄去扣留营，接收的人有时是我的老同乡林裕，有时是陈志坚。据说，他们偶尔有收到，没有被没收和开天窗。对于身陷牢狱的扣留者来说，能够阅读到一点外头关于他们的消息，的确是一件很令人振奋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可能由于我负责撰写关于家属委员会及扣留者的新闻太多的关系，加上当时我跟当年红透半边天的行动党武吉明灯区国会议员李霖泰（现在是丹斯里李霖泰）很靠近，所以我曾被警方政治部人员约谈。谈的不是什么共产党，或是什么地下活动，而是家常便饭琐碎话题。政治部人员甚至假借造访总编辑，而常来座落在陈秀莲律第

4路的编采部，对我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

马中签约建交，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北京方面派先遣部队到吉隆坡筹设大使馆。报馆探听到有关消息，派我及另一名摄记陈业发到苏丹依斯迈路的美仑大酒店等候有关先遣人员的出现，以便采访第一手资料。没有料到一个星期后，我被警方政治部召去谐街总警局，这次不是约谈这么简单，而是真正问话。2名警官轮流查问我那天去美仑大酒店干什么，跟谁接触过，谁派我去等等一连串问题，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

报馆在较后也收到讯息，说最好不要让前政扣者去采访新闻。于是，我在马华公会决定收购《马来亚通报》股权前2年便转入广告部从事广告招徕工作。尽管如此，我对新闻业和报界依然很有兴趣。

(六) 冰霜雪压心犹壮，战胜寒冬骨更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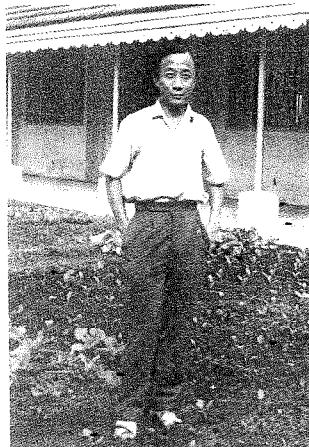
陈炳权

作者简介：

陈炳权同志两度被捕，第一次由1960年扣留至1963年，第二次由1966年扣留至1972年。当年，他是劳工党增江支部副秘书及增江地方议会议员。他现年73年，为劳工党党史工委委员、凤凰友好联谊会财政、爱国工委委员（筹建91烈士墓等）、及增江北区

华小董事会董事，仍积极参与各项有关的社会工作。

从我国统治政权继承了英殖民主义时代的衣钵，实施了违反民主人权的“内安法令”以来，我国人民目击了有关法令，对马来西亚的人权遭到专横的行动所侵犯，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正义，却被当政者倒行逆施加以滥用，以致肆意逮捕和拘禁思想政见不同的反对派人士。它不须经过法庭公开与公平的审判，即可长期关押进扣留营，蒙受不白之冤。为了巩固权力的贪婪而践踏公义，成为统治政权“长治久安”的政治手段与御用工具。



由于忘记历史就是背叛自己的良知，因此，1973年12月29日，发生在太平营内的事件既忘不了也抹不掉。起因于患重病的扣留者黄水生，因病痛难挨却得不到医药照顾时，选择了上吊自杀来控诉营方的不人道待遇，由此引起了营内扣留者的不满与愤慨。当扣留者向营方投诉被拒绝，诉求不受理时，唯有采取抗议行动，结果却遭到镇暴队的暴力镇压和严厉惩罚。在这“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况下，华、太两营的250多名扣留者，只好被逼进行反迫害的绝食斗争。在这长达47天忍饥挨饿的艰苦绝食期间，却遭到镇暴队肆意殴打的暴力虐待，以及单独监禁的精神折磨。在这危难时刻，荣与辱、坚持与妥协，正考验著政治扣留者的斗争意志和反抗决心。而事实证明：只有在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基础上，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才能威武不屈的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以维护不可屈辱的尊严。正所谓：

铁窗岁月满腔仇：抗暴维权永不休；
个人安危何足惜，岂能遗憾在千秋！

与此同时，营内的绝食斗争，引起了外头家属的焦虑万分，激发了家属的支援行动，来自各州的70多位家属，大部分是妇女和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相聚在首都吉隆坡市区里，在长达47天的日子里，彼此团结互助、义无反顾的不断走上街头：拉布条、举海报、分发传单、举行游行示威、和平请愿，要求政府当局尽快解决营内长期绝食的危机问题。可是有关当局对家属的诉求不但不理不睬、无动于衷。还一而再的动用镇暴队既野蛮又粗暴的对付手无寸铁的家属，即使是六、七十岁的老婆婆也不能幸免，以致多人受伤。还强行把家属抓上警车、关押警局，然

后控上法庭。可是大部分家属都宁可被判坐牢，也不愿缴付罚款，以此来抗议当局的暴政措施。

随著时日的拉长，营内许多体弱不支的绝食拘留者逐渐被送进医院吊水急救，但仍旧坚持绝食。为了营内亲人的安危，家属们的游行请愿，虽然三番四次遭到镇暴队的威胁与逮捕，不但无畏无惧，继续勇往直前，而且还广泛的发动扩大宣传，把这次绝食行动，从大马报章的新闻报导，传播到国内外的人权组织，并取得他们的发文声援，和社会正义人士的经济资助。此外，我国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及律师等人，也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协助担保被警方扣留的50多名家属出外候审，以及上庭为家属义务辩护。这种可歌可泣的历史场面和扣人心弦的情景，实令人刻骨铭心的难以忘怀！

(七) 我们为什么坚持47天的罢食斗争

林裕

作者简介：



林裕同志，60年代为圆丘工友联合会总秘书，是当年阿沙汉及直凉园工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两度在内安法令下被捕。首次在1967年，被扣留逾40天；第二次被监禁长达10年（1969-1979）。他现年65岁，从事种植业。

这场在我国政治扣留营发生的47天的罢食斗争，距今已是33年前的旧事，也渐渐被大家所遗忘了！

但是一旦提起这件往事，我们这群曾经参与这场斗争者还是满腔的怒火！一个人一旦肚子饿了，手脚就自然会无力，这是一件很难忍受的事。那我们又怎样能够进行47天的罢食斗争呢？这就关系到一个毅力的问题。这毅力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激发出来的呢？这又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

我们这群参与罢食斗争的战友，大多数是60年代，在合法党团内进行宪制斗争的活跃份子。我们是被反动政权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在内安法令下，被长期关在扣留营里的政治扣留者。

我们被套上的罪名，有些是十分荒唐的。例如参加工会罢工、请愿、庆祝五一劳动节、游行示威、甚至为独大筹款的义卖工作等，都可被列为罪状，未经审讯的被长期扣留。

反动政权除了对我们长期扣留，企图摧毁战友们的精神和斗志外，在营内也施行各种心理战，如在营内制造各种白色恐怖事件，使战友们不能安定的生活。例如当扣留者要离开扣留所时，就会被扣上手铐，把扣留当罪犯看待。

当政扣者离开扣留所到医院看医生，或是因为扣留者的父母或其他亲属逝世、申请回家奔丧等，押送者就要强迫我们上手铐。如果我们接受被扣手铐，就被当成罪犯一样。在路上，若有人问警员或政治部人员，这些人是犯什么法的，他们就会污蔑我们是什么杀人的恐怖分子，或者暴徒之类，以便践踏战友情谊的尊严。

所以，我们一向来是，坚拒被上手铐的。就算有病也不能去看医生，只能在扣留所内见医药助手。如家里有丧事一样不能回家奔丧！

笔者本身是手铐制度身受其害者。其一，是在扣留期间，我不幸患上肾结石症，时而发作，由于拒绝上手铐而放弃到医院治疗。肾里的几粒顽石，只好伴笔者在营内渡过十年的时光。其二，是笔者在扣留期间，母亲不幸病逝！同样是手铐的问题，而不能奔丧。事后政治部就宣称笔者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人，连母亲逝世也不奔丧等！

这一系列的心理战，不外是想要在心理上，挫伤战友情谊的尊严，摧毁战友们的精神，想从而瓦解我们的毅力。

很不幸的，“12·29”事件，也多少关连到手铐问题，因为水生战友在政治部的时候，曾被严重的殴打，一边耳膜被打破而患上耳鸣。他又不想当罪犯般的被扣上手铐去见医生。久而久之，耳鸣就越来越严重。精神受打击很大。在这样的一种恶劣的环境下，他可能想以死来控诉反动政权的暴政，所以走上自杀的道路，结束自己年青的生命，以暴露反动政权的罪行。

在事件发生后，姑且不论水生战友的选择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的整个情势是，战友们长期压抑的怒火爆发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似乎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跪在敌人的面前求生；或者是在敌人的镇压面前，勇敢地展开斗争，如果不能胜利，也要在敌人的面前光荣的站著牺牲。

当时，我们这些久经斗争考验的战友们似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斗争，准备不胜就成仁。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47天罢食斗争就这样展开了！当时，笔者是被扣留在太平的甘文丁营。罢食开始后，就集体被押上镇暴车，送往华都牙也营，到华营一场惨无人性的镇压行动也就开始了！

我们一被押到华营，就特地被安排一个接一个的从一条后巷押进华营内。敌人有计划的在小巷两旁布满镇暴队。当战友们走过他们的面前时，就被他们用木棍打或被穿皮鞋的脚踢。就在一片呼喝声及惨叫声中，战友们就这样被一个接著一个的关进个别小营房内。

我们这些从太平来的战友就这样和华营原有的战友汇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了！然而，敌人的残暴镇压并没有停下来！自从我们被个别关进小房后，不时听到有敌人冲进个别战友的小房间，殴打声及呼喝声不绝于耳。敌人企图制造一种人间地狱的白色恐怖气氛！

在第二天，我们被分成小批放出去冲凉时，敌人还是有目标的趁这个机会殴打战友。笔者可能也被敌人列进目标进行殴打。可能是胃部被打伤，致使在罢食期间虽然没有粪便可排泄，却不断排出些血迹。也可能就是出血的缘故，在罢食20多天后，笔者就时常会在起身或走路时，由于血压过低而昏倒。有一次我在路上昏倒后，就被送往医院。在医院里，因为还有便血的现象，护士就准备为我抽血作化验。可是，就是抽不出血来！在这种情形下，我就被安排24小时连续吊水，直到罢食胜利结束。进食以后，体能也恢復了一些，才停止吊水。

在罢食斗争期间，笔者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看到许多战友已被医生列为进入非常状况，血压已是很低！心脏随时有停止跳动的危险。即使只是昏倒过去，可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醒来了！医生也对他们提出危险的警告。但他们还是视死如归。还是谈笑风生，还不断鼓励战友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这些战友发挥了人类最高尚的品质。对于这些事迹，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虽然已经历了30多年的岁月，有时偶而回忆起来，还是令人激动不已！

当时，也许因为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件，医院里的医生及医务人员，对我们的遭遇及勇敢的斗争精神，表达了他们

的同情和佩服，甚至有一些人还为我们淌下了泪水。

最后，当我们斗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不但我们激动不已，院方的工作人员也是很激动的，纷纷向我们祝贺及鼓励我们。

这场“12·29”历时47天的罢食斗争，虽然最后总算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生活在敌人的黑牢里，敌人还是无时无刻的在进行著各种阴谋诡计，伺机镇压我们。反动派对扣留者的迫害是永无休止的！

这场“12·29”的罢食斗争，已经是33年以前的事，有些已经模糊了，有些简直被遗忘了！但是，对我来说，有几件事却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因为它具有独特的时代精神！

1. 12·29罢食斗争的导火线是水生自杀事件。这位水生战友，就像当时许多战友一般是工人出身，思想认识虽然不是很高，但处处为别人著想，希望能够为大众做一些好事，对于自己曾经犯上的一些错误，总是耿耿于怀！

在水生战友出事之前的晚上，笔者在饭后散步时，碰巧遇上水生战友，不觉中我们聊了起来。当时水生有反映他面对的一些问题，如在政治部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他被政治部鬼仔打后遗留下的耳鸣及因手铐问题不能去见医生诊治等。我记得当时是有给他一些安慰。他还提出在扣留营内应该不分彼此的大家团结起来及如何改善营内的生活环境。他还提出建议在某处可种几棵木瓜，在某处可种花草，在某处可种一些药草及凉茶，可给战友

们服用等。

最后还向我提到在营内某处篱笆底下的水沟，该处的洋灰板并不牢固，轻易可被拆下来。如果营内有什么紧急事件，而战友有须要逃出去，可从那个地方逃走等。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乐观、很有责任感、处处为别人著想的好青年，那会想到这就是他要结束自己生命之前夕。

所以当第2天早茶时，大家发现水生不见了，就分头去找。我第一时间是想到他一定是逃走了。因昨晚他有讲到营后有一处地方是容易逃出去的。我即刻到该处去，在仔细的观察下，该处的铁丝网并没有被动过的迹象。看了多遍后，确定没有从该处逃出去。我回去遇到少棠战友。他忽然想起还有一个小储藏室没有去看。他就走向该处，我也跟在身后。他一打开门，只听大喊一声吊颈，就冲了出来。我往里边一看，果真水生战友是吊颈了！当时，本能地冲前把他抱著往上推，企图减轻他颈项的吃重量。此时，其他的战友也冲进来，才把他整个身体拆下来，看来已经是一具有点僵硬的尸体了！

我们尽可不赞同他如此结束他的生命，但从他死前的各种迹象，如建议要怎样改善营内的居住环境，如有紧急需要可从某处逃出去等，可以反映出当时这些左翼青年，都随时想给人类作一点好事，处处为别人著想，即使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还不忘为别人著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说是当时左派的人生哲学。

2. “12·29”这场惨烈斗争，在经过47天较量，最后是敌人妥协了！我们获得胜利，这只是反映了敌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暂时作了妥协，并不是敌人大发慈悲，真的不想看到政扣者活活饿死！

我们这场罢食斗争，在一些人看来像是自杀式的斗争，这只是片面的看法。其实，我们的斗争是结合当时营外的局势。当敌人实施搬营计划时，大家已意识到一场大镇压已摆在战友们的面前了！战友们在思想及行动上已经有所准备。所以，我们的斗争才可能在家属付出血泪，国内外进步党团大力支持和声援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去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长期罢食斗争是要配合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而进行，否则，不可轻易开展。

3. 对于这场“12·29”大罢食，有些朋友提出为什么不申请进入世界健力士记录。这也许是开玩笑的说法，但也不是毫无道理的。250多人集体大罢食，而且能坚持47天之久，毕竟也是一件少有的记录。
4. “12·29”这场罢食斗争，是发生在臭名昭彰的内安法令下，在经过33年后的今天，这个违反人权的恶法，不但没有被废除，居然还被今天的当权者，以“反恐”为藉口，让它继续横行！

事实证明，当权者是永远也不会自动放弃一切已经握在手中的镇压工具，这就是一切反动派的本质。

(八) 回忆扣留营生活

李耀华

作者简介：



李耀华同志，1967年中在内安法令下被捕，至1975年初获有条件释放。被捕时他是劳党金宝支部秘书及社阵金宝区联副秘书，时年23岁。他现年62岁，仍然在华教机构服务。

1965年，离校出来社会工作，参与新村的劳工党支部活动。当时正值国内外局势风起云涌的年代。随著国内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支部、区部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扣留、被迫捕。当时，自己虽政治经验尚浅，但很快就被选为支部秘书，续又担任社阵金宝区联副秘书职。这种“快熟面”式的承担重任，虽非自己所愿，但在形势所迫下，只好勉为其难接受下来。随后，很快地就被“内安法令”找上门了。这虽属预料之中，在当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在1967年6月17日被扣留，其时是23岁。经在政治部拘留所单独监禁和审讯后，于同年7月下旬被送往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B座，直至1975年初才获有条件释放。

在扣留营的日子里，虽然生活空间很小，但生活素质却是充实和“多姿多彩”的。它既有学习和工作，也有运动和休闲活动、过著有纪律的集体生活。这7年多的扣留营岁月，自己虽能从容面对，但却给家人带来不少痛苦和忧伤。这些感触在当时也只能强忍在心中，并默默祝福家人能渡过这个难关。

自1966年开始，扣留营人数已逐年增加。因此有机会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过集体生活，互相学习和经验交流，从而扩大视野、丰富人生经验。在那期间，大家共同参与营内反迫害、争取基本活动自由、改善生活条件与福利的各项斗争。通过这些患难与共的日子，彼此之间有了深一层的了解，结成牢固的战斗友谊。这段生活经历，在自己人生成长过程中影响深远，且非常珍贵，终身难忘。

营内扣留者的斗争，因环境与条件局限，一般上以抗议集会、呈抗议书、不合作行动及集体罢食等斗争方式进行。自进营后，先后参与1968年历时24天的3·25罢食斗争及1973年为期47天的罢食斗争。除此之外，也参与过营内多次象征式罢食抗议行动，其中包括发生在1969年11月27日持续7天的一场B座扣留者罢食斗争。

在1973年12月29日，华都牙也扣留营的扣留者被当局暴力镇压后，所开展的那场持续47天的罢食斗争，其过程是极其艰苦的。它是迄今营内为期最久的一场罢食斗争。这场斗争的导火线是太平甘文丁扣留营的一位同志在营中逝世，引发扣留者对内安法令下，无审讯长期监禁对扣留者人身安全威胁的抗议行动。事实上，这是有关当局配合当时越来越尖锐

化的国内政治斗争形势，对营内政治扣留者进行镇压的一项有计划的预谋行动。

这场罢食斗争由于经历长时间的双方对峙局面，它对扣留者的个人健康造成极大的损伤。不过，大多数的扣留者虽被单独监禁，但在发挥顽强的信念和毅力的鼓舞下，都能克服身心所承受的种种折磨，坚决抗拒任何威逼利诱，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到来。

当年，这场斗争能获得胜利，我认为应归因于以下几项基本条件：

其一 共同对敌，方向明确。当时，营内扣留者虽因思想分歧及左翼路线斗争分成几个单位，各自生活。但是，在面对营方的镇压及基本权益与生活福利被无理剥夺的情况下，虽然各方在对局势估计、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的运用等，会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在大敌当前，都自觉地调整步伐，共同对敌，为斗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其二 思想认识的提升。营内同志自经过1966年16天的5·26罢食斗争，接下来1968年24天的3·25罢食斗争的实际考验；以及各单位所开展的学习活动与思想教育工作的深化，营内扣留者的政治认识普遍提升。此外，彼此之间的互信增强，可说斗志昂扬，并充分发挥团队精神，冲破长期以来在营内的白色恐怖气氛。这是斗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其三 外头家属、同志的支援行动。当时外头的负责同志积极发动同志们及家属们开展各种形式的支援活动，引起国

内党团及国外一些关心人权组织的关注，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压力。有关当局在无法迫使扣留者低头的情况下，惟有寻求折衷方案，使问题获得解决。

其四 扣留者生命垂危。当扣留者的罢食斗争进入30天后，普遍上健康已开始恶化，尤其是体弱多病、受折磨及严重殴伤的罢食者，其实已处于死亡边缘，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随后又传出扣留者准备不喝水、拒绝进医院的传闻，和当地医院医生对扣留者健康水平处于危险状况的报告，加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有关当局最终被迫接受扣留者的基本要求，恢复扣留者的原有权益与福利，结束这场长达47天的罢食斗争。

这场发生在1973年12月29日的罢食斗争，迄今已超过30年了。热心的同志将该事件的相关资料结集出版，作为一项历史记录，他们的努力与精神值得赞许。作为该场斗争的参与者之一，受邀撰写感言，谨以此短文，作为个人对该段日子的一项回忆，供关心该事件人士参考。

2006年5月

(九) 我的回忆

黄天祥



作者简介：

黄天祥同志，工厂职员，现年58岁。

12·29事件已将近三十三年，每当想起大哥，心里还是那样的疼痛和失落。悠悠岁月，非但未能减轻我们家人对大哥的深切思念，反而加深了永远的伤痛和歉疚之心。

大哥禀性忠厚，待人真诚，关心集体，乐于助人，这些品性在青少年时期便已突显。

童年时代的我，曾目睹大哥先后两次勇敢地率先闯进年老无助的自尽者屋里，在众人协助下抱著可怜的自尽老人的身体，将它解脱下来。惨不忍睹的人间悲景震撼了在场的人们，也震荡了我幼小的心灵，至今印象犹新。想不到在扣留营里又重演了这一幕，所不同的是，这次被解下的受害者竟是我的大哥！

看到了老乡没钱雇人驳接胶园里的幼苗，大哥便志愿地为老乡驳接胶苗。由于当时需要驳接的胶苗很多，大哥便携带我

前往帮助，连续几天的驳接工作是在烈日下进行的，所以，时过四十多年了，我尚能记得。

回想当年，要不是大哥的无私付出，我不敢想像我们的家将会怎么样。那时一家十口，只得父母亲微薄的割胶收入，肯定是捉襟见肘，更何况父亲后来提早退休，家庭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少年时的大哥和二哥便主动地配合妈妈支撑著这艰难的家直至被捕。

在那漫长的贫苦生涯里，大哥从未有过怨言，而是乐观积极地扶持著家庭渡过艰难的日子。也是在大哥的坚持下，我们才有机会接受多几年的学校教育。由于我是较大的弟弟，大哥对少年时期的我，管教是严格的。他积极安排和教会我驾驶摩多，并做了一些相应的其他安排，在缅怀大哥的生活点滴时，我才逐渐领会了大哥的活动轨迹和良苦用心。

大哥的骤然离去，事出突然。家人都难以接受，悲痛非常。长期以来，都是妈妈的帮手的大哥，他的悄然离开，妈妈受到的冲击，比谁都更大更深。妈妈当时的哀痛和倾诉，更加剧了家人的伤痛和铭记在心。

12·29事件反压迫、争人权的罢食斗争，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密切关注。事件的爆发与延续，有力地揭示了牢狱内的不人道内幕，清楚地掀开了当局的虚伪咀脸，让社会人士上了一堂实际大课。

在饥饿煎熬、冷热无常以及当局软硬兼施的高压环境下，英雄的政扣者坚持斗争，直至最后胜利，令人无不肃然起敬。对局外人来说，这实在是难以想像和理解的。

然而，在政扣者身上，让人们看到了立志献身于人民事业的真正英雄，体认到真正为人民事业奋斗的崇高精神。他们是真正从事人民政治事业者坚持信念，坚守原则的最佳典范。12·29的胜利斗争，也是崇高的个体英雄气概和集体主义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在我极度悲伤和失落的氛围下，涌现在眼前的那一群朝气蓬勃、勇敢坚定、积极乐观的英雄志士们，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鼓舞著我继续向前，是我生活中的其中一个最有力的推动剂。祝福并期望他们继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事实上，他们好些人目前做得很出色、很好，诚令广大仍然关注时局发展的人们欣慰和尊敬。也希望这迟来的祝福能够聊以表达我对英雄志士们的再一次敬意！

在风云变幻的六、七十年代，国内外学生、工人运动波澜壮阔，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稍有正义感的青、壮年人很自然地或多或少，或浅或深地卷进这时代的运动中，发挥其积极作用。环视眼前百病丛生的政治生态，12·29精神益发突显其现实意义。回首当年，瞻望未来，真是教人思量。

我永远难忘当年家属们携手相扶持，患难与共，同赴时艰的感人事迹。他（她）们不愧是政扣者的英勇家属，是我们社会的楷模。

我永远不能忘怀大哥，一个为家人，也为社会付出他所能付出的一切的人。他永远是我们的大哥，是我们的长者。

大哥一生没结过婚，每年清明时节，我们兄弟都相约携带孩子前往大哥安身之地，以寄托对大哥思念之情，并献上我们的敬意。

谨以缅怀先人前辈事迹，激励大家共同进步共勉。

(十) 血染的丰采

林子亮

作者简介：



林子亮同志，槟城劳工党甘榜东姑支部执委。1967年12月27日被逮捕，之后扣押在华都牙也A座和B座。1979年2月释放。现任槟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执行秘书。

如果把1973年发生在华都牙也政治扣留营的12·29绝食斗争比喻为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对当年的政治扣留者来说，这是一场在敌方极尽挑衅、非常被动、而且是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选择的战场和时间、不得不背水一战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战场、这样的时间，政治扣留者非要接受的战争，其艰苦性、残酷性、长期性就可想而知。

斗争的结果就如一名高级的监狱官员向政治扣留者的谈判代表之一陈福兴同志所说的一样：现在你们是胜利者，但是你们以后将尝到你们这场胜利的苦果，因为你们付出健康的代价，其实我已经从你们的身上闻到死人的的味道！

这场绝食斗争从1973年12月29日爆发到胜利结束，经历了漫长的47天。对于扣留者来说，这47天是人间的地狱、是生与死的搏斗、是意志的考验、是信心的磨炼；我们挨饥忍

饿，还要遭受肉体的酷打、精神的折磨。

为什么要绝食呢？人的生命是何其宝贵。在敌人的心脏绝食，可以说是准备把命豁出去。谁不爱惜生命、谁要把生命抛弃？特别是具有崇高理想、热爱人类的政治扣留者更是如此。因此，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扣留者绝不轻言绝食。

这是当年扣留营我方领导层的态度与观点。所以12·29绝食斗争，是一场捍卫尊严、反抗暴力、反抗迫害的斗争。暴力引发了绝食斗争，过程又是充满了血腥暴力。正义终于取得胜利。这就是1973年发生在华营47天绝食斗争的历史！

看政治扣留营的绝食斗争史，12·29华都牙也政治扣留营的绝食斗争，是自我国独立以来最为长久的绝食斗争。根据华都牙扣留营的记录，1967年有过长达16天的5·26绝食斗争、1968年长达24天的3·25斗争及另一场长达21天（麻营30天）的8·13绝食斗争，接著是发生在1973年长达47天的绝食斗争。

根据林同安同志的回忆，斗争的爆发，是因为当时华营扣留者获悉太平营黄水生同志因为被迫害而自杀牺牲，极端愤慨，马上派出6名代表（A、B及C座各2名）要求见营长了解情况和处理问题。但是这合理的要求被营方粗暴地加以拒绝，双方僵持不下。到了晚间，代表们还没有回到营内，同志们担心他们的安全，于是闯开A座通往办事处的篱笆门，集合在营方办公室前的空地。

蓄谋镇压扣留者的营方马上调来联邦后备队，向著扣留者放射催泪弹，然后挥动警棍，冲向扣留者，大打出手。许多扣留者被打到头破血流，伤痕累累。暴力殴打后，营方就对扣留者全部施行单独监禁。为了抗议营方的迫害，扣留者只好展开绝食斗争。除了斗争的长期性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参与绝食斗争战友的遭遇，意识到它的残酷性。

吴少平同志，槟城劳工党人，1968年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并送进华都牙也扣留营。12·29绝食事件爆发前，被调往太平甘文丁政治扣留营。当华营爆发绝食后，他连同太平营绝大部分扣留者又一起调回华营。在吴少平同志的身上，就布满了当局使用暴力的血腥痕迹。

太平甘文丁战友，从华营办公室押进A营时，就遭到列在通行道两旁的狱卒和联邦后备队的毒打。吴少平同志说：从营方办公室通往A座的路程中，营方部署了殴打扣留者的布阵：即在通道的两旁，一边是狱卒、另一边则是联邦后备队列成一道很长的施暴队伍，当战友们从中间通过时，均遭受两旁的狱卒和联邦后备队拳打脚踢、或者用警棍殴击，几无幸免。

这一阵毒打，凶狠之极，许多扣留者头破血流，伤势严重者被送进医院急救。医院的大部分医疗人员，也因为营方的残暴而对扣留者起了恻隐之心，不耻营方之残暴行为。

绝食30余天后，在医务人员检查时，我因为血压在40和70的状态下被紧急送进医院。在医院治疗中，恰巧隔壁病床是吴少平，于是我们一边吊著葡萄糖，一边聊著，吴少平告诉我，他多次遭受毒打，这已是他的第三次进入医院。

现在，30余年过去，吴少平对于当年残酷的遭遇历历在目。在他的回忆中，当他第三次从医院回到A营后，白色恐怖笼罩扣留营，白天狱卒在狱官的带领下，寻找殴打的对象，晚上则是进行骚扰，不让安眠。

在接近绝食第40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姓梅的华裔高级监狱官员，带著7位狱卒（包括一位姓“李”的华裔狱卒，一位宗教师和一位叫做“罗斯里”的狱卒）进入一位来自麻坡扣留营的扣留者房间，进行殴打。这一幕恰巧让他从窗口看到，就放声高喊，试图阻止监狱官的野蛮行动。

结果就是这一队野蛮的打手，在姓梅的狱官的带领下，打了那名麻坡扣留者之后，就进入他的监房。在梅姓狱官的下令下，两名狱卒左右张开他的双腿，其中一位狱卒则提起大脚，向著他的尾椎生殖器部位踢下，其他有的用棍，有的用拳头，胡乱的全身乱打，直到他昏迷为止，才把牢门锁上，扬长而去。

由于伤势太过严重，营方见他半个小时之后还未醒来，担心伤重不治，才把他送进医院。当他送进医院时，已经不能言语，医院方面判断，吴少平的严重伤势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阶段，再也经不起另一次的殴打。因此，决定让他留在医院，直到绝食结束为止。

根据吴少平回忆，他的伤势延续了许多年，多方治疗，难见效果。直到现在，他还是受到伤痛的折磨。

另一位扣留者叶镁辉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况。事件发生时，他住在C座。当时的C座只有区区的12位扣留者。绝食第二

天，叶镁辉连同其他扣留者被押送进B座的单独监禁房子。在送往B座的过程中，遭受狱卒和联邦后备队棍棒敲打、拳击脚踢，结果头破血流，被送进医院，缝了9针。

叶镁辉同志，槟州劳工党日落洞支部干部，1968年被逮捕后送进华都牙也政治扣留营，1978年释放，被扣留超过10年之久。他回忆起这段充满暴力的往事时，对于营方缺乏人性的野蛮行径深感愤慨。

营方通过暴力企图迫使扣留者放弃绝食斗争。他们派遣大批的镇暴队进入扣留营，施行白色恐怖，监视冲凉、殴击扣留者，同时通过镇暴队派饭，打开扣留者房间，试图通过暴力迫使绝食者进食。

但是这一切的企图，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营方也知道无法通过暴力迫使扣留者放弃绝食，就改用软策略。一天三餐，浓烈的咖啡香、鲜美的面包；美味的白米饭，加上香喷喷的印度加里，送进单独监禁中的扣留者房间，这对于绝食者来说，空著肚子，面前则是摆著鲜美的食物，其引诱力可想而知。

从斗争策略上来说，营方的诱食确是一步高招。可是使用在当时的扣留者身上，却毫无效果。大概是过了一、二个星期，营方的期待完全破灭，他们企图通过个别击破的方法彻底失败，因为他们检查食物时，没有扣留者在他们的引诱下偷吃一口饭，送饭诱食终告一段落。之后，就不再送饭，只是每到进餐时间，形式上打开监房小门，问声“要吃饭吗”，就算是完成诱食的任务。

除了白天进行白色恐怖外，晚间则向扣留者施行精神虐待，极尽干扰的能事。

营方在扣留所内装置了一种钟表，每半个小时就敲打一次。他们干扰的方式可谓多样化，有的时候大声敲打，让你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有的时候细声敲打，但是长达五分钟，目的还是不让你入眠；有的狱卒则故意无休止的来回大力踏步，让皮鞋响声令你心烦、干扰睡眠。因此，经常引起扣留者在半夜三更群起抗议。

47天漫长的绝食斗争，就是在充满白色恐怖的气氛下进行，没有坚强的意志、缺乏坚定的信心、不准备付出牺牲代价，这场斗争根本就无法坚持下去。但是，参加12·29的政治扣留者，就是头破血流也好、就是伤痕累累也好、还是生命垂危也好，信念只有一个：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就在绝食第47天，被送进华都牙也医院的病重扣留者，全部都面临生命垂危的阶段。当天早上，医院院长特地检查，其中一位扣留者苏志明同志，情况非常危急。当时医生向他发出最后警告，必须马上进食，否则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挽救他的生命。躺在病床上的苏志明同志非常明确的说：当我所有的同志都在绝食，我怎么可以进食呢？医生看到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话不说，马上把他送往设备较为完善的怡保医院，以便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故。当时，我们也很清楚，华都牙也医院从医院院长以下，都在尽心尽力保护我们的生命，不希望出现任何死亡的事故。

其实，我以为在我们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向当时华都牙也医院的院长、医生和护士们，表示谢意与敬

意。我们坚强的意志与信念感动了他们，而他们的专业精神也赢得我们的敬意。

根据当时华都牙也医院院长的观念，绝食是可以进食牛奶和果汁，但是我们的绝食行动是不吃任何食物，包括牛奶和果汁，可是经过我方代表耐心地和院长沟通后，终于接受我方绝食的概念，而院方则是履行他们医疗的任务。

绝食的第47天，也是最为紧张的一天。从医院的记录显示，扣留者随时会有死亡发生，就他们的专业精神道德而言，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故的发生。看来，监狱方面也担心出现死亡事故，而我们当然更加关心，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同志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不怕死，但也不愿意看到死亡的发生。应该说，当天各方面都是非常紧张，密切关注著事态的发展。

当天我已经是第三度进入医院吊葡萄糖水。约在下午五点钟，我们的谈判代表之一陈福兴同志带著虚弱的身体，在营方的同意下，到医院汇报有关谈判的进展。

陈福兴同志向我们汇报，因为营方坚持不开小门，谈判还待进行。汇报还未完毕，营方就通过一名狱官前来通知福兴同志：“你们要不要结束绝食，那是你们的事，但营方已经决定开放监房小门”。

营方的这一通知，等于宣布营方已经接受我们的主要谈判条件，包括开放监房小门。于是就宣布47天的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医院方面也松了一口气，为了庆祝胜利，我们要求医院让扣留者回营。结果除了那些非医药照顾不可的同志外，凡能够走路者、而且医生确定不会在途中不支的扣留者，都允

许回营。

当我们集中在一起时，大家高唱《下定决心》和《团结就是力量》庆祝。在唱歌过程中，有不少同志不支跌倒，有位名叫温振源的同志，躺在床上听到宣布绝食胜利时，兴奋地爬起来，但还是因为太过虚弱，而跌到头破血流。

宣布47天的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后，扣留者从中挑选几个还支持得住的同志负责厨房烧煮工作。同时也决定大家在同一时间进食牛奶和稀粥。那是一个胜利美妙的夜晚，我们的同志通宵达旦，庆祝了一个晚上！

文中提到的几个人物简介如下：

吴少平：劳工党槟城垄尾支部党员，1968年2月14日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之后关进华都牙也扣留营A座，1973年调往太平甘文丁扣留营。12·29爆发绝食斗争后，再调回华都牙也扣留营A座，1978年释放。现在从事罗里运输工作。

陈福兴：马来亚劳工党中央副总秘书、槟州分部助理秘书，槟州日落洞区联领导。1967年7月8日被逮捕，之后扣押在华都牙也扣留营A座和B座，在扣留营曾经数度被选为扣留者总代表，1982年8月31日释放，前后扣留长达15年之久。释放后，曾经前往菲律宾参加国际人权会议。1989年9月，不幸跌倒逝世。

叶镁辉：槟城日落洞劳工党支部干部，1968年2月3日被逮捕，之后扣押在华都牙也扣留营A座、B座和C座。1978年释放，曾经在《星槟日报》和《光明日报》从事翻译及负责电讯工作，现已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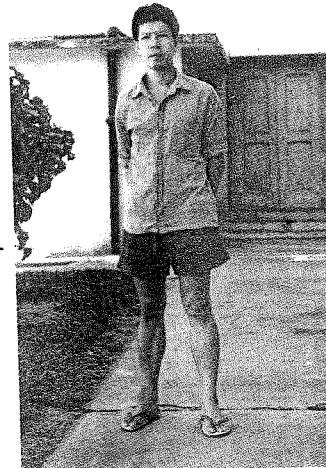
林同安：槟城同志。

苏志明：柔佛州同志。

(十一) 扣留营绝食斗争的体会

陈松生

作者简介：



陈松生同志，新加坡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三年级学生。

1966年11月因参与学潮被南大当局开除学籍，同时被新加坡政府驱逐出境。

1967年6月因参与工潮被马来西亚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扣留，关在吡叻州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为期八年。

1980年赴英国念法律，1984年成为执业律师。业余积极参加华教及人权运动。

(一) 初尝绝食滋味

初尝绝食滋味，将近四十年了。

地点：新加坡女皇镇监狱

历时：一天

绝食要求：改善狱中待遇。

1966年11月我因参与南洋大学学潮及新加坡学生运动而先后遭到南大当局开除学籍及新加坡政府驱逐出境。

为了镇压正在罢课反对汤寿伯报告书的义安学院学生以及支援罢课聚集在学院的大、中学生，新加坡政府于11月中旬某日凌晨调动镇暴队包围和袭击义安学院，援引公安法令逮捕约150名大、中学生，分别关押在女皇镇监狱和樟宜监狱。我和大部分的南大生及义安学生被囚在女皇镇监狱。约一个月左右，我被释放并驱逐出境。

(二) 绝食：政治扣留者唯一的武器

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自由的可贵。

对于有期徒刑的囚犯而言，虽然他失去自由，但是，他毕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能出狱。

可是，对于内部安全法令被囚禁的政治扣留者来说，他所面对的是不经公开法庭审讯而被无限期囚禁的命运。

如果政治扣留者不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如果没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如果欠缺坐穿牢底的决心，很难想像他如何度过漫长又遥遥无期的铁窗生涯，挺胸步出牢门。

这点区别，或者是刑事嫌犯和囚犯对政治扣留者“另眼相看”的原因。这是我在女皇镇监狱、吉隆坡半山巴监狱以及三个州属七个警察局扣留室(lock-up)作短期挂单之后的生活体验。

在人权不受尊重的时代和人权被践踏的国度，失去自由的政治扣留者除非具备坚定的信仰，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坐穿牢底的决心，否则无法抵御暴政和酷吏的迫害，无法争取基本人权，无法捍卫做人的尊严和维护不屈的灵魂。在这种环境下，绝食是唯一的武器。

然而，绝食是一种自戕躯体，慢性自杀式消耗生命能量的特殊武器，一种处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斗争手段。

在反迫害和争取基本人权的斗争中，政治扣留者没有太多的选择，于是绝食斗争变成难以避免的途径。

(三) 六年六次绝食斗争

从1967年5月至1973年12月这六年七个月期间，西马半岛的政治扣留者先后在华都牙也扣留营(华营)、太平监牢女营、麻坡扣留营(麻营)、太平甘文丁扣留营(太平营)及芙蓉监狱展开六次大规模的绝食斗争。

- 1 . “5·26”绝食斗争：(华营)
1967年5月26日至6月1日：16天
- 2 . “8·28”绝食斗争(太平监牢女营)
1967年8月28日至9月7日：11天
- 3 . “3·25”绝食斗争(华营，麻营)
 - (i) 1968年3月25日至4月17日：24天(华营)
 - (ii) 1968年3月31日至4月17日：18天(麻营)
- 4 . “8·13”绝食斗争(麻营，华营)
 - (i) 1968年8月13日至9月11日：30天(麻营)
 - (ii) 1968年8月22日至9月11日：21天(华营)

5·“11·27”绝食斗争（华营）

1969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7天

这次斗争由华营B座反右单位同志发动，非反右单位未参与。希望有关方面的同志能总结斗争经验，以史鉴今。

6·“12·29”绝食斗争

(i) 1973年12月29日至1974年2月13日：47天（华营）

(ii) 1974年1月13日至1974年2月13日：32天（太平营）

上述六次绝食斗争，除了“8·28”及“11·27”之外，其他四场斗争皆有相当详细的文字记载和经验总结。

除此之外，政治扣留者还在这个时期发动过无数次1天至7天的短期绝食，其内容以政治为主，表达扣留者对时局的关注和某项政治诉求。

有关这类短期性质，未遭营方处罚的绝食日期和具体内容，几乎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消逝。唯1969年支援劳工党杯葛大选则是例外。

(四) 政治和生活诉求的高昂代价

从“5·26”、“8·28”、“3·25”、“8·13”及“12·29”这五场大斗争的内容及所提出的诉求来看，扣留营的绝食斗争以政治诉求为主，改善生活的诉求为辅。斗争的展开是那个年代的必然。

这个必然性反映了这六年期间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发展。

中国文革思潮对马来西亚左派运动的直接影响，牵动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政府顺势加强镇压左派运动。扣留营在这段期间爆发频繁的反迫害争取人权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上述六场绝食斗争有个规律：

(政府)剥夺权利——(扣留者)争取权利——失去权利——再争取——再剥夺——再争取。

每次绝食天数都在增加，显示斗争的艰苦和惨烈。

具带动全局性质的1967年“5·26”16天绝食斗争拉开了这一系列斗争的序幕，而“12·29”47天绝食则不幸地变成马来西亚左翼扣留者大规模长期绝食斗争的绝响。

当局从1977年开始对华营政治扣留者实施21小时的单独监禁是政府利用当时的时局对扣留者实行全面的反扑。

当年政治扣留者的政治信念、思想状况和生活条件，皆可从绝食斗争诉求中窥视一二。与此同时，政府当局对政治扣留者的政策也从中暴露无遗。

为了争取改善营内恶劣的生活条件，扣留者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若是政治诉求，如废除内安法令、无条件释放政治扣留者等要求；那是连生命赔上也无法争取，因为内安法令是当权者维持统治的主要法宝之一。

(五)绝食斗争的体会

八年的铁窗生涯，碰上三场大绝食也算是难得机缘。

1966年尾我被新加坡政府驱逐回联邦，次年三月参与工运。六月中旬被扣留，八月上旬被押往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从此在那儿开始我的囚禁岁月。

我所参加过的绝食斗争是“3·25”、“8·13”及“12·29”。

最后一次的47天绝食，我总共消瘦25磅。绝食结束时，体重不及一百磅。绝食结束后的普通后遗症，诸如水肿，心脏出问题等，那是在所难免的。关键的是“活下来了”。

体会么，倒有几点：

- 1 · 来到鬼门关徘徊一阵之后，居然还能悠悠晃晃地溜回来，那今后就要活得更有意思，才不枉此行。
- 2 · 见证了绝食同志，尤其是那些被殴打得受重伤的同志到了生命临界点时刻那种不愿做逃兵的情景，才深刻地体会什么叫做“临死不屈”、“视死如归”。
- 3 · 每当红头兵打开牢房铁门押我们个别去冲凉，看到同志们坚毅默然的神情（如果讲话，就要挨打），捎个眼神打招呼（互相鼓励）的时刻，才深刻体会什么叫做“阶级感情”、“战斗友谊”。
- 4 ·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展开这场惨烈的斗争，把什么“反右”、“右倾”这些名词和帽子抛开了，体会了什么叫“敌忾同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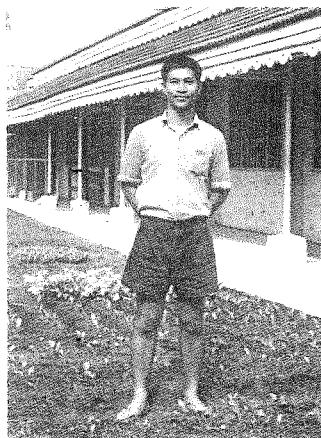
- 5 · 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赐恩典。要享有这些东西，就必须准备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这个道理在这场绝食斗争中体会得更深刻。
- 6 · “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是当时华营扣留者送别获得释放同志的战歌。这首战歌在47天绝食中起著激励斗志的作用（只能默念和默唱而已）！！

当时华营已给镇暴队接管，高墙内外音讯完全被隔绝。我们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绝地进行斗争，完全不知道营外家属的支援行动有多大，也不知道这场绝食斗争会持续多久。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这首战歌所体现的信念，给坚持绝食斗争的扣留者予巨大的精神力量，尽管有些同志在经历30多天绝食之后还是放弃斗争。

（2006年7月14日）

(十二) 内安法令下的暴行

李万千



作者简介：

李万千同志当年涉及阿沙汉及直凉园工潮被捕（1967-1974）。出狱后，曾任董总执行秘书（1977-1989）及董教总规划发展部副主任（1996-1999），亦曾参与反对党活动（1990-1995）。他现年64岁，为《当今天马》（www.malaysiakini.com）与《独立新闻在线》（www.merdekareview.com）的专栏作者。

我国前总警长拉欣诺的律师，于2005年8月3日在法庭上念出他的公开道歉：“我，丹斯里拉欣诺承认负起（1998年）攻击的责任。对你和你的家人所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深感遗憾。我真诚地向你拿督斯里安华依不拉欣以及你的家人同样致以道歉”。

读到这段新闻时，我突发奇想，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么的一天，当局也把45年来非法动用私刑的政治部人员绳之以法，并公开向以前及现在所有曾经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惨无人道地加以迫害的拘留者和他们的家属道歉和赔偿？

我乐观地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维护人权的斗争，总有一天，上述“奇想”终究是要变成“事实”的！就在8月1日，笔者和另外8位前内安法令拘留者，就出席了我国人权委员会（Suhakam）关于在内安法令下被迫害真相的听证会。像这样的“听证会”在以前也是难以想像的。

不必讳言，在内安法令实施45年以来，政治拘留者被迫害的案例可说是数以百计、千计，用罄竹难书来形容，相信也不为过。在我的供证过程中，我呈上一份1969年5月1日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A、B、C座政治扣留者所发表的声明，其中就罗列了不少有关方面的“罪行”，摘要如下：

1. 长期（数月至一年）的单独监禁，连续几天几夜的疲劳审问和精神折磨，造成许多政治扣留者患上神经失常或神经衰弱症。
2. 对扣留者拳打脚踢，揪头发以头撞墙，殴打腹部至内部出血，送院动手术。
3. 把扣针插入政治扣留者的10只手指，或用铅笔夹在10只手指的指缝里，然后用力加以握紧，使政治扣留者痛苦万分。
4. 用打火机燃烧或用树胶带弹打，或者用铁针插入政治扣留者的生殖器内。
5. 强迫政治扣留者脱去裤子，用肛门坐在汽水瓶上。
6. 强迫政治扣留者脱光衣服在风扇下或冷气室内受凉挨冷，直到伤风感冒或晕倒为止。
7. 不断地动用“驱逐法令”把许多政治扣留者强行驱逐出境，而且对拒绝出境的爱国志士无限期地分别监禁在全马各地的刑事牢狱里。在芙蓉监狱内，有些拒绝出境的

爱国志士已被关了10至20年不等，目前仍然继续地被监禁著。

8. 有许多已被关了4年至8年以上的政治扣留者，目前仍然继续被无理地扣留。
9. 屡次动用残暴队进入扣留营以暴力镇压和殴打不愿出外被扣手铐的扣留者，造成多次的流血冲突事件。
10. 扣留营的生活福利和医药卫生等，仍然得不到合理的改善。

此外，在听证会上，我也以书面及口头说明了由于涉及马六甲阿沙汉园和彭亨直凉园工潮，笔者如何于1967年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及政治部如何对我进行恐吓、收买、心理战和“洗脑”，要我背叛我国工人的斗争和我的政治理想，支持当时联盟政府的政策。当局对我进行“颠覆”失败后，未经法庭审讯就把我送进拘留营，至1974年我才获释。我也说明了在拘留营内两度被殴打的经过。

营方对我们施暴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不是你的家”。我初进营时也错把“拘留营”当成我的“家”，而且竟然在“家”里唱起歌来！结果招来一顿毒打和处罚。这事件后来演变成全营同志罢食抗议，迫使营方公开道歉，处罚施暴者，并保证以后拘留者享有歌唱的权利。

我第二度被殴打，是发生在1973年12月29日。我在镇暴队的镇压中，下体受伤，几乎残废。其他受轻、重伤的同志，不计其数。当时我们是集合在华都牙也营办事处前，要求营方告诉我们太平营拘留者黄水生同志自杀身亡的事情真相。镇暴队的无理镇压，引发了一场为时47天的罢食，这就是著名的12·29大罢食事件。

与许许多多被迫伤、迫残、甚至被迫疯、迫死的同志比起来，我受到的迫害可说是最起码的，算是“华都牙也大学”的“入学资格”罢！无论如何，正如我在证词结尾时所说的：“我还是希望人权委员会能够致力于采取更为透明和有效的方式，让更多曾经被迫害过的前拘留者，愿意挺身而出，作出详细的投诉，以便那些施暴的罪犯，能够一一被暴露、指证、及被控上法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当局必须立即废除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立即释放所有在内安法令下的拘留者，或将他们控上公开法庭。”

(5/8/2005)

本章补充了1967年太平监狱8·28及华营5·26、1968年华营3·25、1968年麻营8·13、1971年砂营10·9及1976年3·2等6场绝食／绝食绝水斗争，以及《永远窒息不了的呼声》和《响应自由和正义的呼声》两篇附录。《永远窒息不了的呼声》是对1970年11·27华营流血镇压事件的控诉书；《响应自由和正义的呼声》则是马来亚政治扣留者为纪念联合国人权宣言25周年的声明，对我国政扣者当年的处境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这组资料配合12·29骇人听闻的镇压政扣者的史实，一方面足以把反动政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这些受害的政扣者申冤雪恨、讨回公道！



營
內
集
體
署
食
身

第七章：营内其他罢食斗争

（一）华营5·26绝食斗争

60年代，在臭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下遭扣留在华营的人士都是未经审讯的政治扣留者。他们除了被剥夺公民应享有的在公开法庭接受审讯及为本身辩护的基本民主权利之外，在扣留营内还要遭到各种无理的迫害。

当时营内所实施的完全是普通监狱的条例，不只蔑视人权，而且公然对扣留者进行蓄意的迫害。最令人愤怒的是，在扣留营里，扣留者仍然被剥夺集会、行动、言论和通讯的自由，甚至连唱歌和游戏都不准，即使在牢房小聚，也要受到惩罚，包括单独监禁在“面包房”若干天，三餐只有面包与冷水，还要遭到心地恶毒、行为卑鄙的狱卒的恣意污辱、骚扰和虐待。

政治扣留者日常的膳食配给经过营方与承包商互相勾结、上下其手的结果，食物品质粗劣，而且数量不足，食米里头甚至蓄意掺入沙粒、碎石子和铁屑，致使扣留者每天都须花费长时间将食米中的沙粒与碎石拣出来，进餐时也经常因咬到硬物而致牙齿损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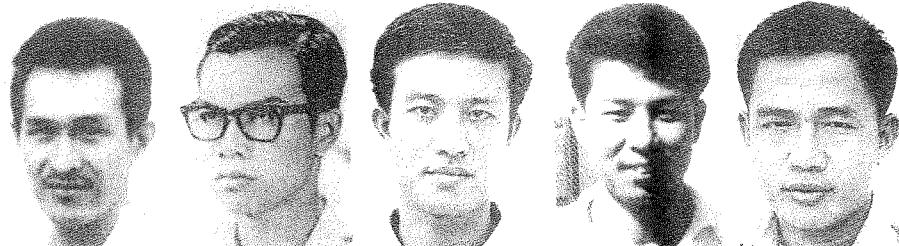
恶劣的环境加上不时发生的迫害和挑衅致使扣留者不得不起来反抗，这就是1967年5月26日由营中劳工党与人民党同志发动的绝食行动的起因，历时十六天的5·26绝食斗争事件，全面暴露当权者反民主和滥权的行为，并突破多年来扣留营内的白色恐怖。

华营被间隔为A、B、C三座。1967年，C座是特别营，里头关著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社阵主席哈斯诺、总秘书达裕汀、副总秘书拉惹古玛医生等。A座最大，有200多个囚室，囚居在这儿的，绝大部分是马、印对抗的俘虏和嫌疑犯，后期增加一些人、劳两党党员。

B座原本囚禁砂劳越人联党的干部和领袖，他们被调回古晋后，才由人、劳两党干部填补空缺。当时，该座扣留者计有：吉打州的柯建发、柯良德、郑伯俊、黄南明、赵善宝、雷钜添、曾汉生、林春华、徐华俊、陈连寿、甘毅旺、邢定淮、林木荣、李国章、赖锦松、谭亚耀、蔡有德；霹雳州的江海、毛谭今、林清桂、林进才、刘剑洪、彭国华、江玉晓、刘朝天、林今汉、刘倩、郑亚育、李凡、冯有钦、王今强；柔佛州的陈凯希、彭利生、张毅、翁武春、赖炳祥、林联川；槟州的陈潘钦、陈立志、陈福麟、管复翔、钟友青以及马六甲的杨甘林，共43人。

呈函人劳两党中央

上述名单由B座总代表陈凯希和副代表毛谭今于2月26日，联合署名寄给人、劳两党总部。3月9日，B座扣留者联名向监狱总监拿督慕勒提呈备忘录，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不久内政部组团到华营调查。B座扣留者也组成一个



陈凯希 刘朝天 陈潘钦 彭利生 柯良德

由陈凯希、刘朝天、陈潘钦、彭利生、柯良德为代表的谈判团，提出70多项要求，但只有10多项获得接纳。4月24日，陈凯希再度代表“B座难友”致函给人、劳两党总秘书，要求关注营内问题。该函全文如次：

鉴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特殊，及目前时局的需要，我们趁著内政部将派代表前来调查扣留者的生活情况的机会，正式庄重地提出改善我们的待遇、环境和要求基本的自由权利。这都是长久以来压制在我们内心的要求。

在全体四十三名难友致给监狱总监的长信中，我们指出：目前我们每人每日的伙食费只有区区七角钱，经过承包商的一层剥削，我们所能享受到的食物是可想而知了。我们要求把伙食费提高到块半，这是研究了目前量的不足、质的恶劣及项目的稀少所达到的最低限度的结果。同时，为了避免中间人从中牟利，我们亦要求自行购买粮食。

由于我们是政治扣留者，我们要求在这不及两亩地的小天地里享有宪法及联合国宪章上所规定的基本人权：集会、行动、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我们还要求报上的新闻不该涂去，刊物信件不该没收，收音机不该被控制，宿舍大门不该关闭，熄灯时间不该限制，同时我们亦要求政党领袖应

被许可来探狱，亲戚的探狱时间应予延长，亦准许我们每年春节归家省亲。

自我们失去自由后，我们的家庭陷入困境，我们既无经济来源，又不得不有所开销。因此我们要求政府许可我们在此耕作、养鸡鸭、做家私、藤器等工作，以便我们能协助家庭。否则政府应当发给生活津贴，让我们购买一些必要的日常用品。

我们被监禁的牢房原是为那些罪犯而建设的，设备差，空气也坏。里头非但没有水喉、厕所，连大窗也用锌板密封著。这严重地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我们要求这牢房的大门应随时开著，让我们能够解决早晚洗脸刷牙及上厕所的问题，窗前锌板也应拆除。

在我们致给监狱总监的信上我们也对我们的被捕表示了意见，同时也要求给予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在公开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否则无条件释放。另一方面，我们亦对被扣捕期间所受到的对待，及目前毫无期限的监禁表示抗议。

我们希望党对我们提出的上述问题表示关注，在必要时亦会支持我们的要求。此致

社会主义敬礼！

1967年4月24日

开展绝食斗争

5月16日，人、劳两党共同成立一个扣留者联合委员会，决定派代表会见内政部长敦依斯迈医生，并订于5月26日上午派代表到华营了解扣留者情况。两党也呼吁各州尽速成立扣留者家属委员会，以便互相照应。华营B座43名扣留者于5月26日这一天正式开展绝食斗争并通过家属带出一份投诉信，要求人劳两党扣留者联委会转达有关当局，投诉信全文如次：

劳工党暨人民党拘留者联合委员会诸委员鉴：

欣闻人劳两党所组成的“扣留者联合委员会”将于5月26日上午十点到华都牙也扣留营探访。为了使两党“联委会”能更全面的了解我们在拘留期间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恶劣待遇等详情。我们谨此向两党“联委会”提呈此份书面报告：我们深切希望两党的领导同志能重视我们政治扣留者所遭受的各种迫害和非人的待遇，并为我们伸张正义以及为我们合理提出改善营内的生活待遇而向有关当局据理力争！

首先让我们表明，我们都是在“国内安全法令”下遭受扣留的，并未经法庭审判而被监禁的政治工作者，我们不但被剥夺了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所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基本人权，同时我们还遭受骇人听闻的精神虐待和肉体折磨，以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政治扣留者，这在民主的国度里是极其少闻罕见的现象。这也是公然破坏国际公法的不法行为，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向“联委会”提出我们的控诉。

精神虐待及严刑拷打的审问

我们从被捕的第一天开始，不少的同志就遭受到被虐待的厄运。诸如党中央委陈文松同志，在审问期间，被关在高度冷气室里，连续四天四夜的疲劳拷问，在威胁与利诱没有得逞后，政治部便恼羞成怒，开始是揍耳光、拧耳朵，接著是揪住头发碰撞椅子，殴打胸部、腹部，燃著火柴烧下部，从皮伤一直打到内伤，至瘫痪地上，口鼻流血。有时脱光衣服在高度冷气室内拷问，强制只准以拇指和食指按在地上，两脚伸张两尺匍伏迫供。由于寒冷致使鼻涕直往外流；政治部人员硬压陈同志的头，迫他吸回流在地上的鼻涕，直到受冻晕厥。晕厥后却被政治部从陈同志的口、鼻灌入掺有烟蒂、剩茶和咖啡的污水，强行灌醒，仍旧继续被拳脚交加进行迫供，直到不省人事。四日四夜过后，政治部人员采用了威逼利诱的手段，续之又布下了各种圈套，企图使他跌下陷阱。这样连续个多月，一切书报都被剥夺。陈同志就这样地被单独监禁达半年之久。

(二) 霹雳州的蔡高排、高社、桂芬三位同志，在审问期间受到各种惨无人道的精神虐待和肉体折磨。在连续几天几夜关进冷气房的疲劳审问时，被铐上手铐，拳打脚踢，揪头发，碰墙撞壁，殴击胸部、腹部，以及用拖鞋揍打耳光至口鼻流血，并在枪械下迫供，令他们签反党及反共声明。

(三) 还有，不少民主爱国人士亦遭惨无人道的拷问，刑罚五花八门；有的生殖器被刺进数寸长的铁钉；有的十只指头插进钢针；腹部被铁枝不断的刺插，以致腹内严重损伤；有的由于受刑时昏倒，反被送去医院抽去

两瓶血液。甚至有些在长期迫供下，精神不支以致精神失常。轻者连续数天的拷打，拳击脚踢，直至无法支持倒地或溢血为止。以如此的法西斯酷刑对待政治扣留者，这是“民主国家”的一大讽刺。

拘留营内的生活待遇与福利问题

我们被无理监禁在扣留营里，不但失去了自由，同时还过著恶劣的生活。在营内，营方还定出了许多不合理的条规，进一步把我们在围墙内仅有的一点自由剥夺殆尽。如几个人在一起练习太极拳或体操、唱歌或游戏，甚至有时闷热在牢房内，向窗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都要受到无理干涉和警告。书信被没收，报章新闻被涂黑，超过三个人在房内阅读或谈天不被允许，晚上被关在牢房里，原本是很昏暗的电灯被限制至十一点关熄，严禁三个营的扣留者自由来往等，真是不胜枚举！

至于我们的福利问题：

(一) 目前营方规定，我们每人每天的伙食只有七角钱（包括早茶和两餐饭）。由于我们的伙食是由私人承包，因此我们实际上每天的伙食还不足七角钱。其次我们通过营方代买的各种食品和日用品，却像经过长堤税关一样被剥削。如一罐葡萄糖，外面市价一元二角半，这里却要一元七角，被抽了三十五仙的税。“三A”牌酱油，市价是两角或两角半一支，这里要五角，抽了一百巴仙的税，还有火柴、衣料、蛋、水果、塑胶桶等都比市价高出三、四十巴仙到五、六十

巴仙，价格昂贵的非常可怕。这种剥削比起高利贷者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试问我们的生活怎能不坏透呢？

(二) 目前，我们是住在一座一条走廊，一百多间小牢房里，窗口小，空气龌龊，完全不符合卫生条件，大大影响我们的健康，致使不少扣留者经常染上各种疾病。更不容忽视的是，我们有些难友生病，经常都被拖延诊治。有一次我们营中好些难友因食物中毒以致形成泻痢，病况是严重的，但营方竟对我们的病痛漠不关心，在几经交涉下，才把患者送院留医，大大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有时一些难友牙痛要求去拔牙，却非等上三、四个月不可，每个人都知道牙痛是极难受的，因此有些难友被迫自己想办法，以除疾痛……。

(三) 连最经济而必须供给的各种体育用具，我们都不能充分的享用，往往营方所供给的用具不是品质恶劣不能使用，就是缺乏供应，使我们不得不自己出钱购买，加重我们的经济负担，这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

综合了上述各种不合理情况，我们希望“联委会”能把我们以下所提的要求，向有关当局转达并争取：

- (1) 政治扣留者在审问期间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迫害，包括单独监禁、精神虐待、严刑拷打等；
- (2) 任何政治扣留者都必须提控法庭自辩，不然就无条件释放，马印对抗事件有关的扣留者必须被释放，因马印对抗已结束；

- (3) 在新年期间，必须准许回家过年团聚或家属有喜、丧事也应该准许回家；
- (4) 营内扣留者的基本权利如集会、唱歌、游戏等不该予以剥夺，同时保证今后的书信不被没收，新闻不被涂掉；
- (5) 伙食由目前的七角增加到一元五角正；
- (6) 在我们住宿的每一层楼内建设一间卫生厕所；
- (7) 晚上不能把我们所住宿的大门上锁，并取消十一点熄灯的条规；
- (8) 准许政党党员及扣留者的朋友探营；
- (9) 准许扣留者出去购买食物及日常用品；
- (10) 每月至少供给两套主题健康的华语影片；
- (11) 各种运动用具，营方必须充分地供给；
- (12) 提供更多的工作，诸如做家私、藤器、电器以及手工艺品等，倘若不能供给，政府应当发给每人每日五角钱的生活津贴；
- (13) 准许 A、B 营以及特别营 C 营的扣留者自由来往；
- (14) 准许在营内种植蔬菜、饲养鸡鸭，以补伙食的需要；
- (15) 供给一架收音机，让扣留者自由收听，以及一架电视机；
- (16) 每星期必须派医生到营内巡视；
- (17) 扣留者去医院看病不应被扣上手铐。

最后，让我们全体政治扣留者，对两党诸位领导同志所给予我们的关怀，致以最崇高的谢意。

谨此致
社会主义敬礼

扣留营政治扣留者谨上

1967年5月26日

同时参与绝食者，也包括囚居在A座的人劳两党干部：陈文松、杨培昌、黄少明、陈炳权、陈炳均、谢林金、黄乙新、蔡高排、蔡高社、蔡桂芬等。然而，绝食斗争开展的第二天，华营B座扣留者便受到野蛮的镇压。镇暴队开进营内，不单施放30多枚催泪弹，还打伤13名扣留者，其中4位伤势严重，被送进医院缝针治疗。绝食者全被关进各人的囚室里，实行单独监禁，原有的权益，诸如：会见家属、书信来往等一概被剥夺。

营外支援

人、劳两党中央也及时联合向内政部提呈备忘录，除照实反映政治部人员迫供、洗脑的案例以及营内生活环境、待遇差劣之外，也提出下列4项要求：

- (一)立即废除法西斯式的国内治安法令和取消紧急状态；
立即恢复我国人民的一切基本民主权利，恢复人民基本结社、言论、出版和行动的自由权利；
- (二)立即无条件释放全体政治扣留者，解除所有前政治扣留者的条件；
- (三)立即停止一切迫害和虐待政治扣留者的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必须接受华都牙也以及其他政治扣留营内的政治扣留者向营方所提出的有关政治扣留者在营内的基本人权，改善营内生活、学习、卫生等方面待遇的合理要求；
- (四)设立一个包括各政党代表、政治扣留者家属代表和社会人士的公开调查庭，公开调查有关政治扣留者在被

监禁期间所遭受到的迫害事件。

劳党中央又于5月27日向全国各州分支部发出紧急通告，号召支持扣留者的斗争，并积极做到：(一)广泛分发两党联合向内政部提呈的备忘录；(二)举行各种宣传活动，在党内张贴大字报、标语及进行访问；(三)积极和被捕者家属联系，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四)在各支部张挂大布条，书写：停止迫害政治扣留者，废除国内治安法令。

5月28日，1千500名劳工党党员在槟城阿依淡及大路后分别发动游击式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虐待及迫害政治扣留者。29日，远在南部的麻坡扣留营的30多名(扣留者)也开展绝食斗争。紧接着，全国各地都不约而同爆发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抗议示威，例如：柔佛州的峇株、东甲、新山、淡杯、麻坡、令金、北干那那、居銮；雪州的班达马兰、增江、峇都、半山芭；霹雳州的金宝；吉打州的居林等地，至少都有一次目的一致的游行。各州人劳两党分部或联合或分别发表抗议声明，人劳两党中央也发表联合声明，力促政府给予政治扣留者公平及人道的待遇，形成不小的舆论压力。

5月30日，40多名来自槟、吉、霹、雪四州政治扣留者家属，在槟州州议员许平城和劳党分部组织秘书谢思亮的率领下，在华都牙也扣留营大门前要求会见亲人，守候良久都无法获准，遂决定在营外捱到天亮。第三天，25名家属在陈志勤国会议员的率领下，到内政部与副秘书再纳阿比汀和监狱总监拿督慕勒会谈一小时半，最后，陈志勤才获准到华营探监。于是，6月3日在营外驻守的槟、吉、

露、雪四州政治扣留者家属一部分便移师到首都，在劳党总部集中后前往内政部请愿，并成立全国政治扣留者家属委员会。其成员为主席：刘海瑞（露州），副主席：李明石（吉打）；秘书：陈进生（雪州）；委员：刘新好（露州）、蔡来和（槟州）、陈炳衡（雪州）。委员会也通过5项要求：（一）要求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的子女，否则给予公开辩护的机会；（二）立即接受扣留者的合理要求；（三）保证我们子女的生命安全；（四）允许我们立刻会见子女；（五）设立独立调查庭，公开调查迫害和虐待我们子女的真相。

当天，劳党中央也与扣留者家属委员会联合发表声明，呼吁人民团结起来，制止联盟政府继续“行凶”。声明也强调：联盟政权必须立即接受扣留者的要求，解决绝食问题，必须公开保证停止迫害政治扣留者，停止以暴力镇压和殴打绝食者，确保绝食者的性命安全。其后，内政部答应让家委会3名代表：甘幼华、陈进生及李明石赴华营探监，三人探监后表示，政治扣留者将继续绝食，直到有关要求被接纳。

6月9日，时为内政部长的敦依斯迈医生突然辞职，其职位由副首相敦拉萨兼任，他与家委会代表会谈时，答应了政治扣留者的部分要求，并同意考虑进一步改善营内条件。翌日，家属代表甘幼华、黄华音（彭利生太太），内政部代表、监狱总监拿督慕勒在华营会见扣留者代表：拉惹古玛医生、陈凯希、江海、刘朝天、柯良德、张毅，扣留者宣布结束为期16天的绝食斗争。

6月11日，B座扣留者举行难友大会，选出第三届生活委员会，成员为：



总代表
毛譚今（露） 教育主任
黃亞慶（檳） 经济主任
蔡有德（吉）



卫生主任
冯有钦（露） 体育主任
黄乙新 康乐主任
（雪州，绝食期间由 A 座调往 B 座）
农业主任
赵善宝（吉） 林联川（柔）

大会通过下列三项提案：

- (一)向绝食期间给予我们极大支持的政党、家属代表和社会人士致以万分谢意；
- (二)呼吁全体难友紧密提高警惕，继续为合理的总要求斗争到底；

(三)呼吁政党、家属和社会人士密切关注我们反迫害和争取改善营中待遇的事件发展。目前，内政部长对我们的总要求只作口头上保证而已。

家属的斗争

关于家属在华营大门外的斗争，7月9日出版的第12期槟州《党讯》有十分精彩的报导，题为《爱国志士与家长心连心，誓把斗争干到底》，全文如下：

“华都牙也拘留营的爱国志士为了抗议联盟法西斯政权以残无人道的酷刑虐待以及把他们提出关于基本人权、膳食、学习、卫生、生活等总要求无理拖延，终于在5月26日四时展开了绝食斗争。当党总部获悉他们展开这场正义斗争之后，在5月27日便发动了各州部分家长去探狱。结果：营方违反一向来的惯例，毫无理由地拒绝了家长们的要求，而且还拒绝证实狱中的绝食事件，但是从27日开始，全国各地的反迫害，支持狱中绝食斗争的浪潮已广泛地掀起，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关注。

营中绝食进入了第五天，各州的家长便陆续到达华都牙也拘留营外，坚决要求准许家长探望子女、兄弟和亲人。当天下午，营长召集全部家长到营内的办事处去训话，说什么‘被拘留人士进行绝食，违反营内的条规，不许会见’等废话，许多家长不断与营方争论，并坚决提出，若不允许会见他们的子女，绝不离开办事处。尽管营方威胁要以暴力对付，他们还是在里头与那些狗腿坚持，一小时半以后，营方便召了镇暴队把家长们挟了出来。许多父老们还是不断地高喊‘我们有绝对的权利会见我们的子女’、‘我

们要证实我们的子女是否平安’、‘反动派的狗腿们，你们是没有好下场的！’

父老们被驱出以后，便决心在营外坚持，虽然该地警长警告，但家长们还是在营外住下去！

他们在营外到处徘徊，被关在第二、三层拘留房中的拘留者攀上铁窗，向家长们证实了营中爱国志士十三人受重伤以及全部被镇暴队殴打的消息。这时候，大大小小的狗腿便非常紧张地四处包围，捉了四位与拘留者谈话的家属，这些家属说：‘既不给我们会见，在营外徘徊有什么不可以！你们要把我们捉去那里都可以。’

傍晚时分，营方再通过警长企图欺骗家长们离开驻点，他说：‘或者你们明天可以会见，现在你们回家去，明天再来！’他还说：‘明天只许父亲、母亲及老婆会见，其他一概不允许。’有些家长便问他说：‘如果拘留者中，有的父母经逝世，而且还没娶老婆怎么办呢？’结果警方无言以答。父老们都非常清楚，这是他们要驱走家长和减少隔天营外的集中人数的诡计，结果大家决定要在那露宿并坚持所有亲属都应有权利会见他们的亲人。

晚上，华都牙也附近的同志们都非常热忱地来访问和帮助家属解决一些困难，他们从附近借了一些被单和枕头供应年纪较老的家长，野蛮无理的镇暴队却阻止行人进入父老住宿的范围并打伤了一位送被单的同志。经过父老们的抗议以后，其他送被单的同志才被容许进入。那些身体较健康的年青家属和同志们对年纪大的父老们都表示极大的关怀和照顾，把父老们安排睡在椅子或车上，而他们则睡在石敏土和草地上。

第二天，营方所许下的时间一到，父老们便蜂涌前往狱门，要求会见子女和亲人。结果不出大家所料，营方托辞说上峰下令不许探营。于是家长们便不断与营方争论。并敲打营房大门，大声高喊反动派的毫无人性……。党安排了一位律师去与营方交涉，营方仍旧不允许父老们的合理要求。在这情况下，父母们只好不断地去敲其大门，并大骂在楼上偷偷探头出来的狗腿……。

在午夜时分，有些从吉打乘火车来的家属到达了，其他整十名乘汽车的吉打州家属则先后被扣留在先及华都牙也的警局度过了一夜。

日夜在那里巡逻的镇暴队，每每在巡逻时将枪口对准住宿的家属，在晚上，则用手电筒去照射，以皮鞋制造吵杂声，以警棍敲打木棚，纵容坏分子抛石头，企图偷刺汽车轮胎等卑鄙行为。但是，这只有使父老们更加痛恨反动派，更加强了他们的斗争勇气。

6月2日，营中绝食已经进入第八天，早上十一时半，父老们再集体地去敲营房大门，有些年老的父母，由于忧虑营中绝食子女的健康情况而嚎啕大哭，大骂反动派，情况极为恸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家属们汇集在大门前高喊：‘我们要见我们的子女！’、‘我们要见我们的兄弟！’、‘陈凯希同志，我们已经坚持了三天三夜了！’、‘同志们，坚持斗争到底！’响彻云霄的口号声，大大地鼓舞了正在绝食中的狱中同志们的斗争！虽然镇暴队如临大敌，摇铃布阵，准备镇压，但家属们还是信心百倍，情绪高昂地大喊口号，把营外对绝食斗争热烈支持的声音传达给牢房中的同志！坚持了两个小时左右，营长不得不出来

来要求家属们等待至下午三时半陈志勤同志探狱后再作打算。

下午三时半左右，陈志勤及总部的一些负责同志到达了，气壮山河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响亮歌声爆发起来了，‘我们要会见我们的子女兄弟！’、‘坚持斗争！’、‘社会主义万岁！’等口号不断震荡起来，吸引不少远近的各民族群众。同时‘我们有绝对的权利会见我们的子女、兄弟！’、‘抗议政府迫害政治扣留者！’、‘我们要政府保证绝食者生命的安全！’的华巫文条高高挂起来了，更进一步和清楚地显示了父老们在哪儿坚持的斗争决心！

陈志勤经过了三个小时的探访和谈判毫无结果，他不敢向报界公布营中爱国志士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事实，但是他的谈话，证实了里头绝食中的同志许多被殴打而受重伤。

政治扣留者家属在营外进行斗争，每逢晚上，一些附近的支部同志都有前来慰问，怡保及朱毛支部还报效了一些东西；甚至距华都牙也集中营有八九英里的红泥山同志也踏脚车前来慰问，最靠近集中营的民望支部的一些小妹妹和同志们也前来集中营外集体学语录歌曲，玩节目。嘹亮歌声、笑声有力地鼓舞着正在进入第十天的绝食正义斗争的爱国志士们！

在6月5日那天，集中营中绝食已进入第十一天，营外家属也已经坚持了六天。从雪州前来慰问而被警方挟到怡保去的一巴士车同志以及槟城、安顺和附近支部的同志们都前来慰问。同志们都汇集在营外，连同家属共同争取探营

的合理要求，营方仍是毫无理睬，于是百余人的口号声便冲破牢狱四周的沉静空气。‘下定决心！’的歌声和‘陈凯希同志，我们都来了！’、‘营中的同志们，我们已经等了六天六夜了！’、‘社会主义万岁！’、‘斗争到底！’等亲切和激励的口号更提高营内外同志的斗争信心。同志们一直喊到四点左右才结束。

当各地来慰问的同志们都回去了，以及许多家长去洗澡、买菜煮饭，只剩下数位同志伯母和三个年青同志在营外的时刻，反动派的镇暴队便乘机强迫家属离开，并野蛮地把家属的行李抛上我们的车辆，将营前的空地重重包围起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全部的家属便决定集合在监牢的后面，高喊口号，通知在营内进行斗争的同志说，家属被迫离开，下吉隆坡请愿去了，并鼓励爱国志士们斗争到底！

第七天，全部家属到内政部前挂起请愿红布条，要求内政部接见家属代表。坚持到下午三时左右，内政部终于答应接见家属的七位代表。并在谈判之后允许家属的代表即甘幼华和陈进生等于隔天会见所有绝食的政治扣留者。内政部长也答应于两天后解决绝食者的总要求。

当家属代表在隔天获得会见所有的政治扣留者之后，斗争便告一段落而回家去。前后共是八天。在这八天里头里，许多父老们都从这实际的斗争中更深一层地认识了敌人残无人道的面目，也在斗争中教育了他们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以敢于斗争和在斗争中发挥互相支援，互相照顾，互相帮助的伟大精神，胜利一定是属于斗争的人民的！”

砂劳越政治扣留者的斗争

上述华营绝食斗争并非第一起，同年2月22日，砂劳越六里监护中心二百多名政治扣留者为抗议当局取消部分扣留者的既得权利，展开为期18天的绝食斗争。在人联党、古晋码头海港工友联合会、第一省巴士车工友联合会、第一省建筑工友联合会以及古晋印务工友联合会的声援下，内政部于3月10日派员与政治扣留者谈判，基本解决有关要求后，绝食行动才宣告结束。

9月6日，人联党中委钟勇华在监护中心运动时跌倒昏迷，中心负责人延误时间，以致在送院途中逝世，此事直接导致扣留者于9月9日展开绝食斗争。绝食进行到9月18日，当局才释放钟勇华遗孀李友娟。9月29日，内政部专员与扣留者签署协议，答应设立调查庭，调查钟勇华死因；赔偿钟府一切损失；每6个月为营中扣留者进行健康检查等要求，扣留者便宣告结束绝食行动。钟勇华遗体于9月17日停放在人联党总部，20日发引还山。

新加坡政治扣留者绝食行动

新加坡樟宜监狱、女皇镇监狱以及其他扣留所的政治扣留者也于6月8日起，开展三天的绝食斗争。兹以劳党槟州分部秘书处于6月19日发表的《新加坡爱国志士在狱中展开绝食斗争》文告为准，全文照录如下：

新加坡社阵总部林清祥同志在6月17日下午六时一刻在樟宜集中营内招待记者，解释集中营此次展开绝食斗争的原因及经过，兹抄录于下，希各支部将之抄在板报上：

林清祥同志说：在6月3日，我代表全部被拘留人士，写了一封信予监狱监督，信中提出十三项要求；第一项我们要改善膳食。在六个月前，我们吃的是西餐，但六月后，我们吃的改为中餐。中餐不但量少，而且质地很坏，诸如牛奶、牛油、饭和菜都很少，鱼和肉都不新鲜。

他说，第二项要求，是改善我们活动的地方。他说，我们目前被监禁的地方很小，没有运动场所，我们要求扩大我们活动的地方。第三，我们要求监狱当局给我们完整的报纸。他解释说，我们每天看到的报纸，有很多新闻被涂掉。第四，要求当局让我们收听短波广播，因为我们的短波收音机被当局取去。此外，我们要求当局不要限制我们的亲人来探视我们。他说，因为目前有一些被拘人士不准接见他们的兄弟。我们要见我们的律师。此外，我们也要求把所有的政治拘留人士皆关在一处，因为现在有些被拘留在女皇镇和其他监狱里。

我们提出十三项要求的信，被监狱监督所拒绝，是故我们决定在6月8日进行绝食，以抗议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抗议行动党政府关闭三间工会，抗议把政治拘留人士驱逐出境，如驱至中国、锡兰等。此外，我们的绝食，也是对在华都牙也和麻坡被拘人士的绝食表示支持。

我们的绝食在和平气氛中进行。但到了次日晚上八时半，监狱监督突然率领四十名狱卒与官员到来，以武力对付我们，结果我们之中有两人受严重的殴打，他们是KK奈尔和张秋仕，七名被送到处罚室里处罚，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们昨天写了一封信予监狱监督，要求向我们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此外，我们也写信通知李绍祖与知知拉惹。

我们的绝食，原定进行三天，但因发生上述事件，有七个被拘人士被带到处罚室，他们七人直至今晨始停止绝食，余者在三天即停止。这次停止绝食只是暂时性的。

要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

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劳工党槟州分部秘书处发

1967年6月19日

(按：此文原刊于《马来亚劳工斗争史》第十章第七节)

(二) 太平监牢 8·28 绝食斗争

囚禁在太平监狱的 10 名女政治扣留者于 1967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7 日展开绝食斗争，抗议监狱当局待遇刻薄，并要求遣送到华营。在槟州分部全力声援，以及林建寿、崔耀才、许平城等的奔波下，9 月 7 日，内政部常任秘书锡阿都拉与他们一同到太平与女政治扣留者谈判。由于她们的部份要求被接纳，绝食斗争也于当日结束。10 人为：刘秀枝（吉打）、孔梅芳（吡叻）、陈玉环（雪州）、李小红（雪州）、林南枝（柔州）、郭美娥（柔州）、黄青玉（柔州）、林艾蓉（柔州）、何八妹（柔州）、张亚妹（柔州）。〔摘自《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 509 页〕



刘秀枝



孔梅芳



陈玉环



李小红



林南枝



郭美娥



黄青玉



林艾蓉

编者按语：

经过参与者的回忆和斟酌，罢食日期可能是 8 月 28 日，而不是 8 月 18 日；而参与者的名单亦有所出入，有关的资料如下：

1967 年 8 月，太平监狱一角落监禁著 13 名女政治扣留者。她们是左翼政党（劳工党）的刘秀枝、陈玉环、陈七友、孔梅芳、李秀叶、李英；马英对抗事件的郭美娥、林艾蓉、洪桂兰、吴惠卿；阿沙汉及直凉园工潮的黄青玉、张亚妹、林南枝。

她们决定于 8 月 28 日展开绝食，提出两项要求：

(一) 改善生活条件，(二) 调往政治扣留营。

绝食行动前夕，在独立 10 周年特赦下，陈七友、李秀叶、李英获释放；其馀 10 人参与绝食。

获释放的女扣留者将绝食消息带到外面，引起外界及当局关注。在获得改善生活条件的承诺后，她们结束了（约一星期的）绝食斗争。第二年获调往华都牙也扣留营。

(三) 华营3·25绝食斗争

1967年10月22日，陈凯希在牢中当选劳党总秘书；11月9日，便被调往吉隆坡警察总部单独监禁，重新面对严峻考验。

这一次的迫害已非旧事重提，而是要他像甘幼华与何海平那样，发表悔过声明，以争取早日释放。为达到打击劳工党的目的，政治部官员甚至只要求他离开马来亚，到任何一个国家去生活，但都受到他的坚决拒绝。

然而，他万万想不到政治部官员竟然让他阅读华营B座反右单位批判他的18条罪状。吃惊之余，他还是从容地把18条罪状一一看完，从“罪状”的内容、措词来判断，他相信那不是政治部伪造的文件。问题是，如此隐秘的秘件如何会原件落在政治部官员的手上？

同一个人因1965年2·13群众斗争而成为被肯定的人物，两年后，竟然在牢中被自己的同志列为右倾头子点名批判。这种来自内部的打击有时比敌人的打击还难抵挡。

三个月后，陈凯希在警察总部恫言进行绝食斗争，抗议被当局无限期单独监禁，1968年2月17日，终于争取到调回华营B座。

华营A座的变化

1967年5·26斗争由B座扣留者发动，绝食行动所提出的

总要求其实是涵盖全营ABC三座。但是，事件过后，B座的生活待遇略有改善，而A座的待遇不但照旧，营方还变本加厉，蓄意加强压制。

1967年7月过后，大批党团人士陆续被扣押进营。进入B座的有陈福兴、谢思亮等；到A座的有曾天生、李万千、陈松生、周扬、加南星等。独立10周年前夕，在A座的大批对抗事件扣留者和C座拉惹古玛医生、哈斯诺、那沙隆等被释放，遂使C座暂时空置，而A座的党团人士则由少数转为多数，政治气氛也大为改善。

新进营的扣留者都是因为参加争取民主、人权、改革社会等政治改革运动而被当局以“颠覆”或“触犯”内部治安法令强加扣留的。他们大多胸怀理想、意志坚定，具有较高的政治意识与理论水平，绝不会自甘受到囚犯似的管制和对待。

而另一方面，5·26事件过后当局也不甘于镇压失败，出自政治上的需要和统治阶层的不良心态，处心积虑，竭力想恢复其“威严”，因此，双方关系日益尖锐和紧张，随时可能爆发正面的冲突。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扣留者加强组织和思想教育，作好斗争的准备。

8月10日上午，李万千与另三位扣留者在牢室里唱歌，值日狱卒上报后，营方小题大作即刻派出平素惯于欺压扣留者的狱卒进入牢室，强行将四位同志押至办事处，并在该处围殴及打伤李万千。嗣后还对他“判决”关禁“面包房”三个月。

对于这项严重的暴行和挑衅行为，扣留者及时作出反应，

长久受压制的 A 座扣留者，毫不理会营方的警告和威胁，迳自召集全体大会，选派代表与营方负责人谈判，限令营方必须道歉并即刻将李万千释放回营；同时须惩罚全部参与殴人的打手，并保证今后不得对任何扣留者动粗。除 A 座以外，BC 两座也派代表向营方发出警告，而李万千本人则在“面包房”内以同样的条件向营方宣布无限期绝食。在全营战友的激烈反应下，营方和监狱当局不得不于 8 月 13 日召集 ABC 三座代表，由营方负责人在代表们面前正式向李万千道歉，同时也答应扣留者的全部要求。

殴打事件过后，扣留者开始突破不准集会、不准唱歌等不合理的所谓“营规”，而营方也无法强制进行。扣留者方面，除了继续催促营方与监狱总监方面实现 5·26 事件所承诺的“总要求”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断以实际行动突破各项限制。

例如：食物的品质不合规格或数量不足时，即行退回，要求更换或补足；随时召开大会，商讨关系集体的课题；各座之间隔墙对话，或者“打电报”（注：A、B、C 二座隔墙抛掷信件，A 座在中间，除了可以跟 B、C 两座通讯之外，也协助 B、C 两座互通消息。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套制度，即使偶尔给狱卒发现，他们为了减少麻烦，也都视若无睹。）以交换对各项问题的意见，达致统一行动。

而长久以来饱受营方欺压的 A 座也不理会营方的警告，自行成立“战友生活委员会”，领导和处理扣留者的生活、学习与康乐等。在委会的主持下，开办文教班、武术班以及举办各种集体的文娱、体育活动（注：扣留者原本以

‘难友自居’，1967 年年底，大家立意将扣留者当作一个作战的场所，由此改称为‘战友’。）第一届 A 座生委会成员为：



总代：曾天生



副总代：陈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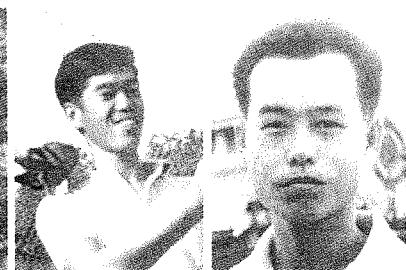
文教：周扬



财政：翁隆胜



康乐：罗耀棋



体育：萧金水 卫生：温锦源

在生委会的主持下，营内经常举行政治性的集会，针对国内外发生的时事与政治课题发表文告，提出意见与看法，表现扣留者对国家大事与大众疾苦的关怀，如声援各地此起彼伏的工潮、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农渔民斗争以及争取华教地位的行动等；还有声援当时正身处水深火热、反抗美国侵略的越南人民以及反歧视、争取平等地位的黑人民权运动。文告都是由家属传达至营外发表，通常都受到

相当的重视。

在殖民地时代，政府就设立一个所谓的“上诉局”，宣称扣留者如果认为有所冤屈，可向这个局申诉，就能得到公平的对待云云。这个局，一直都由一名殖民地时代担任过法官的英国人顾德所主持。

他定期巡视扣留营，未来之前即由营方通知扣留者，并为有意会见者登记和安排时间。长期以来，扣留者在会见上述“法官”时，都会提出无条件释放以及改善生活待遇等要求，“法官”往往唯唯诺诺，不断点头答应，过后则杳如黄鹤，毫无下文。这种所谓“上诉”，行同儿戏，令人反感，而且，扣留者并不以为曾经犯罪，实际上也无须上诉。为了彻底暴露这具有欺骗意味，而且十分伪善的“上诉局”，1967年9月22日华营全体扣留者拟具公函并集体签署，正式宣布抵制所谓的“上诉局”。

1968年1月22日，太平监牢14名女扣留者调到华营C座。此时，A座新人不断进来，他们包括反对旧币贬值斗争的十多位滨州劳党干部以及13名圣战军和3名回教党州级领袖。

1月23日，劳党中央通过报章宣布将于农历新年前，委派胡汉光和陈秀英携带新年礼物探访华营。“反右”单位（包括劳党霹雳州分部、劳党雪州某些支部及雪州人民党的成员）即提出：杯葛劳党中央代表来访，同时也反对生委会代表以营中扣留者代表的身份会见，他们认为一接见劳中代表，就会丧失反右立场，被右倾反革命的劳党中央捞取政治油水，利用狱中战友对他们的认同而在营外误导群众，阻碍反右路线的推行。

由于营内扣留者与营方关系正处在僵持的状态，当局进行全面镇压的行动随时会发生。在这种形势下引发论争，绝对是不利于扣留者共同对敌斗争的利益。另一方面，杯葛或不接见劳党中央代表，等于从整体上否定了劳工党。同时，不允许生委会负责人会见劳党中央代表（在会见时申明不代表反右单位），则是否定经战友大会选举产生的生委会的权限，后两项课题更是原则性的问题。因此，负责人尽一切努力与反右单位协商讨论，希望能消除分歧，避免组织上的分裂，以便恢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与反右单位讨论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营中支持劳党中央的资深同志如陈炳均、陈炳权、陈福兴等更亲自执笔撰写长篇论文，详尽叙述劳工党的历史与现况，说明党在各个历史阶段从事社会改革和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肯定它的贡献并主张以团结——批评（斗争）——团结的方法来处理左翼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另一方面，也以正确和科学的理论说明左翼党团的组织原则，并指出什么是破坏团结的行为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些文件在战友间传阅后，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不只明辨是非，廓清思路，而且得到绝大多数扣留者的接受和认同。反右单位则强调否定劳党中央，与之划清界线的鲜明立场，甚至为此导致营内组织的分裂也在所不惜。

3·8事件

1968年3月8日傍晚，当各座扣留者正在准备晚上召开的国际妇女节纪念会时，两位扣留者在A座楼上透过小窗与C座女同志谈话。这原是“营规”中所严禁，在楼下围墙

边站岗的狱卒无法阻止，便以下流的语言破口大骂，同时作出猥亵的动作影射对话中的男女同志。这卑鄙行径激怒了扣留者，即刻著令该名狱卒道歉，被他傲慢地拒绝。于是 A 座扣留者马上召集全体大会，并通知各座扣留者，同时派出代表出见营方负责人，要其上司处罚这名狱卒。由于群情沸腾，营方不得不同时接见 ABC 三座代表，无形中自行解除三座扣留者不许来往的“营规”。稍后时，为了缓和情绪，当局也接纳了全营扣留者的全部要求，包括惩罚肇事的狱卒。

致朱贵华电文事件

朱贵华于 1968 年 3 月 18 日启程到香港治疗。3 月 17 日，国内各报刊载了这项消息。当天中午，华营 A 座生委会负责人草拟了一则电文，分致 A、B、C 三座男女扣留者征求意见，并建议以华营全体扣留者名义发送予朱贵华，向他表示慰问与祝福。电文草稿很快就获得大多数扣留者的认同并同意以全体扣留者的名义发出，可是营内“反右”方面对这份区区五十余字的电文，却须花费六、七小时的讨论，直到当天傍晚才表示同意。

当晚，三座代表要求会见营长，奥马营长只进入 A 座，态度傲慢，对扣留者的要求稍作敷衍，即匆匆离开。营长的态度引起全体扣留者的极度不满，三座同志齐集办事处外高声声讨。营方旋即敲打镇暴警钟，全体狱卒配备起头盔、藤牌、警棍列阵以待。在群情沸腾的形势下，全体男女扣留者毫不退缩，也堆积了大量煮食用的橡胶木柴，准备作自卫还击，同时也设置水桶、毛毯等物，以防御催泪

瓦斯。

九时许，奥马再次进入 A 座，向代表表示：当局并未否定扣留者发送电报的权利，唯电文内容抵触内部治安法令，其上级不允许发出此封电报，代表要求奥马允许会见 B、C 座代表以商讨处理电报的事件及协助解除当晚的紧张局面，营长答允了。当 A 座代表随营长进入办事处等待 BC 座代表前来时，出现了几名政治部人员，大声呵斥，责备营长让扣留者“得寸进尺”，并下令不得召开三座代表会议。

稍后，奥马进入 A 座，向扣留者表示自己已无能为力，要求扣留者当晚遵照营规，回返牢房（原规定每晚九时关闭牢房大铁栅，至次日早上七时才开放）。扣留者拒绝，并表示若问题不获合理的解决，A、B、C 三座全体扣留者将坚持到底，继续在牢座外露宿。与此同时，当局也调遣了警察后备队（镇暴队）在华营内外驻守。当晚的局面十分紧张，前社阵总秘书达裕汀曾到办事处，要求会见营长，希望寻找出回旋的余地。这项尝试失败了，达裕汀回来反映的是：当局的态度十分强硬，有镇压的意图。

3 月 17 日晚上至第二天早上，全营三座扣留者均在牢座外露宿，未发生事故。

3 月 18 日上午，三座代表再度要求营方安排召集三座联席会议，营方拒绝。于是全营同志决定绝食一天以示抗议。A 座生委会领导为了使座内对敌斗争步伐一致，决定以 A 座生委会名义与宣布退出生委会的反右扣留者共同组成斗争委员会，作为对敌斗争领导机构。

“斗委会”决定以全营三座全体扣留者名义向内政部发出抗议信，说明绝食一天的原由，同时抗议当局显示欲血腥镇压扣留者的意图，并表示将采取与营方不合作的态度，直到当局改变凶残和顽固的态度为止。与营方不合作的具体步骤指的是：扣留者将不遵守“营规”，在狱卒点算人數时不排队。下午，全国监狱副总监苏来曼巡视全营各座，同样对各座代表表示：政治扣留者可以发电报，唯因电报内容抵触内部治安法令，当局拒绝代发此封电报，扣留者表示电报内容可作修改，但必须三座联席会议共商决定，并与营方谈判，否则任何牢座的扣留者代表将不会单独与营方接触，苏来曼表示将于次日再作决定。

3月19日下午，A座召开“斗委会”紧急会议，反右方面表示在事件未解决前拒绝排队的决定是错误的。他们宣称：“不排队是斗争形式的升级”，若不中止，他们将个别行动自行排队，并向内政部另呈一份抗议信。

与此同时，营内又连续发生其他政治迫害事件，如褫夺黄金钱和叶玉东的公民权并强制驱逐到中国去；拒绝C座赖群凤申请到麻营探望病重的未婚夫陈洪光；无理地继续扣留已办释放手续的翁武春，以及使用公安法令逮捕陈福麟的母亲等。

至3月25日凌晨当局派出联邦后备队(FRU)进营残暴镇压之前，A、B、C座均出现晚上进牢座(反右单位)与不进牢座的两个阵营，A座更有排队(反右单位)与不排队的现象，扣留者内部分裂，完全呈现在当局眼前，有利于营方的镇压。

全营展开绝食

25日凌晨五时许，五、六百名联邦后备队分别冲入华营A、B、C座，首先将露宿在牢座外的扣留者团团包围，同时强迫逗留在牢座内的扣留者进入各自的牢房，稍后将在外露宿的扣留者分批押送，强迫进入牢房。在押送过程中，联邦后备队成员在狱卒指示下，恣意殴打和粗暴叱骂扣留者。更在C座向女扣留者大量喷射催泪瓦斯。政治部人员尾随扣留者进入牢房后，开始肆意搜索扣留者的所有信件、书籍，并任意取去，在这个过程中，多名扣留者的手表、钢笔及其他贵重物品被抢劫。接著开始调动扣留者，将B座，以陈凯希为首，参与在牢座外露宿的全体扣留者强行押送至A座，而A座不在外露宿的“反右”成员则全部调往B座。这种调动方式实际上使A、B两座变成“反右”与非反右两个地盘，这是“反右”在扣留营内坚持搞内部分裂的后果。调动过程中，在扣留者自行搬运物件，毫无防卫力的情况下，狱卒不断突袭和殴打扣留者，甚至在进入单独监禁的牢房内，政治部与营方人员仍指示并放纵狱卒及联邦后备队警员，选择性地进入小牢房内围殴个别扣留者。华营狱卒，也许是惧怕日后受到扣留者的对付，一味鼓动临时由砂劳越方面调来的陌生狱卒凶残攻击扣留者，共有三十七位扣留者被严重殴伤。在这些毫无人性的法西斯暴徒疯狂施暴时，扣留者毫无惧色，高声警告，同时也揭露它们的暴行，引致全体扣留者齐声怒吼，及时把暴徒们的疯狂气焰压下去。

A、B、C三座(包括反右单位)全体扣留者当天即拒绝领取食物，拒绝进食，向当局的暴行明确表示抗议。

家属及劳党中央反应迅速，就在 25 日当天，全国家委会秘书陈进生便因槟、吉、霹、雪四州家属到华营探监被拒绝，而向报界发表声明，公布扣留者绝食斗争的消息。劳党中央委员会在当天的会议上得到讯息，立即议决支持华营的绝食斗争，并委派三名代表：全国副主席苏锦祥、总财政崔耀才、槟州工委会副主席拉惹辛甘律师赴华营了解情况。

26 日，三名代表率领 50 多位家属到内政部请愿，得到的承诺是：当局会研究绝食事件。同日，全国监狱总监拿督慕勒也向报界证实，参加绝食斗争的扣留者共 118 人，包括 14 名女性。

3 月 29 日，全马各地的百余名家属齐集华营门外，要求会见被扣的亲人，营方无理拒绝并企图驱逐全部家属。当家属坚持拒绝离开时，当局下令联邦后备队发射催泪瓦斯，并冲入人群疯狂殴打；随后且逮捕四十余位男女家属，监禁至 4 月 4 日，才带上法庭，以参加非法集会的罪名指控后，保外候审。四十余位家属在被监禁期间亦曾绝食三天，严厉抗议当局违反民主、藐视人权的粗暴行径。

槟州劳党党员最先展开声援行动，3 月 31 日凌晨，槟岛市区、阿依淡区、日落洞区、北海的街道、巴刹墙壁、桥翼、巴士车站和交通圈等处，都贴满以及漆上支援华营斗争的标语、大字报、漫画。晚上八时左右，头条路、二条路、三条路及过港仔连续发生示威游行。与此同时，槟州工委会负责人召开记者会，宣布坚决支持华营绝食斗争，并抗议当局扣捕扣留者家属。这是槟州自大罢市以来的首次街头示威，显示该州劳党各支部的活力依旧强劲。

同日，麻坡监狱 58 名政治扣留者通过家属宣布无限期绝食，以支援华营的斗争。劳党万挠支部也发表文告呼吁政府释放于 1962 年 12 月 16 日被捕的前任主席陈洪光，其家属同时发出警告，要求当局基于他有重病在身立即予以释放，否则，一切后果将由政府负责。

4 月 2 日，砂劳越政治扣留者家委会致电劳党中央，深切关怀华营的斗争；砂州 600 多位政治扣留者也绝食一天声援。4 月 3 日傍晚，吉隆坡数百名示威者手持劳党党旗以及写上“坚决支持营中同志的绝食斗争”和“抗议联盟政府迫害营中同志”的布条，从指天街开始，辗转游行到蒙巴登路，在交通灯时高喊反政府口号，十多分钟后和平解散。

4 月 7 日，劳党全国副主席苏锦祥、槟州工委会副主席拉惹辛甘律师、副总秘书刘元华、中委陈秀英以及 4 名家属代表：陈进生、颜玉蕙、黄贤心、王华合组成请愿团至司法部，要求会见部长巴哈曼。代表们携带备忘录与刘华年医生所提供的扣留者健康检验医药报告（刘华年于较早时获准进入华营为扣留者作健康检查），于获得接见时递交。在与巴哈曼会谈一小时后，部长应允将于 4 月 12 日与劳党代表及家属代表同往华营与扣留者谈商。

4 月 9 日，司法部秘书阿都阿兹与监狱副总监苏来曼到华营刺探扣留者态度。首先即打开陈凯希的牢房，询问情况。陈凯希坚决表示，除非有三座各方面代表一起集体谈商，否则不会有任何扣留者个别与当局会谈解决问题。司法部秘书当即答应，并传令召集三座各方面代表。会谈时，全体扣留者提出了八项抗议和十一点要求。接收了有关文件后，口头答应将作郑重考虑；同时也要求扣留者马上恢复

进食，以解决问题。代表们表示，恢复进食是关系到全体扣留者的问题，若无经过集体的商议则违反决定。于是，对方应允代表们回返各座召集会议商定。当营方打开全部小牢房的门后，全体扣留者以单独监禁严重威胁人身安全为理由，拒绝回返小牢房；同时要当局面即刻取消单独监禁的措施，回复绝食前的状况。

这次谈判除了因势利导，争取到开放小牢房之外，并无多大进展。但小牢房的开放，于斗争绝对有利，当局再也不能随意欺凌个别的扣留者了。

4月12日，司法部长巴哈曼到华营巡视，随行的有司法部常任秘书以及监狱副总监苏来曼，同时也召请劳中代表拉惹古玛医生、苏锦祥、陈秀英以及政治扣留者家属代表陈进生同行。巴哈曼在华营走了一圈就离开了。在与政治扣留者正式谈判时，司法部常任秘书半途离席，只剩下以苏来曼为主的监狱人员，扣留者谈判代表为：陈凯希、黎学伟、郑亚育、刘秀枝、林南枝、周扬、陈松生。当局在许



陈凯希



黎学伟



郑亚育



刘秀枝



林南枝



周 扬



陈松生

多问题上拒绝让步，致使谈判没有进展，宣告失败。苏来曼在离开之前表示，将于4月15日前来再次谈判。

4月15日，苏来曼并未前来，营方也不安排与扣留者谈判，只由奥马营长宣布当局已拒绝扣留者的全部要求。尽管在其时，当局在报上公布接纳了扣留者某些要求，但扣留者已经决定将斗争形式升级，以抗议当局的无良。

同日，槟州的日落洞大路后和二条路横路再度爆发支援扣留者绝食的示威。劳党槟州工委会发言人陈巧云召开记者会指出：“联盟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解决扣留者的合理要求，司法部长将责任推给秘书，秘书又推给副总监，副总监再推回给司法部长，这样推来推去，把事情耽搁而未加以解决。我们警告联盟政府，如果营中同志再有什么三长两短，国际法庭将会给予应有的处罚，一切后果要由当局自行负责。”

斗争升级

斗争升级的第一步是：拒绝接受营方每日向扣留者分发的葡萄糖粉，同时也向当局宣布：若再拖延解决问题，扣留者将拒绝饮水；准备以生命安危与当局周旋到底。

营外，党团同志、扣留者家属得知情况恶化后，更加忧心似焚，在劳党中央负责同志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扣留者家属以及密切关心的党员与群众于4月17日齐集首都聚商；并准备于4月18日集体到首相署向东姑阿都拉曼首相请愿，扣留者家属群情沸腾，家属中有年迈者向报界表示，若当局视扣留者生命如草芥，继续拖延解决问题，将抬著

棺木一起前往首相署，走著去，让人抬著回。

4月17日苏来曼忽然到华营召集各方代表会谈，当代表们发觉现场并无党团及家属代表，责问之下，苏来曼托词因时间急促，未及联络。在代表们坚持之下，营方只得临时以电话联络远在首都的拉惹古玛医生，但他为抗议当局无诚意解决问题而拒绝前来。在与外界全然隔绝的情况下，代表们向苏来曼表示只能与之作非正式的谈判。接著，苏来曼对扣留者所提出的要求中四项较为关键性的事项表示同意，并正式保证将予实现。代表们也在全体扣留者一致覆准的情况下，决定结束绝食；同时通过营方电话将消息通知麻坡集中营扣留者代表。该营也在第二天结束绝食。

4月18日，鉴于绝食行动已结束，营外家属取消向首相请愿的行动，仅由劳党中央代表苏锦祥、胡汉光及陈秀英依时前往首相署会见东姑。谈判的结果，东姑接受扣留者方面所提出的十一项要求，并保证将付诸实施。被接纳的十一项要求如下：

1. 政府释放陈洪光及翁武春；
2. 不实施出营上手铐；
3. 准许6名扣留者从A座调回B座；
4. A座三楼重开；
5. 准扣留者代表会见两名遭驱逐出境者：叶玉东和黄金钱；
6. 准许拉惹古玛医生进营看病；
7. 取消各种惩罚；
8. 赔偿在绝食期间被破坏的物件；
9. 调查镇暴队进营伤人事件；

10. 准家属于星期日探监；
11. 供给特别伙食一个月。

3·25绝食斗争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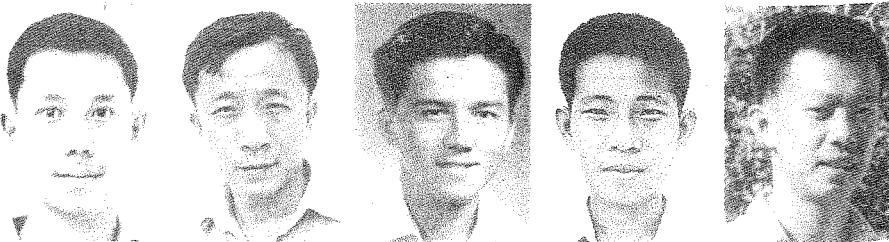
- (一) 3·25绝食事件是1967年华营B座全体扣留者发动的5·26绝食斗争后的延续。5·26事件曾在营外全国各地掀起群众运动的浪潮，推动民主政治的进展；同时也在营内突破营方蓄意制造的白色恐怖，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当局继续粗暴无理地对待无罪的扣留者。但是由于营方并未遵照诺言，不愿实现扣留者的全部要求，因而埋下必须展开另一次斗争的伏线。
- (二) 3·25斗争期间，营外劳党同志不畏艰苦，克服重重困难，将受追捕而失散的党员及支持者重新联络和组织起来；积蓄力量，沉毅英勇地继续策动和开展争取民主人权的群众斗争，终于打开局面，也带动全国各地，再次鼓起群众运动的巨浪，及时地对扣留营的斗争给予有力的支援。
- (三) 3·25绝食斗争事件爆发之前营内领导同志，特别是劳党中央负责同志如陈凯希、陈福兴、工运领袖李万千等以成熟的思想、谨慎的态度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科学地分析整个局势，进而准确地估计主客观的力量，克服弱点，掌握有利的条件，预先具体而全面地部署了各项步骤，大体上使斗争朝向胜利的方向推进。

(四)3·25事件是以当时国内的客观形势作为背景，事件发生后，党团同志、扣留者家属、群众皆被发动起来。年长的家属也毅然走向街头，有力地声援。他们在闹市群众的目击下受到军警残酷镇压的情景，不但震惊全国，也惊动了国际社会，引起多国人权组织与正义力量的关注与声援。当时并非资讯时代，媒体和通讯设备都受到强权的掌握和控制，任何讯息的传达总是困难重重；但是北京电台多次广播了华营绝食事件的消息，也全文广播劳党中央与新加坡社阵关于绝食事件的声明；澳洲及英国的电台与媒体多次报导有关的新闻。事件过后，国际人权组织曾派员专访陈凯希与陈福兴等。

4月26日：A座成立大团结生委会（注：该生委会主张左翼大团结，不分彼此共同斗争）：



总代：陈凯希 副总代：李万 教育：陈福麟 教育：陈松生 经济：彭利生



经济：廖子忠 福利：陈炳权 卫生：许平城 体育：朱齐英 康乐：罗耀棋

5月5日，B座选出第四届生委会，成员有：



总代：周扬



副总代：刘倩



教育：黎学伟



教育：李耀华



经济：郑亚青



卫生：曾国干



体育：黄松光



康乐：江海



农业：蔡高排

B 座第四届生委会成立后，随著外头局势的迅速发展，对于如何处理左翼内部思想分歧问题上，在生委会委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这个矛盾在 1969 年初处理“劳党中央新春探营团”的问题上导致白热化，终于分成两个阵营。赞成接见探营团阵营认为，左翼大团结是大趋势，应以实际行动体现；反对接见探营团认为，劳党中央是右倾组织，应与它划清界线，以免误导群众，影响反右斗争。

赞成接见阵营派出季耀华、郑亚育接见劳中新春探营团。事后，B 座生委会召集 B 座全体扣留者大会，宣布与赞成接见劳中代表的阵营划清界线。于是，江海、黄新华、郑亚育、李耀华、叶润兴、蔡高排、冯有钦、陈农风、郑华、周育华共 10 人，便宣布成立 B 座团结生委会，并选出李耀华为总代。此举也影响 C 座女扣留者作出相应调整。

（按：此文原刊于《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一章第一节）

（四）麻营 8·13 绝食斗争

麻坡监狱成为一座政治扣留营的历史比华都牙也监狱来得早。50 年代，马共副主席巴兰及一大批反殖斗士，就曾在这儿生活过，而且也曾经开展斗争，争取基本权益，其中包括庆祝五一劳动节。

1968 年 2 月，副首相兼内政部长敦拉萨在国会报告内安法令拘留者的数字时，麻营已住有 57 人。7 月，新人陆续进营，以及调营的结果，人数遂增加到 76 人，其中包括：1962 年被扣留的劳党总部执行秘书谢汉卿、劳党柔州分部宣教秘书吴维湘、从华营调来的人民党雪州分部财政曾天生、泉成黄梨园罢工领袖陈伟英、劳党甲州分部秘书戴经达、助理秘书张发起、人党中央委祝俊雄、前新加坡住联受薪职员周亚明以及涉及登陆事件的李义金兄弟等。

麻营分作 A、B、C、D 四座，A、B 两座各有两层楼高，是正式的牢房，D 座只有一栋平房，曾经囚禁过新加坡左翼领袖：方水双、陈德华、李朝明等人。他们于 1967 年释放后，这栋平房便被用作扣留者的娱乐中心。C 座的两层楼牢房建在足球场的另一端，防卫更为森严，3·25 绝食斗争过后，该座便一直空置，跟华营一样，麻坡扣留者于 3·25 绝食斗争过后，也分裂为反右和非反右两个阵营，各自为政。

其时，13 死囚事件引发一些政治扣留者面对被驱逐出境的威胁，据劳党法律顾问拉惹星甘的数据，全国竟有 17 人之

多，其中包括登陆事件的李义金兄弟，以及人民党中央委兼柔佛州议员祝俊雄，由于他们都囚居在麻营，遂成为麻营斗争的其中有关课题。另外，部分泉成园工运领袖在非法集会的罪名下被控上法庭，还需要上庭候审，可是，当局竟然违反3·25斗争有关出营不必上手铐的协议，要他们上铐去法庭。7月20日，他们拒绝上法庭，营方调来一支镇暴队强行押解，全体扣留者手扣著手，阻挡镇暴队执行任务，于是，双方便发生冲突，扣留者多人受伤。

陈凯希于7月中旬从华营被调到新山，以出席新山市议会调查庭，31日供证完毕，并没有送回华营，而是直接送进麻营。他曾致函调查庭，要求把他送回华营，但不得要领；华营A座扣留者向司法部长提出抗议，也没有结果。于是，8月6日，麻营扣留者（非反右一派）向当局提出10点抗议、16项要求，并限期一星期内给予满意答复。

10点抗议包括：

- (1) 抗议劳党全国主席许启针被单独监禁长达一百多天；
- (2) 抗议政府坚持吊死11名死囚；
- (3) 抗议政府有意关闭华文独立中学；
- (4) 抗议政治扣留者被无理驱逐出境；
- (5) 抗议当局未履行5·26及3·25绝食斗争的协议，特别是违反出营不上手铐的承诺。

16项要求包括：

- (1) 释放所有政治扣留者；
- (2) 设立调查庭以调查扣留者的遭遇；
- (3) 实践两场绝食斗争的承诺；
- (4) 不要没收政党寄来的刊物文件以及家属寄来的书刊；

- (5) 营方不得控制收音机；
- (6) 允许扣留者保有本身的小型收音机、录音机及电唱机；
- (7) 改善医药照顾；
- (8) 把陈凯希调回华营；
- (9) 改善营内灯光设备等。

限期一到，当局并无任何反应，因此麻营42位非反右单位的扣留者便于8月13日展开绝食行动。这场斗争比上两场受到更严密的新闻封锁。迨至8月22日，报上才刊出由柔州家属及劳党工委联合发表的绝食消息，这一天，华营A座及C座非反右扣留者也开展绝食行动予以声援。8月24日，劳党槟州工委及家委会步柔州后尘，发表声明支援两营的绝食斗争。

26日，麻营扣留者提高斗争形式，将绝食升级为绝饮。3天后，10多人不支昏倒，他们包括：陈凯希、谢汉卿、戴经达、周亚明、吴清苟、邱国英、郑举等。



陈凯希



谢汉卿



戴经达



周亚明



吴清苟



邱国英



郑举

于是，来自槟、吉、甲、麻、东甲、新山、居銮的家属为数50余人，于8月28日在劳党全国副主席苏锦祥、总财政崔耀才的率领下到司法部请愿，要求部长巴哈曼立即着手解决扣留者问题，并批准私人医生为扣留者把脉。两项要求均遭拒绝，家属在司法部过夜不走。

次日一早，苏、崔二人又率领家属到首相署求见东姑，只获首相署秘书叶进贵接见。一小时后，叶进贵交一封“东姑密函”给崔耀才，要他尽速转给司法部长。到了司法部，崔耀才发觉手中的东姑密函轻若鸿毛，在阳光下一照，里面竟空无一物，才知道给东姑耍了一招。在家属们的坚持下，司法部长终答应于9月1日及3日分别到麻营和华营去解决问题。

9月1日，麻营谈判破裂，扣留者代表为：陈凯希、谢汉卿、吴维湘、张发起；9月3日，华营代表：李万千、陈松生、陈福兴、许平城、刘秀枝等人又与副监狱总监苏来曼



陈凯希



谢汉卿



吴维湘



张发起



李万千



陈松生



陈福兴



许平城



刘秀枝

(注：当时，监狱总监拿督慕勒因无法偿还4万元债务，刚在霹雳高等法庭被判入穷籍)谈判，也告破裂。两天后，崔耀才和拉惹古玛医生向报界透露，一半以上扣留者的健康非常恶劣，他们手脚冰冷、不能站立、心跳微弱、屙泻黑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劳党霹雳州分部和党中央分别发表声明指责政府草菅人命，随后发表声明者另有：槟州工委会、柔佛工委会、新山人劳两党支部、全马鞋业工联合会、各州家委会；劳党雪州工委会及左翼工团则分别在吉隆坡发动示威游行。

9月9日，集合在司法部已三天的40多名家属开始展开绝食，抗议司法部长没有诚意解决问题。两天后，司法部常务秘书阿都阿兹终于奉命到麻坡与扣留者谈判，接受26项要求中的17项，绝食斗争遂告结束。苏锦祥在向报界宣布两营结束绝食行动时，也顺便提到麻营42名扣留者总共减轻1,020磅，总秘书陈凯希失去了人形，只剩下皮包骨。

政府与两营扣留者所取得的协议如下：

华都牙也营

- (一) 华营A座总代陈凯希可于两星期内由麻营回返华营，给予两天时间办理手续及收拾其物品；
- (二) 凡到怡保镶牙、补牙、拔牙及配眼镜之华营政治扣留者，可免扣手铐；
- (三) 每间房的灯光于两星期内由六十光增加到一百光；
- (四) A座及B座之政治扣留者可向营方申请华人节日举行各种球类比赛；

- (五) 每名政治扣留者每年给医生检验全身一次；
- (六) 每人每月供给香皂一块（由十月份起）；
- (七) 华营温锦源可与麻营温锦鹏每月通讯一次；
- (八) 在西医同意下，政治扣留者可给中医诊治；
- (九) 华营外建一厕所，以方便探访者使用；
- (十) 供给每人床布一条及枕头套一个（由明年起供应）。

麻坡扣留营

- (一) 现于麻坡扣留营的陈凯希于两星期内可回返华营；
- (二) 运动用具可增加（数量较后决定）；
- (三) 准 A、B、C 座政治扣留者在一起读书、看电影及运动；
- (四) 所有政治扣留者明年由医生作一次全身检查；
- (五) 房间灯光由六十光增加至一百，稍后再加改善（即由两房一灯改为一房一灯）；
- (六) 政治扣留者代表可访问在医院留医之战友，惟须根据扣留者情况；
- (七) 原则上同意政治扣留者在扣留营内养鸡，惟须待卫生人员批准；
- (八) 每名扣留者每月供给香皂一块（由十月份开始）；
- (九) 麻营温锦鹏可与华营温锦源每月通讯一次；
- (十) 绝食后给予两天有薪假期及增加一名工作人员；
- (十一) 在西医同意准许下，政治扣留者可给中医诊治；
- (十二) 供给大石磨一个；
- (十三) 供给每人一条床及枕头套一个（由明年起开始）；

- (十四) 在医生之推荐下可获得一个月特别伙食。

这一次绝食斗争反映出几个无情的现实：(1) 联盟政府已不再急于解决问题，绝食斗争遂一次比一次长久而艰苦；(2) 营外的支援力量已呈现弱势；(3) 舆论难以突破。

(按：此文原刊于《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一章第六节)

(五) 砂营 10·9 绝食绝水斗争

老友

狱中（编按：指砂拉越政治拘留营）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乃是当年 9 位狱中战友，为了要求监狱当局取消强施于他们身上的一切不合理的处罚，而展开长达 8 天的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

事缘于 1971 年 10 月 6 日，狱中官员带领了大批狱卒到 A 座搜查，被战友发现，于是一些战友便在大门口，高喊口号，抗议当局的无理搜查。狱官见状，无可奈何，只得撤离。过了两天，狱方与座内值勤官员先联络好，乘战友们在中午休息时，调来大批警方镇暴队，手持枪械，驻守在座外，然后狱官带来了大批狱卒。手持盾牌、警棍，凶神恶煞地，突然冲入 A 座搜查，翻箱倒箧乘机破坏一番，并掳走一批书籍。面对狱方的无理捣乱，战友们个个义愤填膺，情绪激昂，高喊口号，怒斥狱方官员的胡作乱为。

10 月 9 日，营长便点名召见 9 位战友，即是陈宗明、丘恒山、丘立诚、黄绍隆、林永伦、锺吉祥、许乃泉、苏孙国及朱兰光。在其办公室，营长宣布 9 位战友从当时开始即刻被处罚个别监禁在石屋的隔离室为期 2 个月至 6 个月不等，并取消政治拘留者应享有的一切权益。包括不准会见家属，不准拥有书报、不能听广播、与外界完全隔绝。随后，营长便命令狱卒即刻押送我们去石屋隔离室。对于狱方强施予我们身上的无理处罚，我们即刻提出严重的抗

议，并要求营长即刻收回一切不合理的处罚，让我们回去原座，但营长则一意孤行，强押我们至石屋隔离室。我们被个别囚禁在一间 4'x 8'，没有窗口，墙脚只有一个 6" X 1" 通风口的囚室里。里面空无一物，只能睡在洋灰地板上。

从办公室至石屋隔离室的路上，个别负责同志认为与其被囚禁在这人间地狱的囚室里，坐以待毙，不如采取坚决的斗争，即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以争取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处罚。于是到达石屋隔离室后，便通过墙脚的通风口，争取大家一起开展无限期的绝食绝水斗争。

按当时 9 位战友的实际情况和对方的情况，牢内外的形势及事件的本质来看，靠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到底，是有可能达到目标的。因此，大家一致同意，即刻开展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直至胜利为止。

这场斗争是从 1971 年 10 月 9 日开始，斗争的前 4 天是在石屋的隔离室内展开的。大家时而唱歌鼓励，时而喊口号抗议。斗争至第 4 天，在家属和广大社会人士及狱中战友的大力支援下，有关当局有鉴于事态的严重，绝食绝水者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因而可能引起不利的影响。于是训示狱方把我们移至营医院。在营医院，狱方准备为我们打水针，但遭到我们坚决拒绝。斗争进入了第 8 天，即 1971 年 10 月 16 日，有关当局才不得已与我们谈判。最后，有关当局只得同意取消施于我们身上的处罚，但不准回原座，即 A 座，而在营内厨房，另辟一新座即 A2 座，继续扣留我们。基于我们的斗争目标已达，亦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于是我们同意结束这场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虽然面对死亡的威胁。到后期，牙龈肿烂流血，小便时，流出的是滴滴的血水，鼻孔也流出点点浓浓的鼻血，身体枯弱，几处昏迷状态。但是，在正义的感召下，为了争取基本的生存条件，大家发挥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斗争精神，誓死不屈，坚持到底，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注一：本文为亲身参与此场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者所写，乃如实反映当时身历其境之实况。

注二：《墙内岁月》一书中，第120面至121面里曾提到绝水斗争，及友谊丛书之一《往事》一书中，第54面至55面也曾提到绝水斗争。此二篇文章与本文有些出入，诚请知情者翔实核查之。

09-10-2004

附件：参加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历史资料）

1971年10月，我与其他8位A座政治拘留者被调往隔离室处罚，由2个月到6个月不等。结果在大家同意下开展了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要求营房取消处罚，将我们调回A座，从1971年10月9日开始到16日为止，经过8天的绝食绝水后，营方基本上答应取消处罚，并把我们调到A2座。当时参加绝食绝水者有：

丘恒山、陈宗明、林永伦、钟吉祥、朱兰光
丘立诚、苏孙国、黄绍隆、许乃泉

（六）记一九七六年“3·2事件”

陈雪文

作者简介：



陈雪文同志，曾留学英国。1974年3月10日在内安法令下被捕，直至1982年8月31日才获释放。被捕时为新闻从业员，时年28岁，现已退休。

七十年代太平甘文丁扣留营内，政扣者为反迫害而进行的抗争不曾间断，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所发生的“3·2事件”便是其一。

当年营方为了各个击破，把政扣者“分类”隔离，监禁在以铁刺网和锌板围墙重重间隔的十几个区域内，进行分而治之。其中对政扣者中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的处置尤费心机。在初期，他们大多与工农难友分隔开来，被施以“软”的一套，有些则给予某些有区别的待遇。直到不那么“听话”时，再进行“另类”调动。但由于大伙同是内安法令下的受害者，命运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在面对威逼利诱时，多能感同身受，患难与共，心相呼应。每当某个营区有人遭受无理迫害时，邻近的营区难友大多会设法给予一定形式的支援。为突破封锁，一些有条件的营区难友，则会挺身攀上锌板墙与别区难友互通声息；偶尔遇到

别区难友路过时，也会争取攀墙致候。

三月二日上午，某区难友路过五区，该区个别难友发现后静悄悄攀上围墙向他们问好。看守狱官即刻发出呼喝，一边则以“猴子”恶言相辱，不甘受辱的难友随即以“禽兽”回敬。就这样，他们被押送到办事处，经过一番争执后，再被蛮横地押往“面包房”关押。

那座孤立建造专门用来单独监禁和迫害政扣者的“面包房”，平日高墙阴森，铁门深锁，动用时则刻意发出关门巨响，加上吆喝声，制造白色恐怖气氛。难友一旦身陷其中，便将孤立无援，命运叵测。那天，上述难友一被关进单人囚房，就遭到狱官掌掴，脸上被吐口水。受辱难友自卫地发出呼喊传讯，随即引起邻区难友的警惕和密切关注。

事态很快在营内传开，五、六、七区的难友相继作出反应，群起抗议，大伙攀墙声讨，呼吁营方停止迫害行动，立即放人。与此同时高唱抗暴歌曲，声援受害难友。

面对众扣留者的坚决要求，营方策划了进一步的镇压行动。在营长的率领下大队人马开进了五、六、七区，凶神恶煞地强行把参与行动的各区难友全都押进了“面包房”，人数共约四十几人。“面包房”一时爆满，只好三两难友共囚一室。囚室除四壁外，空无一物，只在高处有个通风口。不过在铁门处，相邻囚室仍可互通声息。这一来，原本阴森的牢房一下就变成了政扣者团结抗暴的战场。

当营长装模作样地充当“判官”，却为免在众扣留者面前威风被灭，而个别地传召难友“宣判”施以两周“刑期”时，难友们都投以轻蔑的眼光，暗自下定了抗争到底的决心。就这样，原本被隔离的各区难友联合起来，命运与共地一致决定，全体展开罢食斗争，直到迫害停止。

下来的十四个月夜，这四十几位难友是在身著平日的短裤囚衣、被迫睡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度过的。罢食期间，他们除了饮用水外全面拒绝进食。即使营方惟恐闹出人命而不断通过医药助理进行劝说或警告，难友们也无动于衷，毫不动摇。为了抗击营方的暴行，大伙忍受长期身心的摧残，由始至终紧密团结，斗志昂扬，做到了没有人倒下，没有人妥协，没有人诉苦，也没有人放弃。特别是来自四方的知识分子难友，在这场严酷的考验中，发挥了高度的自觉，坚定地与大伙心连著心，经受了锻炼，保持了一贯的傲骨与豪情。

随着罢食的进程，一些难友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日渐虚弱，只能平静地躺下。每当黑夜降临，蚊虫连夜轰炸，一些较敌视的狱卒则躲在囚室外不时发出各种怪叫声，进行精神上的干扰。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战友们以歌声互相呼应，互相鼓舞。墙里墙外，于是此起彼落地响起振奋人心的战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坚持下去，就是胜利！”通过歌声把心中的火苗互相点燃，战友的深情温暖著每一个人的心。

每当唱到“有谁愿离开家，有谁不想家，是谁不让咱回家……”时，悲愤之情便在难友心中荡漾，透过昏暗的牢房扩散开来，转化为无形的力量。

这场为期十四天的罢食斗争，最终以政扣者的胜利坚持以及当局的迫害图谋宣告彻底失败而告终。对于大多数“3·2事件”的参与者而言，无疑地这是一场严酷而艰苦的考验。它也把营内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内安法令扣留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行动表达了广大政扣者对内安法令下未经审讯的无限期拘留的强烈愤慨，为我国扣留营的反迫害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参与“3·2事件”的政扣者包括：

卢水清、李志江、赵华护、蔡亚福、陈永和、何金城、刘永金、苏容、范天福、黄亚九、刘佛通、徐建华、林长城、洪宜孝、黄亚佐、梁高才、郭富生、陈益、黄汉锡、吴昌荣、周毓豪、郑文泉、杨祥宣、黄贵平、萧清水、罗焕敏、张兴国、杨盛宜、杨贵波、林广昌、杜天福、杨文波（马大）、杨亚七（马大）、赖兴祥（马大）、侯亨能（马大）、何育才（理大）、陈清涌（星大）、陈水生（南大）、林南进（南大）、刘清铎（留英）、陈雪文（留英）、黄祥胜（留纽）。

以上参与者名单可能有误或遗漏，有待纠正。

附录：

（一）永远窒息不了的呼声

近几年来，拉扎克集团日益残酷地迫害各地政治扣留营和监牢的政治犯。他们的血腥罪行令人发指。1969年11月27日傀儡警察对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的政治犯的武装镇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据报导：拉扎克集团对华都牙也扣留营的政治犯开会欢迎来自麻坡政治扣留营的战士为借口，从1969年7月1日起对华营政治犯进行新的迫害，全体政治犯立即开展英勇的斗争，反对敌人的迫害。这一斗争持续了几个月。

1969年11月27日拉扎克集团派遣名为镇暴队的武装警察对政治犯进行暴力镇压，把许多政治犯打得头破血流，其中有三四人伤势严重，这就是1969年11月27日的流血事件。这次事件后，拉扎克集团变本加厉地迫害该扣留营的政治犯。但是，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们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不畏强暴，把扣留营当作战场，坚持斗争，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1970年11月27日该扣留营全体政治扣留者为了纪念这个流血事件一周年，发表了题为《窒息不了的呼声》的控诉书，揭露拉扎克集团的法西斯暴行。

控诉书说：我们是政治扣留者，不是罪犯，但是我们好像罪犯一样被对付。同其他扣留者一样，我们相信只有从我们的祖国消除一切暴力、镇压和剥削，才能建立一个真正

民主、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这是我们以自由和生命的代价来坚持和捍卫的政治信仰。我们要求消除剥削和压迫，但是我们所受到的却是不加审讯，长期监禁。我们是在臭名昭彰的国内治安法令下被扣留的。我们之间有些同志被扣留了六年以上。

控诉书说：在1969年5月13日以后，情况变得比以往更恶劣，到了1969年11月27日事件之后，白色恐怖的管制在这个拘留营悲壮的史册上继续写下了新的一页。那些令人痛绝的罪行，我们记忆犹新，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和有自尊心的人士听到这些野蛮的罪行和看到牢房的血迹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愤怒。

控诉书指出：在这个扣留营里最黑暗的时期，残酷的考验成为营里的生活日程；我们每天廿四小时被单独监禁在六尺乘12尺长的小牢房里，每天只被允许两人或三人一起洗澡和放风十分钟。结果，我们的健康遭受严重的损害。政府必须对白色恐怖管制的一切暴行，承担全部责任。这些罪行的重要执行者是扣留营总监奥玛末哈默阿明(Omar Mohd. Amin)。

拘留营总监是一个暴戾者，他不择手段地采取一切行动来压制我们的合理要求。他还善于制造种种借口来拒绝、停止或减少我们的日常供应，以饱其私囊。1969年11月27日事件之后，就是他挑动怂恿和指使人进行有组织的迫害，这是他亲自带领镇暴队；后备队在1969年11月27日夜里进入扣留营野蛮殴打政治犯。就是他在1969年11月29日在女牢C楼揪住女政治犯的头发，并推她的头部猛撞门栅，就是他在办公室里怂恿他的爪牙多次捆一位女政治犯

的脸颊，并剥夺她和亲友们会面和通讯的权利达六个月之久。当这位被扣留了四年以上的女政治犯在监警的监视下，在怡保医院治疗的时候，也就是他多方面为难这位女政治犯。当我们把被殴打的政治扣留者和偷窃政治犯财物的案件提出控诉时，他却置若罔闻，对那些行凶和偷窃的狱卒不采取任何行动。

控诉书说：在白色恐怖管制下，被监禁在单人牢房的政治扣留者，有的被打到晕厥，有的被打脱了牙齿，而当他们不省人事的时候，他们的财物也被偷窃去了。他们向医生申诉，回来后，他们立即受更沉重的殴打。有的政治犯在医院留医时，他们的手腕被手铐扣紧在病床上，遭受肉体上的折磨外，还要遭受精神上的折磨。那些狱卒配著阿华田空罐，尖声唱下流歌曲和大力敲打桌子，呼喊声、狂笑声和辱骂声，刺痛我们的耳朵，使我们的精神受到伤害。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走廊奔走追逐，在地板上顿脚，夜间有些狱卒故意一下子熄灯、一下子开灯，干扰我们的睡眠，有些行凶的罪犯，听到同志们被殴打的声音，反而更加疯狂起来。在这期间，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几乎成为一个刑场，卑鄙的行为，污辱和伤害政治扣留者的行为，受到当局的鼓舞和赞扬。

控诉书说：那些狱吏和狱卒在所谓“突击检查”我们牢房的藉口下，不是公开的掠夺，就是偷偷地窃走我们的财物，他们是劫匪加小偷。这种“突击检查”也是旨在制造麻烦和干扰，使我们得不到安宁。统治当局极力防止外界知道扣留营里发生的真实事件，所有信件如果被发现有谈到拘留营的情况都被没收。在会见来访者的时候，我们被

禁止谈到有关1969年11月27日事件的话题。政治扣留者被强迫去做没有报酬的劳动，有些患病的政治扣留者也被当局强迫去参加劳动。

控诉书指出：这些罪犯骑在政治扣留者头上作古作怪，有时他们还互相鼓励和竞赛干更多罪恶，他们日夜殴打政治扣留者而不受任何处罚。他们甚至相信处在紧急状态时期，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地制造借口来杀害政治拘留者而不受任何处罚。这样，听到狱卒开放和关闭牢房的声音常常就是暴行的预兆。我们遭受他们极端邪恶的暴行达六个月之久。每天廿四小时单独监禁，对我们身体健康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害。接著，每天十二小时无限期的监禁，使已经恶化的健康，进一步严重，结果有一位同志就死于心脏病猝发。还有其他疾病正在蔓延。三位有心脏病，两位有精神病，三位有肺结核病，百分之四十有胃病，百分之五十五有鼻病。难道这些数字还不够雄辩地证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已经被毁坏和威胁到何种程度吗？难道我们还没有提供足够的事实证明政府是有目的在对我们进行慢性的谋杀吗？历史已经证明：所有反动政权，对政治拘留者进行慢性的、有计划的杀害，即以简陋卫生设备和通风设备，加上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说明了政府恰恰要我们逐渐地死去。这种方法不是比露骨的屠杀更加残忍和阴险吗？我们呼吁一切有正义感的各族人民，关注在这个拘留营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控诉书说：必须指出：警察当局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我们是想强迫我们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但是，恐吓和折磨决不能使勇敢和坚强的人屈服。可以预先地说，政府是一

意孤行来压制我们。今后他们还会迫害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我们之中并没有人会缺乏勇气和决心，为捍卫正义事业而继续奋斗。

控诉书说：朋友们，同志们，同胞们请倾听我们的呼声：我们是被拘留在一种毫无自由的情况下，我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我们正当的要求被压制；由于我们热爱自由，因而遭受监禁；由于我们热爱正义，因而遭受折磨。今天，恐怖管制还在严格执行，我们坚信有正义感和有自尊心的人士，一定会支持我们。马来亚人民绝不让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逃脱人民的制裁！

控诉书最后说：我们恳切地呼吁马来亚人民和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制止反动政权进攻政治拘留者的罪行，我们向人民呼吁支持正义的事业，谴责邪恶的罪行！

附录：

(二) 响应自由和正义的呼声

马来亚政治扣留者为纪念联合国人权宣言廿五周年声明

际此联合国人权宣言颁布的第廿五周年纪念日，我们全体马来亚政治扣留者，以丧失人权的无辜者身份，谨此声明，以促请所有热爱自由和正义的以及那些捍卫及促进人权的人士关注马来亚的政治压制和政治窒息，并且暴露拉扎克——李光耀集团在口头上誓言尊重和推崇人权宣言，但在实际上却践踏人权宣言于脚下。

(一) 马来亚的政治压制和政治窒息

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在国内外的事务上采取两面政策。它以空洞的政治词藻和伪善的外交姿态把自己装扮成自由、民主的外貌，拉扎克政权出席不结盟国会议兜售其所谓“东南亚中立化”的政策，企图掩盖其亲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本质，并大做其建立「民主新形象」的迷梦。

这个反动政权假热心地“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但在国内却疯狂地实行种族压迫政策。它在外国以“伟大的人权捍卫者”的姿态，说尽漂亮话，妄图掩盖其在国内的野蛮压制和违反人权的事实。它企图通过此种伪善的行径来愚弄世界人民，但一切的花招并不能改变血淋淋的事实。我国人民长期以来所遭受的痛苦，及我国目前所经历的动乱将不会被此种宣传伎俩所模糊。我国人民有责任将反动

的拉扎克政权的真正本质向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示。

人们要问，拉扎克政权对联合国人权宣言尊重到什么样地步？它究竟给本国人民特别是政治扣留者以什么样的基本权利？让事实本身来见证吧！

在拉扎克——李光耀独裁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下，所谓“民主”不过是神话。所谓“议会民主”不过是幕闹剧。所谓“国会”不过是树胶印，是当权者为政治利益服务的权宜手段，目的在掩盖统治阶层的独裁本质及保护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利益。所谓“竞选”是完全受当政集团操纵和控制的。中选的反对党国州议员都被任意逮捕及不经审讯地扣留。例如，星洲国会议员李思东同志于六三年中选后立即被捕，随后他的公民权被剥夺。现在他已是在星洲扣留营中监禁了十年，马来亚劳工党副总秘书陈福兴是槟州立法议会的民选议员，他是在任议员时期被捕的，他愤而辞去州议员职位以抗议假民主及响应马来亚劳工党杯葛1969年的大选的号召。人民社会主义党中委朱基利菲是彭亨州议员，在他还未来得及出席首次州议会时就被逮捕。他们都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被监禁了四至七年之久。

反动政权已将我国沦为法西斯警察国，政治部的情报网遍布每一角落。我国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权。联合国人权宣言保证每一个人有思想、发表、出版、集会和组织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却被压制，根本不存在。真正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政党和工会被封闭，他们的领袖干部和成员被抛进监狱，那些未被监禁者不断遭受到政治迫害。进步团体和刊物被有系统的清除。任何敢批评政府政策的和持相反意见的人就被套上“反国家份子”及“颠覆份子”，随时可在

“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捕和监禁，忠诚和爱国的公民生活在恐惧中，语文和文化问题被立法宣布为“敏感问题”禁止人民公开发表和讨论。所有宣传机器被严格的控制和检查，总之，所有反对的声音都被窒息，所有正义行为都被压制，这就是所谓“自由”民主和正义国家的真面目。

（二）马来亚政治扣留者的一般情况

政治扣留者问题，是我国当权者侵犯人权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多少年来，数以千计的反对党、工会领袖和大学生，被一批批地横蛮逮捕和迫害。这些大逮捕是在不经法律程序下进行的。完全没有法律途径可以保护扣留者免受政治部人员施以粗暴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目前尚有四百名政治扣留者被监禁于马来亚各地如华都牙也、麻坡、太平和星加坡岛上的监狱。此外，不少过卅名政治驱逐者，分别监禁于芙蓉和半山芭监狱。

马来亚政治扣留者因持有与执政集团不同的政治信仰及对政府政策发表不同的意见而被逮捕。简而言之，我们是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为了自由和正义而斗争，才被捕的。在这个国家，爱国分子被诬蔑为“叛国份子”，叛国分子被歌颂为爱国分子。在这个国家进步和清廉的公民被诅咒为“反国家分子”和“颠覆分子”，反动的社会渣滓被吹捧为“社会栋梁”。在这国家，一小撮特权阶级无情地压制和剥削广大的受苦受难的人民。人们不满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无数爱好自由和正义的人士正在挺胸而出，为争取恢复人权和社会进步而斗争，我们政治扣留者是这斗争队

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政治扣留者是在令人憎恶的无所不包的“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的。此法令授权内政部，以不须审讯和无限期地逮捕和扣留任何人。只要部长认为需要，便可把一个人监禁整个下半生。我们的被扣留是不义和非法的，但却没有法律可以阻止部长的随心所欲地长期扣留我们。在长期和无限度的扣捕下，四百名扣留者当中有三巴仙被监禁了超过十年，十五巴仙超过六年，卅五巴仙超过四年。

政治部人员最喜欢及拿手的便是长期虐待狂的手段，在精神及肉体上去折磨政治扣留者，以挫折他们的意志和迫供。故此，被虐待的政治扣留者被送进神经病院的已屡见不鲜，有的据说是“跳楼自杀”，有的“自己跌断肋骨”……。细诉政治扣留者所发生的这些惨事，是多么沉痛和令人发指的啊！

任何坚持其立场和原则的被捕者拒绝做滑稽的“电视明星”，不愿谴责和背叛过去的政治信仰、活动和同志，就被关进黑牢。那些拒绝招供，不愿在威逼利诱下屈服的人，也就享以铁窗风味，反动政权以长期和无限期之监禁手段企图迫使扣留者屈服。政治部官员告诉我们：“改变你的思想，谴责你过去的活动，否则你绝没有机会踏出牢门！”这是一种廉价的，但也是严重的政治勒索。这是彻头彻尾的侵犯思想自由权利。“承认你的错误，然后我们将会向政府推荐释放你。”这又是一种权宜之计，企图把不法和不义的扣留合法化，以误导社会舆论，转移人民愤怒的目标。

在扣留营中的恶劣条件及长期禁锢，已损害了大部份政治扣留者的精神和肉体的健康。这种迫害，企图损害他们的健康，消蚀他们的智慧，这实在是一种慢性而肯定的谋杀方式。这政策已夺走数名政治扣留者的生命。前马来亚劳工党委、马六甲市议员冯朝民同志，在狱中死亡，这完全是反动政权长期监禁和迫害，故意忽视其健康所造成的。

每当反动当局认为必要，便随时调来“联邦后备队”（受特别训练的军警），对正在进行绝食斗争，以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政治扣留者狂施暴行，以暴力镇压和施放催泪弹。在监牢里，长期的单独监禁被利用来挫折扣留者的意志。伪政权的官员竟然说：“你们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在不采用暴刑的情况下杀死你们，编个对付你们的藉口是容易不过的事！”在这种无情的迫害期间，律师或亲属都不许来访。因此，当局可以散播各种各样的谎言，进行污蔑以掩盖其一切暴行。

为了缓和人民越来越高涨的愤怒及避免我们的家属反对其迫害和长期扣留政策，反动政权指示政治部官员在全国进行公开的造谣中伤的宣传，企图丑化我们政治扣留者在人民心中的伟大形象。政治部官员说：“是政治扣留者不愿出来，他们在牢里生活得很快乐！”

只有最无耻的法西斯主义份子才有勇气散播此愚蠢可笑的谎言。他们只差没有把这恐怖的地狱描述为天堂罢了！他们的居心是昭然若揭的、恶毒的。首先，企图欺骗和误导公共舆论以使其迫害政策合法化；其次，企图把长期监禁的责任推到政治扣留者身上。由于监牢并不是天堂，即使

是笨蛋也不相信他们那种可笑的言论。这种造谣中伤的宣传，只能更进一步暴露反动政权的恶毒和怯懦。

反动政权知道监禁我们是专横的、非正义的和非法的，会引起人民的反对和谴责。为了使这种专制不义和非法的监禁，取得一些表面上的公正，此政权特地成立了所谓“咨询局”，定期检讨每一个扣留者的案件以推荐释放或继续扣留。值得注意的是该局是由一位叫古德的法官（JUSTICE GOOD）担任主席，这家伙是个臭名昭彰的英殖民主义者。他在英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中曾担任过重要角色。在过去十三年来，他忠诚地为反动政权服务。

事实上，该局仅仅是一个傀儡机构，它的设立旨在把专横、不义和非法的扣留合法化。即使是政治部人员也曾多次向政治扣留者表示“释放或扣留一个人的权利，完全是操在我们的手上，并不是‘咨询局’”。这是不打自招的事实。该局只为反动政权服务，它是反动政权为政治上、宣传上的需要的工具。因此，它的任务与正义、民主等毫不相干。我们认为出席该局的检讨是一出闹剧，它的作用不过将监禁合法化。为了暴露其傀儡本质，我们坚决杯葛它，以免人民受蒙蔽。

政治扣留者经过长期的非法监禁如获得释放，反动当局又将许多限制条件横加在他们身上。他们被剥夺了参加政治活动和职工运动的权利，他们的居住和行动受到约束，他们被强迫向警察局报到，复受警方人员严密监视和刁难。任何无根据的怀疑都会使他们重投牢房。表面上他们被释放，实质上他们是走出有墙壁的监牢，跨进较大的无墙壁的监牢。这就是我国成千上万的前政治扣留者的命运。

反动政权的另一个迫害政治对手的方法是剥夺他们的公民权，然后将他们监禁起来以候驱逐出境。

目前有三百名政治驱逐者分别监禁于芙蓉和半山芭监狱。他们大多数在本国出生，他们的家属已在这土地上根深蒂固，他们的被驱逐出境，主要是他们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并与此独裁政权斗争。最特出的例子是人民社会主义党中委祝俊雄同志，他是在一九六七年被捕。被捕前是民选柔佛州议员和新山市议员。他们被监禁和驱逐纯粹是基于政治理由。政治驱逐者的困境是骇人听闻的。政治驱逐者的待遇并不比普通刑事犯好。一个刑事犯的服刑是有限期的，然而一个政治驱逐者的监禁是无限期的，有的已被禁锢达十五年之久，有的死在监狱里，大部份被迫在黑牢里受苦。

(三) 我们的呼声是正义的呼声

历史已证明自由是不能乞求的，它需要以高价来争取。以我们身受的经历，我们理解在追求自由和正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克服重重的困难和作出重大牺牲。在真正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感召下，心怀亲爱的祖国和广大受苦难的人民，我们准备面对任何困难，并愿做出更大的牺牲。我们的道路还很漫长、艰苦，但胜利却是肯定的。

我们坚信，我们的正义事业将最终获得辉煌胜利。我们也坚信，不体面的释放将使人终生蒙上耻辱，为真理而坐牢是一生的荣誉，不论我们将被监禁多久，不论我们将遭受什么造谣中伤、迫害和虐待，我们绝对站稳脚跟，高瞻远

瞩，尽管我们与外界隔绝和家人分离，也不能与我们热爱的受苦难同胞会面，但是，我们和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内心的连系是绝对不会被高墙厚壁所分隔得开的！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人民事业，人民祈望著自由和正义。我们的呼声是正义人民的呼声。人民正在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历史已证明：自由和正义的呼声是绝不会被窒息的。因为这是永远呼应和回荡著的呼声！怀著无限的信心和希望，我们呼吁所有热爱自由和正义的人士响应自由和正义的呼声！发出你们的抗议吧！为控诉独裁暴政，为捍卫全世界的人权而斗争吧！

马来亚政治扣留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